

中国底层

访谈录

上卷

老威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底层访谈录/老威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

ISBN 7-5354-2126-1

I. 中…

II. 老…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4219 号

责任编辑:吴双 阳继波

封面设计:叁一工作室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三河市文阁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20.25 插页:4

版次: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2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5354-2126-1/I·1625 定价:42.00 元(上、下简精装)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上卷

序言：哀民生之多艰（流沙河）	5
老戚在底层（代序）	10

胡风牢友张广天	16
---------------	----

认识 63 岁的张广天纯属意外，但一回生，两回熟，幸好我在四川东北部某县的一个社会福利机构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否则就不会知道胡风竟有这么一个贼眉鼠眼的“牢友”。

死刑犯牟大路	26
--------------	----

他局外人一般谈论着别人的死。我晓得，如果给予第二次生命，他选择的仍然是犯罪。

人贩子钱贵宝 37

拐卖人口是一项历史悠久的罪恶行业，在旧中国，这种能赚大钱的买卖都由黑社会操纵，把骗到手的良家妇女高价转给发达城市的妓馆。没想到，新社会铲除了黑帮，拐卖犯罪却由钱贵宝这种大山里的乡巴佬继承了。

打工仔赵二 47

时为 1999 年 1 月 12 日晚上 9 点钟，阴有小雨，气温仅有摄氏 4 度。我在成都新南门附近的巷内，用 10 元钱买下了这篇谈话。

厕所门卫周明贵 58

年近七十的周大爷与粪便打了一辈子交道，晚年却鸿运临头，承包了成都市西郊茶店子附近的一所公厕，“这也算生意，”他说，挺精神的样子。

居委会主任米大喜 69

73 岁的米主任是少年老威心中响当当的人物，虽时过境迁，但昔日雄姿犹存。当我在桌边整理这篇文字时，那个时代的马车轰隆隆地从脑海中碾过。

赌徒周忠陵 80

周忠陵是我的患难朋友，我住疯人院的时候，

他仍然九死不悔地坚持探望，后来我发觉他也有病，这叫我太绝望了，原来在这个薄情寡义的时代，只有疯子之间的交情牢不可破。

酒鬼高马 92

高马在北京一家著名的报纸当了多年的编辑，他嗜酒如命，曾喝遍天下无敌手，经常处在一种半醉半醒的状态。更令人想不通的是，高马还是诗人，出色的翻译家，虽然满脸浮肿，左看右看都不象有文化的人。

书商万人敌 103

40岁的万人敌做过多年诗歌美梦，终于壮志未酬。转而适应经济形势，改行做书商。不料一炮而红，再二炮、三炮，成了百万富翁。可万人敌天生的贱骨头，狂吃狂喝、偷鸡摸狗如昨。

写手茜茜 112

茜茜的名言是：“女人比男人的社会风险更大，从写手到作家，一步之遥；从《还珠格格》里的公主到三陪小姐，一步之遥；从家庭主妇到另类宝贝，也是一步之遥。”

嫖客唐东升 122

1985年8月1日夜，我与一些熟人，被招待进成都高新区的一家夜总会，本想借机采访嫖客，不料迎头撞上老唐。我与老唐八年没见了，

在这种场合重逢，哈哈一笑，都把对方当成了嫖客。

三陪林小姐 131

林小姐脸色苍白，不是做三陪的料，更为犯忌的是，她与我这个夜总会的不速之客在外面有了联络，并把这种危险的浪漫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

蜀派古琴大师王峪 139

王峪大师已经 87 岁了，他的经历见《巴蜀地方志·音乐名人传略》；他的琴音已由台湾天籁出版公司制成光碟，在海外广为流传。

街头瞎子“张无名” 149

1996 年 12 月 22 日，有人从街沿右首牵出一位瞎子，怀抱二胡，摸上石阶，挨桌向食客打躬问寻。我怜其年老瑟缩，遂点了一曲，不料琴弓初开，即非寻常之音，也就动了访问的念头。

农民皇帝曾应龙 156

曾应龙犯组织、领导、颠覆等多项反革命罪，政府念其愚昧，从轻判处无期徒刑。他性情乐观，服从管理，警察和犯人都对其印象较好，经常戏称“陛下”。我被“恩准”向陛下赞助人民币 50 元，支助他读四川函授大学。

国民党老人廖恩泽 165

廖恩泽黄埔军校毕业，曾任国共谈判国民党的参谋人员。多少年后，他与牢中难友老右派冯中慈成了好朋友，继续进行着“国共合作”。

老军人廖恩泽侄儿廖觉 176

1999年5月24日清晨，国民党老兵廖恩泽突发脑溢血，终不治而亡，享年79岁。他的侄子廖觉给我讲了老人的身前身后事。

川西神医张松 185

张松说：“按风水先生的说法，我的床摆在阴阳界上，一旦入睡，我就同逝去的亲人们在一起了，他们通过托梦，把灵感给我，使我产生一种压制不住的‘看病’的冲动。”

神医信徒瞿曲 194

瞿曲小姐为成都某电讯公司高级职员，虽很讲科学，也出过国，但极其信命。她是个热心的神医信徒，曾志愿驱车带领许多朋友去诊病。

老右派冯中慈 197

斗室如蒸笼，采访中，我们均汗如雨下；冯先生两次脱下，拧出至少两茶碗汗水。我不禁劝其赤膊上阵，遭婉言谢绝。可见读书人的斯文本色不改。

老地主周树德 208

我对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吝啬，腊肉、花生放上七、八年，都舍不得吃。可据说借他钱的不少，均是几角、几元，人家不提还，他也不敢去讨。我一直想问他这是什么心理？

老红卫兵刘卫东 218

算起来，老刘也属于中国最早的一批红卫兵，造过反，串过联，下过乡，那个时代的时髦都赶过。可惜地处边缘，这辈子注定进入不了主流社会。

吹鼓手兼嚎丧者李长庚 231

小城镇的送葬队伍，吹鼓手作为一种逐渐消亡的职业，暂时还能派上用场。李长庚的黄金时期早过了，但他凭着一股拗劲要跟上时代，这种传统精神令人心酸。

招魂术亲历者何老东 242

“-----医生想尽了所有办法也止不住，于是就请端公到家里招魂，烧符、化水、并在水缸里看见一男一女两个赤身裸体的小孩在搏斗，端公一剑刺去，又满山遍野地张贴拿鬼招魂的贴子-----”

算命先生孔庆天 251

孔庆天先生是孔夫子第 74 代玄孙，现年 88 岁，文化大革命中由山东曲阜迁居来蓉，是成都最有名的算命大师之一。

风水先生黄天元 263

人太毒了，比蛇和蝎子毒得多。特别是现在的人，以前是吃阶级斗争的奶，如今又吃升官发横财的奶，都练得五毒俱全，六亲不认。

乡村老教师黄志远 274

黄老师黑人黑户，又要养家糊口，又要担惊受怕，其多年的酸甜苦辣，一言难尽，好在他已基本安居乐业，小杂货店的生意也算不错。

村小老师许长久 286

虽然他讲的东西年代久远，几乎没人再愿意听，但我还是不知不觉地被感动了。

拆迁户罗月霞 297

城市要现代，道路要扩张，所以拆迁每年都必要。随着大量老化而贫穷的居民搬出去，我们这座古城正迅速失去历史，失去怀旧而伤感的歌谣。

朝圣者旺吉 310

梦寐以求的神祇之旅，我们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洗礼和震撼，在当日游历大昭寺时，我同朝圣者旺吉有了这次交谈。

流浪汉王响 318

他无职业，无家室之累，向往古代汉人的浪荡生活，因此至今保持着一种走路的心态。

序言：哀民生之多艱

洪一峰

本書中這一羣畸零人，除了兩位先生而外，我都不認識。本書作者從前也僅認識其中幾位，且對他們的生存狀態不感興趣，更未想過時來會採訪他們。這裏說的從前，是指十年前的八十年代。那些年間，本書作者正在寫現代詩，已具知名度了。年輕氣盛的他，逞其狂狷之態，率其豪爽之情，跑到潛魚礮裏去打撈沉船，摸些碎片，鑲嵌或既難唸又難懂的長長短短句，自己覺得快活極了，哪有興趣去關心社會邊緣的畸零人呢。必待身歷一場慘烈的熬煉之後，看清社會真相，他才想起該去採訪他們。他悟到，寫他們，這是他的神聖職責。

老戚也算是與世不偶的畸零人了。畸零人訪畸零人，好比俗話說的「流淚眼觀流浪人」，心有靈犀可通，宜其探幽索隱，得吾人之所不得，寓吾人之所不寫，遂成鴻篇駁著。他目前的身份是「在野的作家」。這個身份是某個溫良佬他訂的，見本書上北京深處周二黃「篇中，在野者，不穿制服不領薪之謂也」。懊惱，我雖然退休了，寫文章也不

必再穿朝服了，畢竟還在頒薪拿補貼，仍住公家房，算不得在野。本書作者叫我寫序，蒙看得起，敢不從命。那就借幾寸篇幅，寫幾行淺見吧。

首先，我認為本書開了我眼界，使我驚歎，使我不安。這種感受，很久沒有過了。十年來，我厭讀那些遠離現實之作，藻飾膾炙之作，塗改歷史之作，販賣鄉土之作，玩弄智巧之作，更不用說瞎眼頌德之作了。這些作品，大不足以揚大我之聲，抒大我之困，小不足以進小我之德，娛小我之情，根本不嚴不肅，却自命為嚴肅文學，真是笑話。本書則不然，堪稱為嚴肅。並且有趣，隨便翻開一頁，皆能引誘你讀下去，用對話體寫人寫事，便有這點好處。記得史坦倍克《人龍之間》便是這樣寫的。

本書中這一羣畸零人，大部份或荒謬或淒涼，僅有五位就不荒謬又不淒涼，可以說是奇特人物。他們是老知青麥大勝、老軍人廖恩津、朝聖者旺吉、同性戀者倪冬雪、藏書家冉雲飛，就這五位。而荒謬的到舉出來就太多了，有光着屁股在街上肇事的酒鬼，有獄中的妄想狂，有專門製造假象的還體美容師，有僵僵的哭喪者，有京城娛樂圈的混混，有口稱「共同致富」會議上社會主義國家，有個形象問題的暗娼，有盼望成名的乞丐詩人，有迷信八卦的

女教師，有患夢遊病的作家，有為愛情而毀了仕途的老右派，有風趣橫生的老地主，有騙女色出了洋的無恥詩人，有溫得可怕的所謂民刊主編，有厲害而深沉的算命瞎子，有以垃圾養豬而發財的乞丐頭兒，有該上知識份子還得從頭學說人話了的憤懣的副教授，有在瀟俗報刊混飯吃的清醒作家，還有信巫術的文學官員、騙子神醫、神醫的信徒小姐、死刑犯、嫖客，真够熱鬧的了。至於淒涼的就要少些了，有歎惋「世風日下」的琴師，有画家村裏的窮藝術，有拉二胡的盲丐，有跑灘的窮藝人，有崇拜高爾基的流浪漢。難得的是既荒謬又淒涼的那兩位，其一為失學的流浪少年，其一為已故詩人海子。海子自殺身死多年，本書作者採訪海子生前一位鄰居，錄其憶回憶的陳述，饗讀細緻，不時摘一二句評語，如聞其聲，如見其人，讓我們瞭解到這位不幸的詩人很可能是名場上的犧牲品，可悲可憫。本篇還寫到當年四林的先鋒詩人羣之江湖義氣，近似舊時代袍哥跑碼頭，有一定的聯絡方式，其間也不免帶有虛偽性和使小壞的，彰顯出名場上的競爭之激烈。這些記載，雖然一鱗半爪，作為八十年代現代詩運動的史料，甚有價值。

荒謬使人驚歎，淒涼使人感傷，本書除了這兩點所謂

的審美價值（這個說法實在可笑），尤以駕人眼界，促人思考，導人覺醒為其旨歸，倒不在乎文學上純不純啦美不美啦那些瑣屑講究。全書三十幾篇，大半是上乘之作了，叫它怎樣去純怎樣去美，關山難越，那樣多的失路之人，本書作者憑着良心為他們寫照，為他們悲哀，中國文學之一線生機正在此，我佩服他，尊敬他，亦正因此。

「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望。」

「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

此杜甫夢李白所作也。願本書作者平安。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四日成都作

流沙河

序言：哀民生之多艰

流沙河

本书中这一群畸零人，除了两位先生而外，我都不认识。本书作者从前也仅认识其中几位，且对他们的生存状态不感兴趣，更未想过将来会采访他们。这书说的从前，是指十年前的八十年代。那些年间，本书作者正在写现代诗，已具知名度了。年轻气盛的他，呈其狂妄之态，率其豪爽之情，跑到潜意识里去打捞沉船，摸些碎片，镶嵌成既难念又难懂的长长短短句，自己觉得快活极了，哪有兴趣去关心社会边缘的畸零人呢。必待身历一场惨烈的熬炼之后，看清社会真相，他才想起该去采访他们。他悟到，写他们，这是他的神圣职责。

老戚也算是与世不偶的畸零人了。畸零人访畸零人，好比俗话说的“流泪眼观流泪人”，心有灵犀可通，宜其探索索隐，得吾人之所不得，写吾人之所不写，遂成鸿篇骏著。他目前的身份是“在野的作家”。这个身份是某个混混给他订的，见本书“北京混混周二真”篇中。在野者，不穿制服不领薪之谓也。惭愧，我虽然退休了，写文章也不必再穿制服了，毕竟还在领薪拿补贴，仍住

公家房，算不得在野。本书作者叫我写序，蒙看得起，敢不从命。那就借几寸篇幅，写几行浅见吧。

首先，我认为本书开了我眼界，使我惊叹，使我不安。这种感受，很久没有过了。十年来，我厌读那些远离现实之作，藻饰脓疮之作，涂改历史之作，贩卖乡土之作，玩弄智巧之作，更不用说瞎眼颂德之作了。这些作品，大不足以扬大我之声，抒大我之困，小不足以进小我之德，娱小我之情，根本不严不肃。却自命为严肃文学，真是笑话。本是不然，堪称严肃。兼且有趣，随便翻开一页，皆能引诱你读下去。用对话体写人写事，便有这点好处。记得史坦倍克《人鼠之间》便是这样写的。

本书中这一群畸零人，大部分或荒谬或凄凉，仅有五位既不荒谬又不凄凉，可以说是奇特人物。他们是老知青廖大矛、老军人廖恩泽、朝圣者旺吉、同性恋者倪冬雪、藏书家冉云飞，就这五位。而荒谬的列举出来就太多了，有光着屁股在街上肇事的酒鬼，有狱中的妄想狂，有专门制造假象的遗体美容师，有雇佣的哭丧者，有京城娱乐圈的混混，有口称“共同致富”会说“社会主义国家，有个形象问题”的暗娼，有盼望成名的乞丐诗人，有迷信卜卦的女教师，有患梦游病的作家，有为爱情而毁了仕途的老右派，

有风趣横生的老地主，有骗女色出了洋的无耻诗人，有滥得可怕的所谓诗人作家，有厉害而深沉的算命瞎子，有以垃圾养猪而发财的乞丐头儿，有说“知识分子还得从头学说人话”的愤怒的副教授，有在滥俗报刊混饭吃的清醒作家，还有信巫术的文学官员、骗子神医、神医的信徒小姐、死刑犯、嫖客，真够热闹的了。至于凄凉的就要少些了，有叹惋“世风日下”的琴师，有画家村里的穷艺匠，有拉二胡的盲丐，有跑摊的穷艺人，有崇拜高尔基的流浪汉。难得的是既荒谬又凄凉的那两位，其一为失学的流浪少年，其一为已故诗人海子。海子自杀身死多年，本书作者采访海子生前一位邻居，录其凭回忆的陈述，观缕细致，不时插一二句评语，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让我们了解到这位不幸的诗人很可能是名场上的牺牲品，可悲可怜。本篇还写到当年四川的先锋诗人群之江湖义气，近似旧时代袍哥跑码头，有一定的联络方式。其间也不免带有虚伪性和使小坏的，彰显出名场上的竞争之激烈。这些记载，虽然一鳞半爪，作为八十年代现代诗运动的史料，甚有价值。

荒谬使人惊叹，凄凉使人感伤，本书除了这两点所谓的审美价值(这个说法实在可笑)，尤以开人眼界，促人思考，导人觉醒为其旨归，倒不在乎文学上纯不纯啦美不美

啦那些琐屑讲究。全书三十几篇，大半是“恶之花”，叫它怎样去纯怎样去美。关山难越，那样多的失路之人，本书作者凭着良心为他们写照，为他们悲哀。中国文学之一线生机正在此。我佩服他，尊敬他，亦正因此。

“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

“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

此杜甫梦李白所作也。愿本书作者平安。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在四川作
流沙河



1949年12月30

日，成都解放，老百姓涌上街头欢欣鼓舞，与南下的解放军水乳交融。图中的冬日街景虽然破败，但大家的情绪却如火红的夏天。这正如诗人胡风写给共和国成立庆典的颂诗标题：“时间开始了！”

（曾循提供）

老威在底层（代序）

老威

90年初，我的自杀冲动逐渐猛烈，几乎不能控制自己的手脚。为了给我治病，某社会福利机构采取了强制措施。尔后，我被迫从文学的名利场隐退，与世隔绝四年。开始很不自在，因为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没人把我当作诗人或作家来瞻仰，没人说“久闻大名，如雷灌耳”之类既中听又肉麻的恭维话。我发觉自己一旦不写字，就被社会遗弃得太快，象一截狗屎，刚拉在阳光灿烂的街头几分钟，就被踩得不象狗屎了。我甚至连话都不会说了，在许多经验和生活常识上，一个四肢抽筋的疯子都可以冒出来教训我一顿。

开头两年我想表现自己，却没任何机会，憋坏了。我老是与人打架。医生慈父在把我电疗得像一只呱呱蹦跳的青蛙之后，劝我面对现实。我不得不学说人话，此前，我同目前国内众多先锋诗人、作家一样，只会说书上的话。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没书读，没音乐听，没高雅的话题可供思考、讨论，这绝对是一个人文知识分子所无法忍耐的，但我还来不及忍耐就扛过去了。我在与疯子们的朝夕相处中，精神病有了明显好转——“心静自然凉”，我通过学箫明白这个理。

海子和顾城都是因为“心热”而自杀，我与他们的区别是我在诗和女人之外有广泛的爱好。我无法在一种想法里跑一辈子马。我写诗写得太久，同朝秦暮楚的读者关系太近，再不发疯，就说明我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九十年代，坚持写诗并混出人样来的，都是些精明的卑鄙小人。因为这是商业的天下，哪来的诗意？

这本《中国底层访谈录》缘起于我吹箫的经历。我师父姓司马，

是个 83 岁的和尚，我很想知道他的一些故事，但我至今除了箫，对他的过去和将来都一无所知，他吹了 60 多年的洞箫，却什么也说不出口。中国民间还有多少这样的人物？

我陆陆续续与我所认定的江湖中人交往了七年，并无多少功利目的。由于过去养成的记者习惯，我总是把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谈话私录下来。当然也不排除儿童式的猎奇冲动。我的朋友马松认为，“这是本世纪前所未有的精神奇观”；而评论家唐晓渡认为，“这是中外新闻史上都不曾有过的采访。”

我不敢作非分之想，因为我怕名利心又会诱发疯病，而这本书中的每篇采访录都是治病的。空虚、压抑、失去人生的方向感；或者人生的方向感过于执着，乃至狂妄得不可一世的人，都可以把它当作医疗手册——我就是这么过来的，“老威”这个长期混迹底层的名字，我直到现在还在用。

从古至今，中国都有极深厚极成熟的“底层思想”，如果将这些东西编排成小说，绝不亚于高尔基的《人间三部曲》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它们都是能流传后世的具有见证意义的作品。可惜，中国作家都耻于这样做，耻于向脚下的土地汲取养分，他们追踪世界文化热的同时，却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同一种大文化背景所复制。当然要凭这本书改变一种时尚几乎不可能，但它至少在世纪末提供了第一条“回头是岸”的老路。

这个岸，不是大家熟知的“死人传统”，而是许多活生生的人生经历。我觉得从一个影子杀手（凶手）取一个碎尸犯的口中得到的叙述，也比大批当代作家的小说、散文精彩数倍。这些文人都是标新立异、著作等身，以猛攻诺贝尔文学奖而闻名于世的。

就此打住。相信读者诸君自有判断。

1998 年岁末

钱钟书仙逝后的第 7 天草于白果林



在 1952 年初进行的急风暴雨般的“五反”运动，为以后的历次运动开创了一种模式。图为“五反”宣传队在上海市的弄堂里教唱宣传政策的歌曲《两条道路由你挑》。



1966 年，史无前例的文革正式拉开序幕，毛主席八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小将。图为挥红宝书高呼万岁的“红海洋”一角。

老城在底层（代序）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前进的动力。”1976年清明节，全国各大城市均不约而同地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群众集会，图为四·五运动中的成都反帝路街头。
（曾循提供）



80年代的成都街景。据拍摄者回忆，这大约是为了一场中国队失利的国际足球赛。

（曾循提供）



1998年5月，我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成都市民在美国领事馆门前举行抗议游行。

（曾循提供）

老威在底层（代序）



几乎遗忘了的“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在“反战音乐会”上重新响起。
（曾循摄）

成都西郊种牛养殖场的一幕盲目的交配。时过境迁，集体的欲望也是盲目的？

（曾循 摄）



采访缘起

认识 63 岁的张广天纯属意外，但一回生，两回熟，幸好我在四川东北部某县的一个社会福利机构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否则就不会知道胡风曾有这么一个贼眉鼠眼的“牢友”。

1992 年隆冬的这次谈话有些随意，逮着什么说什么，同心理医生的路数相似。张广天太不像话了，对历史，对大文化人，居然不晓得敬畏，这大约是受转型期大众趣味的影响吧。

所以，严肃的胡风研究者应该对这篇东西持批判态度。

胡风牢友张广天



胡风与梅志，这对恩爱的患难夫妻
摄于 1937 年。当时离全国解放还早，可
是两人已经浸润在理想的曙光之中。

老戚：你认识胡风吧？

张广天：这些年已经有好几拨人打听过他的情况，是通过领导找来的，我不谈也得谈。今天你私下约我，是啥意思？你肯出点儿血么？三百块咋样？那么大的名人才值三百块。如今市场经济，我工资低，没办法。



胡风与梅志，摄于 1966 年的北京，此时作为“反党集团”头目，胡风尚在“监外执行”。



1981 年，胡风刚回到北京不久，在其寓所与“胡风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诗人胡征（左）合影留念。

老威：没办法？老张，你可是这里面响当当的人物。在监狱进进出出，顺带替犯人交封信，捎点熟食，还有港台的光屁股美女明信片。你的油水大了。

张广天：还是内盘？不过，我现在是自由公民，你管得了么。我坐了 20 多年牢，又留监当了十来年工人，这辈子，监狱就是我的家。我在自己家里弄些小买卖，犯屎法。

老威：里面有台湾间谍，你也替他传信？

张广天：我比警察更了解犯人。有的警察还是我看着长大的，几寸高，就晓得在我这儿要烟抽。当然罗，监规一条条订在那儿，该不该执行？该。但是劳改场所不是中转站，犯人进来，一住十几年，咋熬的？叫化子打手虫，

穷欢呗。

老威：莫扯远了。我付一百元。

张广天：你太抠了。

老威：这不算正式采访。老张，你晓不晓得，在监狱图书室有胡风的专柜？胡风夫人、胡风集团成员的种种回忆文章自不必说，还有他老先生的作品集，包括那封写给毛主席党中央的倒霉的三十万言书。这十几年，全国各地报刊发表有关胡风案件的文章，至少几百篇，我若真要搞研究，直接查资料就完了。找你嘛，不外乎就是吹吹闲牛。

张广天：你倒是个爽快人。好，那一百元收下了，就摆摆龙门阵。你不能记录，我搜搜身，没录音机吧？失过脚的人，防人之心不可无，否则会影响我的饭碗。现在讲胡风，他坐牢的名字叫张光人，开玩笑时，大伙就喊“张光棍”。当时谁也没想到，他居然是我们这儿名气最大



1984年8月，胡风参观在北京的鲁迅博物馆，深深沉浸在对先师的缅怀中。
1936年鲁迅病逝，作为得意门生，胡风曾是出殡抬棺人之一。

的犯人。当然，这儿也关过刘吉挺、张西挺两口子，四川省革委副主任；还关过二、三十个造反派头头，重庆八·一五的造反司令黄廉，至今还在一队当卫生员，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战场上练出来的顽固劲，牢坐了近20年，还保持着从毛主席他老人家那儿学来的读书做眉批的良好习惯。黄廉讲的最多的故事，就是他指挥手下把军舰开入长江口，向据守朝天门码头的“反到底”示威，结果码头上打炮，击中了军舰旁边的运猪船，猪满江逃窜，重庆人民因此断了一个月一人半斤的供应肉。

老戚：张光人咋样了？

张广天：我又扯远了。张光人长得牛高马大，比所有犯人都高一头。他是七几年从雅安苗溪茶场转来的，到底哪一年记不清了，大约是冬天。这座监狱很大，从大门进来，是干部的家属区；再过一道岗哨，就是劳改区了。左边有一条河沟，沿着河沟走，是铸造和磨砂车间；而右边一溜长坡，约两、三百米，通往深监重地。里头有八个队、两千多犯人。我当时在二队二组任学习组长。天刚擦黑，大红毛（劳改大组长）吹哨收监学习，教导员却站在楼上，叫我出去搬行李。我跟教导员一直走到二道岗，才接住张光人。有好几人护驾，军便服、蓝制服都有，连监狱政委都出动了。我骇得大气不敢出，猜想可能是大官犯了错误，起码省市一级。因为普通新犯都是自己跟政府进来，几道岗都得立正喊报告，待哨兵放行，才能通过。张光人虽然也懂立正报告，但那么大个子，声音比蚂蚁还小。张光人的行李就一个铺盖卷，一个网兜。里面装些洗漱用具、换洗衣裳、几本书。一群人都爬那溜长坡，张光人在中间，看起比我们高出半截，大脑壳大眼睛秃脑门，一望就知有来头。遗憾的是衣冠不整，帽子小，外衣扣子掉了两颗，就用一根鸡肠带拦腰一捆。那风又硬又猛，从坡上一阵阵刮下来，张光人的衣领被灌风，边爬坡边咳嗽。唉，太凄

凉了。

后来，张光人就分到2组。政府找我单独谈话，要求我密切注意他的一举一动，随时汇报，还说如果干得出色，就记功减刑。犯人哪听得这个？我的神经都绷紧了，心里盼望他在我假睡的时候自杀，被我及时制止，那起码减个一年半。那时的监舍一溜红砖平房，前面有球场大的放风坝，从放风坝上几梯，就是食堂。一个院两百多号人，算大队。我们的监舍主要是水泥通铺，排排躺十几个。我睡最里头，靠着桌子，我安排张光人睡我旁边，接着是生产组长。第一次学习，我向大家介绍新同张光人，并传达政府训令：不准私下盘问，串通案情。然后才例行公事地总结当日劳改表现，最后学报纸。大家发言时，我吩咐张光人做记录。他在灯下眯着近视眼，脑壳习惯性地下磕，极其认真。过去这项工作由我做，张光人来我就轻松了。你晓得，过去的运动多，今天批这个，明天斗那个，连《水浒》里的叛徒宋江也揪出来批。把孔夫子和林副主席绑在一块，挖祖坟挖出超水平了。大家发言老一套，路数跟着报纸文章走，只要把上次运动的坏蛋换成这次运动的坏蛋就行了。坐牢三件宝：劳动、发言、耳朵好。天天学习操练嘴皮功，结巴也口若悬河了——因为不发言过不了关。自从有了张光人，我们组的学习记录精彩多了，同一句表态话，他能翻出许多花样，篇篇不重复，这是真功夫。

老戚：对于大批评家胡风，这算小菜一碟吧。

张广天：我多次口头表扬他，可他谦虚，说是写检讨练出来的。我不敢多问。那年头，文人倒霉，即使没犯啥事，也能随手给自己列出十条八件“罪状”，更别说这种专吃笔墨饭的。他的本事也就这么一点点，而我花的功夫太大了。学习完十点钟，值班政府点名收监，挂上大锁，犯人各就各位躺倒。可张光人块头大，要多占半个铺。我吆喝大家往后挪，生产组长杀人前当过

兵，看不惯文人，就悄悄用手拐捣他。张光人夜里失眠，死鱼眼球定在一个地方，而其他人劳累一天，一沾床就睡。我也困，但不敢睡死，好在张光人翻身的动静大，总能惊醒我。

开头我见他夜夜失眠，以为有心事。文人有心事，特麻烦，他一不打架二不闹监，而是趁你迷糊时抹脖子。我向政府汇报，才晓得张光人前列腺有问题。他害怕睡死了尿床，招人笑话，就憋着。实在憋不住，只好翻身起夜。张光人的确上了年纪，每次解手都磕磕绊绊，一会儿是洗脸桶，一会儿是小方凳，一会儿又是劳保胶鞋。夜深人静，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何况他弄出的响动？好几个犯人都惊得从铺上弹坐起来，懵懵懂懂，以为开工了。

便桶在门背后，张光人在桶前磨蹭许久，才挣扎着挤出两小股尿。监舍起夜的规矩是，屙尿不出声响，而张光人不管这些，他屙尿不冲桶壁，直通通下去。咕咕咕，隔好一阵，你都眯眼了，又是咕咕咕，那出水的动静，能把你吓出心脏病。我默算估计，他小便一次费时 7 分钟，也有超常规发挥，达 10 分钟。有一次，一刻钟还没回铺，我探头侦察，发觉他的脑袋抵着墙，我急忙起身，却听见他的牙咬得嘎嘎响。我把他扶回来，他却犟着不肯上铺，我一松手，他又赶向便桶。唉，我看桶里不是尿，而是迷魂药！

老戚：张光人与你们一起出工么？

张广天：他留在院里干些手工活，守守监舍。每次我们收工回来，都见他腰间扎着绳子，双手抄在棉袄袖子里，定定地望天。他从来不与普通犯人搭话，醒着的时候还不如梦里说的话多。真的，后来大家对他习惯了，他起夜也有了规律。开春时，他居然胖了些。可是，在一群刑事犯中间，他肯定憋坏了，脑子有毛病了。不管刮风下雨，他能在院坝上一站几个钟头，像在等

天上的什么东西掉下来。听队里的卫生员悄悄讲，张光人在和毛主席说话。他说：“毛主席，我没反对过你，心都可以掏出来看。毛主席，你受蒙蔽了，但是我认……这辈子完了！”他还骂落在身上的雪：“这些鬼！不要来抓我，我整不死！”卫生员说张光人的泪大颗大颗地流，不晓得受了啥冤枉？

有天夜里，我被一阵磕牙惊醒了，抬头却见张光人站在地下，望着后窗外发愣。我也瞟了一眼窗外，感到阴风惨惨的，我顿时起了身鸡皮疙瘩。你不晓得，这座大监狱在解放前是坟山，分好几块，墓碑东倒西歪的。有的死人连个坑都没有，就地掀几铲土，就算埋了。这儿流行过瘟病，还有灾荒。据老的犯人说，因为这儿的坟太多，把山丘都掏空了，旧的和新的，几十年前和几十年后的墓道，经常通在一处。解放后，人民政府做好事，改造旧城，顺带把城郊的坟山推平填实，依山势建了监狱。在这里关过的犯人，都做过死鬼上身的梦。一般都是又哭又叫，控诉我们占了他们的窝。我还在梦里和游魂野鬼对骂，我说我又不想占你的窝，是别人要关我进来，有屎法。

老戚：张光人咋样了？

张广天：他被鬼迷住了，他说看见了鬼，从最黑的地方划一条船，来接他回去。他说他不迷信，但这辈子只有阎王来给自己平反了。他自言自语的时候太可怕了，有个鬼在脑壳里，透过眼睛看外面。前几天，二队有个反革命半夜从上铺翻下来，把脚脖子歪了。他梦见一个秃脑门的胖大老头推他，骂他霸占铺位，我一听就晓得张光人回来了，他那个铺位过去是人家的，虽然牢房改建了，但位置没变。唉，我又乱扯了。总之，那个晚上我吓得要命，急忙报告了值班政府，管理叫来狱医，给了几片安定，张光人才踏实了。这事过去没几天，张光人就搬走了。

老戚：搬到哪儿去了？

张广天：严管队的单间牢房，关的都是有级别的人物。里面有小灶，有卧室和放风间。生活条件很好，就是太孤独，与外界完全隔绝。据说每天早上从巴掌大的窗口发一份《人民日报》，如果上面有不利于改造的文章，也要剪下来。

老威：《人民日报》也开天窗？

张广天：单间关的都是高级文化人，脑子特别好使，有时凭一字一句，或一个先后排名，就能分析出形势的变化，所以发放的《人民日报》也要经过严密的检查。

老威：张光人搬走你没感到遗憾？

张广天：啥遗憾？

老威：你没减刑吧？

张广天：减刑是政府的事，犯人嘛，顺其自然地坐牢吧。我一个村小老师，就这点能耐，哪吃得住张光人？他不添乱就谢天谢地了。

老威：你刚才说的，我看也没什么，张光人内心痛苦，把自己折磨疯了，他也没惹谁。

张广天：他撞过祸呢。有一回，他把大伙的饭给弄倒了。

老威：咋回事？

张广天：队里犯人开饭都以组为单位，每组挑出两个人上伙房，一个领饭，一个领汤，而大伙拉开圆圈，蹲在院坝里等候。领饭两人一搭，一个星期一轮换。那次恰好转到我与张光人，我点清数，把钵饭码进木条筐里，才让他端走，我随后提汤桶。寒冬腊月，才5点多钟，天就擦黑了，我一再叮嘱老头注意脚下滑，却不料他下石阶时，真噗地一声滑了下去，栽得半天爬不起来。

钵饭满院坝滚，大伙马蜂窝一样炸了，四处去撵。天刚下了些雨，院里汤汤水水的，钵儿轮着没翻当然好，可有两钵滚着滚

着就扣在稀泥里了，一起上来，白饭都浸成黑饭了。还有一钵朝前疯滚，一直进了阴沟，那是特等钵，有半斤，是铸造工吃的，所以组里的李二娃手脚并用地扑了过去，抓了两把稀泥，还没接着。这咋办？伙房蒸饭都是一人一钵，计划好了的。李二娃哇哇大哭，并二话没说，捡起张光人那钵就啃。那两个吃泥饭的，冲着张光人骂开了。大伙劳累了一天，腰都直不起来了，饭是命根子呵。我放下桶，还没来得及拉，已经有两、三个人闪过去，揪住张光人就打。那老头护住脑壳，浑身泥透了，仍没吭一声，直到有一脚踩中了腰子，他才忍不住呻唤起来。

政府出面，把打人者关了禁闭。说实话，我当时一点没同情张光人。真是个废物，就那么两梯石阶，也没站稳。伙食本来就不好，万一饭钵全滚进阴沟，大伙就只能挨饿。那是文革当中，外面搞运动，不搞生产，老百姓都凭票购买半斤肉半斤油，26斤半米，还要搭粗粮，更别提牢里。我们常被饿醒，清口水一股一股朝上冒。

老威：你们这帮人也真是禽兽，不问青红皂白就打一个老人。

张广天：只要有吃的，你骂什么都成。如果没有政府管着，我们早把张光人分吃了。依我说，政府对张光人还是比较特殊，生怕他出事，据说他住单间时，他夫人还来陪过。我们呢，只有成群结队趴在后窗打望，看几层墙外有没有女人经过。我是饿了好多年了。

老威：人家张光人是冤案，是中国数一数二的知识分子，你们呢，永远脱不了罪犯的皮，岂能与他比？

张广天：管他外面有多大的本事，一进这里，都是罪犯。监狱到处都写着：“你是谁？你到了什么地方？你来干什么？”

老威：我与你扯不清。你知道这监狱图书室为啥要弄胡风专

柜？因为你们的政委是文化人，他说胡风是在这儿关疯的，这是监狱的耻辱。

张广天：胡风就这么厉害？

老威：这儿就因为关过胡风而名扬四海，不过，不是监狱的错。执行机关嘛，在那种特定的历史环境里，也只能这么管理。

张广天：对，在犯人眼里，他是政府的重点保护对象，稍微犯点事也不会受罚。有一次，张光人把伙房打的浆糊偷吃了好多，那是用来刷标语的。在这之前，他趁做手工活，偷吃过很多浆糊，在犯人里都传开了。如果这事犯在其他人身上，早上线，与阶级斗争挂钩了；可对他，政府还是睁只眼闭只眼。有人告状，管理还解释：张光人个头大，比小个子饿得快。的确，张光人的饭量比一般人要大些，好象在我们组他从没吃饱过。

老威：你其它还晓得啥事？

张广天：一时想不起来了，我和他相处近两年吧，彼此谈不上啥交情。他是文豪，书上写着，特别犟，哪怕憋疯也不拐弯；我呢，小爬虫一个，莫说狗洞，耗子洞也钻。现在看来，他瞧不起我们这种人是应该的。张光人给我总的印象，就是另一个星球上的人，苦难是身外之物，哪怕突然枪毙他，依然是慢吞吞的。我们监舍耗子特别多，啃衣服，有时缺油荤，还啃人的脚趾头。张光人的脚趾头就被啃过，他坐起来，从被子下翻开脚，一点一点挤出咬口的坏血，又继续躺下睡。这种定力，一般人达不到。即使我个组长遭咬，也是惊瓜瓜地叫，还要满舍撵一阵才罢休。至于他后来的疯，那是我们理解不了的。这里私下说，政府也理解不了。犹如飞碟，见得再多，也不晓得那是啥东西。

采访缘起

1999年12月10日上午，我在重庆市某看守所探望了27岁的死刑犯牟大路，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随律师接触死刑犯了，因此显得比较放松。

牟大路更放松，他用戴土铐的手揩着鼻涕说：“我命中只该活这么大。”

他局外人一般谈论着别人的死。我晓得，如果给予他第二次生命，他选择的仍然是犯罪。



在中国民间，瞎子的主要职业是算命，为明眼人指点迷津，可死刑犯牟大路心灵瞎了，没命可算了。

死刑犯牟大路

老戚：昨天律师把你的案子给我谈了，我感到很惋惜，因为你才27岁。

牟大路：律师、法官、公诉人都这么说，我都听烦了。27岁又啷个？我



精神恍惚的母亲，每天傍晚坐在上屋前望着路口出神，谁也不忍心告诉她 儿子永远回不来了。 (曾循摄)



只有从嘴里吐出来的人才不动感情
而我们是从阴道里生出来的
知道疼
再坏的家伙也有母亲

命中只该活这么大。这世上比我命短的还多，同舍的三个死犯，小的那个刚满 18，一上了镣，就哭趴在炕上，像只乌龟。你猜他干了啥？他赶公共汽车，不肯给孕妇让座，人家就骂了声“傻农民”。他气不过，竟拔出水果刀，把孕妇的肚子捅漏了。送医院抢救，那肠子已淌了一大捧，两个人都搂不住。剖腹取出胎儿，母子都没气了，据说那软塌塌的小脑壳只有拳头大，还留了点刀印。这是我晓得的最小的短命鬼。

老威：你想得开就好。这烟你随便抽，法律无情，我即使想帮你，也只有说几句空话的能耐。

牟大路：能出来透透气也不错。我的律师在哪儿？我的上诉有希望吧？

老威：应该有希望吧。唐律师过一会儿到，他这几天正马不停蹄地跑高院。

牟大路：今天正好星期五，刚才提人，我还以为要上路了。

大清早，电动铁栅门就从一房响过来，二、三、四、五、六房没开，跳过去了，接着七、八、九，我是十房。同舍的三个活死人都提前换成白衬衣、蓝裤子，候在门口。老犯孙鸭儿与我打赌，赢中午的肉钵，他说今天十房没人上路，用不着换新的行头，隆重得像去出席国宴。嘿，真让这臭嘴戳准了。

老戚：你中午吃不成肉了。

牟大路：不行，一个星期两次肉钵，一钵莲花白里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几砣，他妈咋能让？！虽说没上路，但是老子的白血球已经被杀死了大半，中午正好补回来。你不晓得，铁栅门一动，外门一开，三个活死人的血都不流了。都朝人背后躲。这时值班干事喊：“牟大路。”特别温柔。平常提讯的声音都凶歹歹的：“牟大路！”只有勾魂的声音才软绵绵的，我的脑袋轰地炸了，空白了几分钟，才活转来。

老戚：人落到这一步，太可怜了。

牟大路：没觉得。原以为判了死的人，会茶饭不思，没想到我的胃口几天就大了，一天到晚都饿，可能是南瓜汤灌的，甜腻腻的“红军汤”，我们已经灌了三个月。

老戚：啥子“红军汤”？

牟大路：我家里有盘摇滚革命老歌，特火爆，带中有一首井岗山唱的红军歌谣：“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米好香。”我听得烂熟，没想到，我也喝上这红军汤了。老前辈们打江山真不容易。

老戚：你还很幽默。

牟大路：我判死半个月，就肥成这样，再不幽默，就只有苦着脸等着上杀场了。

老戚：在里面怎么打发时间呢？

牟大路：折纸盒，装头痛粉的，你看我双手铐着，一天干十

几个小时，也能弄三千个。一直折下去，脑壳就麻木了，免得儿女情长想法多。如果这样心头还难受，就把这难受说出来。比如枪毙，我们讨论了几次，一直没弄清楚打哪个部位，后心呢，还是后脑？后脑报销得快，但不太雅观，遇上开花子弹，天灵盖没了，那脑髓起码溅几尺远。法警也是人，就不怕脑浆溅一身？我觉得不会用开花弹，人家经常射人，早练成神枪手了，绝对后脑一个眼进，前额一个眼出。有人问需不需要补枪？万一没打死的话。有人回答没死当然要补，如果不补，就折根树枝，插进枪眼里搅几下，只要一见脑花泡泡咕噜冒出来，就完事。我估计，除了法医，没人有胆量去搅。这些都是芝麻细节，包括跪着毙还是站着毙，人前挖不挖个坑，好让你一头栽下去。屁股朝天了，即使没咽气，你除了啃两嘴土，也捣不了乱。还想回个头刺激射手，根本没门。

根本分歧还是后心和后脑，人一五花大扎，两根姆指就叉在后心部位，照准一射，直中心脏。这样差不多是个全尸，把眼儿一堵，人还是完整的。但死得没那么快，因为脑死才真叫死。

老戚：这种问题没啥结论。

牟大路：所以年年争，月月争，天天争。有时脸红脖子粗，还打架。我被电棒烙了好几盘，回房还打，死都死了的人，能出多大声响算多大声响，免得哪天突然上路，不给人留点想头。我刚进房没几天，刘黑娃就上路了。春节还没过，那天早晨他正蹲在炕角角吃早餐，门外门就一齐响。值班政府特别温柔地喊：

“刘忠达，出来一会儿呐？”那口气有点像村长找村民商量事情。当时刘黑娃正吞了口稀饭，把馒头塞了半截在嘴巴，一听勾魂腔，立马就懵了。值班政府又喊了一声，好像连喊了三声，最后就进来站在铁栅栏前。刘黑娃咣当一下坐在炕板上，支着屁股朝后退，政府笑嘻嘻地一招手，两个红毛就上炕，搭个手轿把黑

娃一舀，死狗就仰面朝天瘫起了。他嘴巴还堵着半截馒头呢，看来到阴间都饿不死。

老威：他犯了啥罪？

牟大路：杀人罪。黑道上的老板见他扛着根棒棒在朝天门找活路，就问他干不干大买卖？他当然要干。老板就甩给他5000元钱，要他去把冤家的鼻子割下来。这蠢牛，不但割了鼻子，还把大片砍刀直接从嘴巴硬生生地切下去，那人就鼓起眼睛咽气了。

刘黑娃一脑壳血去交差，老板吓惨了，后悔不该雇民工，因为职业杀手指哪儿割哪儿，从不过火。刘黑娃说他被咬了一口，冒火了。

老威：恐怖恐怖。

牟大路：其实他在房里很温顺，彬彬有礼。紧接着他上路的是个采花大盗，鸡巴不行了就拿酒瓶子朝三陪小姐的下身捅，结果大出血。那天下午花盗盘在炕上折纸盒，还在和我比赛。门外一喊，他“哎”了一声，又“到”了一声，就急匆匆地窜下去，一溜小跑出门了。铁栅栏快关时，我才想起，马上下炕捡起他的鞋去撵。撵不拢了，眨眼之间，他就光着脚板人鬼门关。我隔着栏杆把他的鞋扔出房，打在外门，又当地弹回天井。这是性子最急的一个鬼。不行，轮到我上路，一定不能急，但也不会像刘黑娃，拖泥带水，一喊我，就响亮地答到，然后哼两句歌，与大家道个别才走。

老威：你刚才道过别么？

牟大路：忘了。

老威：哦。

牟大路：你哦个屁！轮到你也差不多。

老威：还没轮到我头皮就麻了。歇把火吧，换个轻松话题。

牟大路：轻松？屙屎轻松，我给你讲一段屙屎。前一晌我们房进来个大贪污犯，叫老蒋，40多岁，周身名牌，一看就晓得是社会上吃香喝辣的公子哥儿。珍稀动物毛病多，吃喝拉撒不习惯。但他最大的毛病是当着人不屙屎。

老戚：这是有教养的表现。

牟大路：要么人乡随俗，要么憋死。教养顶个屁用。牢里的茅坑是敞开的，正对大炕和后窗，你一蹲下去，就必须面对一屋苦难大众。聪明一点的，就鸡公屙屎，速战速决，屁眼儿一挤就提裤子。读过两天书的，要慢功出细货，你就看张《人民日报》，转移注意力。实在难看，你就干脆闭上眼瞎挣，丑陋的面孔就彻底消失了。这老蒋，所有的妙方都试过，屁眼儿就是紧。他憋了10来天，脑壳长毒疮，眼角起大砣眼屎，可就是下不来。每次他都愁眉苦脸一阵，然后运气提肛，感觉来电了，就朝坑上冲，可一蹲，翻两下白眼，噗噗两个臭屁就完了。有时候，他连屁都不放，像个癞蛤蟆，嘎嘎地叫。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了，就一齐围上去，堵着他耳朵喊“加油！”有一回，他又来鼻血又来眼泪，大家就七手八脚地安慰他，堵鼻孔的，摸他的头叫

“慢慢屙”的，老犯孙大鸟，都50多岁了，还和年轻人一道凑热闹，说：“老蒋，生头胎都这样，慢慢生。”死犯锁了镣子，手脚不灵便，就蹲在炕沿上拍手，而上面还有一层嘻皮笑脸的脑壳。坐牢太单调，除了折纸盒，连唱歌也只能在喉管里打转，所以，老蒋就是我们的开心果。开始没觉得有啥了不起，因为刚进来的，或多或少都有点身体不适。但老蒋便秘到第八天，大家就预感到看守所的吉尼斯记录要产生了，如果这时老蒋不争气，下了包袱，就辜负了群众的期望。

老戚：你们觉得这样挺快活？

牟大路：当然。老蒋往茅坑一冲，房里就像过节一样，大家

丢开手上的活路，摩拳擦掌就过去了。有的还陪着老蒋蹲在炕沿上屙假屎，老蒋一用劲，这边就“哎嗨哎嗨”。老蒋瞪着大家，没法，就提裤子起身，没几分钟，又上坑，连放几个屁，把满房臭了个底朝天。如果是往常，大伙肯定捂着鼻孔就躲，因为便秘的屁最臭，你想，陈年老屎在肚皮里发酵，那屁的浓度，点根火柴肯定燃，说不定一壶水都烧得开。但是，今天非同小可，因为老蒋打的不是闷屁，不是干臭屁，而是夹屎屁！再难闻，也要冒着炮火给他堵回去。于是孙大鸟和叶鸭儿，又是摸脸又是捶背，连叫“老蒋生娃儿辛苦。”老蒋拖起哭腔说：“你们到底要干啥子嘛？！”大家也拖起哭腔回答：“你下了包袱我们就好耍嘛。”老蒋说：“屎尿有啥好耍嘛？！”大家回答：“你的屁眼儿连着我们的心嘛。”老蒋说：“狼心狗肺嘛。”大家回答：“不要侮辱我们的人格嘛。”

这个滑头的老蒋，趁大家高兴，放松了警惕，竟突然转身下蹲，把他嫩白白的两瓣大脸向着我们！这太不叫话！刚才是玩笑，这回他可真在侮辱我们的人格了！叶鸭儿是菜农，一辈子低三下四，受尽了别人的气，可也受不了这个。他抡圆巴掌，啪啪就两下。茅坑空间狭窄，挤不下太多人，所以多数同志在外干着急。老蒋两手把住铁管，任打任挨，死活不掉头，眼看几颗花生米一样的羊粪夹着血当当坠下坑，孙大鸟急出一头汗，竟与叶鸭儿一左一右，硬扳老蒋的肩，老蒋几乎被抬起来了。他尖起嗓子叫：“不，不，不要！要，要要出来了！”孙大鸟喝声：

“转！”这一来，老蒋哭得像个娘子，边提裤子边说：“不屙了！这辈子不屙了，反正是死，不憋死，就枪崩死！”

老戚：你们真是一群……

牟大路：流氓，恶棍，下三滥，滚刀肉。我替你骂了。

老戚：都落到这步田地，为啥还要互相折磨？

牟大路：不管落到哪步田地，人和人都互相折磨。社会上天地宽，分得开，所以磨擦要少些，在牢里，一间房关十几个人，严打的时候，经常涨到二十来个，人和人挤得这么亲密无间，不寻开心咋办？今天是老蒋，明天轮到其它人，难说。总之，老蒋历经挫折，最后肯定屙屎了——并且天天屙，一天屙六、七盘。因为正在 12 天头上，老蒋不得不把一条裤子罩起屙，却被路过后窗的警察发现，以为他要自杀，就喝令他“站起”。老蒋气得打抖，将裤子扯下脑壳，伸手从胯下一抹，抓出一大把鲜血示威说：“你看这个！”

警察开门唤他出去，让狱医连开三帖泻药灌下去，从此一通百通。老蒋拉得上气不接下气，连世界观都拉改变了，过去，对糙米饭、南瓜汤，甚至肉钵都不屑一顾，莲花白叶子他要夹起对着光照，稍微有几颗虫眼也不吃，若是发现了猪儿虫，更要惊瓜瓜地叫唤。而今，公子哥儿一跟斗栽成灾民，一天到晚就想吃，一碗南瓜汤，他仰起脸一倒，嚼都不嚼就下肚了。他前两个月没人送钱，即使送了钱，每个月只能买 12 元钱副食，还不够他填牙缝。渐渐，他拉的屎也和南瓜汤差不多，金黄色，像黄河母亲的奶。大伙担心他拉出问题，就暗中轮班上茅坑，连文盲叶鸭儿也在坑上装斯文，看报纸。老蒋像匹笼中的瘦老虎，提着裤子来回跑，可总是插不进针。他哀求占坑者让一让，几乎要下跪了，并且一再闹屎滚裤裆的小儿笑话。有一回，我都瞅出情况危急，让叶鸭儿赶紧闪，那傻农民还在看报，没提防老蒋跨上坑，一转，一屁股就直朝叶鸭儿坐下去，淋了那杂种一头屎。官司打到值班政府那里，把警察都逗笑了。你也笑了？

老咸：我能不笑么？这笑料太没心没肺了。

牟大路：嘿嘿，你说这老蒋和叶鸭儿，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如果在外头，恐怕永远碰不上，可偏偏在牢里狭路相逢，成了冤

家对头。老蒋被气得案子都忘了，然而叶鸭儿菜农嘴脸，一天到晚没事找事，上个月卖副食，除了一人配一个午餐肉罐筒，就是重庆特产怪味胡豆。凡是折子上有钱的，都要了幾大包。老蒋的钱还没送到，啥都要不成，只有欣赏大家一齐嚼又辣又麻又脆又香的胡豆，唏里喳啦的。叶鸭儿故意贴着老蒋的腮帮子嚼，还说：“老蒋，你不是几百万家产么？咋连买胡豆的钱都莫得？你这款爷分明是伪劣产品嘛。”老蒋已正常了个把星期，自我感觉元气恢复得可以，因此吞了满嘴的清口水，顶撞说：“老子的钱把你淹得死！”鸭儿说：“嘴硬顶个屁用，你叫我声爹，我赊给你一大把。”老蒋气得哆嗦，刀背脸上浮起几丝胭脂红，可没料到他还能忍，并且说：“大家都听见了？今天我就不要老脸，认叶鸭儿为爹。爹，我要亲自抓一大把胡豆，以后，爹还要管我的吃喝。”叶鸭儿万万想不到款爷比他更能降格，要反悔，又怕激起公愤，只好装可怜说：“我是所里有名的大肚皮，你忍心？”话还没完，老蒋就接了过去：“你那大肚皮是假的，我比你装得。”叶鸭儿鼻子哼了一声，老蒋说：“你那山猪鼻子哼个臭屁！今天我们就拼个分晓。”我问：“你拿啥子拼？”老蒋说：“我的钱马上就到，买一屋子的怪味胡豆不成问题。叶鸭儿，你敢不敢把四包胡豆全部拿来赌了？”叶鸭儿说：“咋赌？”老蒋说：“一人吃两包，你赢了，我倒赔你四包，你输了就抹平。”叶鸭儿说：“等你钱来了再赌。”老蒋说：“你虚了？我就先抓一大把吃。”

这种好戏，千年都逢不到一回，满舍房兴奋惨了，都冲着叶鸭儿说：“你这回不雄起，就扒你狗日的皮！”还说：“农民始终是满脑壳红苕屎，关键时刻，连胡豆也输不起。”老蒋趁机去扯鸭儿的食品袋，还煽动说：“傻棒棒，想挨打嗦？”

叶鸭儿又怕挨打又心疼胡豆，只有应战：“这是我老叶的强

项，胀死你娃该背时。”老蒋扭了几圈腰，做了热身运动，然后露出比鸡翅膀还瘦的膀子：“想农村包围城市？做你妈的苞谷梦。”

孙大鸟绑了个红布在头上，充裁判，死犯用鼻音奏《运动员进行曲》，选手上场，打盘脚，面对面，眼珠子都要恨出来了。裁判检查了四包一斤装的胡豆，在一人跟前码了两包，然后把手隔在中间，喊：“预备——开始！”

选手扯开口袋，一把接一把朝口头填，腮帮子鼓得像大蕃茄。开头两人的动作差不多，都是一手捏一把胡豆，像公鸡打鸣一样伸脖子，咽下去，再填一把。后来，老蒋的手上明显不如叶鸭儿，再加上嘴小些，所以速度跟不上。半个钟头后，两人都嚼了一嘴大血泡，灌了些水，那黑浆浆就顺着嘴角流了两条槽。大冷天，头上还热腾腾地冒汗。我和另一个死犯，一张接一张往他们脑壳顶放草纸，一秒钟就湿一张，揭起来再放，又浸湿。我们放了七、八张草纸，那汗都没汲干，不仅没汲干，还变稠了，纸一下去，就成纸浆，咋也揭不起来。两个人都填了一包多，脸都紫了。叶鸭儿肚皮占有先天优势，老蒋排骨伸缩性再大也赶不上，眼看不行，老蒋就站起来活动手脚，再坐下来。两个人头抵头，咔咔喳喳又疯吃了一盘，端起瓷碗喝了水，就把抹嘴的血浆擦在对方脖子上。叶鸭儿咽下一口翻上来的胡豆渣渣，叽咕说：

“老蒋，你不行，投降算了。”老蒋怪叫一声，就翻下炕。想一会儿，拍拍脸，他突然埋头直接啃炕板上的东西，这办法果然灵，他三下五除二就超过去了。唉，这老蒋眼都直了，孙大鸟拿手指头在他鼻子尖晃了三回，他都没反应，只一个劲地嚼，嚼。叶鸭儿见了，也学这一招，两个人并排跪在地上啃炕板，吭哧吭哧，把大家笑得打滚、碰墙，连哨兵也觉得稀奇，在楼上观战。叶鸭儿跪了一会儿，死肚皮在地上颤，觉得眼冒金花。马上站起

来，坐回炕上，一把填进去才一秒钟，滴滴哒哒地回出来大半把，大嘴变成了不断挤屎的鸡屁股。可老蒋越战越勇，埋头啃，像个机器，根本不看对手一眼。两人都满脸胡豆渣渣，翻了无数回，都停顿，抹胸，一点点吞下去，叶鸭儿到底不行了，最后一把没填完，全部汤汤水水地回出来，他还想再填，裁判把他的手逮住，宣布战绩：“一斤八两一钱！”

老蒋已经听不见看不见，一路猛啃，我贴倒在耳门吼：“你赢了！”他从胡豆渣渣里瞟了我一眼，还要啃。孙大鸟伸出两手，站在炕沿猛下腰，把这条疯狗往上提。他浑身软沓沓的像没有脚。大家都来搀扶冠军，孙大鸟把红布给他拴在头上。老蒋还在叭叭嗒嗒地咬空气，渐渐，才扶墙站定，推开了我们。他埋起脑壳哑了几分钟，突然向前一弹，射向厕所。叶鸭儿还蹲在坑边抠舌根，又没来得及闪，就被老蒋搂在怀中。老蒋一口喷出两米远，厕所的三面墙统统开花。两个选手一上一下地乱呕，成龟孙子了。热闹大了。这是舍房里最快活的一天；虽然大家都挨了电棒，还是快活惨了，龙门阵摆了好多天。

老威：老蒋现在没出毛病吧？

牟大路：呕了几天血，躺了几天，现在已经彻底没事了。

老威：肯定有后遗症。

牟大路：他已经上路五天了。估计已经到了阎王爷跟前，那是个专治后遗症的地方，隔一晌我也会去。

老威：你还没谈你自己呢。

牟大路：入了班房，就四海之内皆王八，谈他也就是谈我。好了，哥们儿，抽支烟告个别吧。

人贩子钱贵宝

采访缘起

拐卖人口是一项历史悠久的罪恶行业，在旧中国，这种能赚大钱的买卖都由黑社会操纵，把骗到手的良家妇女高价转给发达城市的妓馆。

没想到，新社会铲除了黑帮，拐卖犯罪却由钱贵宝这种大山里的乡巴佬继承，特别是在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

1992年4月30日上午，我在重庆市某看守所探望了钱贵宝，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谈话。由于不准带任何录音器材，我只能在此时此刻凭记忆追述。人贩子自有上不得法庭的歪理，可怕的是，他居然把这套歪理升华成一种“信念”。

但愿这篇采访能为犯罪心理学提供某种参考。



牛，吃苦耐劳的传统中国农民的象征，也是贫穷、封闭、愚昧的象征。



民国时期的江南人市。图中的人贩子正捏着“奶娘”的大孚房同买主讨价还价。

(曾循提供)



田间辛勤劳作的乡村少女，她们是人贩子钱贵宝的主要财源。

(曾循 摄)

老威：看你这帽子老实巴交，不像个人贩子。

钱贵宝：我的确不是人贩子，我正儿八经做生意。

老威：做人肉生意吧？

钱贵宝：同志，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妓院才做人肉生意，我不开妓院。

老威：你没干过逼良为娼的勾当么？

钱贵宝：够资格的良家妇女，无论你咋个逼，她也成不了娼。比如我老婆，至今还守在穷山沟里，我都成这样了，她也没改嫁，没偷人。而天下大多数女的，也同男的一样，喜欢外面的花花世界。喜欢占便宜。报上经常登某某某如何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捉摸，这个人生价值，不外乎



成都火车北站附近的非法劳务市场，滋生社会犯罪的阴沟。披着察尔瓦坐卧者为大凉山来的彝族同胞，据说他们能在烈日下一动不动地打坐一整天，只等夜晚降临，才四处活动“生财”。
（曾循摄）



阴沟旁坐等的彝族小姑娘。如果运气好，或许会进某富裕之家当小保姆；如果运气坏，或许就是人贩子钱贵宝的猎物。
（曾循摄）

就是花一分力气，占十分便宜；就像歌星，张张嘴儿，唱个歌玩儿，票子就哗啦朝兜里淌，所以人人都羡慕歌星、模特，因为他们张张嘴儿，扭扭胯就能赚。我是农民，为啥没人崇拜农民？就因为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花十分力气也占不了一分便宜。你出了汗，种了粮食，可城里人吃着粮食还嫌你汗臭。因此，我干这个行当，是顺应了时代潮流，投其所好。不错，我干了五年卖了20多个人，可这些人都是自觉自愿跟我走的，我又没拿枪逼着她们，我又不是劫匪，绑了肉票换钱。

老戚：你欺骗引诱，毁了人家的一生。

钱贵宝：我承认我欺骗引诱，但这世道，有几个人不欺骗引诱！恐怕只有吃糠的猪最老实，凡吃米的东西都不老实。我说我是老山里的傻农民，肯定没人愿意跟我跑；我把衣裳穿整齐点，说是广东某公司的经理，虽然样子可疑，可人家想都不想就套近乎来了。好多女娃子，都是见面熟，不用你勾搭，她也来劲。并且，怕说自己是小地方的。

我发觉自己还有点魅力，刚出道时不自信，以后熟能生巧，舌头像在青油里泡过，滑刷得很，七仙女也能哄下凡。嘿，本来信不信由你，不信，你当我放屁；偏偏有那么多婆娘把我的屁当肉包子吞了，当香水搽了，活该。

老戚：你是咋个奔上这条路的？

钱贵宝：这类事报上登得比较多，没啥子稀奇。我是平武县小河沟的农民，平武你可能晓得，出熊猫的地方。过去，林子和箭竹都密，我们靠山吃山，捡伐木厂剩下的木头去卖，也够糊口，另外，山上的物产也丰富。可后来，老林子砍得差不多了，伐木厂也撤了，地在坡上，不好种，我们那地方你没去过，光靠种地，养不活人。28岁以前，我超生了三个女娃子，连裤子也没多余的。村里家家户户都差不多，男人捆草裤下地，把布裤子省下来，走亲戚、见外人时穿。冬天，姑娘媳妇都光着，挤在内屋火铺里做手工活路。这样熬到92年，村里几个壮劳力一碰头，决定把存放多年的一些皮货拿到县城去换车票钱，然后搭伙出外打工。先是在县上盖房，以后就跟包工头到成都，到甘肃，长了见识，就不干那累死牛的重体力活了。兰州的回民对人义气，我跟他们混熟了，一起去走村窜乡，北方的地盘太大了，就是戈壁多，屎毛都不长，并且吃水也不容易，冬天的雪化在一窖里，要喝大半年。但是，这里男人对人实在，死心踏地跟着婆娘转。因为女的太缺了，男的就攒呀攒呀，攒十来年的钱，血汗

钱，一下子就用在接婆娘上。在四川，我们那地方够穷的，也没见有多少光棍，可这儿，男人见了婆娘就瓜了，恨不得马上骑上去就日。你晓得四川女娃子勤快，好看，肯伺候人，外省都特别欢迎四川婆娘。我的脑壳一转，嘿，该发财了。

老威：你第一次卖人是啥感觉？

钱贵宝：我第一次没卖人，我把两个女儿嫁过去了，把赔钱货变成了赚钱货。我的亲家在当地还算不错，那地方离铁路线才十几里，不算太偏僻。我把两个女儿嫁在同一个村，得了600元钱、8只羊。羊卖给乍站了，50元一只，这样，我就有了1000元，发了大财，人都高兴快疯了。但是没过几天，我女儿告诉我，她们村里的四川婆娘不少，都是人贩子倒过来的，一个人的价钱最低也要2000元。我这亲家还是做亏本了。

老威：你大老远把女儿嫁给一个陌生人，他们合不来么？你得了钱，你女儿的退路就没有了。

钱贵宝：农民的女娃子，又不是金枝玉叶，有啥合不来？除非男人不长鸡巴婆娘不长尻。女人是越日越好看，当然，生了一两个娃儿，就没啥看头了。俗话说：“下崽前是金奶奶，下崽后是狗奶奶。”

老威：你是咋个扩大业务范围的？

钱贵宝：最先我还老实巴交的，给家乡人牵红线。可任务太艰巨了，我费心费力，磨破了嘴皮子，成功率就是不高。山里的女娃子，一辈子从来没出过县境，你要她一下离乡背井，跑几千里以外去嫁人？嘿，死她个舅妈都不干。没办法，我只有骗，说在北方开馆子，招服务员，管吃管住还拿工资。这一招不灵，就干脆刻公章，造证件，开皮包服务公司，招工人。吹北方牛羊多，毛便宜，适合开纺织厂，生产毛衣、地毯，想起啥吹啥。渐渐，我的骗胆越来越大，与兰州的孙大个子，银川的刘螃蟹，河

南新乡的刁二娃都有了业务联系。我负责把招来的“货”运到约好的地方，交他们的“公司”就行了。

老威：还是个跨省的人贩子团伙呢。喂，你这么卖力地为家乡人民做“好事”，就不怕遭报应？

钱贵宝：报应？哄鬼，封建主义那一套。当然，我们是乡巴佬，做媒的方式有时不太文明，比如，事先没征求女方的意见。但是乡下的旧风俗，也是成婚之前男女不见面，只有进了洞房，揭了盖头，才晓得对方是巫婆还是天仙。我父母那代人就这样过来的。

老威：啥子进洞房？据我了解，纯粹是上刑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倒爽快，数了票子，把人往那火坑一推就脱手了。许多女娃子当即就被几个人按住手脚，让“新郎”强奸。还有被捆绑，被毒打得通体鳞伤的。你的新婚之夜也是强奸老婆么？

钱贵宝：强奸老婆？你咋有这种怪想法？当然罗，你是城里人，夜总会、舞厅，甚至车站、码头，都能认识女娃子，如果脸皮薄，出不了众，还可以上官办的婚姻介绍所，在报纸上打征婚广告；这回不行有下一回。乡下就差远了，很多人，一辈子只能在山沟里钻，结婚生孩子，多穷多累，有啥出息？邓小平提倡改革开放，可离县城几百公里的夹皮沟，谁去投资？恐怕本钱都收不回来。连机耕路都不通，鸡肠小道一走大半天。中国还有不少这种地方吧？财神爷请不进去，就得自己走出来，欢迎改革开放。大山里水土好，女娃子不打扮都白里透红，而北方最缺的就是这种水分多的货。那里的光棍太多了，我把这千里姻缘一线牵，两方都找到了归宿。虽然开头不那么温柔，逃跑啦、寻死啦，喊爹叫娘啦，可这一关过了，嫁鸡随鸡，日子也就越过越红火。至于捆啊打啊，农村就这样，汉子不打老婆不算好汉子。除非老了，撵不动了。有一回，我和老婆掰包谷回家，我就想日

她 她说来那个了，既使我想口，也要等到天黑。我不干，非要白天日，她说累了，死活不准脱裤子。我毛了，就摸根顶门杠要出脱她，她拔腿跳跑，我跟着撵，她呼地一下子投堰塘自尽。嘿，你猜咋样？她非但没沉下去，反倒坐在水头哇哇嚎丧。原来那塘水只能淹到肚皮，我带到北方的女娃子，命都比我老婆好，常言道：“不捆绑不成夫妻嘛。”

我是在帮国家解决困难，一个地方，光棍多，气候又不好，肯定容易出事，弄些女娃子去，阴阳就调和了。城里的婚姻介绍所还兴收介绍费，我与他们同行，也该收。其实除去车船费，沿途伙食费，鞍前马后跑路费，我也剩不了几个钱。有时，与那边“公司”把价讲好，人去了，男方却变卦，出不起那么多钱，也只有便宜卖，我们从不敢在人家村里闹事。

老威：四川警方组织了好多次解救被拐卖妇女的行动，群众都拍手称快，想必你已看过电视了吧？

钱贵宝：当然，你们城头人是拍手称快，山里人就不晓得了。其实这边的女娃子到那边住过一年半载，习惯了，总会想法与家里通消息的，“失踪”只是一种说法罢了，从男方家里逃跑的只是个别人，而多数人是不会同自己的丈夫分开的。

老威：什么丈夫？没办法法律手续，就叫非法同居。

钱贵宝：民间的规矩，吹吹打打，公开请了客就算夫妻了。

老威：你是法盲还是装糊涂？

钱贵宝：乡下人千百年都这样，背太阳过山，和尚的脑壳——无法。有法也用不着。

老威：这回用着了，你拐卖人口，应该判死吧？

钱贵宝：我主动坦白，从轻判了无期。

老威：在狱中学法吗？

钱贵宝：学。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我情愿多劳动，我

祖祖辈辈都是劳动人民，懂的是祖宗的家法，至于国家的法，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后来又包产到户，再后来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总之，一个天子一个法，我一个土老坎，恐怕懂不过来。劳改几年，天天都要学报纸，我增长了不少知识，也认罪服法。可说我是啥子“社会公害”，我不服气。我给政府增了麻烦，要出动那么多警察和车辆，去偏僻的地方找人，而且找到之后，还要费不少功夫，才能把婆娘从男方家里接出来。我晓得，精灵点的婆娘早就藏了，不会让警察找到，因为回家的日子也不好过。乡下不比城里，婆娘不比小娃娃，一见亲人，马上抱头痛哭，失散了多年嘛。可婆娘回到大山沟干啥？从晓得你被卖出去，哪怕老光棍骚得裤裆起火，也不会要那烂屁。

北方比南方野，从电视里都看得出来。前几天晚上，四川台重播了一个打拐节目，那些村，穷得不长一根草，警察的车一开进村头，就被围住了，那些北方棒老二，像从土里拱出来一样多，硬是把婆娘接不走。后来是县委书记、公安局长都来了，鸣了枪，车才开动的。哪个愿意人财两空呢？那可是血汗钱买的媳妇啊。我的眼泪都看出来了，早晓得这么惨，我就不卖人了。我得的是昧心钱。可话说回来，我干这行当也不是一天两天，人人都晓得，为啥子还要饿痨饿虾地接我手上的货？那么多村，那么多乡都不懂法？我又不是在外国卖人。

我敢打赌，被警察解救出来的农村婆娘，多数还是要跑回婆家，一夜夫妻恩嘛。当然，也有打得太凶，同男方搞不好的，北方这方面风俗太坏，手重，不像四川，小打小闹，不伤和气。

老戚：别把自己形容得比佛爷还慈悲，你这种营生，历朝历代都属打击对象。不过，今天你能把心里话说出来，也算有了进步。你们这个人贩子集团很兴旺吧？

钱贵宝：有十几个人，这座车里关了七、八个，北方的就在

当地坐牢。领头的两个已毙了，我是演文戏的，没动过粗，所以排在第四被告。

老威：你们还强奸被拐骗的妇女？

钱贵宝：我没有。我还劝过周黑娃，北方人保守，是原装货，出多少血人家都干，一破了处，价钱就垮了下来。可那两个挨刀的，年轻火气旺，睡倒坐倒都想搞。周黑娃长得标致，骗打工妹有一整套，经常是把人家日出感情来，再牵绵羊一般弄到约定地点交货。

老威：你们不光是在农村作案吧？

钱贵宝：现在的农村地少人多，况且种地不来钱，所以外出打工的特别多。有一年春节后，我在成都火车站整整打一个星期的野铺，还没弄到票。我一见人山人海就来劲儿，这是钱哪，南来北往的，又都准备到外地，前途说不准，心里都空捞捞，所以，这种场合，一旦出现一个啥都晓得的热心肠，大家都抢着向你问这问那。看准了，想骗就骗，你吹屁股拉金子，也有人信。

老威：罪过罪过，你骗这些可怜的人！

钱贵宝：我也哄过大学生，还哄过一位研究生。

老威：就凭你这张老脸？

钱贵宝：不错，我天生老成，遇见这些知识分子，绝不能说招工啦，经商啦，社队企业家之类，那样，三言两语就识破了。我啥都不装，我是农民。但是我们那里条件不错，有花果山，有水帘洞，有原始森林，完全是没被开发出来的世外桃园。吹农村的物产丰富就是我的本行，凭我这条舌头，不怕这些读死书的女娃子不动心。然后，我才向她们虚心求教，表示我们那世外桃园缺的就是知识，是人才。我曾邀请那个研究生一起在天水下火车，去参观考察，有了第一印象后，回去好给我们引进些人才。我们一律高薪聘请并来去自由。

无论是大学生还是研究生，就是博士，也会被我的诚心打动。可惜，这种文化高的婆娘，闹的花样也多，有个女娃子被压在地窖里一个月，也不屈服。

老戚：如果我是法官，我就先割你的舌头。

钱贵宝：该割，该割，我哄人哄成习惯了，但愿坐牢能戒掉这种毒瘾。

老戚：你们的团伙有女骗子么？

钱贵宝：你说放飞鸽？那是前几年，现在行不通了。“鸽子”放入男方，过一段时间能逃回来算没事，万一没逃出来，或者被发现了，漏子就捅大了，弄不好会出人命。放飞鸽那些人已经激起公愤，我们要做，就正正经经地做。有信誉才有钱赚，出了事，人家才会掩护你。

老戚：谁掩护你了？

钱贵宝：当然不能说。况且，我犯罪，我坐牢，与别人没关系。

采访缘起

除了北京和广州，成都算是外地打工仔最集中的城市，九眼桥一带的劳务市场长期火爆，在桥下蔓延了几站地。我曾伪装成招工老板，横贯其间，与男女讨价还价，企图以此诱出些真实民情，但没人愿在生存竞争中与我瞎扯。

赵二是我在新南门附近的巷内碰上的露宿者，40多岁，川北某县人，挖过煤，外出打工已经七年。因一起露宿的同伙皆呼“赵二”，我也就入俗套近乎，用十元钱买下这篇谈话。

时为1999年1月12日晚上9点钟，阴有小雨，气温摄氏4度。

打工仔赵二



打工仔赵二在劳务市场等买主。由于天气好，他特地“装扮”了一番，抽着烟，给人的感觉好象不急，其实想借机抬高自己的身价。 (曾循 摄)

老威：大冷天，为啥露宿街头呢？

赵二：这不是街头，你看，上有塑料雨棚，下有隔湿的油布，再铺条棉絮，把被子连脑壳带脚一裹，啥感觉都没有，一闭眼就天亮了。出门在外，贱点好，贱点饿不死。

老威：想家么？

赵二：家有啥好想的？婆娘娃儿一大堆，一想就心烦。

老威：你们老家不搞计划生育？

赵二：搞，多生一个，罚款三千。我没钱你拿啥子罚？现在又不是前几年，动不动就掀房子，动不动就满山遍野地撵婆娘，几个人按倒安环。环一塞进去，筷子都夹不出来。宋丹丹演过《超生游击队》，挖苦我们

这种人带着大肚子婆娘全国到处下崽崽，她就没考虑，路费由哪个出？伙食咋解决？现在火车也不好混，即使上了车，走不了几站就被赶下来。我三个女儿都是在本地生的，计生办上门来，黑咕隆咚啥都瞅不清，朝里



由于地少人多，农村大量的闲散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了盛况空前的民工潮。图为对城市充满向往的六口之家，时至今日，这家已有三口在外打工挣钱。

(曾循 摄)

再跨一步，灰盆子又踩翻了。我一个女儿在吃奶，另两个女儿扭住阿姨就要糖吃，从此计生办再不上门了。

老戚：穷到这份，生这么多干啥？

赵二：我穷，我背运，我认了，但鸡巴不能认。我浑身上下就这宝贝是硬的，多下

种，将来好打翻身仗。乡巴佬嘛，也没钱上夜总会，我们的夜总会就在床上，黑灯瞎火没事做，就按住婆娘上夜总会。人穷虱子多，婆娘的肚皮稍不留神就大了，怪哪个？她想得儿，儿偏不来。



城管交警每星期都要出奇不意扫荡若干次，收缴活跃于成都大街小巷的有碍市容的无照拉客偏三轮。赵二的偏三轮被缴过好几辆，赔光了本钱，只好露宿街头了。

(曾衡 摄)

老威：你想省些钱寄回家吧？看你这么节约，连住店的钱都舍不得。

赵二：我有大半年没寄钱了。

老威：她们在家咋办？

赵二：自谋生路嘛。乡下娃又不是金枝玉叶，养到两、三岁，只要走路的步子稳，一般就会讨饭要东西了；再不行，舔盘子也养人。我婆娘

带着她们在县城里逛，熟门熟路的，说不一定收入比我可观。我发觉，娃娃越金贵越难养，白白胖胖还三天两头上医院。我的娃，风吹雨打从不生病，像树苗，你不管它，眨眼功夫又冒高一节。

老威：你这当爹的的确想得开。

赵二：我自身难保。他们至少还有个窝，我却睡街沿。这一溜十几个人，就数我年纪大。这儿离九眼桥劳务市场近，明天我得赶早去，找家餐馆打工。我的肚子又饿了，天还没黑时，我想的是上建筑工地，卖苦力钱要多些。肚子一空，寒气一上来了，



在成都某天桥上擦皮鞋的农村妇女。生活难以支撑时，她们就出没在黄昏街头擦“黄色皮鞋”，向体力劳动者廉价出卖肉体。

(曾循 摄)

我最想的就是小面馆，热乎乎的一大碗下去。从殡仪馆门口过去十几步，有家胖大嫂面馆，三元钱一斗碗，吃了还可以添面，除了潲子不能添。前天我们一伙六个人去，都添了三次面，把老板娘吃瓜了。我把全市的面馆比较了一下，就这家最实惠。九眼桥下的面虽说只要

两元，素面只要一元，但一碗挑起来就那么一夹，我连吃三碗才半饱。有一次，我饿昏了，吃了七碗面。

老威：看来你对面食比对儿女有感情。

赵二：老板，你能不能给碗面钱？

老威：给你十元钱。你莫做动作，惊动

了其它人，都来要钱，我给不起。喂，你家里有多少地？

赵二：我没地，我是矿工。

老威：下岗工人？算了吧，你这样子还冒充下岗工人？

赵二：不是国营企业，是专挖国营企业墙角的小煤窑。比如大煤矿从山那边打洞，我们就从这边，远处一望，一匹山梁弄得像蜂窝煤。小煤窑的入口像狗洞，我们只能肩拖着煤筐爬进去，胳膊伸直了要碰脑壳，只能学解放军练兵，倒拐支着朝前挪。煤窑斜着下，像一个酒瓶子，只有下到底才能挖煤。唉，伸手不见五指啊。

老威：你们没有矿灯和风镐？

赵二：你是电影里见的？我们这种贼矿工没有那种矿灯帽，都在头上绑把手电筒，风镐更不能用，一发电，山体震动大，山那边很快就发现了，更要命的是塌方，洞里都是临时性木桩，经不起震。这种累死牛的活儿，我陆陆续续干了许多年，一天才挣几块钱，一张脸从来没洗干净过，有时太累了，一回家卸下行头，就倒下睡。天长日久，你看我这后颈窝，这倒拐子，黑碴碴的，洗不掉，哪怕搓层油皮下来也不行，煤印子浸进肉里了。

老威：不在家挖煤，跑出来干啥？

赵二：80年代还凑合糊口，90年代就不行了。几块钱能买啥，恐怕钻一天煤窑，连肚子都填不饱。乡上太黑了，我们偷煤他们赚钱，干部都盖了宅子。大煤矿亏损，发不起工资，帐也算在我们头上，工人一见我们就咬牙切齿。最后，小煤窑的人跑了一半多，工钱少还能忍耐，万一哪天惹急了，那边工人来堵洞子，不死路一条？唉，一个乡一个村，男的女的，只要走得动路的，都朝外跑，男的卖苦力女的当鸡，都想得开。我婆娘幸好有三个娃拖着，只能在县城荡，否则我一离开，哪个晓得她干啥去？两个月前，我在九眼桥还碰到一个熟人，大都擦黑了，还不

收摊子，还在喊“擦皮鞋”，我瞅了一会儿，觉得有点像本村张狗嘴的婆娘，结果硬是，原来在擦黄色皮鞋。

老戚：啥意思？

赵二：就是专门在天黑时出来擦皮鞋，借幌子找客户，擦着擦着，手就摸客人的脚脖子。接着边擦边砍价，能给 50 元钱算大老板，当然，年轻奶大的，容易成交，老点的比较困难，像狗嘴婆娘，快 30 了，你想想，乡下女的 30 是啥概念？生过娃，奶子都垮齐裤腰了。卖不起钱，20 元算不错了，也有 10 元一炮的，这是底价，婆娘们想起都难受。我拉偏三轮那阵，还比较风光，隔三岔五打肉牙祭，10 元给过，20 元也给过，有一次手紧，就试着刹到 5 元，不提防当头挨了一鞋刷子。我想还手，那泼妇又起腰站起来说：“把胯风给你吞两口，不收钱！”我说：

“你这么老。”泼妇说：“老就贱？那你比我老得多，我倒出 5 元钱买你的屁眼儿，干不干？”

老戚：骂得好，你他妈也太过份了。

赵二：我挣钱容易么？我刚到成都，挖楼房地基，一方土几块钱。我干一年多，才存了 200 元，托人买了辆偏三轮，开始还兴奋了一阵，后来就经常被撵得鸡飞狗跳，霉的时候，一天也挣不了 5 元钱。况且，水灵的，乖巧的，嘴皮翻得出花儿的都上夜总会，档次低的，也有发廊和卡拉OK 厅。小婆娘学东西快，没几天，普通话也操起了，打粉扭屁股也会了，还有挣钱买假文凭的，听说是为了傍大款跳槽，彻底换装庖谷屎的肚肠。只有卖不起价的货，才在街上摆摊，5 块钱真的差不多，九眼桥最便宜的店，就 5 元住一夜。

老戚：你为啥不住便宜店？

赵二：刚来那阵经常住，挖土住工棚，拉偏三轮租房，几个人合租，一个月才出几十块钱。后来我的车被没收，山穷水尽，

就住不起房了。今晚本想住 5 元店，去晚了，客满。

老威：在哪儿？这么打挤？

赵二：九眼桥旁边，好长一溜塑料棚，还有正在拆迁的平房，白天摆摊卖百货，晚上围起来架成通铺。没床位，屁股大的一间，能挤七、八个，当然，十几个也挤得下，这铺有弹性，冬天人多，挤着也热和，有时，还热得蹬被子，打个屁也出汗。他妈的，老板守在门口收钱，不断叫：“再挤一点，再挤一点，都是出门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发财目标，挤到一起来了。”

老威：你没挤得下？

赵二：我挤了好几个地方，却崩地一下爆出来。昨晚我去得早，睡在最里头，不料半夜屙尿，一回头铺就没了。我挤了半天，七、八只脚将我朝门外蹬。我气惨了，拖起铺盖，想找老板退钱，可半夜三更哪有人？只好裹起被子靠门坐到天亮。还是这宽敞，如果是热天，就舒服了。

老威：你拉了几年偏三轮？

赵二：两年多。

老威：两年多才被缴了一辆车，你算有本事。

赵二：我被缴了三辆车，也不算多，好多人一年就要损失四、五辆。

老威：成都市拉偏三轮的有十几万吧，既影响市容，又抢了人家正规三轮车的饭碗。

赵二：靠劳力吃饭，总比偷抢正当。我只气不过这一行的社会待遇和小偷差不多。只要一听说警车来了，大家马上蹬起车飞逃，像一群挨了竹竿的下河鸭子，恨不得长出翅膀冲上天。我的第一辆车就是在白果林附近遭缴的，本来偏三轮都有固定的地位，比如我在五块石、高笋塘、长途汽车站一转拉，一般就不出

这个范围。人熟地熟，警车还没拢，就有人飞叉叉地沿途报信：

“端窝子的来了！端窝子的来了！”于是所有的偏三轮都掉头，见尿巷子就钻，拐进居民院脱了险，还可以锁上车，出街来看热闹。唉，我每次倒霉都是贪心，人家价钱一出高，就不晓得东南西北了。那次，从长途站到白果林，我不想走，就乱喊 10 元，那婆娘还 8 元。并且一口一个师傅，叫得人麻酥酥的。我一横心，反正是星期天，路线又是二环，就答应了。

那是 97 年夏天，外地人坐偏三轮又便宜又凉快，虽然二环路灰尘大，但沿途观光嘛。我蹬了将近一个小时，背心湿透了，就干脆光着脊梁。那婆娘躲在遮阳伞下，还关心我感不感冒。唉，我这人贱，客人说话一平等，我的舌头就长，向人家介绍好要的公园，省钱的商场，老地名等等，仿佛是老成都。其实我也是吹得闹热。

我绕开好几个有交警的大口子，走营门口立交桥再穿金鱼村，过交警四大队都顺利，偏偏拐过中新路口，就见摩托堵了过来，好几辆，把来回方向都拦断了。我吓得没主意，就转头朝坡上冲，冲了几盘车都倒退。最后上去了，是个居民大院，我拉着个婆娘在几栋楼房之间疯转，她也骇惨了，试了几次，都不敢跳车，就拿伞戳我的光背，背都出血了，还不停车，她就举起伞打我，脚还在下面踢，我十几元买的遮阳伞被她打成刷刷。后来，摩托还是把我堵死在墙里。妈哟，我心疼的！刚刚才把车的本钱挣回来！我死死地抱住车把子不放，泪水和汗水，在脸上都分不清了，最后，车还是被缴了。停在路边的大卡车上，偏三轮冒央央的，车屁股还挂了七、八辆。我跟着车撵了一条街，有屁的用？我只有往回走，走了好几个钟头，还没拢家，心里空捞捞，差点就弄疯屎了。怪只怪自己贪心跑长途，车没了，伞也没了，连 8 元力钱都没收！那婆娘还当警察面闹着要我赔偿精神损失。

老威：偏三轮的交通隐患大，不整治就泛滥成灾了。喂，你不会只跑二环路以外？

赵二：二环路外盲流多，治安复杂，经常遇到白坐车的。

老威：连三轮钱也给不起？

赵二：地头蛇，惹不起。他没向你抽人头税，就是天大的人情。况且拉贼三轮的，真碰上敲榨，也不敢报案，到了派出所，你算自投罗网。五块石一带，小偷都抱成团，金堂帮、新津帮，帮与帮还常打群架，动刀子呢。

老威：伤人么？

赵二：连肠子都挑出来了，就用我的三轮，拉到一个小诊所缝合，嘿，啥子医生，戴个老花镜，像老娘们纳鞋底一般，把线扯得呼呼响，血淌个不停，就在手术床下放个洋瓷盆，哒哒哒，把医生护士的裤脚都溅湿了。我见得多了，一般死不了。最狠的数彝胞，黑压压的一大片，在马路两旁蹲着，像秃头鹰，他们白天披着察尔瓦一蹲就是一天，好象不吃不喝，只有随地大小便，才挪动位置。半年前，五块石还是他们的地盘，内地贼帮不敢惹，只有撤退，他们管彝胞叫“乌云”。

老威：这倒很形象。

赵二：彝胞特懒，如果不是饿急了，一般不抢行人，可是专抢小偷，只要见你得手，他们就黑压压地跟上你，然后展开察尔瓦，把你围在中间，“哦！哦！哦！”一顿怪叫。识相的交出钱包则罢，若要反抗，彝胞的刀拔得比你快，并且在毒药里浸过，随便挑你一下就要感染，伤口溃烂，几个月好不了。

老威：小偷成了彝胞的打工仔了。

赵二：差不多。所以彝胞迁移到哪里，哪里的小偷和强盗就绝迹。结果，彝胞就自己动手。一般在深更半夜，彝胞像夜猫子，挨门挨户地袭击居民小区，只要一根带钩的绳子，他们就能

飞檐走壁，这都是山区练出来的，只要没上年纪，几乎个个都是爬岩的高手。彝胞的特点是见啥收啥，阳台上挂的香肠、腊肉、衣服，甚至奶娃子的尿布，都一齐装进察尔瓦里，如果入了室，只要是搬不走的东西，冰箱、洗衣机、沙衣等等，都统统砸个稀巴烂，所以民愤极大。每年警察都要清剿彝胞聚集的地方，拉一大网，连耗子也逃不掉。除了有作案嫌疑的，不管男女老幼，全部遣送回去。彝胞最害怕这个，一见警察就四处乱窜，有的还朝下水道里钻。下面在钻，上面在掀石板，硬拖出来，裤子都掉了。这样整治过后，得清静 20 多天，贼娃帮才会卷土重来，这下子，住家户拍手叫好，过路行人却惨了。

老威：你见过扒窃么？

赵二：两年前还是单个的贼，悄悄摸人家钱包，现在结成帮，就明目张胆抢了。扯耳环、项链，几个人把女娃子的手掰开，倒抹戒指，最容易糟的是花枝招展的婆娘，挎一个巴掌大的皮包，屁股把人的眼睛都扭昏了。嘿，一眨眼，皮包带就被割断了，有时不是割，简直是硬生生地扯，你喊抓贼，谨防后脑勺挨一石头。有一次，我拉一个老板过老成摸彭路口，那老板长得像匹山，还喂喂打手机，把我累闭气了，不料从背后扑上来六、七个人，勒颈项、扭手、抱脚，差点把车子都按翻了。他妈的，老板衣裤所有的兜都被抖出来，皮带也被抽了，连内裤也伸进手去捏了个遍，最后，公文包、手机、皮鞋全被拿去，老板求把皮鞋留下，否则不好走路。贼说这盘收获不多，要把皮鞋提回去，撬底子，看藏没藏宝贝。老板被抢得瓜兮兮的，那么大个人，还捂着脸哭了半天。

老威：你是啥东西，看着大白天抢劫也不报警？

赵二：我走得开么？我腿都吓抽筋了。况且，这种事不是一次两次。我管？找死啦？

老威：那你当时咋想的？

赵二：我就想着我的车，万一摔坏了，修理还得花钱，所以在旁边干着急。那老板笨得像狗熊，看模样倒像有武功。我帮着那些人推他，他就是赖在车上。后来，我问他要车钱，他还骂人。

老威：有觉悟，真他妈有觉悟。

赵二：先生你是讽刺我吧？我这个等级的人，也值得你讽刺？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我已流落街头了，没有做英雄好汉的本钱。虽然，到处都在放英雄好汉的录相，我经常看，一块钱，看两部，还有一杯面面茶。前头巷子拐弯，就有四、五家，塑料棚子里黑麻麻坐了好几十个人，都是打工仔。这就是我们的娱乐，天天看录相，就说明运气好，工打得顺。先生，你是记者吧？记者还是有做英雄的本钱，管闲事受了伤，报纸要登，电视要演，自己不出医药费，说不定还要得奖金。

老威：你在胡说八道，我记得九眼桥和五块石都整治过好多次，警察花了大力气。

赵二：这世道穷人太多，都想发横财，我没去偷，就算有觉悟了。这雨已经下了十来天，明天会咋样呢？鬼晓得。

采访缘起

年近七十的周大爷与粪便打了一辈子交道，晚年却鸿运临头，承包了成都市西郊茶店子附近的一所公厕，“这也算生意，”他说，挺精神的样子。

1997年夏日的一个深夜，我从母亲开的茶馆出来，因入厕与周大爷搭上了关系。其实在此之前，我们已互相眼熟久矣。

我鼓足勇气，才挣脱所谓知识分子的角色感将这次访问进行到底，那种豁然开朗的喜悦如一次畅快的排泻。

公厕历史也是城市历史的一部分，可我至今没见过以研究公厕著称的学者，那么，这篇文字倒填补了一段空白。

厕所门卫 周明贵



机关干部送肥下乡。守了几十年厕所的周大爷却对这张文革旧照片嗤之以鼻，他说：“这种草肥只配送一般的生产队，而公厕里掏出的正宗的大粪要重点送郫县红光公社——那是毛主席57年视察过的地方，要用优质的肥料保证它年年丰收。”

老威：周大爷，公共厕所还锁门呀？

周明贵：快 12 点了，也该锁门了，任何单位都有上下班。

老威：你这也算单位？

周明贵：当然是单位。我是正儿八经向环卫所承包了的，一年要上交好几千元。每人大小便一次一角，你这知识分子帮忙算算，要多少个一角才能凑齐几千？喂，你到底解手不？已经超过 12 点，按规矩，要加收人厕费，看在老主顾的份上，免了吧。

老威：我不解手，我请你喝茶。

周明贵：嘿嘿，你太客气了。哦，你妈的茶馆还没关？今晚上她的生意不错。你妈是个善人，平常我要口水，灌个壶，她从不收费。我做梦都在为她老人家烧高香，祝这个街坊铜壶煮三口，天天客满。茶卖得越



正在拆迁中的旧城区，老门卫周明贵也将在一浪高一浪的城建热潮中“转战南北”。

(曾循 摄)

多，尿也就越多，大家的生意都搞活了。

老威：哪就请吧，周大爷？

周明贵：我一个守厕所的，就算了吧。

老威：这世上哪有高低贵贱？皇亲国戚就不拉屎？

周明贵：我没见过皇亲国戚拉屎，至少不会上公共厕所大小便。据说身份太高的人，当着众人是不会大小便的。好啦，说笑呢。我晓得你是文人，喜欢收集个素材。你该不会把啥子都朝报纸上捅吧？

老威：我是小报记者么？况且你这里面又没发生凶杀案。

周明贵：嘿，叫你说准了。前两天，一个男的追一个女娃子，撵到厕所里来了，拉都拉不住，把解手的人吓得惊抓抓地叫。我让儿子去抱他，他刷地抽出一把刀来。结果大家都不敢上前。那家伙逮住女娃子，要破像，女娃子跪倒求饶。幸好我一尿桶泼过去。后来 110 来了，也没找我了解情况，就把男的女的都带走了。你猜后来咋样？才隔了一天多，那两活宝，又出现在街上，还搂搂抱抱的。我不想看他们，他们却偏偏冲过来，指着我鼻子骂：“老狗日的，你敢泼我的尿！”我不吭声，他又骂：

“狗咬耗子，多管闲事。你劝架么，拉开就完了嘛，搞得我们一身臭哄哄的。”我忍不住说：“不泼你，早出人命了。”没想到女娃子也帮腔说：“死了也与你厕所所长无关。我们已经耍了三年朋友，他已经杀了我三盘了，出没出人命？哼，你还报 110，搞得家里人捂住鼻子来接我们，街坊邻居都闹麻了。今天，我们特地来向你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现在都讲法律。”这话气得我儿干瞪眼。”吵了好几声，就顺手抓了把铜水瓢，要开打。我急忙拦住，那泼妇却跳到大街上，惊鸣辣喊“杀人了！”弄得河翻水翻。围了大群人，更可气的是，那男的居然说：“不愧是看厕所的，杀人也用粪瓢。”这太侮辱人了，我儿把水瓢砸了过去，

大家却以为粪瓢来了，纷纷躲闪，其实，现在的公厕哪来的粪瓢？

老威：后来咋收场的？

周明贵：多亏你妈挤进来，把那对瘟神请进茶馆。你妈是走南闯北的艺人，是团长，水平就是高。她说：“这种无赖，我的茶馆一天要进来好多个，你千万莫跟他们要面子，冷言冷语打发就完。”唉，这种混混，社会上太多了，也没工作，整天在街上杀进杀出的。我听了你妈的话，发毒誓，以后再不管这种闲事了。大家都不管，免得血喷到自己身上，我一个看厕所的出面管了，反而让群众当笑话摆，封我一个绰号，叫“粪瓢雷锋”。现在，那小杂种一人厕，总要没大没小地与我开玩笑，说：“你挣钱困难，经济损失就不赔了，我们两口子在这儿免费解手一年咋样？”

老威：太混蛋了！

周明贵：我也不气了，恶人自有恶人收拾。今后，就是茅坑里栽个人来摆起，我照样认钱不认人。

老威：对，你这把年纪，自己的身子骨要紧。现在是世纪末，情况复杂，你看这条街，三百米不到，卡拉OK厅十来家，美容院六、七家，哪儿来的生意？这是城乡接合部嘛，城里一扫黄整顿市容，嫖客就都上这儿打挤来了。那个女娃子姓张，就是我妈茶馆隔壁美容院的小姐，乐至县的人，一过夜里12点，如果没有约会，就到斜对面的“在水一方”坐台去了。她的那个二杆子男友还蒙在鼓里。

周明贵：不愧文人，了解得很仔细。

老威：我的意思是说，这条街夜里的生意比白天好，卡拉OK点一首歌才2元钱，小姐唱歪了嘴也花不了几十元。

周明贵：与我没关系。

老戚：唱歌嗑瓜子，口就干，而经常嫖的人，一般都肾虚尿频，你不做买卖，人家就朝街上冲了，夜里没人管，这不是浪费么？

周明贵：歌厅里有卫生间。

老戚：这些低档次的角落，屁的卫生间。看，说着说着生意就来了，那鸡婆提着裤子，尿胀慌了，你一定收她五角。

周明贵：收三角算了，我明天和老伴商量，把作息时间调一下。上午的生意不好，门可以开晚点，感谢你提醒了我。

老戚：你这是红灯区里唯一的公厕。

周明贵：与你摆龙门阵，精神越吹越新鲜。唉，如果倒退十几年，谁会想到靠公厕谋生？那阵，全中国解手都不要钱，厕所是公益事业，归环卫部门管。有一段时间，环卫下放到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下放到居委会，结果，这项又脏又臭的亏本事业就没人管了。现在公厕红火了，我是环卫所的退休老职工，与脏东西打了一辈子交道，还死缠了半个多月，才承包下来。

老戚：现在还有不要钱的厕所吗？

周明贵：大概在老居民区还有吧，因 70 年代以前修的房子，家里都没有卫生间，大伙都习惯跑公厕，有时，要转好多弯，跑几条街。夜里应急，有夜壶和马桶，这是家家户户都必备的东西，红漆马桶过去还是新媳妇的陪嫁品呢，结实的马桶要用几十年。乡农市一带还有两个老公厕，一下雨，粪水就满街涨，弄得小汽车都不敢过；而一出大太阳，陈年老粪蒸发，臭气跑出一里外，薰得过路人眼泪直流。附近居民天天盼望拆迁。

以前，群众都有早起涮马桶的习惯，就近有厕所则罢，没厕所就一齐候着，粪车肯定比公共汽车还准时，大家说说笑笑地倒尿，彼此的关系很融洽。

老戚：你还很怀旧的。

周明贵：对，我也拉过粪车嘛。群众都尊称我为师傅，没有谁瞧不起谁。过去，夜里还有偷粪的，经常被居委会的值班人员逮住，关起来，并扣住车辆。那会儿，没经济概念，不罚款，但要写检讨书，挖思想根源。文化大革命中，偷粪贼引用的毛主席语录，一律都是“要斗争批修”，然后说，偷粪是中了刘少奇损人利己的毒。

老威：偷点屎尿也上纲上线，太过分了吧？

周明贵：一切都是国家的嘛。过去，很少有化肥，农村用的几乎都是自然肥，大粪是宝。我们是专业单位，掏出来的粪量大、质量也高，得服从组织安排，送往红光公社。这可是一块金字招牌，因为毛主席 57 年到成都，亲临视察过。那儿至今还留着当年的公社牌坊。红光公社和毛主席有关，所以是农业的榜样，种出的庄稼绝对应该是最好的。我们得配合，确保它年年丰收，我们每年都敲锣打鼓送“争气肥”，汽车鼻子还戴特大红花。

其它机关、学校也送肥，但地点就不是红光公社了。他们的所谓“肥”，阴沟的污泥、杂草居多，质量也就差远了，可场面还是很壮观的，一路上，各种板车望不到头，还有不少小学生拉板车的。

老威：我小时候也送过肥，走“五·七”道路嘛。周大爷，你过去在环卫所具体干啥工作？

周明贵：掏粪、送粪、打扫公厕都干过，那年头，没有价钱可讲，党叫干啥就干啥。我们的榜样就是时传祥，全国人大代表，受过毛主席的接见。我原来住在线香街，街口的公厕，有男女各三十多个蹲位，用木板起了一层楼，下面是半封闭的大茅坑。到了 70 年代，城里的大公厕不再用板车拉粪，改用汽车，把碗口大的管道插进坑，开动马达往上抽。有一次，管子堵住

了，我拔起来伸手掏，原来里面卡了半截木棍，还有一块巴掌大的死胎，这一硬一软的两种东西缠成一团，差点把机器弄坏了。

老威：谁这么缺德？打胎的地方遍地都是嘛。

周明贵：年轻人，你说的是九十年代。过去的人，没有结婚证，哪个敢公开到医院打胎？

这是道德败坏的丑事，一旦张扬出去，就一辈子抬不起头了。所以，许多一时失脚的女娃子，都是悄悄开些药，人不知鬼不觉地下掉肚子里的货。甚至还有吃错药，闹出人命的。通过文革，大家开化了很多，而在文革前，公共厕所就是打胎的医院，我还遇过昏死在厕所里的，满下身都是血，我将她抱出来，那个惹祸的男人守在外面，明明脸都急青了，还装着不认识人。我拦了辆公共汽车，他却推了辆自行车过来，自称“学雷锋做好事。”我懒得点破，也不晓得后来他驮她上医院没有，反正中国命贱。

老威：你是清洁工，可以随便进女厕所。而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女厕所就绝对神秘，街坊上曾揪出过偷看女厕所的流氓犯，游街示众不说，还要挨观众的口水。

周明贵：我有规定时间，选没人的时候进去。并且在外面立牌：“因打扫，暂停使用。”那次救人，是有女同志拉我进去的。

老威：听说在文革期间，教授也扫厕所？

周明贵：牛鬼蛇神下放到居委会，归群众管制，扫街、扫厕所，啥都干。我想干，但是造反组织不批准，只好在家里耍。劳动惯了的人，不要要出毛病，就一早一晚，习惯去厕所，给牛鬼蛇神做示范。我晓得，知识分子是受不得委屈的，虽然他暂时像狗一样毕恭毕敬，但是内心把账一笔一笔地记着，时机成熟了，再一笔一笔抖出来。古戏里有孟姜女哭长城，如果现在像秦始皇

那样“焚书坑儒”，也就没有人敢写“孟姜女哭长城了，也就没账可算了。共产党毛主席毕竟是仁慈的，不杀文人，连胡风也不杀，讲思想改造，”讲“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这容易吗？劳动人民知识化当然容易，进扫盲班，学政治、学历史，哪个不乐意？可是，要让教授扫厕所，斯文就扫地了。报纸经常登这类文章，诉苦，变着法子挖苦思想改造。据说还有当时想不通，用裤带在厕所里上吊的，惨哪。唉，这也叫惨，我生来就是掏粪坑的命，就不惨。你说惨，没人相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孔夫子说的，连毛主席的胳膊也扭不过他的大腿。

老戚：我觉得你挺风趣的。

周明贵：谈不上，劳动人民嘛，拿得起，放得下。

老戚：你勾起了我许多回忆，那种回廊式的公共大厕所，我们这种小屁娃经常在里藏猫猫，屙屎忘了带纸，就撅起小屁股在隔板上蹭。惹得大人骂，可以说，厕所是我们这代人的第二课堂。

周明贵：你把厕所叫“课堂”？

老戚：差不多。因为在课堂学不到的东西，都能在厕所里找到。我第一次接触到女性生殖器，就在厕所的隔墙上，一团乱麻中的一个洞，那么直观，那么触目惊心，接下来的一幅画，是性交的剖面图，男女形象都省略了，就剩下两个嵌在一块的器官。当时我才8岁，读二年级，连课本都是红彤彤的，万万没料到在革命的红海洋之外，还有这种阴暗角落，于是就咬牙切齿的掏出铅笔，在性交图旁歪歪扭扭地批注：“刘少奇和王光美干坏事。”

周明贵：你也有乱写乱画的习惯？这不好，我也想不透是啥原因，许多人一解大手就乱来，你费心费力地擦了，刮了，弄干

净了，嘿，一会儿他又给画上了。几十年，我就是这样擦了刮，这比扫地冲坑更难整。文革，反右，四清，政治空气浓，你没地方发泄，就到这儿来，还情有可原；可现在，发泄的地方有的是，你还在墙上鬼画桃符。这又不是出风头的场合。

老威：有些啥内容，你晓得的一定比我多。

周明贵：我文化低，也没认真看，气都气不过来。好像儿歌，下流图画，粗话，标语，一段一段的文章，啥都有，反正这种东西的历史很长，城里、农村，只要拉的时候顺手，都来几句。文革是个例外，打走资派，打派仗的标语，直接刷进厕所，啥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保皇派吃屎”；啥子“庙小妖风大，坑浅苍蝇多”，

老威：据我哥说，他会背的唯一的儿歌就是厕所的产物，你听听：“我们两个好，我们两个好/我们两个凑钱买皮袄/你穿皮袄我烧火/房子烧了莫怪我/救火车，来救我/吉普车，来撵我/把我撵进东门派出所/派出所，关的坏蛋多/把我挤成肉砣砣/你一碗，他一碗/妈妈哭进来舔锅铲”。

周明贵：这有啥意思嘛？

老威：意思谈不上，就觉得比老师教的儿歌有趣。还有一首《厕所恋歌》：“你是天上的鸟儿/我是地下的推屎爬儿(屎克螂)；/你在云中打旋旋/我在屎里头栽筋头儿。”

周明贵：你一个文化人，记这些下三滥的口诀干啥？

老威：见笑了，老人家。厕所文化嘛。你晓得，中国有十几亿人口，能够写文章，并在报刊上发表的，毕竟很少，况且，发表出来的东西，也审查了又审查，不见得就真实。许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在大庭广众中的发言权，所以，厕所也算自由发表言论的地方。绝大多数情况下，写了就写了；没人追究责任。以前，我恨班上的一个女同学告状，就在厕所里写：“王小红是地主

婆！”还写“地主婆王小红与走资派日×！”这种明目张胆的诽谤在中国小孩中经常发生，并从厕所发展到外面的墙上，还由一个人骂街发展到许多人参与的对骂，直到墙装不下了，于是擦了重新开骂。而大人呢，要么不屑一顾，要么饶有兴趣的欣赏一番。没人打算破案。

周明贵：我是大老粗，没你这些想法。

老戚：我是向你请教呢，

周明贵：其实，产生乱写乱画，主要是因为环境不好，过去的厕所，有木架结构、有水泥板结构，甚至还有土墙、竹篱笆那种简陋的围子，铅笔、粉笔、钢笔很容易在上面写画。以前的人，一般都随身带笔，边解手边发挥，也是忘掉臭味的娱乐方式。现在，厕所要收费，几乎都改进了。隔墙上镶了瓷砖，滑溜溜的，笔在上面不好写。厕屎看报的人比较多，打手机的比较多，随身带笔的少。不过，乱写乱画仍然有，昨天，里面还有一首纪念毛主席的诗，嘿，好记，看一遍就记倒了：“毛主席呀，您爬起来看/前面尽是贪污犯/毛主席呀，你朝右边看/右边尽是嫖娼犯/毛主席呀，你朝左边看/假冒伪劣一片片/毛主席呀，你回头看/下岗工人一串串/毛主席呀，你再朝脚下看/还有几个婚外恋/毛主席呀，您莫法看/人民想吃大锅饭。”

老戚：我不想吃大锅饭。

周明贵：你当然不想，你又不是打工仔。

老戚：周大爷，你的收入还行吧？

周明贵：勉强糊口。这条街比较背，街口又是体育中心，陌生人懒得朝这边逛。

老戚：你可以改善一下经营环境，再提高人厕费。滨江路的高级厕所你晓得不？里面有鲜花，有电话，有吸烟厅，还卖与排污有关的小百货。例如高档手纸、卫生巾、香水、痔疮药、消炎

药水、口香糖等等，大小便五角，生意火爆极了。

周明贵：厕所不存在知名度，只要肚子胀，啥地方都能屙，否则，你轿子也抬不进人来。我与老伴考察过滨江路的厕所，那儿的露天全是茶馆，密密麻麻的人脑壳。人家本钱厚，客源猛，而且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我掏五角钱，进去享受了一盘，消毒水太浓了，薰得人受不了。墙上贴满了各种痔疮便秘和性病广告，彩色的明星头，眼睛直勾勾的，一门心思要赚屁眼儿的钱。我估计隔壁女厕所也少不了卫生巾和各种妇科病广告。我上下不得空，眼界倒是开了，可惜啥也没拉出来。

唉，一个月有个两三百元钱，我也就知足了。至少，我不给房租，我儿子、儿媳进城拉偏三轮，也有个歇脚的地方，活路也轻松，跟养老差不多。现在，下岗的太多了，年轻力壮都找不到工作，何况老头子。生活累啊，难啊，绷起一根筋做人，哪天筋绷断了，就完屎了。你还没瞌睡？夜猫子。文人火旺，鸡巴傲在头上。

居委会主任米大喜

老威：我找居委会的米主任。

米大喜：老的还是小的？

老威：老米主任。

米大喜：我就是，不过已退居二线了，今天是暂时在这儿替女儿值班。请问同志您贵姓？您的单位介绍信和有效身份证件呢？

老威：我不联系工作，我是二幢廖老师家的二毛。

米大喜：二毛？！长变了长变了，认不出来了。这些年，你在哪儿发财？咋不回老街坊打一头？你们家的房子可是好久没人住，房管局下来

采访缘起

金光村是成都市最老的贫民窟之一，由于地盘偏狭，位于城建死角，所以至今没有拆迁响动。我曾随母亲回去了几次，旧屋和旧邻都还在，我在这儿渡过了整个少年时期。

73岁的米主任是少年老威心中响当当的人物，虽时过境迁，但昔日雄姿犹

存。当我在桌边整理这篇文字时，那个时代的马车轰隆隆地从脑海中碾过。

车辙碾得再深，终有一天，还是会被时间的尘土湮灭。可米主任这一代毕竟是存在过的，并构成一个社会最初的基础。请世纪之交的健忘的读者记住这次访谈的日期——1996年11月4日下午2点。

调查几盘了。

老威：我妈每个月都按时交房租。我

家地势低，墙角浸水，啥都发霉了，没法住人。

米大喜：你妈绝对高傲，不与居民打照面，你这做儿子的，也该常联系。

老威：我是想常联系，可这一带下点雨，就同水牢差不多。今天我拐了无数道弯，人都转晕了，才找到居委会。我记得原来的居委会在正街上，好风光哟，您老人家每天早晨都在门口举行挂旗仪式。



居委会主任米大喜也“退休”了，真没想到，在组织里忙碌了一辈子的他也有失去组织，充当“马路天使”的时候。

(曾循 摄)

了，就从齿轮厂病退到街道。当时想不通，因为 60 年代，工人阶级是最吃香的，可转眼之间，人废了，还与东家长西家短的婆婆大娘们为伍。各级领导都来做什么，还把我选为区人大代表。你说的米家大院，就是派



居委会的老太太也发福了，这个胖子太多的时代啊。
(曾循 摄)

出所的汪所长和我们一起去征用的。原来住了个大资本家，开纱厂的，几个儿女都跑海外去了，就剩两个老的，乡土观念重，不愿背井离乡。公私合营后，他的厂子归国家，有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他就没事可干，整日闲赋在家了。1965年下半年，虽然文革还没正式开张，但火药味已闻得见了，所以我们一去，老家伙就晓得咋回事，马上顺水推舟说他解放前剥削工人弟兄，罪孽深重，经过这十几年的阶级斗争教育，已脱胎换骨，洗心革面，早就想把这座祖传的剥削阶级的包袱卸下来，奉献给国家，只苦于一旦奉献了，就要露宿街头。汪所长倒爽快，马上开了证明，叫人拿到房管所，给老俩口换了当街

一间九平方米的屋。

老威：你们这是违法。

米大喜：那个时代，革命就是最高的法。再说，两个老人住那么一座十来间屋的大宅院，整天也提心吊胆的。周围全是贫民，平均每人的住房面积才几平方，就你资本家特殊，真不怕闹鬼？真不怕被群众的口水淹死？告诉你，把资本家的大院改成居委会，是全体人民都赞成的好事，要不，文革闹起来，造反派不一把火烧了才怪。

老威：后来呢？

米大喜：后来街道也造反了，居委会又改作某某派的临时军部，直到1968年省革筹成立，张梁刘张当了政，市面上才初步有了点秩序。接着又是红卫兵上山下乡，所有的组织逐步解散，居委会又开始办公。

老威：办公？居委会是政府？

米大喜：居委会是政府的基层群众组织，算是最低的一级吧。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才是正儿八经的政府机构，具体管我们这段的只有一个户籍警，而办事处经常与我们打交道的是群工科。

老威：你领工资么？

米大喜：能领一点固定的补助，叫不叫“工资”？至今没个说法。我是共产党员，区人大代表，能计较报酬么？这芝麻官是世界上最累的活儿，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要通过这儿向下传达，群众有啥反映，也要通过这儿向上汇报，当然啦，各个时期的重点是不同的。我们这段，鸡鸣狗盗之徒多如牛毛，如果没有居委会这级组织配合政府进行整治，早翻天了。

老威：米主任，您还没说居委会是如何搬出朱家大院的。

米大喜：老头的两个儿子从美国回来了，不愧是洋教授，很

会说话。他们一进屋先鞠三个躬，感谢党和国家，以及街道的人民群众按政策替他家照看房产，说本应付清这些年的看家费，但考虑到居委会同志们的无产阶级觉悟高，金钱反而会损害大家的感情和形象，所以，特送“海内一家，叶落归根”的锦旗一面。

老威：这么说，他们要回来为国效力？

米大喜：你信他这套资产阶级的鬼话。我们前脚搬，他们后脚就开始拍卖房产。那是 1985 年，国家还没开放到这种无法收拾的田地，大伙基本都靠工资，打着灯笼也找不出几个特别有钱的人，所以，那院子没人要。你猜他咋办？他回过头找政府，喊出 30 万的天价要卖给政府，歹毒啊。换了毛主席时代，群众个个都会站出来扇他嘴巴，可现在风向转了，资本家吃香，资本家兼有海外关系的洋教授更是香上加香。政府仁慈，想借此安抚海外游子受创伤的心灵，吸引他们回来参加四个现代化，然而，这种人已被美帝国主义彻底俘虏了，拿了钱，马上走人，还说自己的家产已脏得像垃圾场。

老威：现在那种规模的宅院得卖 200 万吧？

米大喜：拆了。太可惜。我不是为院子可惜，我是为政府的钱可惜，当时的 30 万现在值多少？建 10 所希望小学也用不完。前面那条街正处在干道上，全拆了。这儿是死角，开发商来看了，地盘窄，又不当街又不当路，而且是穷人窝，没啥赚头。唉，拆迁全凭运气，有运气的都迁了，迁不了的，哪怕到了世界末日也迁不走，很多人不明事理，按多年习惯，啥事都找居委会。我们又变不出房子来。

老威：您老人家是群众的主心骨。

米大喜：哪个又是我的主心骨呢？

老威：您可不能悲观，现在虽说不讲阶级斗争了，但外来人口多，形势复杂，缺了您这一角儿，派出所和街道办的人下来，

都两眼一抹黑，他们找谁了解情况？您就是政府的眼睛、鼻子和耳朵啊。哪家聚赌，哪家租房，哪家来人没报临时户口，哪家非法同居，您都一清二楚嘛。记得小时候，街坊上的二流子都特别怕您，因为公安局要送谁去劳教，也得征求您的意见。

米大喜：现在也要征求我的意见，不过商品经济，大多数还是罚款。前一晌，我女儿领着派出所的同志挨家挨户查《暂住证》，抓了十几个来历不明的人，都送城郊的多宝寺收容所了。按他们的罪，送劳教绰绰有余，但都只关了几天，只要有人替交罚金，就放。

老威：他们犯了啥子罪？

米大喜：聚赌、嫖宿、看黄碟、不办《暂住证》或《暂住证》到期不续签。

老威：这好像不是罪吧？这叫生活作风有问题。

米大喜：你的脑壳才有问题。过去，莫说这样明目张胆地看黄碟、嫖宿，就是偷看手抄本也够劳教资格。你家隔壁的西皮娃，传播《少女之心》被人检举，我领派出所去查抄，人赃俱获。于是挂黑牌，游街示众，还送劳教三年。罪名就是“传抄《少女之心》犯”。

老威：都是邻居，您何必断送人家的前程呢？

米大喜：好人坏人，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以前有部朝鲜电影叫《看不见的战线》，我连看了几遍，感触很深。就由居委会出钱，把联防队员、积极分子、义务交通员和居民小组长都请到电影院受教育，我也在看不见的战线上，唯一的法宝当然只有依靠群众，80年代以前虽挨家挨户查户口，在查之前，都由居委会到派出所反映敌情，因此表面上是普查，暗地里早有重点可疑对象。

老威：75年，我舅舅刚作为最后一批战犯特赦回来，就被

您老人家查过，弄到派出所去泡过一夜。

米大喜：你舅舅是国民党，行迹可疑，容易引起误会。不过，几十年了，让我撞上的误会就这么一次。唉，过去的事了，而现在，打击犯罪的力度要大得多，一年要来好几次拉网清剿，公安、武警在全区、全市统一行动，连派出所也只起配合作用，居委会呢，也跟着跑，但同过去相比，只算得上敲边鼓。

老威：这样好不好？

米大喜：倒是痛快，可这样一来，群众的积极性就挫伤了。

老威：现在不是打人民战争的年代，依法治国，群众靠不住。当然你们这代人除外。

米大喜：二毛同志，你咋能站到群众的对立面呢？

老威：我不站到群众的对立面，今天就不来找您了。这块地盘，过去是成都市无业人员最集中的地方，而今，这里除了小商小贩就是小偷小摸。我们的老屋被撬了好几回，没损失啥值钱的东西，不过是几瓶老酒，一台冰箱，一台破电视机。我没报案，掉这么点东西就报案，会笑掉人的大牙。米主任，您明白是咋回事，前天猫毛俩兄弟打架，老二捅了老大一刀，幸好没出人命，也私了，没报案。这地盘，就这么个传统，您不会不晓得吧？

米大喜：我晓得，要相信政府有魄力解决治安问题。唉，你着急，政府比你还急。去年夏天由居委会出头，在这门口开了个茶馆，天天爆满。我原先设想，形势变了，过去那种通过喇叭吼一声，大家就端个小板凳来开会的作法行不通了，开个茶馆，你不通知他自己就来。我们利用这个场所，既卖了茶水，又宣传了党的政策，还可解决几个闲杂人员的就业问题。一举几得。那晓得，莫说在茶馆里读文件，就是读报纸也没人听。不但不听，还要起哄。我女儿劝我灵活点，报纸没人听，就改打川剧围鼓，这是传统文化，弘扬忠孝仁义和社会主义并不冲突。这一来，老年

人欢迎，年轻人捣乱，夜里一开场，就有人告到电视台，要求派记者来采访“噪音污染”。众口难调，我这个居委会主任也没主意。嘿，你没主意，群众自己有主意，打麻将，一摆就是六、七桌，还闹桌子不够。于是大伙也不请示你了，就各从各的家里抬桌子板凳，一会儿就摆了一坝，还拐弯，又有人过来接电线，牵电灯，这叫啥话，居委会变成大众赌场了。还有人建议我按桌子收钱，说：“茶喝不喝没关系，只要有麻将打就行了。”

老威：这叫财神爷进门，你拦都拦不住。

米大喜：我一个受党多年培养的干部，咋能把大家引向邪途呢？

老威：麻将也叫邪途？那成都市全体人民都入邪途了。没有一家茶馆不赌。

米大喜：不少人赖在茶馆打通宵麻将，赢了就吃喝嫖耍，输了就偷鸡摸狗。我后悔，想关门大吉也来不及了，连女儿也劝我听之任之。然而，我是居委会主任，我要为这段的治安负责。有一回，五幢的驼背打麻将输了一万多，疯了，回去就喝滴滴畏，幸好他老婆发现得早。事已至此，我只好主动到派出所投案，报警抓赌，等于自己封自己的门。很多人都在背底里咒我骂我，因为这件事，我辞职了，派出所决定，由我女儿接任。

老威：好象还是您说了算。

米大喜：我女儿 50 出头，气功啦秧歌啦，专追热门，她的性格更适合与群众打成一片。

老威：茶馆垮了，您又如何开展工作？

米大喜：我让人在房顶安了一个高音喇叭，早、中、晚广播三次，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本来这是居委会坚持了几十年的做法，过去，居民家里没电视，个人也没订报的习惯，所以，这广播还挺受欢迎。80 年代以前，我手下有专职的播音员，平时读

文件和报纸，还播放音乐。搞得和中央台差不多，有时就干脆转播中央台的节目，偶尔也有街道新闻。可后来，电视渐渐普及，这广播就有点跟不上形势。

老威：让我看看您的广播室。

米大喜：就在那旮旯里，让我把电灯扯燃，否则黑咕隆咚，你摸不清楚。公家的电，能节约就节约。

老威：这么黑，平常咋办公嘛。

米大喜：我的办公桌在门口，闲人也没必要朝里面打望。

老威：嘿，完全有必要。灯亮了，这四壁上的荣誉才显得辉煌！这么多锦旗奖状！几面墙都挂不下了。哦，马恩列斯毛的大照！我记得小时候就有？

米大喜：居委会搬了三盘家，房子越搬越小，锦旗和奖状，还有大半柜子，挂不出来，特别委屈的是这五张领袖像，并排挤不下，转角又不好看，只得边角压边角。这是 60 年代我刚下街道时买的，纸张和印刷都特别巴适，以后的领袖像，质量就要差些，颜色也淡。

老威：看上去的确古香古色。

米大喜：30 多年了。

老威：算文物了。可惜太挤了，这面墙宽，咋不把伟人请过来？

米大喜：供领袖像是有规矩的，只能在进门的正面。

老威：哪就错开一点嘛。

米大喜：你以为是贴明星照？上下左右歪着倒着都没关系？马恩列斯毛都一样伟大，只能在一条水平线上。否则会犯错误。

老威：米主任，您令我太怀旧了。这是一个博物馆，时间在里面完全停顿了，我还会抽空来，一面一面地读墙上的锦旗。

米大喜：毛主席说：“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只可惜，

这些荣誉没有传人了。居委会的工作也越来越难开展。你看，这是带话筒的收录机，这套调音设备，还是 80 年评先进居委会时得的奖，由区委书记亲自颁发的。现在没有年轻人愿意干这个，只好由几个老年人轮流担任播音员。眼花口吃，经常出错。从前，光读报纸、文件就要三个小时，而今，时间只有缩短，早晨 6 点半到 7 点半，中午 12 点到 1 点，晚上 8 点到 9 点。除了阅读和播放音乐，还有天气预报，以及个人口头发表的观点。

老戚：啥观点？

米大喜：比如早晨播完开场的《东方红》（有时是《春天的故事》），就是提醒上班的同志，交通拥挤，骑车、走路注意安全；早饭不能马虎，防止低血糖；退休老人不能贪睡，起床的注意事项；下岗的青年同志要勤劳，莫自暴自弃。中午转播中央电视台的国内外新闻；晚上要发安民告示，提醒关门窗、关煤气、防火防盗、早睡早起；不要聚众赌博，注意陌生人。还要播火警、匪警、障碍台的电话号码，有时还播性卫生知识，老年人起夜注意要点。

老戚：真是社会主义温暖的大家庭。

米大喜：一进这间屋，处在荣誉之间，就觉得自己又在焕发青春。虽然许多青年同志不理解，找上门提意见，说高音喇叭是噪音，骚扰居民。我反驳说，这也叫骚扰？那卡拉OK、黄色舞会、通宵达旦的滥酒划拳叫不叫骚扰？你多听听我的广播，多了解了解国家的经济、政治形势，心灵就净化了，档次就提高了，就有追求了。电视台来采访，也被我说服。开玩笑，我是长期做基层群众工作的人，党和国家的精神就是通过我们这类人深入到千家万户的。

老戚：人心不古。想起居委会当年的风光，真令我感慨。

米大喜：我知足了，现在没几家居委会在正常运转，一般都

是把办公地点腾出来开麻将馆。

老威：据说您这会址也是临时的？

米大喜：已经“临时”了十多年。房主陈银在你小时候就疯了，有一次，他把煤油炉子点燃，放在他爸的床下；还有一次，他把他爸卡得翻白眼。总之，他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的老子。陈老汉被折磨死后，陈银没人管，到处追女娃子。于是由居委会出面，将他送进精神病院。这样，我们临时代管他的房产。

老威：疯子回家了咋办？

米大喜：五花大绑又送回去，医院才是他真正的家。

老威：病好了也送回去？

米大喜：送回去，总比流落街头强，

老威：万一这一带拆迁了呢？

米大喜：就把疯子的户头换成居委会。作为集体的遗产，它永远属于全体居民。

老威：它永远属于以您为核心的全体居民。

赌徒周忠陵

老威：忠忠，千禧年之夜你是咋过的？

周忠陵：睡觉嘛。

老威：就没做点辞旧迎新的动作？例如放放鞭炮，望望夜景，大叫几声，或者看通宵电视？

采访缘起

周忠陵是我的患难朋友，我住疯人院的时候他仍然九死不悔地坚持探望，后来我发觉他也有病，这叫我太绝望了，原来在这个薄情寡义的时代，只有疯子之间的交情牢不可破。

治疗内心疾病的唯一方法就是互相出卖，把弱点啦隐私啦统

统当众抖出来，用伤口制成美味的笑料供人品尝。他妈的，我真想把这篇东西印成传单，撒遍中国的每一张麻将桌，断了狗日的后路。

但是，就在我蠢蠢欲动的时候，周妻东南站出来控诉：周忠陵曾在摄氏 43 度的塑料棚下，不喝水不撒尿，搓麻一天一夜，居然没被热昏头。

周忠陵：我就这么弱智？本来想去搓几圈麻将，但记起岳建一的告诫，就忍了。唉，睡吧睡吧，这世道除了赌，就睡觉舒服。98 和 99 年我都走背运，翻过这个坎儿，把

旧世界丢在枕头那边，然后蹬几下梦脚，一睁眼就是美丽的新世界。老岳说了，只要我戒赌，就马上转运，财运如洪水，一

直发下去，到70岁也止不住。

老威：你就那么迷信岳建一？

周忠陵：老岳得道高人，我岂能不信？

老威：嗜赌如命与随便玩几圈不是一回事。

周忠陵：

倒霉就是从随便玩几圈开始的，就像马疯子，原来牌都认不明白，自从去年被三缺一的妇女帮拉住凑数，入了门道后，就着迷了。除了吃、睡、印书和发书外，其它时间都耗在麻将上。还埋怨赌友说：

“这么好玩的东西，过去咋不告诉我？”

有一回，他把两个二筒都码反了，大伙忍着没提醒，他却在自言自语：“咋半天糊不了牌呢？”——你看，手艺臭成这样，还经常拼到底不下桌，没现钱就拿书抵，



赌徒周忠陵曾是80年代的先锋小说家，弃笔从赌之后，仍不忘文学道上的老朋友。图为周忠陵（后左）、老威与坐轮椅的作家史铁生在北京某湖畔合影。



非常遗憾，周赌徒拒不提供其打麻将时的“工作照”，也坚决反对在访谈文字中插入任何有损光辉形象的赌博场景。无奈，只好以这张 80 年代访贫问苦的旧照充数。（右一为莽汉诗人李亚伟；左一为诗人白云峰）

一晚上要输几件货，几百本书。马疯子的今天就是我的昨天，从 89 年算起，我的赌龄不算短了，你晓得，以前我除了做生意，是个特纯洁正派的读书人，还写了不少先锋小说。我差不多已成名了，作品讨论会也开过，书也出过，评论家把我归于格非、孙甘露、余华一类，说不定我的悟性还高过这些人。正当我把文学搞得意气风发的时候，麻将来了，这是上帝的安排，我一摸就上瘾。重庆北碚天生桥一带，就那么一条尘土飞扬的公路，如果没有西农和西师两所大学，这儿就是偏远乡村。在乡村中，我读呀写呀，打电话邀约文学朋友，接着就是盼望某人风尘仆仆从外地赶来，促膝谈心一夜几夜然后分手。可平时，我一惯无精打采，老觉得身上不对头。这就是成名？不是热闹就是寂寞，而热闹短暂寂寞漫长，搞得人越发无病

呻吟。自从沾了麻，我的精神面貌得到彻底改观，“十亿人民九亿赌”，我顿感朋友遍天下。我的体重只有 70 多斤，一天吃不了四两饭，可一上桌就目光炯炯，熬个三天三夜没问题。输赢倒是其次，我要的就是那种近乎虚脱的感觉，仿佛骨头渣子都化进稀里哗啦的牌里。最开始我也同马疯子一样，输多赢少；有时三家一使眼色，盯准我下套；还有的时候，牌友换了一拨又一拨，只有我一人坚守阵地。嘿，别看我二目射神光，眼窝深得像俄国诗人莱蒙托夫，可啥也看不见。只要有人与我赌，管他老幼男女、尊卑贵贱。有一次在老黄家赌到第三天早上，所有的人都感到昏昏欲睡，就我腰板笔直地钉在坐位上。老黄告饶说来不起了，我说你来不起了就去躺一会儿，换个新人继续打。老黄说：

“我老婆、岳父、岳母、舅子、小姑子、小姑子的同学都轮番上过四、五盘，只有我 15 岁的小崽儿没陪你。”我赶紧说：“既然这样，叫小崽儿也来凑个数，输赢好说。”老黄说：“他还在上学。”我说：“从小有赌兴，将来能成大器。”老黄尊敬我是作家，只好把小崽儿从被窝里掏出来，揪到桌边懵懵懂懂地坐起。又勉强打了一圈，兴趣索然，我才觉得一阵瞌睡像酒劲一样，从尾椎骨猛冲上脑门。我摇摇晃晃地出门，差点在路上睡着了。回家这一觉，嘿，睡了一天一夜。东南几次催我起来吃东西，我都毫无知觉。她吓坏了，还以为我啥事想不通吃安眠药，找来医生翻眼皮查看，被告之正常。

觉睡够了，吃了饭，就坐在窗前发愣。我突然想起我还是作家，这样浪费时间简直罪过。于是打起穷精神，拿出纸和笔，准备干正事。没料到，我才在纸上写了几行字，脑袋就重得不行。我连换了儿道浓茶，依然哈欠连天，最后只好弃笔打盹。我的许多小说都这样只开了个头，就一直丢在那儿。

生活如此周而复始了好几年，你在文章里说我熬骨油，算抬

举我了。对于我，文学上成名远没有麻将那么有诱惑力，不信我教你摸几把，那光溜溜、凉滋滋的小方块真的像女人皮肤一样，很有快感。打麻将讲手气，你晓得啥叫“手气”？这是超越技巧的东西，甚至超越游戏规则，你事先根本不知道手气如何，一会儿，你赢或者输，才恍然间明白啥叫“上帝之手”。若干年前，我就读到过“上帝教我掷骰子”的书名。

老戚：你一年输赢多少？

周忠陵：五万多吧，特别背的时候，输过十来万。后来东南无奈，也鼓励我到北京鲁院读书兼做书生意，跳离赌博环境，她嫌我的赌友文化层次低，以为我是被拉下水的。她说，北京有文化氛围，大家都有事业做，就没人陪我消耗时间。她没料到这麻将将是 20 世纪中国最大的时尚，它的普及程度相当于清末民初的鸦片烟，官场、文化界、生意场、百姓家、甚至三陪小姐和收荒匠都玩。教授和打工仔没共同语言吧？可方城一开，就四海一家了。特别是成都，街头巷尾，除了密密麻麻的串串香小火锅，就是遮天蔽日的赌桌，警察抓了一阵又一阵，也丧失信心了，因为这不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问题，而是野火根本烧不起来。唯一的办法，不是堵，而是导，干脆把麻将也列为体育项目，与象棋、围棋并列算了。嘿，你说中国处于转型期，群众生活压力大？你说竞争激烈，工作不好找？可麻将一望无涯，仿佛成都人都没正经职业。听说有家国营企业，几个月不发工资了，住底楼的下岗职工们为了自谋生路，就破墙开麻将馆，结果家家都热火朝天。后来连领导也加入了，大小都是赌嘛。

老戚：你老婆放你出来戒赌，你倒赌得更欢了。

周忠陵：刚到北京住鲁院，还没怎么赌。渐渐，会朋友的劲头过去了，就忍不住摸两把。我这么大把年纪，上屎的学，哪怕在教室门口站一站，也觉得有点像范进中举。我听不得电话

响，一听就掉魂。还是搓麻将踏实，骰子是老师，掷下去认点子，课就开始上了。如此昏天黑地，瘾倒过足了，可痔疮却发了。这痔疮又叫坐板疮，跟长期练坐功，憋屎憋尿有直接关系。俗话说“十男九痔”。但一般人发痔疮不过屁眼儿火烧火辣，出点血而已。我的痔疮不是出点血，而是像女人月经，来很多天，有时血来得猛，大肠头子就坠出一节，在裤裆里荡来荡去，像猪尾巴。嘿，真他妈像《百年孤独》里写的，布恩迪亚上校的家族发生返祖现象了。我一年要卧床好几次，肛门内塞了颗炸弹，我觉得早晚要被痔疮炸死，轰！直肠的导火索一拉，我坐自己的土飞机上天，下一阵肉渣渣雨。

老威：听说你认识一位专治屁眼儿的神医？

周忠陵：也是打牌认识的。你晓得，我这人轻信，况且这痔疮发作如十万火急，也由不得我。那神医原是写诗的，突然有一天开悟，改钻中医，半年就成名了。许多离休将军找他医过屁眼儿。据说他家的客厅还有香港船王包玉刚送的匾，上提“华陀再世”。神医平生最大的憾事，就是没能给胡耀邦治病，“便秘引发心脏病，”他经常叹息说，“我可是治便秘的专家！”他的确专家，一帖药下肚，我就一泻千里；再二贴三贴若干贴，我再也消停。平均半个钟头拉一次，有时刚把裤子提起来，稀屎又出来了。我折腾了一个多月，不敢上街，不敢坐车，不敢见朋友，特别是女性朋友，不怕你笑，有次我打了个喷嚏，下面也噗地一口射出。我本来就只有70多斤，这样一拉，人几乎虚脱，连走路也得扶墙，挪两步，歇口气，头上直冒虚汗。

老威：这哪是治病，纯粹是下毒！

周忠陵：就是毒，大剂量的芒硝，又医痔疮又医赌瘾。我的肠子和思维都泻成直的，吸收了什么，就直接排掉。所有的朋友都劝我中断这种要命疗法，但神医在我心中的地位，不可动摇。

40岁生日，我还特邀他一起过，结果他发酒疯，在大街练拳脚，把护送他回家的人打了。

老戚：这么不给你面子？

周忠陵：经过一番脱胎换骨，我认清了他的真面目，与胡万林是一路货，治一百种病统统使一味药：芒硝。我记得制造炸药也用芒硝，我差点就成了这种疯狂实验的牺牲品。后来我停服芒硝，痔疮又翻了。

老戚：这叫“屁眼儿的报复”，你还是改邪归正吧。

周忠陵：我从小身体就弱，不是这出毛病，就是那儿不舒服，所以对病痛的忍耐力特强。真叫我毛骨耸然的是岳建一，98年的一个夏夜，我正在都江堰打麻将，他从北京来长途，声音出奇地阴冷，他在电话里说：“周忠陵，你还在赌么？再这样下去，你有血光之灾啊！”我的心尖抖了一下，仍强笑说：“不算赌，就摸几把耍麻将。”老岳说：“你要绕开麻将，连看也不要去看！”放下电话，我的手都湿了，可还是依着惯性赌下去，一个通宵，手气还不错，赢了几千。睡到第二天下午，到河边去喝茶，途中碰见一个算命老头，竟当头一句：“先生大贵之相，千万不能沾赌！否则有血光之灾！”这一来，我有点灵魂出窍了。莫非冥冥之中，真有人在安排我的命运？

老戚：老岳也给我打过电话，让我一定尽最大的努力劝你，他在家中烦躁不安，觉得你似乎躲不过这一劫。

周忠陵：我在许多朋友的面前诅咒发誓，今生再不沾赌，可有人一约，我就不由自主地去，像丢了魂，脑子一片空白。我经常一边摸牌一边想：“打完这圈就下桌！”心理压力太大了，我就在乌烟瘴气中自我解嘲：“岳建一说我再赌下去有血光之灾！”其他三位随口应付：“这么厉害？开玩笑吧？”我打出个幺鸡说：“老岳的话，百分之九十要应验。”我的下家说：“真

的？让他给我也算算？”我说：“算个屁，老子就是让你给祸害的。”对家说：“是条害人虫。”我说：“明天开始金盆洗手。”上家说：“那今晚赌个莽的，再翻一番如何？”我正犹豫，下家说：“周哥的赌场绝笔，不搞个杠上花不收兵。”

老戚：这样折腾，不出事才怪。你一把骨头在那儿熬，全神贯注，又是烟又是茶，长年累月，连健康人也受不了。最近的报纸连登两起麻坛惨案，都是老年人鏖战太久，引发了心肌梗塞。

周忠陵：我到处宣传岳建一的预言，还算是很多次命，可一天不赌，我又憋得慌。我喜欢热闹，总想找什么东西去塞满这脑子，免得它空荡荡的。都江堰风景如画，气候宜人，倒是适合隐居。40来岁的人隐啥居？后来，我爸死了，你晓得，是场车祸。

我爸才60多岁，身体很健康。那天傍晚，他和妈从西农校园散步回来，过了马路，老俩口已站到路边了，一辆中巴车挤过来，把爸爸撞出几米远。这是一个月里，这块地面出的第四起车祸，都是中巴车为了抢客，恶性竞争造成的。我父亲，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好人就这样去了，我从北京赶回来料理丧事，心力交瘁。此前我曾经历过死亡，我的第一个未婚妻在举行婚礼前夕，突然病倒，一检查就是晚期脑瘤，我目睹了一个美丽生命消逝的全过程。我晓得，死者对其亲属的影响远不是眼前的悲痛，而是一种无尽头的空漠，血缘崩地断了，你只能飘着活，肉体和房屋不是家园，而死者带走了你真正的家园。现在我媽信了基督教，向上帝祈祷时也在同我爸对话。我没有父母那辈人的自制力，嗜赌如命肯定跟死亡有关，我逃避，在借一种游戏淡化记忆。

老戚：你爸爸的死也算血光之灾吧？你不认为这是一种预兆？

周忠陵：守灵之夜，朋友来得太多，应酬也离不开麻将。这

是中国民间的风俗，我只能上桌。以后，我几乎放任自流，谁也拦不住了。

老威：你是否觉得“血光之灾”已应验过了？

周忠陵：我没仔细想，只凭一种惯性在生活。哦，在回北京的火车上，有个胖和尚还给我算命，说的也跟岳建一差不多。真是蹊跷。

老威：后来呢？

周忠陵：又过去大半年，我见没动静，就彻底放松，觉得老岳不过是出于老朋友的深厚友情，装神弄鬼吓唬我戒赌而已。一直到99年开春的一个晚上，我楼上的书商打麻将三缺一，硬要拉我凑份。当时我感觉身体有点不舒服，但盛情难却，不好推辞。屋里四人都是大烟枪，一支接一支，一会儿就浓雾弥漫。我打了几圈，感到透不过气，就趁洗牌出门站了一下，回来接着打。精神老集中不了，平时的赌场神威不晓得跑哪儿去了。对家说：“忠忠，你的脸色咋这么难看？还没输赢嘛。”胸闷得受不了，我就站起来，灌两口水，呛住了。一咳嗽，面前冒开金花，看不见谁了。我一软就下了麻将桌。

赌友们手忙脚乱把我搀下楼，在床上躺了半个钟头，快窒息了，赶紧朝医院送。抢救几个小时才还阳，我胸肋上开了两三个刀口，浑身插管子。原来是肺泡打破了，如果晚抢救一个小时，必见阎王。

老威：太悬了。

周忠陵：还有悬的。我在病床上垂死挣扎了一星期，转危为安，于是我又浮想连翩。没办法，我天生的盲目乐观主义，活着多美好，有牛皮可吹，有钱可赚，郑州马上开书会，我的《证券法》正行情看涨。

老威：刚从鬼门关归来就想去热闹？

周忠陵：鬼门关太冷清了，我要去人多的地方冲冲晦气。

老威：你弟弟代你开会不行？

周忠陵：这是我们家唯一的交际明星，关键时刻，非我出马才摆得平，从小到大都这样。于是我预订了飞机票，去的那天还同医生发生争执，他不同意我出院，我骗他说回家静养。结果一出门，就直奔机场，临上飞机，才发觉《身份证》忘带了。

老威：你奔丧啊！

周忠陵：差不多。嘿，幸好忘带《身份证》，否则这条命就献给祖国的航空事业了。你想想，伤还没全好，能坐飞机么？肺不炸了。我拖着浑身伤痛，连夜赶火车到郑州，没料到，第二天又租了辆桑塔纳朝回赶，全靠敖歌一路照顾，否则这条命又献给祖国的铁路事业了。

老威：咋回事？

周忠陵：我拢郑州的当天，肺就不行了，剧痛，找到医院，技术不过硬，不敢开刀复查。我弟弟搁下业务，陪我到火车站，突然想起刚才医生“再也颠簸不得”的警告，立即找出租车。花了一千多元，在傍晚又驶进同一个医院。这是老天的惩罚！可笑的是，我在病床上连做三个梦，都在搓麻将，并且盘盘赢，清一色，杠上花，我占全了。我还盖着麻将铺盖睡，嘿，这玩意儿与围棋有点相像，不过一个是方的，一个是圆的。妈的，人类发明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比原子弹、氢弹的破坏力大得多。岳建一神机莫测，我服了。

老威：不赌啦？

周忠陵：瘾小多了，可赌可不赌。以后就别当正事做，打点娱乐麻将算了。

老威：你差点从麻将桌底直接溜下鬼门关，还不戒？

周忠陵：死而后生，死而后生。

老戚：你太没出息。

周忠陵：男人的出息就在于赌，我算开悟了。你以为你不赌？

老戚：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

周忠陵：你在写作，埋头苦干许多年，不发表也写，这是在下注呀。你的赌瘾比谁都大，你把一辈子都赌进去了，赢就赢个鸡犬升天，输就输个血本无归。政治家也在赌，注下得更大，甚至不是钱，不是生命，而是千秋万代，几辈人都看不见的乌托邦。文革就是个乌托邦，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也是乌托邦，结果输了，几代人的青春和理想都搭了进去。你看，这颗小小的骰子，我们这种凡人掷下去，不过在桌面打滚，而抽象的骰子掷向历史的桌面，开局的每张牌都是血腥的。而乞丐、打工仔、下岗工人也在赌，或者怀着赌的欲望。麻将、纸牌、扑克、围棋只是寻常的赌具，而活的赌具是人，到处游荡，为生存熬尽骨油的人，自己赌的同时也成为别人的赌具。

老戚：你还弄出哲理了？

周忠陵：十年前，我被抓进去一次，在牢里撞见重庆大名鼎鼎的赌王张，近 70 岁，就赌了 60 多年，国共两党的赌牢都坐过，永远戒不了。承办人只草草审了一次，就让他卷铺盖滚蛋。

老戚：老家伙赖帐？

周忠陵：他一竿子坦白到底，然后告诉承办人：赌博嘛，最多劳教三年，我这点数目，最多一年半。我年纪大，干不动活，只能到劳教农场看门；看门相当于养老，我犯了错误，没脸让政府养着。承办人让他写戒赌保证书，他说，我写了就是欺骗政府，几十年的坏毛病，恐怕戒不了。承办人说不写就劳教。他说劳教也戒不了。承办人说关在里面赌什么？他说见什么赌什么，没钱就赌饭赌肉赌不干活，我怕里头的娃娃跟我学，赌上了瘾，

输了就偷、就抢，我的罪就大了。承办人气得拍桌子，赌王张却大声喝彩：“一个巴掌，拍了两下，五根指头，八个点！你干脆轰我两炮，凑个满贯，我好办保外就医。”

老臧：这无疑是你的榜样吧？

周忠陵：这是我听到的最精彩的赌徒故事。我？永远上不了这境界。

老臧：境界？亡命徒嘛。你比赌王张更亡命，不过身体差远了，这正好挽救了你。回头是岸吧，忠忠，世上好玩的事情多，何必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采访缘起

高马属狗，生于1958年，在北京一家著名报纸当了多年编辑。他嗜酒如命，曾喝遍天下无敌手，真不晓得他的编辑是怎么当的。

更令人想不通的是，高马还是诗人，出色的翻译家，虽然满脸浮肿，烂得象一堆酒精，左看右看都不象有文化的人。

他已离过三次婚了，第四位夫人在我采访他时，就坐在旁边，她一再开玩笑说要对我的采访记录进行审查，像我和高马的领导同志。

高马早不耐烦了，他一再伸懒腰，舒展着一身肥肉，为中午的酒宴做准备。时为1994年10月3日，在和平里附近的一个公园。

酒鬼高马



酒鬼高马的宴会，狂喝滥饮才刚刚开始。据说醉得越深，杯子举得越频繁，而酒鬼劝酒的理由是五花八门的。（陈大华 摄）

老威：你已经毁了三次约了，今天好不容易逮住你。你到底愿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

高马：我们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过，你采访我什么呢？我已经好些年不写字了。

老威：你撒谎，前几天我还一本杂志里见过你翻译的希腊诗歌，赛菲里斯的《桑托林》：“假如可以/你就回到幽暗的大

海吧/忘记笛声，忘记赤裸的双脚/在你
和他人的睡梦中踩踏/沉沦的，生命的声音；//假如可以/你就在你最后的贝壳上
写下/日期、姓名和地点吧/然后再抛回
大海之中……”



高马的另一个酒友，文学评论家唐晓渡在成都的烂馆子里喝酒。老唐是大胖子，巅峰状态是两斤白酒的量。他旁边的漂亮女士是成都经济电视台的编导王海文，两人萍水相逢，老唐就开始恍恍惚惚，滔滔不绝了。那天晚上，老唐是被五个人扛回来的，这太稀罕了。我的朋友李凯在文章里说：“唐晓渡很儒雅。”的确。

(陈大华 摄)

高马：你的记忆力还是这么好？很危险，老兄，很危险。这是个不需要记忆的时代，一个人出车祸死了，脑浆涂满的轮胎依旧要在道路上滚动。文化大革命，红色大海洋，集体的狂欢突然之间沦为集体的痛苦。痛苦吗？痛苦是为欢乐所付的门票，记忆是为遗忘所付的门票。列宁同志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

背叛了，又他妈的怎样？当然不能怎样，谁能把醉鬼怎样？我说到哪儿去了？你看我这脑子，注意力无法集中。我上午不喝酒，脑筋就不转，或者转也白转，你看见

我皱着眉头，以为我在挺深沉地思考问题，其实我在睁着眼睛睡觉。

老威：你刚才还在编发新闻呢。

高马：工作是一种本能，闭眼也能干，我编了十八年，报纸已化作身体的一部分。这边领导视察、讲话，那边特大车祸，家属要讨个公道，其实这种公道死者不需要，左边鲜花和儿童，过节呢，下边，脱毛霜广告。

11 点半下班，中午喝啤酒，边喝边做私活，效率很高，脑筋象生锈的机器开转了，开始头有点疼，咔咔响，后来喝通了，第一泡尿出来，整个身心都舒畅了，接着越来越舒畅，半个钟头一泡尿，肠子好像是直的。有人说，醉鬼没心没肺，对，我越喝越没心没肺，腰以上全没有。一张漏斗嘴巴直通尿道。你说我译过诗？现在我想起我译过诗，好象和排泻有关。我忍着一泡尿，偏不拉，这时就会本能地亲近大海，向大海撒尿太舒畅……



往死灌。



这对醉鬼酒后的
关系赛过情人，中国
真是遍地高马呵。

我接着喝，直到受不了直冲厕所，这下诗的感觉没有了。我一下午要喝十几瓶，你算算一个月酒钱多少？

老戚：相当于你的工资吧。

高马：你太小看我了。晚饭我还接着喝呢。白的，二锅头，一瓶半到两瓶，有一口没一口，直到半夜。有朋友陪着喝当然好。80年代，家里有许多过路客，吹拉弹唱挺高兴，开会的时候，大伙一块醉，摔跤一般抱在一块，躺在街心说悄悄话，什么永不分开。谁拉我回家我就同他急，一个狗钻裆，撞到树上，又弹回来。星星长毛了，这是诗人马松的句子，“我的毛醉了！”腋毛还是阴毛？还是月亮抖下来的寒毛？他妈为什么不在80年代被汽车碾死？我在80年代醉的最后一场酒是在和平里，与一个当兵的，大冷天，喝着喝着就开始扒衣服。你知道醉鬼与醉鬼之间就这样。我埋怨他坐得太远，其实他就在我的旁边；后来我又问他的鼻子在哪儿？他摸着我的鼻子说在这儿，我说不是，这个鼻子不是那个鼻子。他火了，扇了我一耳光，我倒在地上，看见那玻璃窗一晃一晃地扇耳光，就撑起来要去打它。当兵的说，有种

的脱衣裳练，我就脱衣裳，当兵的说，有种的脱裤子练，我就脱裤子，后来我们都哭了。再后来，我的酒友纷纷戒酒，成家立业，变体面人啦。一晃八年过去，我还在喝，常常一个人喝，鬼都不上门。

老威：你也结过婚。

高马：结过三次。第一次醉了，抱错了人，恰好被我原配夫人撞见，完蛋了。第二次又抱错了人，我的次配夫人说，你哪是酒鬼，纯粹是个花鬼，你连亲了谁的嘴也不明白？我说那是酒杯呢，她说去和酒杯睡觉吧，又完蛋了。第三次，是我老婆抱错了人，她以为我醉了不知道，就跟一个男的出去了，我趴在窗台上，看见他们手挽手在雪中散步，真够浪漫。我追出去，头碰了电线杆。我不省人事，差点没冻死。我醒过来，却躺在床上。我冲守在一边的老婆咆哮：“肯定是你的野男人把我弄进屋的！”我老婆答：“哪有男人？是我把你拖进来的。”我气疯了：“你撒谎！我明明看见！”我老婆答：“什么明明看见？你一个酒鬼能看见啥？”我挥起拳头：“看见风流鬼！你骨瘦如材，岂能弄得动我这大块头？”我老婆答：“早知如此，我就不管你。”我的拳头挥到她身上：“这是我的遗产，分给你这骚婆娘！”这么一来，祸闯大了。

老威：你这种东西，结什么婚。

高马：我早有这种自知之明就好了。年轻时真好色，醉了也能干，后来就淘空了，瞪着眼看，干不了，酒令人阳萎，现在想起来，老婆即使有外遇，也没错。醉鬼有什么自尊？她偏偏同我这种人计较，转身进书房了。我继续狂喝，他妈的，但越喝越感到冷，酒里有股血腥味！酒变红了，整个屋子酒杯一般晃着响。我站起来走了两步，听见鸡叫又走了两步。我感到奇怪，五年没听见鸡叫啦，饲养场的肉鸡，三个月就肥了，不会叫。会叫的鸡

让时光倒流。我推开了书房门，嗅到一股比酒更浓烈的酒精味，我恍惚记起我老婆是外科大夫。又灌了一大口，我明白，就几步之遥，但我永远走不到我老婆那儿去，钢丝床太远了，我进一步，床退一步。我老婆在床头，不，在船头，穿着白大褂，要离去了，她将融入白色，融入一座大医院。我感觉到，血在白床单下面无声地淌。

老威：我听说过，你老婆在大腿上划了一刀，血滴嗒滴嗒流了两小时。

高马：滴嗒滴嗒，像钟表一样。我醉得太厉害，居然救不了她。结啥婚，作孽呀。她的葬礼弄了三天，人潮水般涌来，亲属、朋友，还有她治好的病人。她是个好医生，以前我一点不知道，这么多人需要她。我没喝酒时，少不了挨骂。但是我病了心慌、肚子疼得要命。不行，我这辈子交给酒呢。

老威：老婆都死了还喝？

高马：老婆不是我喝死的，是自杀的。当然，你说我借酒杀人也可以。唉，这现实太丑恶了。幸好时间不会停滞在某一悲惨时期。我再也不结婚了，孤独吧、麻痹吧，如此而已。

老威：什么“如此而已”？凭《国际歌》，无产者能找到自己的同志，你凭酒味还不能找到自己的酒友？

高马：还没喝你就说酒话了，我的酒同志都是阶级性或季节性的，哪能天天陪着喝？现在快 12 点了吧？我们边喝边聊，你看我这肚子，像一口缸，你相不相信，你这种不好这壶的人，我一个屁就把你醉倒了。开个酒厂吧，老威，我给你看大门，做广告，将来呜呼了，请你把我的遗体剁了装缸，埋地窖发酵十年，自然是天下最美的酒。

老威：转眼之间，你三瓶就下肚了？

高马：我一般要喝五瓶，才会撒第一泡尿，你摸我这肚子，

很实在，里面像绷着弹簧，现在我有点醉意，等出了尿，我反而不醉，越喝越不醉。

老威：我可是越喝越难受，幸好不是白酒，要不早吐了。

高马：喝酒有两关，第一是肠胃，第二是心理，这是相互作用的。本身酒量好，就占了先天优势，如果人逢喜事，哈哈笑几回，酒量还会上涨许多。你喝了两瓶半就想吐？这可太不够意思了。一定是见了我心情压抑，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老威：我几乎不喝酒，我们好几年不见面，所以“舍命陪君子”嘛。

高马：我不是君子，我是高阳酒徒。

老威：怎么又扯上西汉的郦食其了？我又没让你做刘邦的食客。

高马：跟你这种现实主义者，耍不出理想主义的酒疯，饮酒要互相凑趣才够劲，你一杯，我一杯，猜拳行令说醒酒笑话。汉高祖刘邦是个酒徒，所以才会让郦食其在门外走来走去地骂街，没砍他的脑袋，反而奉为上宾，这种事在历史上太多了。老威你呀，这几年尽学些没用的东西，“人文精神”啦，“反殖民化”啦，“本土”啦，“中年”啦。跟酒没多大关系，中国历史是被酒泡出来的，因此也跟历史没多大关系，既然跟历史没关系，跟现实就更没关系啦，因为从我们身边淌走的每一秒钟，都是历史，远一点，近一点，不是我们说了算，是天上的大醉鬼说了算。我们是他老人家的亡国奴。

老威：那什么跟现实有关系呢？

高马：酒。

老威：不行，那是你的生存方式，放到我这儿就不灵了。实话说，89年我在海南岛，醉了一次，人事不醒地横在大街，连大货车在我面前急刹也不知道。差点就血溅海口了。后来有朋友

告诉我，行人见着这堆死肉，纷纷掩鼻绕行。从这以后，我发誓再不沾酒了。

高马：你当时灌了多少？

老威：就七、八两白酒吧！

高马：这么点就成死肉了？一定有事，你这人不会凭白无故灌这么多。

老威：我姐姐刚遭车祸去世不久，我就下海南，岛上人很多很乱，找不到工作，我反而惹了一大堆麻烦。那时，岛上挤满外乡人，都莫名地兴奋、狂躁。

高马：我猜中了吧？一般中国人都这样，遇高兴的事喝，遇不高兴的事更要喝。好像酒不是致幻饮料；而是一种发泄对象，像男人对女人，需要时就想起来，射了就完事。自己把自己当畜牲。你别打插，我胡乱说呢。女人与酒谁更可爱？我说，都可爱。你要懂得爱，爱酒或女人更胜于自己。当然，女人不这么看，她们恨酒，与酒较劲，争夺男人，她们认为男人呕吐、胡闹，死猪一样睡在垃圾里不好看，女人重视外表，酒鬼很丢面子。丢了面子可以再捡回来嘛，她们不这样看，因此她们看不透酒鬼温柔的内心，一团烂泥，还要让他说“我爱你”么？

你们四川的老杨，评论家，知道吧，他也贪杯。并且越喝话越多，他想离婚，想了 20 多年，女儿都 20 多岁了，但就是离不了。离不了贪杯也是一种活法，精神就升华了嘛。升华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就成柏拉图。柏拉图是我知道的世界上最早的阳萎者。刀不磨要生锈，老杨肯定出问题啦，他的日常生活是，一苦闷就喝酒，喝了酒就骂人，骂累了就睡觉，其它时间才是读《圣经》和写充满尊严的道德文章。他的酒龄与我差不多，区别只是酒使他发泄，发泄了灵魂上的有毒物质，身体才会健康、有活力。自杀丧命的女诗人普拉斯说：“我吞吃男人像吞吃空

气。”那对于老杨，吞吃酒精像吞吃女人，每一口都咬牙切齿。我没有这么多不平衡，至始至终，喝酒就是喝酒，这样，人也纯粹得同高粱酒一样透明。这么透明的柔情的液体竟会放翻一个个彪形大汉，使之露出爬虫本色，这不是老子《道德经》的含意么？

老威：《道德经》里赞美婴儿，将其同水的特性相提并论，这只是一个自然属性而已，婴儿没有母亲不行，母亲就代表一种社会属性。

高马：你说错了，母爱也是一种自然属性，婴儿哇哇大哭，母亲把乳房塞给他。婴儿能够吸引所有人去爱，因为任何监护他的人，都有权为他的将来设计蓝图。我一旦醉了，也同婴儿一样，任何比我清醒的人，都有权把我抬走，以免阻塞交通。不过，我比婴儿气力大，我心里完全明白，但我管不住自己的行为。有一回在酒吧，喝到半夜，我付给三陪小姐五百元，准备回家，可那小姐看我摇摇晃晃两眼发直，硬说我只付了三百元，气得我劈头就是一巴掌，她才不吭声了。骗得了谁。还有一回，我光着屁股在街上跑，遇上一个小馆子，就坐进去，嚷着要继续喝，把所有的女顾客全吓逃了。服务员也躲着不敢出来上菜。老板只好亲自出马，劝我穿裤子，我摸了摸身上，真光着。就叫他爸爸。老板说：“疯子，我一不报警，二不打人，因为我是你的街坊王老三。我下岗快两年了，好不容易攒钱开了个饭馆，今天才开张。既然你这么照顾我，我也不做生意了，就陪你一醉方休好不好？”我回答好，我付酒钱。谁知没喝到两盅，我爸拎着裤子撵进来，老人家70多岁，气得浑身哆嗦，我只好乖乖地穿上裤子，我爸还揪我的耳朵，嘿，40多岁了，还被揪耳朵，太过瘾了。

老威：你没觉得丢人？

高马：你太看重社会形象了，又不是政治家。“醉了一次就不再喝了”——这语气挺像个大人物。时代不同了，风气变了，每个人都在强调独立性，连幼儿园小朋友都以我为中心，所谓多元化社会也不是独生子女的社会。按照现在流行的行话，每个人都应该寻求适合自己的定位，即社会角色。我的定位是酒鬼。

老戚：你是报纸编辑，还是翻译家。

高马：这些都是一个酒鬼的保障。自由的保障，随便脱裤子，回到童年的保障。我的先天酒量是爸爸培养的，一岁的时候，他就喜欢把我放在膝盖上，自己喝一口，再用筷子头蘸一点让我沾，这样，我逐渐成为与众不同的孩子。

老戚：你这样“与众不同”，还能在报社呆下去吗？

高马：现在又不是毛泽东时代，一看家庭出身，二看政治表现。我的业务能力过得去，没有因醉误事。另外，我从不在金钱上与人计较，什么工资、奖金、提成、稿费，任何人都可以比我拿得多，我这个优点比所有优点都强。还有，单位领导请客，有我护驾，免受多少罪。实话告诉你，我人缘好着呢，光屁股在街上跑也成了善意的玩笑。我唯一碰不得的伤疤就是婚姻——酒与女人真的势同水火。我夹在中间，充当调解人。现在，我偶尔也打打野食，但家伙不行了，酒一过量，就有点挺而不坚。

老戚：你号称喝遍天下无敌手，你最喜欢的酒是什么牌子？

高马：对于酒鬼，什么酒都能喝，一般过得去就行了，很少在意牌子。家里有常年泡的老酒，好几坛，活蛇、猪板油、拐枣都能泡酒。名酒如五粮液、茅台、竹叶青、汾酒、泸州老窖当然滋润，但价钱昂贵，一年品不了几次。其实这些酒，包括一些几百元一瓶的洋酒，适合酒仙、酒圣一类的人物在场面上喝，我是酒鬼，有喝的就满意。如果你一定要我选酒牌子，就好比让嫖客选妓女，让家庭妇女逛超市，琳琅满目。不过，自然发酵的酒感

觉总要醇些，而勾兑的酒要来得猛些。当然，并不是每个人的感觉都这样。几年前，四川一帮下海经商的诗人闹着要造一条载满酒的轮船，从重庆沿江直下，直抵出海口。他们取名叫“梦之船”，并选浪漫老诗人孙静轩做船长。孙静轩同四川各大酒厂关系特别好，据说他能拉到钱，赞助长达一个月的大吃大喝大吹大擂。当然在酒足饭饱之余，上了“梦之船”的众酒仙还要重评中国十大名酒，发动新一轮的广告攻势，把老字号的十大名酒给打下去。

老威：这种文人阴谋永远得不了逞。

高马：“梦之船”就是做梦而已，不过这是最对我胃口的梦。

老威：顺便问一句，你喝酒还吃饭么？

高马：我早忘记米的形状了。

采访缘起

40岁的万人敌是我80年代的故交，做了多年诗歌美梦，终于壮志未酬。转而适应经济形势，改行做书商。不料一炮而红，再二炮、三炮，成了百万富翁。

可万人敌天生的贱骨头，狂吃狂喝、偷鸡摸狗如昨。所有光荣退伍的文学青年都这样，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结大概要支配他们一辈子。

这是1999年国庆节夜晚，对于万人敌他们，天天都是华灯初上的节日。

书商万人敌

万人敌：早晓得你到了北京，就朝周忠陵家打电话，没人。从唐朝一直打到民国么年，都没人。我怀疑你是躲起来了，不想与生意人打交道。

老威：说话咋这么酸？你是打过电话，可都是在酒桌上打的，一大堆人，灌得醉醺醺的，这时，某个客户突然问：“老威的情况怎么样？下海了？出国了？还是疯了？这么多年也不见他的动静。”于是你说：“你等着，我把他叫来。”口气像我的领导。北京这么大，我从西边赶到东边，打的也得一两个钟头。我来你们早走了。

万人敌：约好了，我们就会等你。

老威：趴在桌子底下等我吧，我不过就是个拉关系的话题。

万人敌：老威你还是这么明察秋毫？糊涂一点，人与人嘛，能互相成为话题都不错了。80年代写诗的哥们，有几个能经常挂在咱嘴巴上？虽然，话不一定是好话，江湖传言嘛，晕的素的都有。94年那阵，传你疯了，在福利院追着护理人员唱情歌，结果被打了一顿；还传你随地大小便，一把一把抓屎

吃；最恶心的是传你虐待其它病人，让他们跪着舔你的鸡巴，简直比法西斯还没人性。哥们听得心酸极了，愤怒极了，还在酒桌上约好，等春暖花开时，一帮旧人浩浩荡荡去探你，租架飞机去，在福利院房顶上迫降！我们要把票子装进迫击炮，去轰县长，去轰院长和委员长……虽然这个

伟大计划撒泡尿就成了泡影，但能够让我们动这个念的就你老威一人。

老威：我疯了大伙都高兴？

万人敌：从心理上扯平了。万人敌下海，海子自杀，老威发疯，只有某某、某某某在坚持写作。

老威：我脑子

非常好用，谢谢关照。

万人敌：你是气我，还是瞧不起我？

老威：瞧不起你？这不是跟我自己过不去么？你有钱，有房子，有车，但这些都是靠本事挣的，既没偷也没抢更没骗。我觉得这倒干净，至少比 90 年代的绝大多数文人干净。老哥们，我不希望你穷，



书生意做得不顺时，书商就想起庙里烧香，求菩萨保佑熬过这淡季。

（放歌提供）

80年代你流浪，腰无分文，凭着一手好诗就能到处投宿，远方飞翔着大鱼大肉，你啃完一个鸡翅膀又继续上路了。而现在，你年老皮肉松，没本钱流浪了。你天性堕落，稍不留意就露出了无赖的嘴脸，绝对在“民间立场”和“知识分子写作”里混不出头，再没钱，你就彻底完蛋。

万人敌：好马不吃回头草，我现是在著名书商。前途一派光明。二渠道是战场，这十来年，败下阵多少人？但我们几个哥们都稳住了。但不可能永远稳住，说不定哪天一个选题做砸了，就伤元气。人有走背字的时候，做什么砸什么，最后连书会也不敢去，怕批发商揪住你要钱。97年，老宋做十七、八本书，没一本卖得动，就狂嫖了一回，准备从20层的大楼上跳下去。我和朱胖子好歹把他拉住。我说：“你腰包里还有多少钱？”他说：“还有两万。”我说：“那就打麻将，输光了再跳楼。”他说：“不行，这是我岳母的养老金，我已输掉一半，剩下的再不还，禽兽都不如。”我说：“你以为你比禽兽高级？百万家产赔光，还倒欠下50万。”他说：“下辈子还。”我说：“把无赖做到底咋样？”他摇头。我说：“真他妈虚伪。”老宋跳脚说：“你妈尼，赌就赌。”

结果赌了一夜，他居然赢了一千块。我说：“好兆头，你走出背字了。”朱大胖子也说：“背水一战。”老宋的一股尿劲终于胀起来，这次他想都不想，稀里糊涂地做了本《大预言》。这书十年来出过好几版了，从来没红火过。老宋自己执剪刀，唏里喳拉地疯剪一晚上，然后颠来倒去地粘贴，复印，做样书，把我俩吓出一身冷汗，以为这屁儿虫必死无疑。朱胖子说：“你还不如直接把他推下楼痛快。”我说：“他岳母的养老金我还。”

老宋一屁股烂账，他交了书号费，就把房产折子抱到印刷

厂，压在厂长手里印书。3万册！我的妈！中邪了。我们以为他将在书会上当众自杀，可没料到，这本破书真火了，呼拉呼拉地卖，呼拉呼地加印，票子如排山倒海涌过来。老宋了清所有的账，还赚了40多万。狗日的，肯定向书里发了功，把读者弄晕彩了。这一夜翻本的东西见着我和朱胖子，就又抱又啃，连叫“恩人”。然后约了十几个狐朋狗友，到磨子桥吃宵夜。我们从晚上十点开始大吃大喝，从街头到街尾，每个馆子都进了一遍。海鲜、川菜、火锅、冷淡杯、麻辣烫、广东点心，翻来覆去就这些东西。老宋说：“今晚只准灌啤酒，看哪个的肚皮最装得。”

老威：磨子桥一带少说也几十家馆子吧，你们都去了？

万人敌：都去了。有的只叫了菜，动筷子拨几下，拔腿就走。

老威：这抽的那门筋？乡镇企业家进城了。

万人敌：就抽筋，尿啃了？美好时光啊，我们80年代盼的不就是这个么？《水浒传》里最有名的格言，就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今天，几千年来劳动人民为之奋斗的目标，终于实现了。年轻时候写诗，贯穿的就是酒色二字，至于卤鸭子、红烧鱼、回锅肉、猪耳朵，不过是下酒的菜；而白酒、红酒、国酒、洋酒、跟斗酒，不过是下色的菜，酒壮色胆，舌头壮鸡巴胆。现在都有了。我们在乱吃乱日乱写诗，这一身肥肉就是快活的诗！

老威：有完没完？

万人敌：与小姐有完，与哥们没完。那晚我们啥子佐料都不要，就一帮哥们干胀，刷掉商人外衣，回到彻头彻脑的农民大肚汉。怀旧啊。老威，记得不？89年春节，我和老乐、老麦，每个人抱十瓶沱牌到你家，那阵沱牌才卖一块五一瓶，而现在，我一千五一瓶的酒都喝过。没有十多年前的沱牌好喝，肯定没有。

要不就是舌头不行了，人兑了太多的水。老宋说，反正这钱都是白捡的，胀完算尿。天快亮时，我们进了最后一家早餐店，一上菜就恶心，都趴在桌边干呕，清口水垂起一尺长，就是呕不出来。肚皮快撑裂开了，马疯子提议晨跑，可才跑一站路，都累成人渣了。各人打的回家。老宋躺了一会儿，感觉不行，就进医院灌肠。我聪明，拢家就吞了三包黄连上清丸，一天中泻了八次，差点虚脱了。我估计傻吃的人都有下包袱的绝招。

老威：所以我哪敢奉陪你们。

万人敌：都是做生意请客练出来的。我晓得，写东西不能吃得太饱，否则就缺乏激情。伊沙说“饿死诗人”是对的，但是伊沙本人却肥头大耳，不像写好诗的。于坚属于蠢头蠢脑的那种肥法，据说他是大师？也许吧，不过他诗中的人造猪油太多了。韩东倒瘦，是江南才子唐伯虎的那种瘦法，如果在古代，他就成天练小诗为秋香题扇子去了。我亲眼见过他为某女诗人题的扇子诗：“这么多年/你的体重不增不减。”

老威：你还读诗？

万人敌：有时凑到眼皮子底下，就忍不住要溜一眼。人都是这种德性，当年我们嫌朦胧诗太老，占了席位，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北岛他们当年的岁数，还不是死占茅坑不走人。

老威：你杂种没指桑骂槐吧？

万人敌：我在指桑骂槐！人活一口气，一部中国历史就是老的死霸茅坑，憋坏新人的历史。最近，我准备自己花钱出诗集，配大幅照片。没人吹，我就悬赏，一千元一千字，看批评家上不上。反正这年头，诗人给人的印象就是脱光裤子打老虎，又不要脸又不要命。

老威：你是钱挣够了，又想回归诗歌？

万人敌：你说到我的心坎上去了。不过一人二渠道，三、五

年是脱不了身的，因为总有还没收回来的账。除非你做了特别轰动的选题，大家提前抱款，等着提你的书。就算你想得开，老账不要了，提前退休，可闲一段时间，不小心又碰上好选题，做不做？几年前顾城自杀，轰动一时，传媒热炒，大家都抢素材。我当时找到一位老诗人，想买内幕材料。我张口出 5 万块，把他骇坏了，连问几声“什么”，嘴皮都在抖。接着就翻箱倒柜，忙了一个通宵。情书啦、照片啦、日记啦、诗和剪报啦，甚至纸条都不放过。我都看不下去，一再声明“够了够了”，可他还在翻，还在兢兢业业地出卖自己。最后，他犹豫了几秒钟，拿出了一件东西，你猜是啥子？居然是一件女内衣！他说：“这是我与 × × 的定情信物，你拍不拍？”

我他妈一下就被震了，这老诗人参加过抗美援朝，在官方诗坛也算个响当当的人物，怎么能被 5 万钱把一辈子的隐私买断呢？后来这本书我没出。

老威：你也有仁慈的时候？

万人敌：怕沾晦气。

老威：你不太彻底。其实世道完全变了，隐私不值钱了。在街上随便买份报纸，几乎都有某某明星打官司、控告侵犯隐私权之类。私生子啦，绯闻男友啦，早年的三陪经历啦，三级艳史啦，甚至父母离异、身心创伤、恋父情结都闹上法庭，请法官公断，动不动就要求赔偿几十万。嘿，你这方面的书还做得少么？茜茜与你关系密切，她说至少为你传过七、八本。

万人敌：她与所有的书商都关系密切，不过最密切的还数老家。有段时间，他把她的稿子和感情都买断了。恶棍你晓得，专搞丑女的那个，只要听说某个地方出了丑得稀奇的人物，这东西肯定日夜兼程地冲去验证，然后上床。去年他专程到昌平搞茜茜，却遭到严词拒绝，茜茜说她已是老家的人了。

老威：这么专一？看来她适合写言情类的书。

万人敌：琼瑶、席绢、黄爱东西的书她都照着搞过好几本。最近出了一本《绝对隐私》风格的书，有点像茜茜策划的。请的是女诗人，谈的是初恋，文字和故事都雅而美。王小妮、海男，好像还有伊蕾。翟永明的那篇，标题我还记得：《十三岁，我的身体背叛了我的心》，有点像《还珠格格》里的对白。现代派女诗人从西尔维娅·普拉斯式的疯狂女权向纯情回归，也算一种新动向。

老威：世纪末怀旧又不是女诗人的专利，40岁是个坎，无论男女，一翻过去都不对劲。你呢？听说这两天茜茜瞄准你了？

万人敌：正常业务往来。再说人长得难看又不是她的过错。我这人天生喜欢笑，茜茜老是问我笑什么，我不能告诉她的腮帮子大，没颈项，喜剧色彩太浓了。茜茜身边还有两女孩，人漂亮，可好吃懒做。我想把三个都娶过来当偏房，不乱搞，没事就四个人坐在床上打麻将。到那时，我一定问茜茜：“一个女人咋能够没脖子？”

老威：你是越活越无聊了。

万人敌：人骨子里都无聊，只不过有人能用理性将无聊感觉硬抗过去，使自己显得有奔头。我的精神一直落魄，大把票子能麻痹器官，但麻痹不了先天的东西。恶棍发了横财，据说在办护照，要投资移民加拿大，到两眼一抹黑的风景区去寻找安全感。他完了，已经开始怕革命，怕马克思的行政机关分配社会财富了，而我们的大儿童马哥，成了中国最大的伟哥用户。老威，不要硬撑了，还是来给我当写手，图个一时快活。

老威：我很快活。

万人敌：没钱没名，快活个屁。成天扛着根破箫，也没见吹出个名堂。

老威：我活该。

万人敌：好，算我多嘴。今晚喝酒吧？还是老哥们，发书淡季，都磨皮擦痒。我租房的外面，有家湖北餐馆，平常一大堆人都在那儿吃喝，味道太绝了。我的起居习惯还同 80 年代差不多，房内像兵营，躺一片人，臭是臭了点，但气旺财旺。如果有谁带女的来，我马上让铺。

老威：你很少回四川吧？

万人敌：我还是不习惯过家庭生活。老威，晚上狂耍一盘嘛，宋二娃要来赌酒，老子非把他的嚣张气焰压下去。

老威：芒克三天前打过电话，说你与宋二娃已赌过了。

万人敌：还不尽兴。

老威：都脱裤子了。

万人敌：宋二娃就这德性，灌到一定程度就脱，把端菜的小姐吓惨了，他还追出去陪礼道歉。后来，朱胖子把他的裤腿点火烧了一只，他穿上后，还到处找缺了的裤腿。我有 20 多年酒龄，从来没失过态。

老威：芒克说你们在比赛撕票子？

万人敌：都让宋二娃闹的。他骂我是地主，买了房子买车，买了车买楼，买了楼又挖空心思出租吃利息。现在那楼成了豆腐渣工程，利息没吃着反而背包袱，这不是花大钱买大罪受么？真他妈哪壶不开提哪壶，都是钱害的。于是我们都骂钱，像骂个婊子，我们把钱和婊子的祖宗八十八代都日了。可到头来，还是离不开。我提醒说：“文学搞得好好，说是挣一把票子就赶紧上岸的。”宋二娃马上就接上火：“你上我就上。”我火更大：“龟孙子不上！”宋二娃说：“把票子撕了！”我说：“都拿出来摆在桌上！”我发誓我没醉，我一张一张地撕，先撕成两半，然后是四半，然后是八半，直到成了纸渣，我才又撕新的。我真

的恨啊，又不晓得恨啥子，这世道，一拳头打出去是空的，但一收回拳头，总觉得一种无形的高压榨得人扁了，晃来晃去，四面八方都有人在监视你，等着你蚀本、垮杆、跳楼的那天，谁会挡你呢？我可能撕了很久，把大家的眼睛都撕绿了，我撕一下骂一声：“我叫你贪财！”我起码骂了几百声：“我叫你贪财！”宋二娃就没老子儒雅，他三下五除二，乱扯一气。有一沓捆好的票子太厚了，他呲牙裂嘴地掰，没掰开，就用牙乱咬。狗日的一口钢牙，居然把那沓钱硬生生啃缺一只角，起劲嚼，当饼干吞下去了。我没啥可撕的了，连单据、发票、出书合同都粉碎，我一个念头想出家。最后我拿碗砸手机，被馆子经理抱住。我要捶他，朱胖子一汤盆扣在我头上。宋二娃早撕完了，又钻进桌子底下摸钱渣渣再撕。

老戚：没人拦你们？

万人敌：大家都想撕。撕完钱就反上梁山。可笑吧，张嘴又是打家劫舍的文学幻想，唉，本来一只卤鸭子就够吃了，我为什么要十只呢？

老戚：一个鸭脚板就够了。而一群鸭子最好永远在天上飞。

万人敌：不可能。今天你只要一个鸭脚板，明天你连一个鸭趾甲也得不到。

老戚：为啥？

万人敌：人多鸭少，还是塞进肚皮保险。

写手茜茜

采访缘起

新世纪的风水一次又一次朝有利于女人的方向转，《绝对隐私》之后是《还珠格格》，美国伟哥刚刚登陆中国，《上海宝贝》就应运而生，以下三路的器官思维火透大江南北。

对此茜茜很不服气，因为她那操练了多年的笔力绝不在“美女作家”之下。“红颜薄命的古语早该失效了。”2000年4月27日晚上，在北京东四十条附近的一家日式茶道馆里，没丝毫红颜的茜茜对我叹息，“假如我能凭色相的话，早卖疯了。”

我不赞成她的愤世嫉俗，但能理解她的处境。她已做

了五年多写手，二渠道兴旺发达时，为了按期交货，她曾连续奋战，每天写一万多字。据说像茜茜这样的写手，全国各大城市都不少，特别是北京郊区，分散居住着好几百。遇着风声紧，二渠道不景气，写手们就主动出击，什么业务都做，甚至包括博士论文、职称申报材料、记者的采访稿、领导讲稿、策划方案等等。

茜茜说：“女人比男人的社会风险更大，从写手到作家，一步之遥；从《还珠格格》里的公主到三陪小姐，一步之遥；从家庭主妇到另类宝贝，也是一步之遥。”茜茜还透露：“以培养作家闻名的鲁迅文学院近年来已沦为写手的主要温床。”

老威：茜茜，我们聊聊天？

茜茜：我累了，况且没啥好聊的，你不是书商，跟我没有供求关系。

老威：这样说就没劲了，我只是你男人的朋友嘛。

茜茜：你小声点，这是公共场所，周围都是耳朵。

老威：我晓得你要做业务，可也犯不着那么贱。

茜茜：我贱？

老威：别装了。你哪是写手，纯粹就是陪酒女郎，硬要吊人家的膀子，刚才酒桌上的八个人，起码有四个摸你的屁股。

茜茜：12亿人民都摸我的屁股又咋样？

老威：明星屁股。

茜茜：我看你有点变态，今天到此为止，再见。

老威：你男人到北京找你来了，他托我先给你打个招呼。

茜茜：他在哪儿？！好吧，楼上有座，我们上去谈。

老威：听你的吩咐。

茜茜：过奖了，我是受了你的挟持，才上来欣赏窗外的夜景，可这样一来，楼下的书商就不会买单了。人家还以为我们有一腿。

老威：我请客，包括下一曲《春江花月夜》，那弹筝小姐的日本和服真不错。明天就约在这儿，你和老邓聚聚咋样？即使做不成夫妻了，也要好合好散嘛。

茜茜：求你了，老威，改改管闲事的臭毛病，千万别让他找到我。

老威：你是卖稿子，又不是卖人。

茜茜：只要不见邓大佑，你让我干啥都成。

老威：人家千里迢迢从四川赶来，在京城疯找了你半个月

.....

茜茜：半年里他已来过两三次。这东西别的本事没有，认起路来赛过狼狗。上回他查到我的行踪，就让一个陌生人冒充书商给我打传呼，说要编一本《党的战士司马南》。我在电话里讨价还价了半天，敲定每千字 40 元，资料由对方提供。接着，我应邀留了地址。

老威：第一次通电话就留地址，你的胆子还不小。

茜茜：我一个穷写手，长相也不勾人，怕啥？况且，我留的是住处附近四川饭馆的地址。到了约定见面的第二天中午，我还拉了合租房的两个女孩一道。饭馆很火爆，我们预订了个靠窗的包厢，隔着玻璃就能看清楚大马路上的一切动静。北京这城市，大得毫无道理，我住在昌平的西三旗，靠五环了。

我们三个女孩耐着性子坐等，谁也没怨言。因为对方说住西客站，从那边绕过来，即使不塞车，都得耗两小时在路上，相当于从一个小国到另一个小国。肚子早咕咕叫，我们就先点两个小菜，聊天充饥。玻璃外的出租车不断有人下，司马南的人头却始终没浮现。

老威：假书商也叫司马南？

茜茜：接头暗号。因为初次见面，就在电话里约定：对方一拢馆子门，就高举某某彩报，上面头版登载篮球大小的司马南头，通栏标题为《正义战胜伪科学》。

老威：还很有诗意图嘛。

茜茜：我老公就是写诗出身。80 年代，还是师专诗社的负责人，后来发配到镇上教中学，他又把整班学生都发展成诗人。那时我年轻，崇拜他，死追着嫁给了他。我私下觉得，他更适合演电影，由于怀才不遇，他才经常在现实生活中来点电影情节。我没料到，这次他玩起悬念来了。

他后来告诉我，他凌晨 5 点就出门，从西客站步行到地铁

口，又在积水潭转了一趟车。拢这儿还不到8点。他见太阳明晃晃的，就躲到路边麦地里，躺着喝了一瓶啤酒。借着酒兴迷糊了一会儿，想着海子生前就住在昌平，也经常大清晨睡在麦地里喝啤酒。难怪诗人、画家和写手在这儿租房的多，恐怕都想沾点死人的灵气——他就这样心潮澎湃地给他老婆设套，成心丢人现眼到底。10点过，他钻出麦地，在街上晃荡了近4个小时，据说好几次，他就站在玻璃外与我对视，两人相距还不到三尺远。

老威：你连自己的丈夫都认不出来？

茜茜：邓大佑也这么说 可直到他进了包间，我才认清楚。原来他没把司马南举在手上，而是直接蒙在脑壳上。不光我们，许多人都注意到了这个怪物，谁也没想到同自己有关，因为昌平住过几拨搞行为艺术的。

当时已近下午两点，我们实在熬不下去了，才在服务员的催促下磨磨蹭蹭地点菜。这个可恶的邓大佑，他居然把司马南的眼珠子抠掉，并透过那洞贼溜溜地观察了我两分钟，才扯下纸面罩煽风，夸我血色好。我当然血色好，我差点就气成脑溢血了。想走，又被另外两女孩扯住，人家已经陪了我两个多小时，这客只有我请。

点了满桌菜，我一点胃口都没有。不，纯粹就是呆瓜一条。邓大佑的全部行李，就是从路边拾得的塑料袋，内装两瓶啤酒（一瓶空的）、一条内裤、一本《严新功法研究》。可他一点不自卑。我晓得，他哪怕成了叫化子，也从不自卑。他说：“我是专程从四川赶来，与你一边挣钱，一边夫妻双修，这本研究严新的书，是我吃素7年，呕心沥血之作，肯定能卖大价钱。”

老威：你丈夫适合在北京混，他这把行为艺术把许多人都盖了。

茜茜：老威你心态不正常吧？寻开心是不是？

老戚：不，邓大佑比我们都清醒，他这一系列行为里贯彻着非常自觉的消解现实的观念，他以编有关司马南的歪书着手约会，然后在海子故居的麦地里模拟自杀前的思考，死而复生走出麦地，回到现实，用司马南的眼珠子审视外出已久的老婆，接着又是与老司对立的严新和吃素。

茜茜：可惜你不是邓大佑的老婆。

老戚：据说北京郊区某村的艺术家，有一天黄昏集体上街头手淫，结果 13 个人全被警方拘留了一夜，引起海内外舆论的骚动。这都是被名利心憋坏了，才出此下招。“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前，曾与 13 个门徒举行最后的晚餐，”艺术家们在局子里这样对警察解释说，“我们 13 个手淫者就是耶稣门徒转世，这是一场现代的欲望晚餐，我们中的有个人只脱裤子不手淫——他象征叛徒犹大。”

茜茜：邓大佑如果有一半这种心思，也不至于在农村小学熬这么多年。当着外人，我又不好煽他耳光，只有接下他的手稿，盼着快快结束这丢人的午餐。两女孩边吃我，边用手朝鼻子扇风，嫌我老公臭。

老戚：这么不给面子？

茜茜：他的确脏，脖根子一层油泥，身上那件香港回归纪念衫已成抹布，胸前的紫荆花同油菜花差不多。我领他回去洗澡，准备等他干净后再问问家里的情况，孩子由谁带着。可我刚一开口，他就倒在床上打呼噜，擂都擂不醒。一直到晚上 10 点，他抠着眼屎起床了，到处翻东西吃。我给他下了一斗碗面，他轰轰几口就下肚了，然后像伟人一样背手，反拿面碗，念念有词的散步。

老戚：现在他正在盲流诗人蒋大器家散步呢。

茜茜：他一直都阴阳颠倒，本来这算不了啥，可他通宵走来

走去的。如果忽然刹步了，肯定就发现了史无前例的秘密，例如“我们正跨在时间的裂缝上”。

老威：他在蒋大器家也唠叨过这句话。

茜茜：有天晚上，趁我睡着了，他跑到大街当中拦住巡警，也告诉了人家这个秘密，结果被请进了收容所。警察问职业，他说从事严新功法研究，这可不得了，邪教呢。他被关了几天，终于审出我这个同伙，就领着警察上门了。

幸好我三证齐全，才没出事。这回我下了狠心，出钱找民工把他扭送上火车。否则死缠下去，我没法干活。

老威：你把女儿丢给邓大佑，一个人长年在外头漂，这像个母亲么？你丈夫显然受了刺激。

茜茜：谁刺激谁呢？

老威：瞧你这一脸无辜。据说你曾当着邓大佑与情夫乱搞？

茜茜：你这张吃屎喝尿的嘴！好端端的一段情被你糟蹋成这样！

老威：你太骚了，自己丈夫来了，即使有外遇也回避一下嘛。

茜茜：政府都管不了的事，你起啥子哄？告诉你，我与他的夫妻关系早就名存实亡，就为了这个，我才离乡背井的。他吃了七年素，开头我顺着他，虽然我们都是农村小学的教书匠，营养差、缺乏吃素的环境。

老威：他信佛吧？或者是个环境保护者？

茜茜：他啥都不信，他是为了诗歌才吃素的。

老威：我读过邓大佑的诗，分辨不出荤素来。

茜茜：那你太马虎，他的诗的确干净，越写越短，最后短得像日本俳句，两行，或者一行就是一首，比如：“瘦的马儿长草/跑进风的排骨”。他说这是经过减肥的诗，只有素食者能

写。唉，自己的男人有这么远大的理想，我岂能不支持？你晓得，中国不比国外，有很多素食馆，品种多，做工精，说不定素比荤营养成份更丰富。中国就没有吃素的店，偌大的北京也没有。庙里的素餐，都统统取些荤名字，像豆腐干做的回锅肉、炒肉丝等等。邓大佑是个彻底的人，那张嘴像个科研单位，每顿饭都要细细琢磨。我们在乡下，除五谷杂粮和蔬菜，就没别的可吃。一个地方的水土决定了肠胃，你不吃肉，肯定痨。痨得清口水朝上翻。红光满面的邓大佑吃素一个月，就菜青着脸；上了三个月，腰比我还细了。每当肠胃捣乱，他就盘腿打坐，念念有词。核桃大的喉包和青筋呵！为了照顾他，我把女儿都送娘家了。他一门心思应付素食麻烦，性生活能力每况日下，最后连老年人都不如，一个月一次还赊账。有一回，我光着身子在床上等他，他摸过来，做了个骑马的动作就下去了，大热天还替我把被子盖上，说：“当心受凉。”我也是有七情六欲的女人，跟一个没人性，不晓得冷热的木头混日子，还不好意思出去说。

我第一次外出打工还很有报负，利用暑假到成都，想报考记者。几家报社都去应聘了，明明笔试口试都不错，却盘盘落选。经人点拨，我的自尊心受到打击：原来考记者也“以貌取人”，脸盘子不亮，才高八斗也白搭。

爹妈给了我这幅平淡的相貌，经过修饰打扮，虽然属于“耐看型”，但太委屈自己了。正垂头丧气要认命还乡，不料熟人捎来消息：邓大佑在家辟谷，差点出人命，现在县医院抢救！我连夜赶回去，邓大佑到底从休克中醒过来。

我守在病床前等待他好转，医生叮嘱要加强营养，可他连蛋、奶也不吃，营养从何来？喂和灌都试过，他直接就喷出来，插管子输入，他就一次次反刍。这条犟牛！我气哭了，说：“你不想活为啥还要搞个女儿摆起？你不管，我也不管了！”

他说：“我辟谷七天，除了清水，粒米未进，已有点灵魂出窍，感觉轻飘飘的，啥子都看穿了。这个人吃人的社会，胖子总是占优势，那些当官的个个都像肉球，滚来滚去占大伙的空间。我一看见肉，不，一想到肉，就气紧，就累赘，太挤了太挤了。女儿也是我和你挤出来的。”

跟这种东西，还有啥好说的。我心一横，决定告别过去背水一战去奋斗。先在成都租房当写手。94年那阵，二渠道的书好发，读者就像一望无涯的猪头，见着花花绿绿的封面就哄抢。花两三天时间，用剪刀加浆糊传出来的臭书，也能呼啦啦地卖两三万。引我入门的朋友说，这世道，只有码字挣钱不认脸蛋。初次接活儿，我非常老实，夜以继日苦干，成天窝在屋子里披头散发，面包啃得牙腔出血，就这么爬了一个半月格子，20多万字，把人皮都熬脱一层，人家还嫌手脚慢，耽搁了工期。原说好30元1千字，但书商审稿罢，就开批斗会说：“你的读者群年龄段为17岁至87岁，懂不懂？”接着是构思不客观，细节不煽情，催泪弹远远不够。最后是工期拖长了，写得再好也抢不了头彩，所以要刹价。我气哭了，那色鬼却借安慰为名摸胸脯。莫办法，钱和协议都在人家那儿。

天长日久，我吃亏吃出经验，速度就快了，一天硬写也一万多字，写疯了能出两万多字。94至96年是二渠道黄金时代，活儿多得接不赢，我们就几个人牵成流水线。甲专门查资料，把参考书可偷可抄可改编的东西剪下来，按前后顺序编号；乙专门想结构，写过渡，连结上下文的段落；丙全盘贯通，润色定稿。真他妈邪，你越乱整，书越畅销，一旦有认真创作的念头，肯定就卖不动啦。最近流行的《上海宝贝》，就是乱整出来的，啥子屎盆子都朝脑门扣，什么“我今年18岁，却有81岁的阴道”，女孩的阴道老成这样就成恐龙了……这就是卖点。

老戚：《上海宝贝》好歹是创作，跟编编匠还是有区别。

茜茜：作家比写手前卫，这就是区别。我编过若干下三路的书，不敢署真名，怕丢脸。现在风向转了，卖字相当于卖逼，没钱没胆找三陪，读《上海宝贝》过于瘾也不错。

老戚：你眼红吧？

茜茜：也许。写手当久了，啥书都差不多。

老戚：你编过哪些书？

茜茜：琼瑶、金庸、古龙、三毛、卡耐基、比尔·盖茨、《心灵鸡汤》续集、《猫王妙语》、《星运大全》；还有成功学、商战记实、官运、中美关系策略、卡通图书、歌迷金曲等等。《教父》火爆时，我们就传《教主》、《教皇》、《教母》、《教子》，三、四天就出一本，作者都是同一个马里奥·普佐。奥修火爆就传奥修，直接以他老人家之名大编特编，直到弄烂为止。有本《奥修》大传就是我主笔，署名却是奥修亲随门徒，印度的穆罕默德·莫迪达斯。

老戚：了不起，连宗教家的传记都能编。

茜茜：只要给钱，太空人的传记也编。每本奥修的书中都有生平，有的还列了年谱，再加上甘地的、泰戈尔的，反正印度人写东西都一个调：优美、快活、有悟性、有神性。逼急了，我还抬了两篇泰戈尔的小说进去。我想中国人这么变着花样捧他，奥修会很高兴。

老戚：你的水平是二渠道公认的，这些年一定发了吧？

茜茜：发个屁。漂在外头，开销特别大，竞争也激烈。现在住通县的写手，许多是鲁迅文学院毕业的，操练上来了，就会爬上我们的头。书商们还喜欢找风骚的娘们，我嘛，渐渐就退出历史舞台了。

老戚：这想法不错，我看邓大佑虽然人有点恍惚，但心肠

好，对你一腔热血。你就再见一面，选成都定居嘛。你利用老关系，继续编书，他给你查资料，轻轻松松地过生活咋样？

茜茜：你刚才还是个臭流氓，咋一下子变成党支部书记了？

老威：妇联主任。你虽然长相平平，但在书商界也浪得风流之名。早把邓大佑欠的那点老账赚回来了。该收心了。

茜茜：邓大佑还会闹事。

老威：听说他已开荤了。

茜茜：上次在收容所呆了几天，被里面的牢头把肥肉用筷子捅进嘴里。呕吐要挨打。青菜全被抢吃光，连饭也用捣烂的肥肉搅拌过。这一套，连正常的回民都扛不住，何况文弱书生？邓大佑出监后特迷恋肉食，胃口越好，他的罪恶感越重。他再次进京时，我搬家了，他就直接露宿在昌平街头，要找一个散文家，叫苇岸，也是素食者。

老威：苇岸已经死了。

茜茜：我晓得，苇岸瘦得同邓大佑差不多，我看是饿死的。癌症晚期时，医生和亲友劝他开荤，补充营养以抵抗病魔——他屈从于一片善心，倒在临终落下永远的遗憾。邓大佑将他引为知己。

老威：苇岸有孩子么？

茜茜：没有。我后悔跟他有了一个孩子。现在啥也顾不上。我不能见他，再纠缠几盘，我的业务真的没法做了。老威，你发善心，为啥不把邓大佑领回家去？

采访缘起

老唐是我 80 年代的文学朋友，而今做了书商，为了生意应酬，染上了嫖瘾。1995 年 8 月 1 日夜，我与一些熟人，被招待进成都高新区的一家夜总会，本想借机采访嫖客，不料迎头撞上老唐。

我与老唐八年没见了，在这种场合重逢，哈哈一笑，都把对方当成了嫖客。这再好不过，访问顺利进行。

老唐比我大两岁，生活中一惯好为人师，这一次我似乎又满足了他的虚荣心。

嫖客唐东升



男欢女爱(清代瓷塑)

老威：这不是老唐么？没想到在这种场合撞见你。

唐东升：咋没想到？你不是也到这种场合来了吗？

老威：嘿嘿，你把我反问住了。是的是的，这两年我啥地方都有兴趣，像

条猎狗，见洞就钻。你别误会，在我的印象中，你是个很正统的书生，模范丈夫。朋友们都私下里议论说，你的老婆挺有福气。



老唐又在外面过了一夜，耗掉费用400元，“档次不高。”他说：“价格还算便宜。”

外头阳光明媚，晃得老唐几乎睁不开眼，他再也不愿回首身后黑咕弄冬的耗子洞，那耗子精还依依不舍地倚在门旁。（赵铁林 摄）

是换一种场合，我这人人称赞的美德就成了笑柄，一个男人，连陌生女人的屁股都没摸过，也太苍白了点。40岁以前，我的确只

唐东升：你可千万别捅到我老婆哪儿去。

老戚：怕了？

唐东升：有点。

老戚：怕还嫖？

唐东升：入了夜总会的门，我就不是从前你在单位上见到的那个一板一眼的老唐了。现在，我下岗了，做图书批发生意，也算发了点小财。做生意嘛，免不了应酬。而今吃喝平常事，关系深的客户，还得招待人嫖。最先是人家招待我，要包间，要小姐，弄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你知道，我把家庭看得重，老婆跟我吃过不少苦，我就是为了让她过上好日子才经商的。可

与我老婆睡过觉。

老戚：第一次要小姐的感觉怎样？

唐东升：一场虚惊，小姐一进来就与我挨得紧紧的，把我逼到死角，说话都结

巴了。小姐提议点歌，我唱不了卡拉OK那种节奏的歌，跳舞呢，当然更不会。真的枉为人生。看身边的人个个搂着小姐，啥动作都做，我怀疑是在做梦呢，若是十多年前，早被抓进牢里了，中国的变化也真大。我的朋友们都劝，老唐，你就把这儿当作自由市场买东西嘛，按质论价。我反驳说，什么买东西？这是大活人嘛。逗得嫖客和小姐都轰堂大笑。陪我的小姐说，没错，这是做生意。后来，朋友们为了我，都没开房间过夜，搞得我不好意思，觉得欠了人家的情。再后来，一帮朋友到都江堰的龙池风景区，那儿的小姐质优价廉，我一沾上手，就觉得另外一个自由天地打开了，什么家庭、责任、道德、传统，全他妈是反人性的。通过嫖，我也



老唐的偶像

思，觉得欠了人家的情。再后来，一帮朋友到都江堰的龙池风景区，那儿的小姐质优价廉，我一沾上手，就觉得另外一个自由天地打开了，什么家庭、责任、道德、传统，全他妈是反人性的。通过嫖，我也

把自己的“丑恶面目”认清了。原来我前半生是在虚幻的道德约束中慢性自杀。

老威：你这是用自己的现在否定过去，其实哪一种生存方式更好，你也没想得清楚。

唐东升：你在玩哲学，而我是在体验。

老威：都谈不上，因为中国人缺乏宗教背景，哲学或体验就显得特别世俗。文化大革命只能算邪教，那时中国民众都将自己的性本能转移到偶像崇拜上，这是 49 年以来的极端理想主义的顶峰，它在消灭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消灭性病的旷世奇迹。而改革开放以来，民众的道德水准在物欲的刺激下，直线下滑到动物现实主义，似乎每个人都醒悟了，原来世上还有这么多好东西没享受！

唐东升：一点不错，爱领袖不如爱自己，这也是文革反思结论之一。如果人人都爱自己，社会就进步了，因为愚弄不了谁。以前通奸，破坏军婚都是挺严重的罪，现在去留自便。再加上有明的暗的三陪小姐，解决问题方便。有钱啥不能干，何必要惹麻烦？原先我以为小姐们都是因为贫困，因为种种难言之隐，被迫从事卖淫，后来才知道，这也是工作。我第一次嫖的是一位隆昌乡下姑娘，虽然做作，但还是尽职尽责，在旅游旺季，她一个月要接一百多位客。我问她为什么进成都干这个？她回答：我喜欢这个，我感激成都人民，他们让我发财，要不，我将一辈子窝在乡下。”她还说她喜欢边干活边聊天，那样挺起兴。情绪一旦调动起来，既舒服了身体，又赚了钱，还深入了解了男性世界。做小姐的只要心细，就能从一百个男人中尝到一百种滋味，当然不会全是快活。不快活的时候也要强作欢颜。这样逆来顺受地搞几年，攒足钱，就可隐瞒历史，安装人工处女膜，嫁个好老公。我要用千锤百炼的本事把老公伺候舒服，让他天天都围着我转。国外不是讲究试婚么？当小姐就是试婚。

老威：这小姐的心眼不坏。

唐东升：岂止不坏，简直是贤妻良母的料，我敢说，做过三陪的一旦从良，温柔劲绝不下于纯情淑女。我和老婆的感情是邻里公认的，结婚前信誓旦旦就别提了，成家后也知冷知热，挑不出毛病。但这相敬如宾的夫妻关系，肯定有问题。我们的性生活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按步就班的公式。先摸哪儿，后摸哪儿，哪儿有块疤，哪儿有颗痣，我都滚瓜烂熟。稍微要创点新，也得提前商量。而且互相都知根知底，像长期周旋的两个间谍，一方翘屁股，另一方就能猜中这家伙将放那门子的屁。我心里把老婆叫“诰命夫人”，皇上赐了牌坊的。

老威：你就不能多读读《家庭医生》，夫妇共同改善性生活。当然，看些一级毛片，掉换掉换性交姿式也很必要，这是科学，不是淫荡。

唐东升：哪能教老婆这些？万一她把种种招数反过来回敬老公怎么办？她身体比我好，我就怕她性心理觉醒。

老威：你是内外交困吧？40多岁的人了，注意身子骨。

唐东升：我有伟哥，走私进来也得200元一颗。伟哥的发明是对人类私生活质量的提升，它的意义相当于人类首次发射宇宙飞船。它不象其它春药，强烈刺激器官，过度地消耗体能，而是调节人的身心，增强活力和自信，它的药效能维持一个星期或更长时间，没有副作用。

老威：你成了春药广告商了。那你的性能力靠药物支撑？

唐东升：笑话，今年我才见到伟哥。今年以前，我仍然炮炮中靶，从不临阵脱逃。注意在调情时少喝酒，有的小姐职业道德差些，拼命灌客人酒，以此可以偷懒。享受生活得保持清醒，自由支配身体的每一部分，否则，就不叫享受生活。另外，接触前多搓搓自己的大腿根和脚心，向天空打几下空拳。这是在激励斗

志的同时，向小姐示威。

老戚：骇住对方了吗？

唐东升：活跃气氛而已。小姐见我这样，不是笑，就是做出一幅惊恐万状的样子，双臂紧夹护胸，如剥掉了羽毛的麻雀。当然，笑、恐慌、哭都能让我起兴，至少不象“诰命夫人”，在床中央坚如磐石。接着，我一上身小姐就陶醉得叫开了。叫春的水平也同身价有关，不能他妈的乱叫一气。

老戚：你太折磨人了。

唐东升：这是劳动，我做生意挣钱也不容易，消费就要优质服务。当然，碰见档次高的小姐，我也犯不着来这种“冰山烈火”。

老戚：你在外面乱搞，你老婆就没察觉？

唐东升：我老婆是人精，一见我周围那些生意朋友，就能猜出所谓应酬是些什么内容。一味否认，抵赖肯定不行，久走夜路必撞鬼。比如老婆问：“今夜到哪儿谈生意？”你不能吱吱吾吾回答“在茶楼”“在某某馆子”“在某某家里”，否则她进一步追问，你就穷途末路了。你要大大方方地说：“在夜总会。”老婆又问：“请不请小姐？”你答：“大家都请，我也不例外，放在一旁，当个摆设嘛。”“只是摆设？”老婆还不放心，“现在已经凌晨三点了。”你答：“哪怕五点我也要回家睡觉，我没在外过夜的习惯。”

老戚：你经常撒谎累不累？

唐东升：我就这个命，瞒得了多久算多久，前天我把内裤穿反了，回家被老婆逮个正着，要死要活的，我只好斩钉截铁，称天气闷热，在夜总会的卫生间冲了个凉。事后我一头虚汗地想，真是一物降一物，老婆这么刁，我还要服她管，可见人结婚不仅仅是需要合理的异性搭配。而是需要一个家，一个能够管理自己

的具体的“小政府”。绝对自由找不到，即使找到了，也没劲，因为偷鸡摸狗的乐趣没有了。有时我觉得“诰命夫人”也怪可怜的。

老威：你在这上面的开销够大的。

唐东升：只要不被扫黄警察抓住罚款，应该说还过得去。干哪行钻哪行，毛主席说，万事万物都有规律。扫黄运动和中国其它运动一样，抽风一般，这段时间抽得紧，就得避避风头，假如耐不住寂寞，你就宁愿多出点血，上星级大酒店，最近公安局才在报上出了通告，住二星级以上的旅客，男女同宿，不查结婚证，这个方便之门开得大。不过，这是必然趋势，去年广汉的税务部门就想公开向三陪小姐征税，引起新闻轰动，终于没有结果。这一步，国家如果迈出了，三陪小姐作为一种职业就有了合法性，哪下一步，就该发营业执照了。我在这儿预言，不出三五年，中国肯定出现“红灯区”。到时候，人们的家庭观念将经受一场八级地震。

老威：这不符合中国国情。

唐东升：什么国情？祖宗的规矩么？还不是要变。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哪种国情更符合人性，你我心中都有数。过去我们认为，妓女是旧社会的毒瘤，必须铲除，几十年一轮回，现在又绕回来了。其实卖淫是一项极古老的职业，在唐朝，整个社会都注重文化修养，因此著名青楼招收雏妓，均要进行素质投资，让其在成年接客之前的几年中，学习琴棋书画，学习待人接物。从《唐宋传奇》里看，当时的高级艺妓往往同王孙贵族交往密切，其社会地位并不低贱。现在，我们应该将大唐精神发扬光大，不能落在其它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后面。等三陪小姐合法化后，就应该先办班，文化班、公共关系学班、生理、心理卫生班、性病专科班，然后考试、拿文凭、发营业执照。当然，定期

的性病检查是免不了的，这样，卖淫作为一种未来产业就会越来越正规，让客户放心。

老戚：你这算是嫖客的理想主义吧？可这样一弄，成本就高了。一般工薪阶层是嫖不起“官娼”的，据我了解，嫖客中找野鸡的人数是夜总会消费者的四倍。野鸡喜欢出没在城乡结合部的小卡拉OK厅，而根据地却在周边各县、各旅游点，在都江堰下面的一个镇上，歌厅就有50多家，以小姐众多，价格便宜吸引着八方骚客，几乎成了全镇支柱产业。那儿针插不进，扫不了黄，因为有地方保护主义。

唐东升：你说的镇子我去过，离都江堰不过十多公里，价格的确便宜。

老戚：你得过性病么？

唐东升：三次淋病，一次尖锐湿疣。出入这种场所的人几乎都得过性病。淋病好治，打两针，几天就好了；尖锐湿疣是顽症，龟头长菜花，进医院，用激光烧了，又用小砂轮磨，可没过多久，菜花又发芽了，并且比第一次的范围还广。我只好出差到北京治病，花了上万块钱不说，又要瞒老婆，又要做生意，心理负担特别大。

老戚：你可以到小诊所去治嘛，谁叫你摆阔？

唐东升：小诊所？想死呀。报上天天都在揭露私人诊所性病专科的骗局。一般人染上这花病，不好意思，只好偷偷找一家私人诊所了断，谁知越想尽快了断越了不断，钱花了几兜，病却好了。我的观点是，什么都找大地方，华西医大、中医学院、省医院，然后才是市级医院，径直奔男性病专科，大大方方地陈述病情，快刀斩乱麻。

老戚：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看来，你有整套的嫖经，瘾是戒不掉了。

唐东升：其实不搞也死不了人。同吸毒、赌博相比，这是最容易戒的。但我为啥要戒？我没有对不起老婆，我从未想过离婚另寻新欢。我只是软弱、管不住自己。话说回来，如果我真能管住自己，就做不成生意了，嫖和赌，有时就是生意的一部分，你不同这帮人打成一片，银子从天上掉下来？

老戚：你已经炼成人精了，感到后悔不？

唐东升：对，假如我只有三十岁，我也会像宋朝的青楼女人一样，为柳永夭折而哭。

老戚：哭个屁，老鳄鱼。

采访缘起

林小姐脸色苍白，不是做三陪的料，更为犯忌的是，她与我这个夜总会的不速之客在外面有了联络，并把这种危险的浪漫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

我这个知识分子的灵魂比她更像妓女，她还有纯情的梦，而我什么梦也没有，什么都能消化掉。

1999年10月7日傍晚的这堂道德课，是由一个三陪小姐给我上的。人人都渴望一种平等而正常的交流，这容易么？

很容易，可几乎忘记了。久而久之，我们就失去了嘴巴，失去了说出内心想法的冲动。

三陪林小姐



街头的卦摊告诉她，她的命很好，有吉人相佑。

(赵铁林 摄)



“一夜夫妻百日恩”，这对露水夫妻似乎都动了真情。

(赵铁林 摄)

老威：我没想到你真打传呼了。那晚上从夜总会出来，脑壳昏沉沉的，朋友们都笑我浪费资源，只动嘴不动手。

林小姐：你的那帮朋友，哼，别提了。不过，我的确第一次给客人留真传呼。这是犯忌的，感到奇怪么？

老威：不奇怪，我们彼此有好感。

林小姐：一见钟情？还不至于。一个月前，客人中有个算命的，是和尚，据说还是五台山下来的长老，西装领带眼镜手机配齐了，很有学问。他给在场的十个小姐都看相，轮到我，就看得特别仔细。脑袋和手臂捏遍了，还要我脱袜子，鼻子抵拢嗅我脚板心。连称“怪哉”。他说我从头到脚都是大富大贵的像，咋会沦落风尘呢？必是过路的，这行道的饭吃不久。开始我不太相信，以为是这花和尚变着戏法玩，后来他扯着我的两只耳朵，连称“佛耳”。

老威：扯蛋。和尚逛夜总会本来就够荒诞了，还算命？真是扯蛋加离奇。

林小姐：管他和尚、道士，给钱我们就接待，都是男人嘛。不过，他凑着我的耳根子说，我胸口有颗痣，必须拔掉，否则这

颗娘胎里带来的钉子会钉死我。我听得肉都麻了。

老威：你胸口真有痣？

林小姐：不信你摸摸。

老威：不用了。

林小姐：和尚说，你会点化我，所以你摸一下不要紧。

老威：我的朋友中好像没有出家的。

林小姐：他形容了你的外貌，说你是“世俗中有佛性的人”。果然，你给我回了传呼，并且约我到家中做客，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客人干这种犯忌的傻事。你就不怕我打骚扰电话？

老威：邀朋友到家做客本来极其平常，你为啥要打骚扰电话？难道在行业之外，你就不需要别人相信你，把你当人么？

林小姐：你是个书呆子，简直是外星人，在这个人人都抢饭吃的骗子社会，你是咋个活的？哦，我晓得，你肯定有家庭背景，父母是当官的，你捅一个关系，把我跳出这个行道，到大公司工作好么？我答应做你的情人，和尚说这人命好，谁娶我都会鸿运当头。现在流行婚外恋，情人比老婆也差不了多少。

老威：我的生活太简单，写书、吹牛，承担一定的家务劳动。我的父母都是退休教师，没任何背景。我喜欢你的坦率，像你这么有灵气的女孩子，是不愁找不到正当职业的，把你的简历告诉我。

林小姐：我是重庆石桥铺人，1979年6月16号生，这是阴历，推八字方便。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一些。我读完初中就出来了，先做传呼小姐，一天嘴巴不停地叭叭，一个月才挣七百多块。我反应快，普通话漂亮，可天生贫血。你握我的手，像不像块冰？我一年四季都这样。我坚持干了一年，就撑不住了。还受了刺激。有一次，我传错了一个号，客户打电话进来破口大骂。婊子婊子的，我把电话掐断了，他又打进来打台长，要赔损失。

我被扣了工资，那时我才 16 岁多，哭了几个小时也没人劝我半句。

从传呼台出来，就跟着男朋友到酒店打工，第一天端盘子就砸了。当时已经 12 点过，可包间的醉酒汉还没离开的意思，我跑前跑后地照料，弦绷得很紧。最后，他们要了一个酸辣汤，我松了口气，总算要结束了，却不料一个大胖子站起来。厚着脸皮粘上我，那几层猪下巴几乎搁在我的肩膀上，我用倒肘撑住他，他哇地喷出来，幸好我闪得快。这人整个就是大茅坑，可我还必须陪笑，做出关心的样子。这拨人不是好东西，贼溜溜的，耗几个小时，老是有意无意地揩油，说些挑逗的脏话。我的腰和大腿被揪青了几块，也不敢吭声。熬呀熬呀，眼看要送瘟神了，可当我端汤上桌时，一只脏手竟偷偷摸了我屁股！一慌乱，汤泼了那狗日的一身。这下祸闯大了，一伙人大吵大嚷不买单，要我赔他上万元一件的名牌西装。酒店上至经理，下至厨师和小工都来赔罪，并承诺他留下地扯，干洗了送上门。并赔偿必要的损失。那人不依，要我下跪一点点地擦，直到他满意为止。我的泪水一串串朝下坠，明明被流氓欺负了，可谁为我作主？连自己的男友都是缩头乌龟。我在汤汤水水的脏地上跪了一个多小时。浑身发抖，那流氓指裤裆要我擦，我拒绝，他就抓住我的手往那儿碰，周围又是口哨又是鼓掌，十几张丑恶的嘴脸快要把我埋了。我从来没听过那么多的脏话。就爬起来跑，可又被逮住按跪下，搞了几次，我气得咬了他一口，才跑脱。我在街上迷迷糊糊走到天亮真不想活了。但死了又不甘心，我刚 17 岁，为啥没有人疼我？男朋友不疼，父母也不疼。后来，酒店经理还派黑道杀手来找我。要我还钱，因为我把他的长期的熟客得罪了。幸好那杀手见我躺在床上发高烧，就动了恻隐之心。他给我一笔钱，望着我叹息说：“这张脸蛋的确人见人爱，你这样的女孩，漂泊在异乡，如

果没有可靠的男人保护你，今后的问题还多。干脆，你进夜总会吧，我牵线，找一个经常有大款出入的地方。你要利用自己的无形资产赚钱，免得被人白占便宜。”

我说我不出卖肉体，他说三陪不一定要卖身，你坐素台，陪那些无聊款爷喝酒、吹牛，唱歌，逢场做戏，一晚上至少能挣200元小费。况且妈咪和我都会保护你，没人敢强迫你出台。我已走投无路，就和青梅竹马的男友正式拜拜。去美领馆附近的一家夜总会上班。里面较固定也有几十个小姐，互相之间从不问底细，从不交朋友。我坚持坐了大半年素台，由于出台的人太多，我显得很孤立。

后来就遇上了你的那些书商朋友，妈咪悄悄鼓励我跟出去玩。她说这拨人过去是作家，知书识礼，不会出意外。的确，他们出手大方，从不强迫人。他们好酒如命，夜总会出来，人都飘了，还找馆子喝。有时，一个馆子一个馆子地挨着喝。直到把通宵营业的地方喝个遍。太累人了，最后我只有泥菩萨一样坐着连眼睛也睁不开了。当时心里烦，过后一回味，还挺好笑的。特别是那姓马的，撒钱找罪受，经常醉在大街上，几个人拉不起来。有一回大家实在没办法，有人就掏出手机，冲着地上的死猪拨号。姓马的还有知觉呢，他扯出手机喂了一声，听说“马儿，起来发货，广州要十件”，就立刻坐起来回答：“你是哪位！”把大家嘴都笑歪了。

老戚：你就一直坐素台么？

林小姐：还没确定关系，你就吃醋啦？

老戚：我担心你没法混下去。

林小姐：我不是好好地在你跟前么？

老戚：你的确不适合做这行，我不晓得什么适合你。唉，你受的教育太少了，而环境好的正派公司一般都要求文化程度。

林小姐：我花钱买了一个大专文凭，骗那些附庸风雅的客人。你认为我是大学生就行。现在的社会，没几样是真实的。

老戚：我总不能骗朋友吧？

林小姐：善良的欺骗嘛。

老戚：这个，我说不过你。喂，你做过生意没有？或许，我能介绍些关系。

林小姐：我做小姐存了些钱，就在西延线二环路以外租了个铺面，做化妆品。累了一夜，白天还得早起，上美容美发店推销。现在搞推销的太多，我这模样，又显得可怜巴巴，容易引起人的误会。所以生意越做越不没信心。没奔头，就要赔钱。我正准备退些货，把铺面转租掉。

老戚：我有朋友在一家大医药公司，我介绍你去咋样？先做医院代表，然后是小区主管、片区经理，一级一级朝上做，据说收入很可观。

林小姐：又搞推销？我都厌恶了。我的一个姐妹就搞药品，跑医院，同医生、院长、药剂师勾兑，竞争太激烈了，治任何病的药都有好几十种。没关系人家凭啥在处方上开你的药？年轻女孩去同有家室的成年人勾兑，不就和夜总会卖笑差不多。更可怕是，一个秃头老色鬼与你单独约见，为了饭碗，你又不能不去。我的姐妹销了两年药，挣了些钱，但已伤痕累累，莫名其妙地打了两次胎。如今，她只有沿着这条道路下去，唉，明明是近视眼，可偏偏对着镜子练抛媚眼，何苦啊。你呀，还当作家，啥都不懂，从早到晚盲目乐观，说不定哪天被我这小女孩牵去卖到非洲做黑人黑户，你还掉过头帮助数钱。

老戚：那我就无能为力了。

林小姐：和尚说，你能给我带来好运。你这么高深的作家，能把我当人看，听我诉苦，并且不使坏，我已非常感激。我想做

你的情人，逗你笑，而不是难过。如果你有那么大的能耐，叫我不要去夜总会了，我马上就不会去。也许我又撒谎了，我晓得，你喜欢听这种谎话。这间屋让我很矛盾，可能一出门就好了，阳光灿烂，我会在马路上哼着歌。

世道太乱，我已在成都生活了四年，想一想，还是有点自豪。当小姐也没啥，既然世界上只有男女，异性相吸，当小姐挣钱还要直接些。相对一个人四处碰壁，小姐安全得多，至少一切都发生在明处，夜总会有妈咪，有大量保安人员，混帐一点的客人也不敢过分乱来。唉，老天爷，如果我是风尘路上的命，我认了，如果有段缘分等着，我就烧三柱香。

老戚：你一直没出过台？

林小姐：到你这儿来，也叫出台，但我不会收你一分钱。好笑，我咋这样说话？给我烟，我已累了，我躺在沙发上，你不会介意吧？我人道一年多才出的台，你信不信？是个新手。他们带着我，在宾馆开了房。那些奇怪的人，进门就与我侃文学，问我懂不懂巴尔扎克。我当然不懂，就脱光了在床上等他。他焦急地在屋里兜圈子。质问我为啥一下子脱光，没一点情调？我为啥要与他有情调？这是个老妈子型的男人，接吻还叫亲爱的，逗得我噗哧一声笑了。折腾了个把小时，他也没做得成，就换了个高鼻梁的，这是老手，做了一次还要来，我没感觉，就拒绝，他迫不及待地提高价位，加到 800 元，我勉强答应。他正象狼狗在我身上舔来舔去，门啪啪响得格外恐怖。跳起来躲到卫生间，原来不是警察，是第一个客人，抓耳抠腮的猴子样。两个人要我一起上，我没能力挣这钱，就穿衣服准备离开。后来，两人争得打架，新手把老手掐在地下，差点把眼珠子抠爆了。我静静地等着，他们完事付钱。咋样？我是个合格的冷面小姐吧？

你们男人都有窥阴癖，我晓得，不讲出最后这一段你不会满

足。认清了我的本来面目。就各走各的路。

老威：不做情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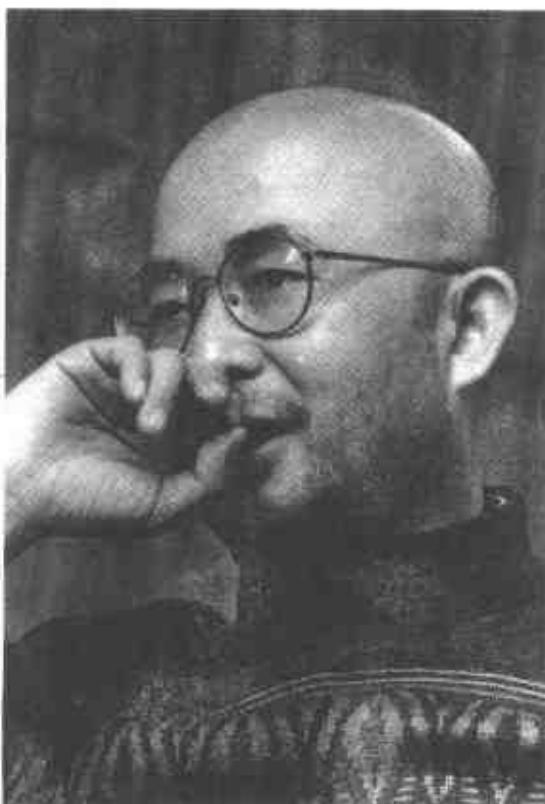
林小姐：我不愿意对你讲出台的事儿，你绕着弯子让我讲。你伤害了我。你和其他客人有啥两样？

老威：对不起，你本可以直接拒绝这种问题，可你还是回答了。明年是新世纪，让我为你的将来打一卦，但愿一切从头开始吧。

蜀派古琴大师王峪

采访缘起

1994年我从隐居地重归故里时，世道大变。因想念妻离子散，物是人非，所以灰心丧气，终日挟一洞箫在成都磨子桥的几家酒吧卖艺糊口。这期间，凑巧与王峪大师有数面之缘，各以琴箫会友，遂成忘年之交。



1995年10月3日和1996年1月31日，我怀着个人目的，两次造访未果。王峪大师家中无电话，只能用传书带信这种极古老的方式联系。终于1997年1月3日上午敲定，下午3点相见。

王峪大师已87岁了，家住成都羊市街与东城根街交叉口旁的一条陋巷内，路人皆知其名。他的经历见《巴蜀地方志·音乐名人传略》877至880页；他的琴音已由台湾天籁出版公司制成光碟，在海外广为流传。成都和北京等地音乐商店也在出售。

听古琴大师抚罢《山中访友》，会吹洞箫的采访者老威露出会心的笑。

(曾循 摄)



本书作者，
民间艺人老威
与成都一位古
琴大师同台演
奏《高山流水》，
知音或许只剩
他们自己了。
(廖亦武提供)

老威：听罢先生这曲《山中访友》，我有点坐不住了。我还没开口采访，您就用这意境高远的琴声“访”透了我。先生，晚辈真是高山仰止啊。

王峪：你还在吹箫吗？

老威：“还在吹箫”是什么意思？我肯定在吹。虽然年复一年，我被生计问题压得喘不过气，但吹箫是每日必做的功课。时间紧，心气燥时，就舔舔凹口，哪怕不出声也行啊。乐器也有灵性，你不爱它，它当然就疏远你。

王峪：是么？我可是许久没抚琴了。

老威：先生岂能降低自己，同我这种俗人相提并论？先生即使终身不再抚琴，其仙风古韵也回旋在天地之间、殿堂内外。想当年，孔圣人游说列国，推行周礼，被一群野蛮人围困于陈、蔡交境之处达三天三夜，水尽粮绝。夫子临危不惧，在众弟子前抚琴高歌，感天动地。我经常在想，这古琴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士大夫的沉浮史。

王峪：可以这么说。古琴是同中国的政治联系最紧密的乐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这正是滋生古琴大师王峪的土壤。



峨嵋山金顶舍身崖，王峪曾于 82 岁那年隆冬在此抚琴高歌，并见到了佛光中的自己。（曾循提供）

器，因此历史帝王会弄琴的不少。隔着千年历史，我们无法亲聆孔夫子抚琴而歌，但我们能从《论语》中“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中辨认出其琴其歌应该是正气浩荡，凛然不可侵犯。与孔子同时代的晋国乐师师旷，为了专心练琴，不受四周环境的干扰，竟刺瞎了双目。据说师旷之琴，直接预示着国运兴衰及个人祸福，几近巫术。特别神的是，他能通过抚琴上天入地，呼风唤雨，重



古琴大师的
意境。如今已不
复存在了。

(曾循 摄)

演历史。虽说古琴起源有许多种说法，但在我的心里，师旷是最早的宗师。

老戚：师旷有琴谱传下来么？

王峪：没有。孔子倒有一首《文王操》，但也有伪托之嫌。不过我觉得这没关系，因为许多古籍都描写了师旷抚琴的场景，你可以从这些场景去想象，从白鹤翩翩起舞到天昏地暗的雷霆之怒，当琴弦终于崩断，大王手中的玉杯也摔得粉碎。这种国势陡转，天人共怒的极端，是很难用乐器表达的。

老戚：您的意思是世间有两种古琴，一种是能够抚奏的，一种是想象里的？

王峪：对，一种是现实，像我刚才为你弄的《山中访友》，有作者，有朝代，徵、羽、宫、商、角分明，平和而雅致，令人流连忘返；而另一种本来是书里的神来之笔，后人读了拍案称绝之余，就把书中千古流传的故事搬进曲谱。人都有模仿的习性，今人模仿古人是很雅很过瘾的事，于是这些故事化的曲子也能广

为流传。

老咸：我还是觉得想象里的好，例如“筑”这种乐器，我最早知道是在《东周列国志》里，荆轲为了酬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携徐夫人匕首及燕国地图去诈降，行刺秦王，“至易水之上，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之，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之。”这就是说，那首苍凉千古的《易水歌》是高渐离用“筑”来伴奏的，后来高渐离继承荆轲的遗愿，在筑里灌铅，并用两年多的时间，逐步接近秦皇，投其所好。终于在遭受挖掉双目的酷刑之后，持筑对专制者发起攻击。我一次次地根据这种故事想象筑的形状和声音，真是心醉神迷。可直到去年，我才在考古杂志上，读到在西汉古墓长沙马王堆里发现失传乐器筑的报道，里面写道：“筑身窄长，筑颈呈三角形，可以看见，以前曾有五根弦，一根压三角顶棱，两根贴着左侧的斜面，另两根顺着右侧斜面。五根弦分在徵、羽、宫、商、角；西侧的筑弦被扼住后，又分别变成羽、变宫、宫、角、变徵五声。”

王峪：你说得不错，其实任何一种曲谱及乐器都是尸体，你不动它，它也就一天天地腐烂了；如果你像音乐学院的学生一样，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照搬，也没意思，你在照搬尸体呢。一个好的琴者，应该象你刚才阐释“筑”那样，把活人的精气吹灌进去，使尸体动起来，使尸体在你跟前跳舞。有人弄一辈子也只能达到琴匠的水平，教学生混饭还可以，就别谈什么境界了。

大约五年前，几十位海内外古琴高手荟萃成都，台湾、美国、欧洲的都有，我陪他们上了峨嵋山的金顶，正是隆冬，寒风怒号，天地浑然素白。当夜清月登空，云涛滚滚如万千银鱼雀跃，众高手面对奇境，却畏缩不前，我一时逞能，竟吩咐徒弟摆几于舍身崖上，老夫盘膝而坐，抚琴高歌李白的“明月出天山”，动情之处，云翻浪涌，天公陡降大雪，这是自然界的听众

在哗哗地鼓掌呢！我边抚边唱边用心聆听那极为深远的回声，感觉自己一直就在舍身崖上坐着。我是一块老石头，一直在与山川对话。蓦然，我猛一睁眼，看见了佛光，那佛光像动荡的水井，在云海边一圈一圈朝上翻，在两个光环之间，我看见了盘膝合掌的佛，在佛的跟前，也摆着一张琴，我真忍不住诱惑想跳过去，抚一抚那张琴！

老威：许多人就这样跳下崖去，那佛就是您自己呀。

王峪：我知道，但我也知道这琴声这歌声不是我能发出的，是大自然在借尸还魂，是融人大自然的祖先在借尸还魂。我们身体在变轻变薄，终于像一具空壳在雪里化掉，我再唱“明月出天山”，我反复唱，我清醒地意识到，这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刹那，我在苍海桑田中积蓄了几十年，就为了这一刹那，永恒的听众，《高山流水》的神话终于被粉碎了，俞伯牙和钟子期算什么？

老威：您对《高山流水》耿耿于怀？

王峪：根本就没有这支曲子，俞伯牙的境界，来源于樵夫钟子期的两句赞叹：“巍巍乎，其志在高山”；“浩浩乎，其志在流水。”这一静一动，或静与动的互相包含，涵盖了东方的全部哲理。但是在这讲得清楚的哲理之上，有讲不清楚的更高妙的东西，像《道德经》里说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古琴里的“玄之又玄”，就是听众的唯一，最后达到琴者和听众都是自己。但你又能从“自己”中触摸到众妙之门。众，大也，多也，普天之下也。那么钟子期就是另一个俞伯牙，子期病死，伯牙毁琴相祭，并发誓终身不再抚琴的真正原因是，他再也弄不下去了，《高山流水》是一支心死之曲。古往今来，没有一个高手能谱出心死之曲。

老威：现在流传的《高山流水》怎么样？

王峪：据说是根据失传的《高山流水》之意境重新谱写的，大约是明代的作品。我想，汉、唐、宋也应该有他们那个时代的“高山流水”，如果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有此雅兴，也可以弄。所以社会上流传的《高山流水》的琴谱版本有五、六种之多，有将“高山”和“流水”分作两支曲子的，也有合在一块的，更可笑的还有古乐合奏曲，据说还是音乐学院的教授搞的，在剧院里演出，挺卖座。俞伯牙果真有如此众多的知音？这个社会呀，只要操作得好，不伦不类的东西也赚钱。

老威：您出的碟子也不少。前天我还在盗版碟市场上，看见了好几种，封皮上有“蜀派古琴大师王峪”的字样，照片很具飘然仙逝的味儿，我猜测可能是您在峨眉金顶让人拍摄的。

王峪：你的意思是我也炒作？当然，我是人，要穿衣吃饭，前几年，我感觉精气充沛，腿脚也灵便，就到处走走，以琴会友，我还上过电视。但这说明不了什么。我这辈子只会弄琴，能卖艺糊口养家，当然再方便不过。不瞒你说，我还收过学徒，然而某个晚上，我突然从电视里看见一个盛况空前的古筝大会，大约有上百个戴红领巾的小孩，面临泰山日出，摇头晃脑地齐奏雅调，令人大开眼界。我却吃惊得半晌吭不了声。圣贤之乐竟成儿戏！而且在宏扬传统文化的名义下进行。惭愧之余，我将所有的学徒扫地出门，也搞得自己心气不畅。唉，世风日下，艺人何为？

老威：我能理解先生。

王峪：上次金顶抚琴见佛是我人生中的极致，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物我相忘的好时光了。如果说运作，也是别人的事，因为当时的琴声和自然之声都被录了下来，制成了光碟，在世界各地流传。整整三个小时呀，要是平常，人都冻僵了，而我却觉得一股滚烫的体液从丹田持续不断地涌出来，我的手指异常灵

活，最后，雪在我的身上堆积起来，眉毛还凝着两根冰柱，然而当我在尾声引吭长啸时，雪噗地一下抖散开去……我徒弟扑过来，给我裹上棉大衣，拥我入房烤火，人们都向我这个八十二岁的寿星敬酒。

老威：我记得你病过一次。

王船：对，病过一次，痊愈后骨节僵硬，就很少弄琴了。但我还是保持焚香、净手、凭几默思的习惯。这是一种姿态，面对琴，你不一定要抚它。你听听，外面多热闹，通宵不停地打桩，又一幢高楼大厦要建起来了，比左边窗外的这幢还要气势宏伟。才短短的两年时间，我这房外的僻静小街就已荡然无存，那掩蔽着小街的一棵棵大树还是解放初期栽的，不过一天功夫，全砍翻运走。我已失去了习惯已久的弄琴的环境，像你说的，乐器也有灵性呀。

老威：斗胆问一句，先生今天抚琴是因为我吗？

王船：其实在我沉思默想的时候，心里已经在抚琴了，客人来访，我就应着心音动手，保持一种连续性的冥想。

老威：与听众无关？

王船：何为听众？从前，敝舍周围，绿荫连绵，夜半推窗，随缘一曲，满街都能听见。那时如果你在街上路过，会以为自己走在汉、唐或宋朝的某条街上。而现在，我根本就不敢开窗，你看，有窗的地方都装成墙了。三面墙，挂了六张琴，一张为晚唐琴，一张为宋，其它都是明以下。我在家中与它们为伴，能从唐琴幽黑的纹理中，听出隐约的奔马之声，还能想象接纳百川的丝绸之路，长安郊外，各类踏青人长袖飘飘的姿态；而宋琴焦黄，严谨的书卷气却隐伏着连绵不绝的流离失所。这些年代久远的乐器，听众为谁？

老威：先生可否给我讲讲蜀派古琴的渊源？

王峪：这有很多种说法，我无意饶舌，挑起派内纷争，况且先师早有遗训。古琴也同文坛和政坛一样，有在野和在朝之分，有学院和民间之别，进入学院也就等于在朝，教学生、拿教授级别的俸禄，整理、讨论、甄别古谱，撰领新篇，并编纂乐史。有时也为达官贵人演奏，成为国家级的权威；而在野也就等于民间，通过自发组织的琴会较技，自视清高，自得其乐，到后来自生自灭如我。

老威：我从来不读现代人编撰的历史书，因为改动太大了，最终你不知道历史是随心所欲呢，还是有严格的尺度。比如唐弢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大作家沈从文只有寥寥几行，大约还是改汉奸文学的代表，张爱玲等人根本没写。而李季和贺敬之都占了大量篇幅，似乎只有革命立场坚定才是好作家。因此，先生您莫悲观，您想想从古至今，产生了那么多好的古琴曲，又有几支是在朝的教授弄出来的？

王峪：谢谢你给我鼓劲，但我已八十七岁，朽木不可雕也。这样吧，我们结为忘年之交，我送你一盘碟子，这第一曲《广陵散》还过得去。

老威：这《广陵散》也是伪托之作么？

王峪：对。因为嵇康在被刽子手砍头之前，抚琴一曲，然后愤然摔琴而叹曰：“《广陵散》兹此绝矣！”遂引颈就刑，连曲作者本人都说“绝矣”，后来流传的《广陵散》当然是假借嵇康之名。不过，这支曲子同《高山流水》不一样，它似乎深得嵇康和魏晋竹林七贤之神髓，悲怆而激烈。它的另一个名字叫《聂政刺韩王曲》，聂政你知道，春秋的大刺客，为报父仇，隐姓埋名多年，终于行刺成功，与残暴的韩王同归于尽。在毙命之际，聂政怕株连亲人和同伙，竟自毁其面，令他人无法辨认。而其姐却在弟弟曝尸街头的时候挺身而出，披麻戴孝收殓遗骨，可谓大义

凛然——《广陵散》叙述了这个故事，并且通过被冤杀的文人嵇康之口——他多想做一个刺客啊。

老威：先生，您也是个刺客，您在这支曲子里向现代社会行刺。世代相传的汉人血脉被腰斩，被接上；再次被腰斩，再次被接上。我觉得在一次次空前的掘墓鞭尸的文化浩劫之后，好的东西都流落到民间，从《高山流水》、《苏武牧羊》到《广陵散》，都是民间的精气凝聚而成，所以《红楼梦》里也讲：“悲凉之雾，遍及华林”。而历朝历代的暴君所干的，正是肃清民间邪说，以正朝纲。天下清明，百姓都不敢讲话，民间的好东西就被烧、被封，被故意“失传”。久而久之，人们就习惯了遗忘，习惯了用朝廷规定的语气说话，奏乐。再久而久之，这个民族就没有历史，没有音乐，更没有文化。

先生，您要保重，尽可能把扎根于您心中的好东西保存得完整一些。祝您长寿。

街头瞎子“张无名”

采访缘起

1996年12月22日，冬至夜，家中冷锅冷灶，我独自一人，想吃些热食，却懒得动手拉开抽屉，数了数银两，就顶着寒风和城市噪音步行到王建墓一带烫火锅。几大块辣毛肚刚涮进嘴，有人从街沿右首牵出一位瞎子，怀抱二胡，摸上石阶，挨桌向食客打躬问

寻。我怜其年老瑟缩，遂吆喝一声，点了一曲。不料琴弓初开，即非寻常之音也。感慨系之，动了访问之念。

瞎子琴师63岁，伪称“张无名”，想来是自惭卖艺低贱，不愿透露真名。若有怀旧的慈善家肯扶危济困，请随时到成都王建墓选家露天火锅店，秉夜坐等。



从旧社会到现在，瞎子拉二胡沿街乞讨作为一种传统一直在民间被继承发扬着。老瞎子去了有小瞎子，小瞎子后面还跟着小小瞎子——二胡的命运也就这样注定了。(曾循 摄)

老威：师父，您这二胡拉得真神！能为我再来一曲《江河水》吗？

瞎子：请您先付钱，按这一带的规矩，十块钱一曲。

老威：这是五十块，您摸好。本来琴声无价，但我只能掏这么多，我还要付酒钱。

瞎子：客官您是行家，如果想听，我可以在这街头为您一直拉到天亮。这二胡的脾气，如同你们读书人的熬夜，越到深处越来劲。《江河水》太悲了，我还是拉《空山鸟语》给您醒酒？

老威：您想拉什么就拉什么吧。

瞎子：您这么客气，我就不敢动手了。

老威：为什么？

瞎子：我眼瞎心不瞎。卖了几十年的艺，从国民党拉到共产党，我懂得这二胡有许多种玩法，对于绝大多数没长耳朵、附庸风雅的食客，弄个热闹就过去了，哪怕是悲到极点的曲子，也是手上功夫，滑把颤弓而已。而给您献艺，是要费心劲的。

老威：风挺硬的，师父，请您坐上来与我喝两杯。

瞎子：不敢造次。

老威：放下行头吧。来，我敬您。我平生最喜欢的两样乐器，一是二胡，一是箫。瞧这二胡，只有两根弦，就拉尽了人世间的苍桑。我的老家李家坪，三面靠山，一面冲着向远方蜿蜒的公路。我不知道山脚那座破败的地主小院是否还在，看见师父您，童年的一切就栩栩如生地凸现了。有一位乡村教书先生坐在门坎上拉二胡，他下雨拉，月亮升起来也拉，把我的性格拉得孤僻而伤感。现在，我只能隔着岁月听了。

瞎子：隔着岁月听？我不懂您的话，但我想哭。很多年没有哭的感觉啦，从娘肚子里出来，我就两眼一抹黑地乱抓，才三岁多，有人就把二胡恶狠狠地塞到我手里，用一根细细的鞭子抽着



张无名的同行，成都街头的盲艺人。 (曾循摄)

我拉。瞎子只能靠这手艺讨生活，哪有客官您讲的那么浪漫？我的爹妈很早就不在了，不知他们作过什么孽，我们三弟兄全是先天瞎，方圆几十里把咱家叫“一窝黑”。我的爹妈受不了这个，就双双服毒自杀了。那时我才七岁，顶着孝帕坐在尸体前，一个劲地拉琴，为爹妈讨棺材钱。这样连拉三天，尸体发臭了，人也快散架了，但我不敢停下来，总觉得头顶上悬着一根细细的鞭子。我至今对师父的印象都是贴着肉疼的鞭子。后来，我就开始走街串巷地卖艺，先在我的家乡邛崃，后来跑的地方就多了。

老戚：您走路方便么？要不要人牵着您？像许多国产电影里那样，一个小姑娘牵着个老盲人，还拿着个碗，边走边声调凄凉地叫卖？

瞎子：客官您说笑了。明眼人有明眼人的社会，瞎子也有瞎子的社会，我每到一地，都要拜访当地的瞎老大，吹吹拍拍几句，交纳一点见面银子，这样，他就会指派一个小瞎子，赔我大街小巷地探路，怎样进怎样出，谁的门坎高谁的台阶低，谁是当地的大户，脾性如何，店铺区在哪儿，应该选择什么时候去，都要有个讲究。等把这些烂熟于心后，方可卖艺。

老戚：你这是解放前的规矩吧？现在是九十年代，卖艺人到

处都是。唱歌拉琴卖药耍猴敲连花落，应有尽有，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见热闹就扯场子，要不治安管理就撵过来了。去年春节期间，我家门前来了五个瞎子，五把二胡一齐拉《太阳出来喜洋洋》，我只好一人分发一个红包。

瞎子：您说的是“伪劣产品”，不是真正的艺人，城市大了，他们就能这个区那个区地流动，骗人钱财。不过，民间艺人界也正在形成一套行规，大家都希望靠硬本事挣钱吃饭，江湖骗术的市场会越来越窄。

老威：你指的行规是什么？

瞎子：首先在一个地方应该有相对固定的卖艺人群，其次是卖艺人中应该有自己的老大。老百姓需要单位和政府来管，艺人也需要。比如，我在王建墓附近卖了七年艺，人家都认识我，知道我拉琴认真，就愿意点我的曲子。或许像我这样的盲艺人，武侯祠也有，春熙路或水碾河也有，但我不知道，也不想打听。我就愿意每晚在王建墓。我这种想法也是我周围一大群人的想法，他们有的弹吉他、拉提琴，有的擦皮鞋、修自行车或者讨饭。如果我们有一天想到武侯祠去立脚，就很困难，会很快被赶出来。

老威：您就不怕经济萧条？万一这一带的馆子接二连三地倒闭怎么办？

瞎子：馆子是倒闭过无数家，但食客和做发财梦的永远有那么多。所以“倒闭”不过是换招牌而已，店铺永远不会空着。中餐垮了有西餐，海鲜垮了有火锅。这王建墓倒底是埋过小皇帝的地方，风水好，人气旺。特别是夏天，火锅一片连一片，从店里摆到人行道上，搞得人连腿都迈不开。这个时候，我就满鼻子麻辣，特别担心撞到人家锅里去。

老威：这是卖艺的好时候吧？

瞎子：汤锅咕嘟嘟滚成一大片，我四周吹拉弹唱的此起彼

伏，二胡音量太小，压不过他们，我就只好让人给接上个喇叭，驮在背上拉。到处都是戏台子，谁在乎谁？反正是为了给食客助兴。赚钱嘛。

老威：给人感觉您是在猪圈里拉琴。

瞎子：世上像您这样懂琴的又有几个？话说回来，如果世人都像您，我早就累死了。

老威：此话怎讲？

瞎子：我每次都要用心劲拉，一个人的心劲是有限的。

老威：您是否觉得这辈子被浪费掉了？

瞎子：这辈子？我从没想过这种大问题。对于瞎子来说，每天都一样，除非病了，撞疼了。15岁那年，我正在茶馆卖艺，突然鞭炮震天价响，把二胡声全盖了，但我还是拼命拉，直到茶博士的手抓住琴，才明白跟前已空空荡荡。外面的人们敲锣打鼓，我摸过去，方醒悟到解放军进城了。后来，人民政府发给路费，把我们一批盲流遣送回四川。我学过一年盲文，还相中过对象。

老威：怎么“相中”？

瞎子：凭两只手，大约是1957年吧，瞎子阿炳的曲子很风行，民乐的确火过一阵，我也沾光上了舞台，给群众拉，也给音乐学院的教授拉，还录过唱片呢。领导上让我带徒弟，有眼睛的我不要，因为明眼人进不了我们这个世界。

我的弟子比我小三岁，为了弘扬民族文化，跟我没日没夜地练，有天中午我打盹，总感觉有虫子在脸上爬，我挥了好几次，终于碰着一双柔软的小手，那发烫的指头一点点淌过我的五官，一直痒到心窝里去。于是我装着继续打盹，也伸出手，梦游般摸她，她的辫子好粗啊，眼睛好大啊，睫毛好长啊，那皮肤也挺滑。我们终于抱得紧紧的。那段时间，我的二胡拉得最好，仿佛

不是我在拉，而是有人在身体内外替我拉，我能在琴声中，“看见”我的恋人，非常漂亮，能带着她同游世界该多好。

老威：你们结婚了吗？有孩子吗？

瞎子：我们发生了关系，那个年代，未婚而发生关系，是要判刑的。领导考虑我们是残疾人，没法判刑，就一再逼她打胎，然后隐瞒过去，以免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我们要求领结婚证，领导说这非同一般，要开会研究。开了几次会，也没最后“研究”下来，她的肚子却出了怀。

不料，反右开始了，这个好领导成了批判对象，群众检举说，我徒弟的肚子是他搞大的，要不他为啥那么热衷于帮我们遮丑？结婚证领不成，我还被批斗了几次，打成堕落分子。多亏我是瞎子，要不早整死了。而我徒弟让几个人按着，强迫流产，她更成了堕落分子加封、资、修。

老威：后来呢？

瞎子：后来就散了，这是命，您得认了，按现在的观念，瞎配瞎不更好？解决了社会问题。但那时候，整个中国像个大家庭，吃喝拉撒生儿育女都靠组织，没组织的，就找民政局和居委会。当然，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是例外，组织没能力来管大伙了，连组织里的人也饿死了不少。我的徒弟死于 61 年。造孽呀。

老威：您觉得现在比过去开化多了吧？恋爱、同居都不成问题，卖艺也没人让您办执照交税。

瞎子：谁给谁上税？社会应该给我上福利税才是。我六十年代就下岗了。如果不是那些年政治气候变来变去，说不定我也能像相声演员侯宝林一样，弄个北京大学教授当当，音乐学院有二胡专业。

老威：教授有啥好羡慕的？没您老自由。

瞎子：光棍一条当然自由，您怎么不来“享受”这种自由？

老威：您引条路，我明天来享受。我把箫带上，与您的二胡合奏，讨的钱归您。另外，希望您能帮我召集更多的盲艺人。

瞎子：干什么？

老威：我想找一位懂二胡的生意老板，出钱搞一次盲艺人的音乐会，如果您能聚拢二十位瞎子，就有戏了。

瞎子：这个主意好，我回去与瞎老大商议。

老威：还有比您更老的盲人？

瞎子：不是盲人，而是这个地盘上的头儿。我习惯旧称呼，就叫他瞎老大。这事只有他出面，到武侯、春熙路、双桥子、西门车站等码头去借些瞎子过来，不过，收费很高。

老威：您别一心钻到钱眼里，那就把我最初听您二胡的感觉给毁了。

瞎子：夜深了，还是拉琴吧？

老威：身子骨要紧，师父，心劲别太过。

农民皇帝曾应龙

采访缘起

1993年大年初七，我在四川东北部的大巴山中的一座省级监狱里，拜访了48岁的农民皇帝曾应龙。

大墙之下，“天子”已秃顶，但斗鸡眼中的烁烁神光依旧。他脚登解放牌胶鞋，身着劳改犯特有的蓝色短袄，袖手对我滔滔不绝地发了两个钟头的“口谕”。这是我降临人

世以来，闻所未闻的宏论，但愿读者诸君看这篇采访，不要以为我在编稀奇故事。

曾应龙犯了组织、领导、颠覆等多项反革命罪，政府念其愚昧，从轻判处无期徒刑。他性情乐观，服从管理，警察和犯人们都对其印象较好，经常戏称“陛下”。

我被“恩准”向陛下赞助人民币50元，资助他读四川函授大学。

老威：您就是这座监狱鼎鼎大名的皇帝？

曾应龙：应该叫陛下。

老威：好吧，陛下，您是什么时候称帝的？

曾应龙：不是朕想称帝，是朕的十万臣民拥戴朕登基的。大约十年前，在乌江中游的观音岩，爬上来一条娃娃鱼，这牲畜会说人话，而且总在月明之夜，从岩腔



老威在北京紫禁城内，与一位素不相识的姑娘成了“皇上”和“皇妃”。如果时间倒退一百多年，这对“篡位者”就犯了弥天大罪，该千刀万剐。

而今，在任何一个皇帝呆过的旅游景点，都会碰见类似的情况。以出租龙袍拍照的小贩们高声叫卖着。可见，在世纪末，皇权通过商业的渠道又成了流行的东西。

(陈勇 摄)

里向外唱一首童谣，什么“假龙沉，真龙升；河之南，降太平”。后来，连三岁小孩都会唱了，于是这歌谣经过许多小孩的口传遍了九村十八沟，有位好奇的人叫马兴，是当地的风水先生，一天夜里，他带着一拨村民跟踪歌声，在“观音”的嘴里找到娃娃鱼，那牲畜见人不但不逃跑，反而啪啪拍打着尾巴，像迫不及待地欢迎人来。马兴捡起它，从它的嘴巴当众挖出三尺黄绫，正是那首童谣，而在鱼肚皮上，刻着“大有”二字。其时皓月当空，马兴出洞，望月冥思片刻，突然对天地三拜九叩，向大家举鱼布告玉皇大帝的诏示。

朕事先并不知道娃娃鱼的事，计划生育闹得厉害，乡干部隔三过五带着医生，挨门挨户地查超生子女，查出来要罚款，装在肚皮里的要拿掉，还号召育龄内男女都去结扎、安环。朕有两个丫头，还想要个龙子，就同村里许多人一样，悄悄带着没出怀的



农民皇帝院落后的“山神”。它守护这方好风水，却保不住皇帝不入监狱。 (宋玉 摄)

婆娘外出打工，在新疆搞建筑七个月，果然天遂人愿，有了龙子，按辈份取名延泽。朕不敢回乡，就领着妻儿到了河南，在新乡落脚。可还是让马兴给算出来了。所谓“真龙升”，正暗合“曾应龙”这个姓名，“河之南”即河南，也有坐北朝南的意思，那么“新乡”这个地名正是新天子藏身之地。

马兴领着一班臣民，千里迎驾，见着朕就取出龙袍加之，纳头便拜，山呼万岁。朕却之不恭，只好顺应天命，回乡称帝，国号“大有”，改公元1985年为太平元年。

老威：“大有”的含意是什么？

曾应龙：大有者，你有，我有，大家有也。朕登基下的立国御旨“有地大家种，有钱大家花，娃儿随便生”，已在臣民中广为传颂。



曾应龙的龙袍可比这橱窗里的龙袍差远了。因为他的“龙袍”是白布染的，上面的龙也是出自大脚农妇的缝纫手艺。

(宋玉 摄)

老威：陛下的疆土有多大？

曾应龙：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朕实际管辖的也就是湘、贵、川交界，有三县之地。宰相牛大全在立国之际，专门组织人丈量土地，绘制成地图，送达四川成都国，湖南长沙国和北京国政府。

老威：说句不客气的话，陛下的这个大有国完全是从史书里照搬来的，包括童谣、娃娃鱼显灵、河南迎驾等细节都是陛下与大臣事先密谋的结果，真没想到，时过境迁，您老人家还在做皇帝梦。

曾应龙：放肆！朕知道你是四川成都国来的什么记者，又同狱方混得颇熟。但朕有权拒绝你的采访。



乌江中流的一个村落，农民皇帝的故居，虽破旧，却很有气势。楼下的白衣者为旅游者宋玉。

(周航 摄)

老威：我不是记者，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民情研究者。如果陛下这次不愿同我开诚布公地交谈，恐怕以后就再难有机会让人了解您和您的“国家”。据我观察，您读过不少古籍，您知书达理，素怀鸿鹄之志，虽然这种远大志向有点过头，您不想永远成为世人的笑柄吧？

曾应龙：成王败寇，有什么值得笑的！您能保证如实地记录朕的口谕吗？

老威：当然，陛下。我保证。

曾应龙：话说太尉马兴、宰相牛大全等一班臣民迎驾回乡后，向朕奏请起事步骤和时机，马兴认为，大有国地理偏僻，人烟稀少；乡民们受祖宗规矩的约束，传宗接代的旧意识根深蒂固，计划生育政策在这儿难以推行。更由于一些乡干部的粗暴作风，激起了人们的普遍反感。婆娘们宁愿钻山洞、吃野菜、喝泉水，过野人的生活，也不愿做人流。这种害怕断子绝孙的普遍民情是能够利用的。牛大全认为，应该让大有国的开国大臣们深入民间，在老百姓中宣传生娃儿的权利是天地祖宗给的，当然是生得越多越好，虽然养娃苦一点，但人穷惯了，苦惯了，养一个和

养七个、八个也差不多，多一个娃儿就多一份盼头，谁要是连咱的盼头都要灭掉，就应该同他干。经过半年多的发动群众，大有国的基础就打好了。于是朕连续颁发几道痛斥计划生育为妖术的秘密诏书，号召大有国臣民敞开生，谁要生养十个娃以上，朕就赐封为“诰命夫人”。

正当其时，曾家沟的百岁长老去世了。在山里，百岁老人的仙逝是方圆百里的头等大事，许多人老远赶来参加送葬。风水先生作为贵宾被请到，他翻山越岭，忙乎了两天，终于勘寻到一处向阳的风水宝地。逝者灵柩停了三七二十一天。请外山的和尚念经做道场，方选定出殡日。

按马兴的计算，必须要在太阳刚露头时落下棺材，百岁长老的香火才会同旭日一般，永远上升。于是一千多人的送葬队伍半夜就吹吹打打地起身了，大有国的开国臣民一百多人也混在里面，普天之下都是逝者的孝子，朕在这时也不能免俗。大家认为如果能借百年之尸，还魂立国，无疑是天赐的吉兆。绕着山梁盘桓而上的长蛇阵壮观极了，连星星也暗然失色，并且越朝上，越辩不清哪是星星，哪是火把和人群。牛大全奏道：“陛下，这一切都来自天国呀。”于是跟着朕一道加入嚎丧的队伍。领嚎哪个家伙嗓音特别亮，他颂一句，上千人就合一句，把山震得嗡嗡直响：“走哇走哇！不要歇气哇！不要抬头哇！到天河上游！去投胎哇！二十年后你又来哇！娶个大姑娘！日牝又下崽哇……”

老威：您老人家还挺有诗意的。

曾应龙：好戏还没开场呢。下葬的时辰到了，太尉马兴又率领十几位禁卫军迎着刚露头的日头跳神，许多人不由自主地跟着跳起来。宰相牛大全趁机亮出膀子，祭起大有国的龙旗，跺几脚，摇几摇，接着从怀里掏出一把豌豆，扬手一抛，连叫几声“变”；人们都弯腰去捡那些入土的神豆，不提防乌云从山涧底

阵阵涌起，一会就遮住了太阳，霎时，电闪雷鸣，暴雨如注，似有十万天兵天将杀向人间。

老威：这就叫“撒豆成兵”的把戏了。

曾应龙：你还懂点行。众人被暴雨浇得鬼哭狼嚎，纷纷下跪恳求牛宰相收了法术，朕自然准奏。雨过天晴之际，臣民们完成葬仪，随朕下山，一路竖起招兵旗，四方乡民纷纷投靠，十几天聚了数万之众。

老威：什么数万之众？您的判决书我看过了，也就不过几千受你们愚弄的群众。

曾应龙：君王无戏言。朕还亲率御林军攻入县城，占领了县医院，赶跑院长，将所有的避孕妖物搜出，在院子里堆成小山，点火焚毁。这一惊世壮举，相当于林则徐虎门销烟。万众欢呼雷动，于是牛宰相马太尉率文武两班大臣，着蟒袍持玉笏，依次上朝，行君臣之礼。

老威：听说陛下还拥有三宫六院，共四十名嫔妃？

曾应龙：那都是牛、马二位爱卿做的好事！朕曾下诏辞退，说创国伊始，百废待举，天子理应与众臣民同甘共苦，岂有功未成，先思淫欲的理！可众卿苦苦相劝，言从古至今，天子都是三宫六院，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陛下不思淫欲的精神值得万世景仰，但这排场是不能不讲的！

老威：陛下的嫔妃都是哪儿选来的？

曾应龙：县医院的女护士都入选了，其它就是文武大臣的公主，但朕日理万机，连一起厮守了半辈子的皇后也无暇宠幸，哪顾得上嫔妃！

老威：陛下的朝廷也太腐败了，满朝都是皇亲国戚。我明白你们为什么要把皇宫选在医院了。一是女人多，二是大有国的乌合之众根本就攻不下县政府。

曾应龙：朕一心记着攻医院烧避孕妖物，召唤民心，把政府和公安局全忘了。后来，解放军包围了医院，朕亲率御林军迎战，不幸被虏，而马太尉却押着后宫嫔妃，投荷花池自尽殉国，可惜池水太浅，淹不了人。马卿一时兴起，竟舞起大刀片子，斩了两个嫔妃的头，唉，亡国之痛，没齿难忘啊！

老威：马太尉和牛宰相不是会撒豆成兵吗？他们的法术到哪儿去了？

曾应龙：牛卿祭起大有龙旗，正要作法，肚子就挨了一枪。好个牛卿，大吼一声，又向前冲了几丈远，可还是倒下了。

老威：陛下的朝廷也覆灭得太快了！

曾应龙：天命也，非战之罪也！马太尉拖了命债，被判处死刑。朕与牛卿等一千大臣均身负重罪入狱。朕就是不服北京国的法！你想想，朕祖祖辈辈的骨头都埋在这地方，朕的族谱能够上溯至宋，一千多年啊，朕还不应该承接风水，建立大有国么？北京国管辖的地盘那么大，且四方八面都要朝贺，还缺一个小小的大有国么？吾国贫穷，就是因为五谷不丰，人丁不旺，计划生育一旦落实到户，朕愧对列祖列宗呀！再说，既使要结扎、安环，做手术，也得通过朕下诏，哪有外国人跑到本国来推行他们的政策的？

老威：陛下说谁是外国？

曾应龙：吾国之外都是外国。

老威：那我也是外国人了？

曾应龙：然也。国与国无论大小，都该平等相处，互派大使，互通关贸，试问如果吾国硬要到你国去推行“娃儿随便生”的政策，你国能接受吗？

老威：这就是陛下申诉多年的原因？

曾应龙：然也。

老威：陛下的朝廷也太小了，如果都像您这么干，哪全中国至少有几万个皇帝要登基。您大约已劳动改造了十几年了，人民政府对您怎么样？

曾应龙：朕学过医，大队就安排朕做了卫生员，也算广施龙恩。朕每天也读报，晓得外面每天都要发生许多大事，而大有国相对封闭、落后，许多年也没有报上一天的大事多，朕要在监狱里勤学习，争取能早日减刑出去，造福于本国臣民。

老威：还想称帝？

曾应龙：穷不能立国，这是教训啊！所以说，要挖穷根，奔富裕，首先就要学习文化和科技。朕过去潜心钻研古藉，忽视了本土本乡之外的时代变化，入狱后，朕反而在高墙之内开阔了视野，还报考了函大。

老威：皇上读函授大学？这倒是新鲜事。听说陛下为上学之事还下诏给监狱长和政委，称他们为“黄、王二大臣”？

曾应龙：读函大需要钱，朕的用意是在表彰黄、王二位管理监狱有功的同时，向狱方征集几百元学费，不料朕的苦心被误解。大队长亲临监舍，把朕好一顿训斥。

老威：皇后来探过监吗？

曾应龙：朕已将她贬为庶人。

老威：这么说您离婚了。儿女改姓了么？

曾应龙：一言难尽。朕的心情不好，不想再谈下去了。

老威：但愿我能拉到赞助，支持陛下学完函大。祝君健康。

采访缘起

经老右派冯中慈的撮合，我又回头来采访了廖恩泽先生，他俩能成为好友，体现了另外一种“国共合作”。

还是西门车站附近的“杀牛巷”，我进进出出不知多少回了，我有如此强烈的亲近老人的愿望，是否说明我的心理也老了？

1997年10月1日，世纪末的秋天，世上又在流行1999人类劫难的预言，却忘了我们已处在劫难之中。老军人廖恩泽呢？他在想什么？

国民党老军人廖恩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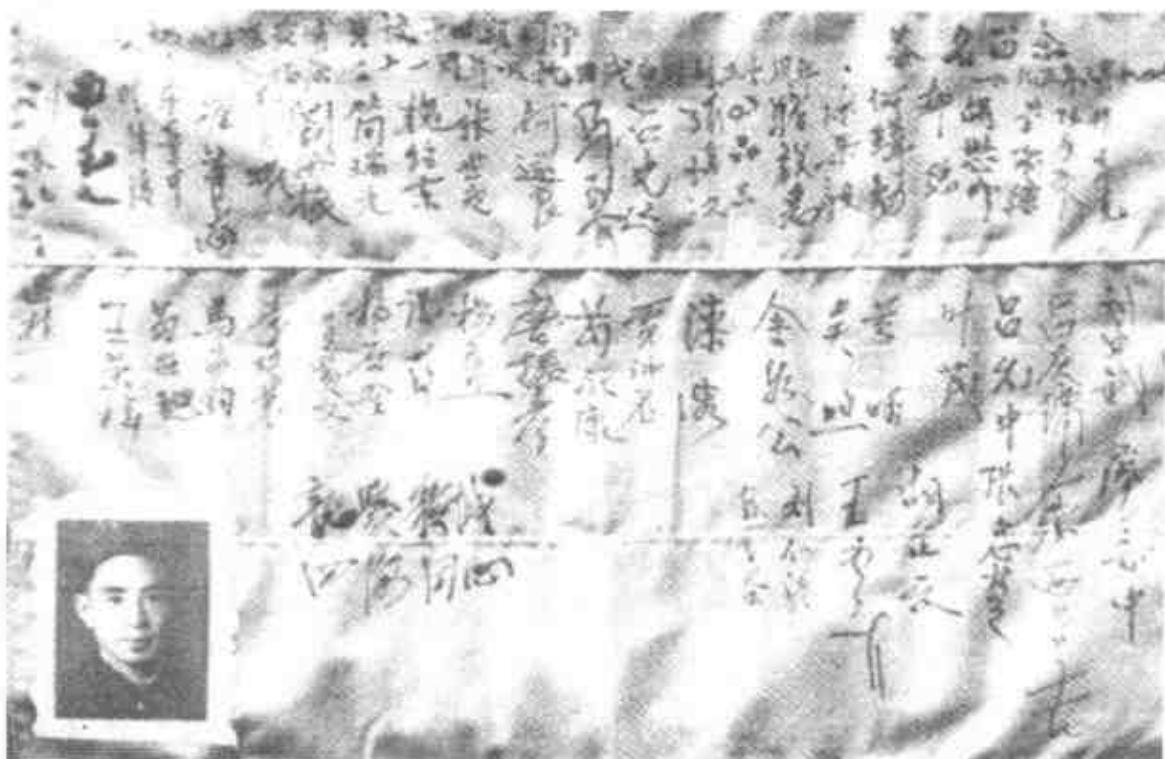
泪迹斑斑，
已把这张摄于
1945年的军入
照片浸蚀了。
(廖恩泽前妻提
供)

老戚：老人家，听人说您的经历非常曲折复杂，能否给我这个晚辈介绍介绍？

廖恩泽：说啥子呢？从国共两朝走到现在的人，一上了岁数，经历都复杂。我把我的履历都写在纸上了，你可以拿回家看。

老戚：好吧，不过我耽心这种履历看不出特别有意思的东西。您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现在，似乎各大城市都有“黄埔同学会”，你经常参加同学会的活动吗？

廖恩泽：前两年，还定期参加组织活



1996年6月14日，成都地区的黄埔军校校友聚会，纪念校庆71周年及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到会的黄埔老人都在长长的绸布上签名，廖恩泽的签名（廖岳中）在右下角，左下角是他作为战犯在监狱里改造时的留影，其中的人世沧桑，已如一阵阵硝烟飘逝了。

动，主要是政府要抢救文史资料。因为黄埔同学中，绝大多数已迈过80门槛，精力不济，记忆力也衰退，再过一些时间，就逐渐成废人了。大家聚会时，一可以活跃气氛，二可以互相提醒、补充，使历史更接近真实。

老威：您认为历史不真实？

廖恩泽：这是个敏感话题。总之，每个朝代有每个朝代的“真实”，你我都无能为力。我这儿有一摞油印材料，都是80多岁的国民党老人的回忆录，没有文采，也没有政治观点，是就事论事的东西，你要都拿去，至于我，才疏学浅，淮海战役那年还不满30岁……

老戚：所以您就没写？

廖恩泽：没写。这两年，抢救文史资料的劲头要淡些了，活动也就不那么定期。但在端午节、孙中山先生诞辰，形式上还是要召开座谈会。我喜欢在家里练字，别人来通知，我就去。每次去，都要少那么几个人。我没戴助听器，我的听力还好，但大多数都戴助听器了。

老戚：您的身板还挺硬朗，看您这坐姿，腰直，背也不驼，双手拳胸，似乎前面还竖着一把无形的指挥刀。据说您从不坐车？

廖恩泽：去外地当然必须坐车，日常生活中可以不

坐车，步行有益健康。这是张群先生的养生秘诀，他说：“日行五千步，夜眠七小时；心中常喜乐，口头无怨声。”所以他活了一百多岁。我不想活这么长，但沧桑之变我还是想看。

老戚：我从您的身上就能感受到沧桑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重庆举行的国共两党谈判现场，谈判桌右中光头者为蒋介石，桌左站立者为邓小平。当时廖恩泽在另一谈判现场武汉任国民党一方的参谋人员。

(曾循提供)

之变。现在我想问，您为什么要去报考黄埔军校？您是黄埔14期，1938年，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了。您是否和那时的许多有志青年一样，出于爱国而投笔从戎？

廖恩泽：抗战为我们这种出身平民的青年，提供了一种报国的机会，然而，当

时的四川是大后方，南京沦陷后，连首府都迁重庆了。我和大哥恩山被父亲送到一家药铺当伙计，也没料到自己日后会从军。那家药铺老板特别自私，不准我们到街面上去看学生们的抗日演说和游行，他的信条是，生意人



花白的头发，沟壑密布的脸颊，“如果不坐牢”，他说，“我早就死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了。”（曾循 摄）

就是一心弄钱，至于国家大事，自有政府出面去打点，因为老百姓是交了税的。我记得即使已进入抗战状态，成都的市民生活还较富足。城隍庙一带小吃百花齐放，月饼拿在手上，油能浸透几层纸。只有防空警报一响，大家紧张那么个把小时。在这种社会小环境下，不当兵也没啥，

只要响应政府号召，向前线捐款捐物就行。而我大哥恩山受不了，常说：“国难当头，谁能安心做生意？”这话被药铺老板听去，告到父亲那儿，恩山被按住打了板子，从此记恨老板。有一天，老板的儿子见了他，就讽刺说：“抗日英雄快去抓付补药孝敬少爷。”恩山气得怒火中烧，可还是咬牙忍了。少爷见这伙计居然不理自己，感到脸面下不来，就抓起柜台上的算盘砸过去。恩山一把接过，他是学过武的，想都没想就把算盘回敬转去。少爷满脸鲜血，哼都没哼就倒下了。

当时我以为出人命了，手脚哆嗦。还是恩山厉害，拉起我一口气跑出郊外，在比较场参军，刚领到两块大洋的军晌又开小差，这一下子，就搭车去重庆。恩山说：“当个大头兵有啥意思？我们去投黄埔军校！正正规规地学军事，将来才有出息。”民国27年1月到28年3月，我们学业期满，各奔东西。恩山出川，调41军，在襄樊一线与日军作战，由于战功卓著，几年之间，他就由少尉排长升到上校团长；而我留在重庆卫戍部队，曾随大部队到贵州打昆仑关战役，后调五战区22集团军总部做少校参谋。

老威：你们闹出人命，一跑了之，不拖累家属么？

廖恩泽：不跑才拖累家属。其实那少爷没死，不过是鼻梁被打塌了。

老威：您的大哥恩山还健在么？

廖恩泽：不晓得。

老威：您们从黄埔军校出来，又见了几次面？

廖恩泽：也就两、三次。45年日本投降，我军挺进平汉线，接受敌寇115师团和13独立警备旅的投降，在郑州至信阳的铁路上，与恩山相逢。互相约定，过两年天下太平，就回家长聚。当时，大家的情绪都很乐观。我俩共同给父母亲大人寄了

信，还捎去了一百块大洋和 20 匹阴丹蓝布。岂料天有不测风云，46 年我调汉口，任上校参谋，参加国共两党的和谈，而恩山的部队在和谈期间，就与解放军打起来了。联合政府的构想一破灭，天下太平也就成了泡影。内战期间，我们兄弟俩南征北战，过着昏天黑地的戎马生涯。恩山升得很快，到淮海战役前夕，他已是孙元良兵团的一个师长。时年 32 岁。徐州会战时，我率 372 团守徐州南线的禹娃山一带，被切割包围了 40 天，终于在 49 年 5 月 10 号，在肖县永城地区被虏。当时我不满 30 岁，对蒋介石死心踏地，就在天黑趁重新被解放军整编时逃跑。

我的勤务兵也跟我逃跑，这小子早就私下为我准备了一套老百姓衣服。我们来不及换，就一口气跑了 30 多里地，刚歇下来，就听见后面连连鸣枪。我的勤务兵急中生智，就将我推下深沟，一个人继续朝前跑。就这样，他被抓了回去，而我换了衣裳，辗转千里，回到了四川老家。

当时成都虽然没有解放，但周边地区的川军已纷纷起义，在南郊武侯祠，我和恩山到底见面了。兄弟俩都成了光杆司令，乱世相逢，难免悲从中来，相与抱头痛哭。恩山说：“西南在历朝历代都是大后方，国军连西南都守不住，可见大势已去。弟弟，你有啥打算？是不是想到西昌去投奔胡宗南，收编一些散兵游勇上山打游击？”我回答说：“胡宗南是蒋委员长的爱将，绝对要直飞台湾的，你是少将师长，或许有资格搭飞机离开。”恩山说：“从淮海及其它中原战场上溃退下来的将校级军官多的是，哪有那么多飞机？况且，你我是凭战功晋升的职业军人，本该如委员长训示：‘不成功，则成仁’，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既然还苟活于世，哪有脸面去台湾？离乡背井的耻辱咽不下去呀。”我问：“哪你的意思是留在大陆？”恩山惨笑说：“我很想留下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可脑袋就保不住了。”我又问：“既

不留，也不走，莫非你想寻短见？”恩山摇头：“我想扮成客商，入云南，从边境过泰国，到金三角。现在还有部分国军驻扎在那儿。弟弟，如果你相信大哥，就一起去，路上也有个照应。”我沉吟片刻说：“不行，故土太难离了。这次不比上次我们去投黄埔军校，还有个盼头。这一去，天晓得啥时才回来？”恩山见我迟疑，急得抓住我吼：“万一被抓住，你就死定了！呆子呀呆子！”我的拗脾气也来了：“国土这么大，我就不信没有我的藏身之地！如果我被共产党抓住毙了，也是命，我认了！从民国 27 年到现在，小日本投降了又接着打解放军，原来以为，仗会很快打完，打完了之后，我们就衣锦还乡，耀祖光宗，过上普通的太平日子……。可是，这仗越打越没止境。你是师长我是团长，都是管上千人的，可是兵呢？一个也没剩下。我晓得，你天生就是做将军的料，只是时运不济，才落到这地步。可我，小日本投降不久就想脱下军装了，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被一种职业推着走。现在，老天爷自动解除了我的军人职业，我再不愿意漂泊了。我想隐姓埋名，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成家立业。唉，这个结局，虽然比原先想象的大红大紫坏得多，但还不是最坏。我们毕竟都从战火中爬了出来，也没缺胳膊少腿。”

恩山听完我这番慷慨陈辞，不禁潸然泪下说：“弟弟，记得刚从家里跑出来时，我们不过是 20 来岁的人，一恍，已经打了十多年的仗了。在这十多年中，除了黄埔一年多，我兄弟相聚的时间加起来才几天。可这一别，啥时才能相见？今生我们注定了要天各一方么？”我也泪流满面，但还是安慰说：“只要都活着，就还有相见的日子。说不定过两年，国军借朝鲜半岛局势，以及美国的援助，反攻大陆，你很快会从泰国回来。”恩山顿脚叹息：“命矣命矣，以后的事谁能说清？弟弟呀，长痛不如短痛，今日我们兄弟就此长别罢了！”

生离死别，从没见过两个从血盆里抓饭吃的军人流过这么多泪，终了我们兄弟立下誓愿：“无论再过多少年，只要一方还活着，就要寻找对方，活要见人，死要见坟。”

老戚：老人家，你们兄弟一去一留，根子都永远扎在故土了。这是我听到的最动人的手足故事。后来呢？大陆和台湾一隔就是几十年，这是历史呢，还是一种宿命？

廖恩泽：这当然是一种宿命，历史是大人物们创造的，而对无法支配自我命运的小人物，只是一种宿命。我曾经不是逆来顺受的人。恩山走后，我也出川了，原来准备到甘肃天水麦积山，找个庙出家。可和尚不敢接纳来历不明的人。于是我又一路来到西安郊区住下来，恰逢当地发生了瘟疫，再加战乱，一个村没剩几个人。我就趁重新登记人口时，伪造姓名和履历，报上户口。两年后结婚。53年，西安铁路工程学院恢复，我顺利考取。毕业后，分配到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任技术员，半年后，晋升为桥梁工程师。1957年，我在视察一个桥梁工地时，被正在劳动改造的犯人认出，那个胡子拉碴的野人冲过来，一个立正敬礼，我定睛一认，原来正是自己的勤务兵。

我不等东窗事发，就自己拎着铺盖卷到公安局自首了。我已有儿子，将来还会有孙子，我不怕了。自己的历史自己负责，要不，迟早也是心病，我幸好没扛着假名字过一辈子。

我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关押在甘肃的一座监狱。这下踏实了，坐就坐吧，我有文化，自学过英语和德语，在监狱里也没吃啥子亏。1975年，熬到最后一批特赦国民党战犯，我出狱，回到了家乡成都。父母是见不着了，只有二姐和七妹还在。政府发给工资，安排住处。我喜欢清静，就一个人搬到西郊，租农民房种花卖花，儿子和儿媳带上孙儿，也来住了一段时间。

我出狱时 57 岁，而离家投军时还不满 20 岁，37 年的风风雨雨，眨眼之间也就过了。青史留名，光宗耀祖的梦想都成旧话，我满世界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好像哪儿也没去过。当然，这种暮年遗老的叹息，你们年轻人是听不懂的。

老威：您找到大哥恩山了吗？

廖恩泽：我今生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寻找恩山。“活要见人，死要见坟”，不负当年生离死别之约。改革开放之后，两岸关系开始解冻，实行三通。于是我就写信给台湾国防部，以一个老兵的名义，恳求他们帮忙寻找兄长。国防部很快发来一封公函，称逐年封存的阵亡将军档案里没有廖恩山的资料；我马上又给有关方面写信，并投书彼岸报界，详细讲述我们兄弟诀别的情形。但半年之中，人家的回信都含糊其辞，也没说死，也没说话，只称“失踪”。我想，人家也是一片善意，害怕伤害我这风烛残年的老人。既是“失踪”，就还有一线希望，而且，恩山是个闹轰轰的脾气，冷冷清清，客死他乡不太像他的为人。

世事难测，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就要不断打听。后来，台湾老兵一批批回大陆探亲，久别重逢的好戏演了一幕又一幕，可我这一幕呢？只要碰见台湾来人，我就想方设法赶去。我觉得石沉大海并不可怕，只要的确有石头在海底。

老威：恩山将军不是说经泰国到金三角吗？听说那是个三不管地区，被国民党军队的后代把持着，您没设法从这个方向……

廖恩泽：关于金三角的传闻很多，但很少有人到过那里。恩山如果在，已经 80 多岁，叶落归根的意识应该更浓。最好能够去泰国旅游时，顺便到一趟金三角。香港的《明报》有毒品巨枭昆沙的报道，连那么神秘的人物也曝光了。他的部队将领中，华人占多数，其中是否有恩山的后代？难说。你看出来了，我的身体不错，我练气功，练书法，食欲好，走路比年轻人都快，为了

啥?恩山会出现的!会的!这墙上的诗是我凭记忆敬录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绝笔：“葬我于高山之巅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唯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巅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世难忘! /天苍苍，水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我是十几年前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当时悲不可抑，竟失声哭了。我还以为心里已经麻木了，可一听右任先生以诗的形式留下的遗嘱，仍然感到震撼，不晓得恩山会不会有同感?

老戚：苍天不负有心人吧。但愿你们兄弟团聚时，能通知我一声。最近，一家报纸登载了一对五十年前的有情人，在五十年后终成眷属，男方已近七十，也是国民党老兵，48年去的台湾。这老兵挺怪，居然为了一纸婚约，几十年没娶老婆。一直到去年，方打听到自己的未婚妻的详细情况，马上越洋赶来相会。这种事，对您也是个鼓舞吧?

廖恩泽：当然。

老戚：我现在发觉，我这次访问有点偏离原定话题。我曾设想把重点放在战争时期和您的狱中生涯，可顺着谈下来，却围绕着你们兄弟的生离死别在打转。您似乎在一生中只做了一件事，而且直到今天也没完成。

廖恩泽：人生由许多阶段组成，在这个阶段，抗日是人人都必须参与的大事；抗日胜利了，载入史册，另外的大事又来临了。现在回头看，人在特定环境中是无法自己选择的。其实，我们兄弟相见在大千世界里的确算不了啥，但没办法，人得守信。

老戚：我最后提一个不恰当的问题，你在狱中耗掉了近20年大好光阴，感到后悔吗？怨恨吗？

廖恩泽：那些年月，无论在哪里，都做不了啥子事。有阶级斗争路线，再有本事的人都不可能有作为。我们那座监狱，除了关国民党外，也关了许多共产党的忠诚干部，大家都是囚犯，混

熟了，也能互相照应。而在外面，再混得熟，也不可能互相关心，亲不亲，路线分，为了“真理”，连娘老子都敢造反。邓小平有本事，在毛主席手里，也只好明哲保身，发誓“永不翻案”，否则，下场和刘少奇差不多。唉，算了，我扯远了，过去我哪敢这样乱说。

总之，我从心底感谢监狱，感谢共产党押我，保护我。要不，我早就死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了。

老军人廖恩泽侄儿廖觉

采访缘起

1999年5月24日清晨，国民党老兵廖恩泽突发脑溢血，经抢救，终不治而亡，享年79岁。

天上飘着毛毛雨，我接廖家侄儿通知，前往吊唁。面对家徒四壁中的廖恩泽遗像，内心涌起阵阵寒意。打仗，坐牢，穷途，落寞，这就是一个曾经有抱负的中国人的一生么？

全国还有多少命运相似的黄埔老人？谁也没作过统

计。一个时代淹没了另一个时代，只有一些历史的残片留了下来。明天，能够证明廖恩泽存在过的或许只有几张照片，几张探监时私传的字条。

不知为什么，此刻我耳边突然响起一首日本人的歌：“你就是你/你不可能变成我/就连你在那里拼死地挣扎/我也只有远远地注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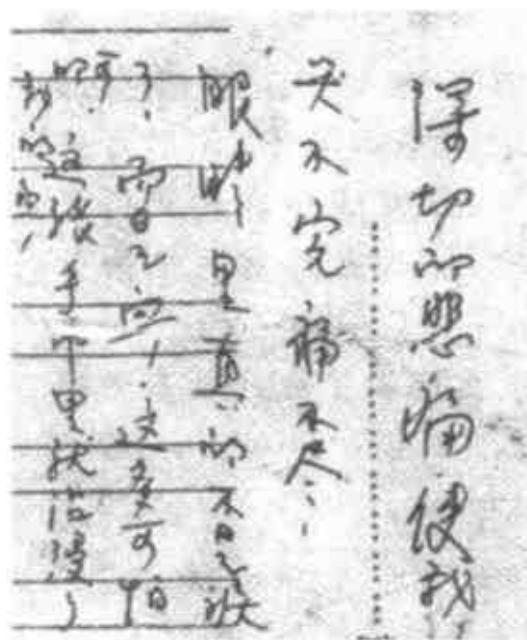
愿他的灵魂在歌声中安息。

老威：老先生什么时候走的？

廖觉：前天医院停止了抢救。不，根本谈不上抢救，因为上两天上午送到医院时，四舅已深度昏迷。医生检查了瞳孔，已经放大。但当时，他的心脏还跳动着，一人高的氧气瓶立在床前，管子插在鼻孔里，抽得呼啦呼啦地响。医生说，四舅是



廖恩泽入狱前与妻子的合影。



廖恩泽入狱后，其妻趁探监传递给他的字条。以后的几十年，人世面目全非，这字条却还残留着当时的体温：“深切的悲痛使我哭不完痛不尽；眼睛里真的不是泪了，而是血！这多可怕啊，这张手帕里就浸透了我的血！”

脑溢血，一下子发作，颅内所有血管都炸了。不信，你过来看看眼睛，红得刺人，耳心和鼻孔不停地渗血。我过去，替四舅揩掉了脑壳的血斑，但又有新的血往外渗。四舅的血太浓了，滴不下来，在枕头四周堆着。他的额头熊熊燃烧着，嘴半张开，似有什么话想说。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

老戚：老先生的心跳靠氧气延长了两天？

廖觉：是。

老戚：可他的脑已经死了。

廖觉：他的亲生儿子在郑州，我们打了电话，就只能等。医生建议拔管子，推进太平间停

这体被面是乱而是心。
易毒被面，拿很我忘不~~西~~。
当好小是传，永生的痛苦。

趁着探监之时，廖恩泽偷偷传递给妻子的字条。这张写于1961年的字条他至死都保存着。

两天，但是我们坚决不同意。医生就在四舅脖子上动刀，直接把管子插进呼吸道。他的儿子终于风尘仆仆地赶车来了，不到50岁，看上去比四舅的皱纹还多。四舅没对我提起过他。

接下去就是办丧事。四舅家徒四壁，把破床和破桌子一撤，几平方米的空间就出来了。妹妹、表姐和宋玉最后一次为他收拾屋子，英汉字典、黄埔老人的一沓打印的回忆录，袖珍收音机的天线已经锈了。细心的宋玉发现了一叠旧照片、旧信及一些泪迹斑斑的文字残片，我都收拾在这儿。四舅的书法已练得炉火纯青，现在人去了，笔和纸还摊在桌上，他正抄录《陈立夫回忆录》上的一段话。我没有哭，但心里隐隐作痛。今年2月，他参加了我的婚礼，他是我母亲家族唯一参加我婚礼的亲戚。当时他想不出送我什么好，他太穷了。我说四舅你能喝我的喜酒，我就太高兴了。父母也说你平常对二毛好，讲啥子礼？实在过意不去就写几个字吧。四舅果然用大红纸录了苏东坡的诗送来了。

我差点说四舅你早送过了。几个月前忠忠爸爸突然弃世，我带着你的挽联去奔丧，你的大字一撑上灵棚，真有点惊天地、泣鬼神的劲：“哀鸿东去，父魂西归；天柱南倾，地维北绝。”横幅是：“限哉命乎。”这种联是写给普通百姓家的么？

也许大喜的日子我不应想到死亡的场景，但是我结婚才三个多月，四舅也走了。我蹲在地上，仰视着他的遗像，宋玉和妹妹

在旁边，挺虔诚地烧着纸钱。唉，我们与四舅的孙子形同陌路，与他却有一种斩不断的血缘，难道冥冥之中，真有支配或捉弄这一切的主宰？

老威：我与老先生是忘年之交，他有健康的身体和意志力！真没想到：“限哉命乎”？这是写给别人还是他自己的？

廖觉：他的血稠，不该喝酒，也许连我的喜酒也不该喝。

老威：你别毫无道理地自责了。

廖觉：上午，我们两辆车十多个人送他到火葬场，父亲的年纪大，都没让他去。刚好下了点雨，空气湿润，火葬场的坝子显得空旷。进炉子前，妹妹和表姐他们隔着栅栏与四舅永诀，我和宋玉，还有四舅的一儿一孙进到里间。一溜五个死者，四舅排在第三，第四具尸体已有异味，并滴滴哒哒的，地上湿了一片。四舅的儿子掀开布，宋玉为他们照了像。我最后上去，看见四舅身着中山装，很安详，只是白发下的红嘴唇，显得非常艳，像柜窗中的模型。炉工身着白大褂，将肩头插向我们之间，这是一道永远的墙，宋玉拉着我从墙边朝后退。四舅从板上翻到传送带上，嘣地一声。我没料到尸体会这么硬，一刹那，四舅早年的铁血生涯涌现出来，在阵阵雾状的硝烟中，我们目送着传送带沿轨道横行，过了三个炉口，然后直行。刺耳的铃哇哇响着，炉中的大火映红了四舅的头，这个老兵，义无反顾地俯冲进去，一了百了。墙不断地增高增厚，我们败退着，太阳出来了，四舅飘动在天空中。我们还要走多久，才能抵达墙的另一面？

老威：你是个诗人。

廖觉：这不是骂我么？

老威：你别误会，经历了亲人的死亡，谁都可能在此情此景中变成诗人，像二战时期一位即将进毒气室的犹太小姑娘写的：“地上的野花呵／明天我就不能看见你的微笑了。”

廖觉：我读过你对四舅的采访，我晓得他老人家为啥喜欢你了。其实他的真名叫廖岳中，这份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名录中，有他的签字，这张合影你看，在成都的黄埔军人都在上面，这是我四舅。

老戚：你给我看过的材料中，有一张老先生早年的情侣照（也许是蜜月照），还有一些特意模糊的字条，人也险恶，他竟把这些爱情信物珍藏了这么多年。唉，可惜我上次的采访没能涉到他的感情生活——他似乎不愿意谈。

廖觉：那是与铁窗生涯联系着的一场灾难。据我母亲讲，四舅入狱，被判无期徒刑之后，四舅母一个人带着孩子，绝望地等待了好几年。那是饥馑而屈辱的几年，作为历史反革命的家属，她三天两头都要去派出所报到集中，然后与一群阶级敌人一道，被押往各种场合接受批斗。她甚至还陪过杀场，与死刑犯同时跪下去，目睹一个接一个的天灵盖被枪弹崩地掀翻，脑浆与血像鞭子一般喷起来，然后朝下落到她的身上。她惊叫一声，只一声，嘴就被捂上了。此后许多年，她能不说话就尽量不说话。

她依旧去探监，外面成片的饿死鬼。在西北的好些地区，饿死了小孩经常不埋，就丢在路边、荒郊。在寒冬腊月，有人恶作剧，把冻僵的尸孩当路标，隔十来米立一个。行人居然见惯不惊，还冲尸孩路标撒尿。四舅母探监要走很长一段这种路，她把不晓得用啥方法换来的食物藏在内衣里面，直到在雪雾中望见监狱的墙，才慢慢朝外拿。可就这样，她还被饥民抢过两回，那些瘦得像鸡爪的手直接从领口伸进去抓馒头。四舅母滚在雪地里挣扎，向监狱方向呼救，在拉锯战中，馒头刹那变成粉，撒在雪里，那些大大小小的人形动物，都趴在地上，手嘴并用，吱吱地寻觅、舔食、争抢着。

这张字条是四舅写的：“这床被面是我们的见证。见着被

面，会使我忘不了当初的爱情，永生的痛苦。”另一张是四舅母的笔迹：“深切的悲痛使我哭不完痛不尽；眼睛里真的不是泪了，而是血！这多可怕啊，这张手巾里就沾透了我的血！”

老戚：这近四十年以前的爱情残片，似乎还有体温呢。

廖觉：但是它们注定被埋葬，孤零零的，没有更多地东西来补充和完善。二姨妈早去世了，父母又不愿多讲。四舅的人生给我们留下了太大的空白。几十年在我们手里，就只有几张照片与字条，他曾经是一个有远大报负的热血军人啊。

老戚：老先生有你这种后辈，应该算幸运的。这世上没有失败者的地位，甚至没人能记得住他们的姓名。若干年后，太阳依旧照耀，人却全换了，谁晓得你曾经活在世上？

廖觉：四舅母终于改嫁了。现实太残酷，她不得不带着孩子，随后夫迁到郑州，斩断了与过去的一切瓜葛。听说她嫁了一个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孩子长大成人，也沾光进了锅炉厂。她的命运似乎是改变了。1975年，四舅随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特赦回乡后，曾去找过她。可时过境迁，当年的生离死别的恋情已随岁月而淡化。这儿的三封信，是已入晚境的四舅母写给四舅的，称呼仍旧是“四哥”。第一封信开头这样：“15日来信并粮票肆两，工业券壹张及布证柒尺肆寸收到，只好替你享用了。庆幸你回到阔别几十年的家乡，当你呼吸着家乡的清新空气，置身于景色宜人的蓉城时，它会荡涤你一生的辛酸，那些忘不了的回忆也会增添愉快，这是一个游子心情的人对你的祝福，愿您在家乡享尽天年。”

接下来是不少极为现实的生存建议：“你要找个工作增添补差，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成都待业青年众多，哪有什么合适的工作等待你去。即使找到工作，（也）受人歧视……发展养殖业，如养蜂、养鸡、兔是较为有前途的……不依靠人，而且

对自己是一种锻炼，开始小本经营，逐渐发展……起居有规律，对健康有好处。养花也是时髦，收益大，不妨试试。”再接下来就谈“晋级考试”，四舅母此时已是个外科医生，她叹息自己：“没福气的人，就这个劳碌命。”

老戚：老先生接受了她的建议么？

廖觉：他真的在金鱼村附近租了农民房子，篱笆圈了块地，开始种花卖花。父亲退休后，有此雅兴，就经常去交流种花心得。为了减轻儿子的负担，他稍微宽裕，就将孙儿接来，亲自培养。看起来，他是叶落归根了，但他心没死，仿佛在与命运较劲。在第二封信里，四舅母终于对他剖白心迹：“我因大半生在惊恐中过来，对什么事从不敢多越一步，心有余悸啊。”话已说到这份上，四舅他能咋样呢？这信写于 1980 年 4 月，好像在这前后，两岸开禁，许多流落台湾的国民党老兵回大陆探亲，掀起一股股团聚的热潮。四舅此生最大的心病被触动，他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大舅的消息。有段时间还走极端，想从福建海域买通渔民，偷渡过台。他说即使找不到大舅，也可以当面向台湾国民党当局讨个说法。退到彼岸的老兵几十年来还有个旧时的家，还有绵绵不绝的思乡病，还有实现团聚梦想的这一天，有的甚至与当年的爱人重归于好，一下子就有了完整的家庭。但留在大陆坐牢的老兵的家在哪儿？成了阶下囚，注定了妻离子散。同是为党国效力的军人，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老戚：老先生可以去台湾寻亲啊。

廖觉：没钱，哪儿都去不了。四舅特赦回来后，除了去郑州见四舅母，就一直在成都呆着。后来他没养花了，就搬到西门车站附近这所旧房子里。这条巷子，一下雨，就像个泥塘，东跳西窜地过去了，那楼口又如一条巨蟒的食道，黑咕隆咚迎向你。大白天，摸着在里面绕几圈，才找右边四舅的住所。两间屋，十几

平方米，四舅与他的孙儿各住一处。厨房两平方米，在过道对面。厕所在楼梯拐角处，大家公用，一户人一把解手钥匙。

四舅在这样的环境中拉扯他的孙儿，此外就看书写字，偶然翻译一些英文资料。除了在我们家与表姐国蓉家走动外，他的社交圈仅限于在成都的黄埔老人。这两年，黄埔老兵们纷纷去世，四舅收集了不少讣告和未完成的打印回忆录。

孙儿读书之后工作，经常不回这个阴暗的家。四舅大部分日子怎么打发的？我也不清楚。有一天，他到白果林来，与父亲默坐一会儿，突然说：“我这辈子，就打仗与坐牢，可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既没敌人，也没朋友。”父亲说：“你有亲戚呀。”就把我从北京带回来的《陈立夫回忆录》送给了他。

老戚：老先生出事时，他孙儿不在家？

廖觉：他已习惯独居了。他邻里关系很好，居委会要写个什么“安民告示”之类的东西，只要在楼下吼声“廖大爷！”就行。他爱卫生，手脚也灵便，楼道与厕所的清洁几乎由他承包。出事那天他照例起个大早，下厕所倒痰盂，这么短的楼梯，居然一去不回。

厕所门敞开着，旁边丢了把断腿椅子，他歪在椅子上，整个地塌了下去。居委会发现后，二话没说先送医院，然后进屋找到桌子上的电话本。我接的电话，并与妹妹急匆匆地赶到医院，人已不行了。居委会的婆婆大娘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廖大爷的死因，说肯定被哪个下楼的冒失鬼给撞了，要不咋会在厕所外，还坐在一把断腿椅子上？

妹妹也说，四舅长期步行，身板硬朗，不是随便能够撞垮的，哪个狗日的不晓得用了好大的劲。有人插话说：“脑溢血说来就来，也许廖大爷没吃降压药，一弓腰就出事。”表姐反驳说：“不可能！一发病，哪有力气去坐椅子？绝对是狗日的撞了

人，原想扶起来坐一会儿就没事，不料祸闯大了，赶紧溜之大吉，现在的社会风气就这样。”

我说，那就报案吧。婆婆大娘表示赞同，但觉得先要分析一番，有眉目了再报案。结果弄了半天，想不出四舅有啥仇人。

“廖大爷那么好，那么受人尊敬，谁也不可能对他干缺德事。”

老威：老先生享年多少？

廖觉：七十九岁。

老威：这是 1999 年，他没翻过这个坎，只能解释为天意。这下子他完整地归属逝去的旧时代了。

川西神医张松

采访缘起

1998年5月21日晨，习惯睡懒觉的我破例早起，与妹妹小飞一起，受成都波洋电讯工程设备公司瞿曲小姐的邀请，驱车几十公里去某郊县乡下探访川西神医张松。

柏油大道之后，还走了很长一段泥泞小路，抵达稻田环绕中的四合院。等待

“体波”诊病的人们已排起了长队。我们好不容易挤入，一人交了十元挂号费，又从8点多钟等到11点多钟，方从窗口见到神医尊容。不过一普通的中年男人

矣。

张神医下午歇诊，我在瞿曲的大力引荐下，终于与其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这对纠正我的种种偏见很有用。

什么叫“破除迷信”呢？柯云路和司马南，这两个急功近利的文人之间的笔墨官司已打了好几年，张松会成为第二个胡万林吗？成都的一家无聊报纸已经开始炒了。

我和妹妹的身体都很健康，虽然开了张松的药，但试不出有多大的神效。倒是他的一番言语，对治疗这个社会的疾病有效。

老威：您就是远近闻名的川西神医张松吗？您真能体波诊病？

张松：也就在这个院子里，出了这院子，我就不灵了。您来看，这儿有一道后门，外面是我家的祖坟地，按风水先生的说法，我的床

摆在阴阳界上，一旦入睡，我就同逝去的亲人们在一起了，他们通过托梦，把灵感给我，使我产生一种压制不住的“看病”的冲动，有的时候，我面对病人说些莫名其妙的话，手在处方笺上开药，脑袋却一片空白，好像有人借我的身体替人治病。

老威：您感觉谁在您身体内？

张松：有的时候是爷爷，有的时候是爹，但很多时候弄不清楚是谁。也许您不信，我常常自己给自己开药方，抓药。我的药都不煎不熬，我到坟地里兜一圈，这座坟头扯把草、那座坟尾刨点根子，就着泥土、蚯蚓什么的，一口口填

进嘴，见效得很。

老威：别人不敢这样治病吧？

张松：当然，他们得按照我开的药方，排



川西神医张松的同行胡万林。不过，张松的名气比老胡差远了。



文革中的“赤脚医生”在为贫下中农老大娘诊病。

队在我药房抓药，我雇了五个伙计，还忙不过来。我每天上午 7 点至 12 点看病，过了中午，我就疲倦了，没灵感了。

老戚：谢谢您在没灵感的时候接受我的访问。要不，我就不明白是在同人说话，还是同鬼说话。

张松：人鬼的界线本来就不分明，这就是人经常得病的原因，那些自以为健康的人，其实是病得最深的，因为不信神不信鬼，人就什么都不怕，世上没有个怕字，天下就要大乱了。人人都想发财，但国家发行钞票也是有计划的，不可能把印钞厂搬到您的家里去，人人都想当官，但国家的官帽子只有那么多，您分一顶，他分一顶，那谁来做老百姓呢？道理就这么简单；可许多人连简单的道理都不懂，搞得社会乌烟瘴气，害虫横行，病啊，没治了。

老戚：您知道胡万林吗？

张松：告诉您，如果您是小报记者，想学习司马南来搞点什么名堂的话，老子根本就不怕您，我一没偷，二没抢，三没医死过人，四没拿过别人的冤枉钱。您看看这院子周围的店铺、饭馆和旅馆，他们都是乡里乡亲，围绕着我在做生意。这几十年前，

只有我张松一家，与世隔绝，连路都长密了齐膝深的乱草，而现在，这儿有水泥路，有停车场，比公路边的小镇还漂亮，我响应邓小平的号召，与大伙共同富裕，也给国家纳了不少的税。您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老威：张老师息怒，我不是新闻记者，我没任何恶意。

张松：难说，记者什么卑鄙的勾当干不出来？前一晌，成都一家小报的记者来找新闻题材，为了试验我是否能体波诊病，他们乱写了一个姓名让我看。后来，这事登出来了，他们的用心就是要砸我的饭碗。现在的记者，与老百姓格格不入，却要做出一幅钦差大臣的样子，到处“明查暗访”，好像是公安局在破案。但报纸是越办越低级，除了广告就没看头了。因为记者太不是东西了。他们不敢惹有权有势的人，不敢报道那些有点背景的敏感的冤案和假案，也不敢为老百姓做主、呼吁，偏偏揪住没靠山的人不放。

老威：您的思想还挺活跃。

张松：您以为农民医生就没脑子？就可以任人宰割和愚弄？告诉您，柯云路和司马南的书和报道我都细细读过。

老威：您没感到末日即将来临？实话说，如果不亲自来走一趟，我也很难相信体波诊病，因为再神的医生，也不可能只看一眼某个名字就如见其人，乃至开出药方。您没练过气功吧？

张松：没有。

老威：气功和类似的“特异功能”在我国盛行过好一阵，在柯云路的书之前，关于严新就有许多报道。国家之所以后来取缔这种大规模的群众活动，是因为大师们有意造神，把正常的东西引向邪教，诈骗钱财。

张松：谁在造神？谁把严新、张洪宝吹神的？还不是记者和文人。

老威：您的药真能包医百病吗？

张松：不能。但是在我的眼里，没有绝对独立的人，我把人分成几大类，这几大类都是通过母体而来，所以，哪有突发的、偶然的病？病的来源说穿了就是人体发展到一定的时候，被外界诱发出来的潜在的变化，这种病变能通过一个人的名字看出来，我有“鬼眼”。

老威：总之有点玄，不把脉，也不介绍病情，还隔着丈把远，就能治病？

张松：古代算命先生有运气之说，据传能在早晨八、九点钟的时候，分辨出在人的印堂中变幻的七种颜色，以此类比，我也不算神。

老威：人家是算命。

张松：吉、凶、休、咎不是病变么？

老威：据说报道您的记者还专程带着您开的几十包药拜访了某著名的医学教授，这位权威专家仔细查过您的处方和每味药，认为您在下大包围，什么都弄点，吃不死人也医不了病。

张松：这种说法我不想解释，您能否在这个院子里多留几天？多问问病人？他们才最有发言权。当然，记者可以抬出专家、教授来压我这个泥腿子，但是，有几个病人能够请得起专家、教授？这些所谓的专家、教授拿着国家的津贴，住在小洋楼里，同许多官僚差不多，老百姓没钱，请不起他们，连见他们一面都很困难。我是老高中的文化底子，以前读过一些史书，知道历史上有名的医生，像扁鹊、华佗、张仲景都不是专家、教授，而是专家、教授瞧不起的游方郎中。他们一辈子都背着药袋，在民间奔波为老百姓看病，而从来不管高低贵贱，病员能否出得起钱等等。

老威：看来您很反感学院派？

张松：不敢。我生气的是他们不该与记者同流合污，借整别人来出名。其实，我除了敬神怕鬼，也没什么奇特之处，如果哪个专家、教授，特别是名牌医学院的教授能像我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扎根农村、任劳任怨地为人治病，我敢担保不出半年，他肯定成为远近闻名、万众拥戴的神医！就算我的医术臭到茅坑里去，也比他们强，因为我做到的他们做不到，甚至连想都不敢想！您问问这方圆十多里的乡亲，我收过他们诊病费没有？城里、外省，哪怕海外的病人来求医，我也是一视同仁，从挂号到抓药，平均三、四十元钱一个人。

老威：您这些话讲得实在，也许农村普遍缺医少药才是您“神”起来的最初原因？

张松：开始没觉得，后来一传十，十传百，病人从四面八方潮水一般涌来，甚至外宾也来求医了，我才意识到自己有点特异功能，当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想胡万林也没料到，柯云路会进终南山找他，为他写书，后来这书为他惹了麻烦。我认为柯云路和司马南之间，本来是文人间的笔墨官司，一个说气功好，一个说气功大师个个都是骗子；一个说他发现了什么，自己伟大得不得了，在报纸上打来打去，名气就越来越响亮，但受害的是胡万林，还有那些看病的群众。

老威：您觉得是柯云路害了胡万林？

张松：对，柯云路和司马南本来就是老冤家老对头，柯云路吹一个，司马南打一个，老柯是作家，灵感来了，不免天马行空上下五千年地玄想，并把玄想同现实混在一块，因此漏洞不少。这次遇上胡万林，就借胡万林来证明自己的一贯思路，惹翻了司马南。司马南是记者，大报小报当然要向着自己的同行，司马南的地位提高了，新闻界的地位也就提高了；司马南一腔正气，普天下记者也就个个都成了为民做主的侠客。

但问题是，司马南既然是到终南山去救人于胡万林的“水火”之中，可为什么要偷偷摸摸？报上说他怕被人指认出来，后来被胡万林的信徒们认出，挨了打，并且还跪地求饶才捡得一条命。大伙为什么这样恨记者？因为记者从某种角度上是站在群众的对立面的。当然，您可以证明，群众很愚昧、很迷信，是封建思想的受害者；您还可以证明，农村需要科学，需要科学和文明去战胜愚昧，然而，谁到深山老林去充当科学的使者？司马南说他也是苦出身，烧过窑、脱过坯，还在农场打过草、盖过房，即使千辛万苦考上大学，也是在饥饿中读完书的。他既然是劳动人民出身，又满腔热血和正气，那他为什么不回到农村、引导乡亲们发家致富？而要作为一个京城来的大记者，花一两天的功夫破除迷信？分明是自己想冒险出名。柯云路和司马南，还有两派人马搬出的大专家们，有谁敢深入偏远农村，呆上一年半载，为农民排忧解难？如果有这样的人，他不仅是神医、大师，而是救苦救难的菩萨，您让我为他为奴作马，我也愿意。中国农民，特别是未开化的农民是最老实最有情义的，胡万林在他们中间，他们觉得有责任保护他不受外来势力的伤害，他们清楚胡万林一完蛋，就没有第二个胡万林来为他们治病，您是城里人，不知道农村看病有多难！一点小病小灾，能捱就捱，如果严重了，要送医院，就得先准备几百元的押金。

老戚：听说胡万林给所有的病员用一种药？

张松：也有人这样说我，还告到县卫生局，质问上面为什么要发给我执照？因为胡万林无照行医。

老戚：今年四月，我不慎由感冒发烧引发肺炎，在一家大医院门诊室开后门，输了两星期液方有所好转。我花了两千多元治疗费，幸好没接受医生劝告住院，否则费用还要翻一番。我是单身汉，暂时没家室拖累，工作两年，才勉强生得起一场病，一般

百姓家庭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目前，国家处于转型期，一切都市场化，以前计划经济下的公费医疗看来会逐步被医疗保险制度所取代，张松先生，您认为您这种神医现象是不是转型期的产物？您是靠医疗价格低廉赢得名声吗？

张松：价格再低廉，你医不好病，人家也不会白扔钱。当然，同样的医疗效果，我收费又比医院，甚至私人诊所低几倍、十几倍。从古至今，医生的天职就是治病救人，在我们这个农业大国，大多数人在哪里？在农村。而大多数医院在哪里？在城市。毛主席是农民出生、懂得这个理，于是号召知识分子下乡，同贫下中农相结合，老人家最大的功德，就是在农村建立了赤脚医生制度，赤脚医生经过培训，懂得针灸，懂得一般的医学原理，治点常见病不成问题，并且随叫随到。那时农村没电话，许多地方不通公路，但只要有人来叫，赤脚医生马上背起药箱，连夜赶山路去治病。在那个时代，赤脚医生和乡下民办教师都象征着一种荣誉。而作为对赤脚医生的补充，县城和省市级医院也经常组织巡回下乡，检查示范就诊。而现在，商品经济，什么都说钱，穷人不仅不光荣，而且该死。更有缺德的医院，不见钱不开刀；还有为了敲榨红包，把纱布缝入病员伤口的，如果毛主席还活着，谁敢这样胡作非为？有多少杀多少。

柯云路和司马南应该把他们打笔墨官司挣的钱捐出来，建一所乡村医院，您说胡万林是个江湖骗子，现在他跑了，您就在他的根据地建一座司马南医院，并把支持你的医学专家、科学家都请进去，胡万林的信徒一定会转而鼓吹您，拥护您。

老威：假如有一天您的执照被吊销，您的处境会不会同胡万林一样？

张松：即使不准我行医，人们也会来找我，酒好不怕巷子深，正神说不邪，您说中国有多少算命先生？算命先生又有几个

领了执照的?但是,这行道最红火,只要算得准,哪怕您躲到深山老林,崇拜者也会像猎犬一般跟来,并且越传越神秘。我不想走这条路,虽然我从阴间的亲人那儿汲取灵感,但同巫医是两回事。至于胡万林,糟就糟在他把治病同造神混淆了,历代农民起义领袖都以治病显灵笼络人心,这不是造反么?而我同病员没特殊关系,不收礼金,也绝不想让柯云路之类的作家来这儿找创作素材。我胆小,希望诸位记者先生看在许多贫穷的患者需要医生的份上,放我一马。

这世道本来就够乱的,大家不要再添乱。安定团结是大局,理解万岁吧。

采访缘起

瞿曲小姐与我有数面之交，因此这次访谈是非常随意的，她边开车边说话，也许其中有不少闪光的警句，可惜行车速度较快，录音效果大受影响。

瞿曲约30岁，是成都波洋电讯工程设备公司高级职员，白领阶层，却是从底层一步步奋斗上来的。虽很讲科学，也出过国，但极其信命。她是个热心肠的神医信徒，曾志愿驱车带领许多朋友去诊病。

神医信徒瞿曲

老戚：您是怎么知道这里有神医的？

瞿曲：经人介绍。大约是91年吧，省军区的一位退休干部患了前列腺癌，多方医治无效，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找了神医。几个疗程的药吃了，没想到还真痊愈了，把这个老头惊喜得发狂，逢人便吹。当时我患了子宫肌瘤，压迫双股神经，连走路都成问题。去了几家大医院，都说必须开刀。我平生最怕开刀，加上公司正属于创业阶段，千头万绪理不清，我是挑大梁的，不能住院。在万般无奈之下，就信了老头的鼓吹，与几位朋友一起，开车去了。我下车时，下肢疼得不行，被人搀扶着来到神医跟前。

老戚：还是同所有的病员一样，不把脉、不问诊，隔着寸把远吗？

瞿曲：对，也同所有人一样检药回去，特便宜，五元一包药，一个疗程七包。我大约治了一个多月，病状消失；到医院一照片，真神了，包块居然被化掉了，于是，我也同我的介绍人一样，

逢人便大吹特吹。我们公司的董事长听了，想起他在美国波特兰市的邻居，一位开餐馆和商店的华人老太太也患有子宫肌瘤。

老威：老太太也到大陆来了吗？能不能引荐一下？

瞿曲：来了就不神了。老太太有 60 多岁，姓李，同董事长的关系特别好。这位李老太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认为开刀不吉利，而美国的医生则认为必须做手术，切除病灶。就这样，一拖再拖，瘤子也越长越大，压迫下肢，使双腿出现水肿，后来，连门也不能出了。我们董事长要为他的异国邻居做点好事，就亲自开车，拿着老太太的姓名、年龄，由我引路去找神医。张老师仔细看了，双手发抖开了药单子。

老威：你们就把处方发到美国去了？

瞿曲：不是处方，是寄药过去。

老威：美国没有中药铺吗？你们花的邮费可能比药钱高几十倍吧？

瞿曲：就这样也划算。因为美国的中药奇贵，不是一般人享受得起的。

老威：你们花了多少诊疗费？

瞿曲：前后不到 200 元，治了两、三个疗程吧，老太太就行走自如了。打越洋电话过来，激动得哭。

老威：这么说，神医的药对子宫肌瘤有特效。

瞿曲：别提美国开刀要多少钱，在中国做肌瘤切除手术也得几千、上万，还得留下疤痕。而在神医这儿，几百块钱就解决大问题。我当时想，应该酬谢一下张老师，可他两眼恍惚，像不认识我一般。

老威：后来呢？

瞿曲：后来我就充当志愿军，带了许多人到这儿看病，还为朋友们免费充当车夫。我想用这种方式报答张老师。按理我一个

知识分子不该如此迷信，但是人类的认识水平有限，在科学技术暂时无能为力的现状下，我们不妨虔诚一点。我们董事长是个有心人，他曾想替神医办护照，让他到外国显神通，给洋人也开开眼界。可是，张老师离开本乡本土就不灵了，他说自己怕城市，一见高楼大厦就犯病。

老戚：读过某报关于神医的报道吗？

瞿曲：那种地方小报您也相信？中国人嘛，什么都一窝蜂。前几年气功热，男女老幼都练，报刊杂志也大肆渲染，要宏扬中华民族的传统。后来热过了头，就有人站出来揭露，特异功能是假的，骗人的，于是，风向一转，人人都成了科学卫士。我觉得这或左或右的极端思维，都是文革余毒没肃清。孔孟之道的核心是什么？是中庸，中正之道。站在中正的立场上，就好象站在地的中心朝四面八方看，您觉得万事万物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

老戚：包括异端邪说吗？

瞿曲：今天的异端邪说，明天也许就是正统大道理。这世上最没原则的就是记者，你把一年前和一年后的报纸对照着看，会发现从前被他们吹上天的，正是眼下被他们踩入地的。他们带着搞新闻的功利目的来看神医，完全是高高在上的文明人进入蛮荒之地的劲头。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乡间神医比他们更喜欢读书，更懂得善待别人也就是善待自己的文明处世之道。他们居然没被感化？

老戚：他们不会被感化，因为他们只信眼前的、具有新闻效应的现实，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人极左极右的快餐思维正是报纸造成的。

老右派冯中慈

采访缘起

1997年8月22日上午，烈日当空，我横穿尘土飞扬的大马路，走进成都西门车站附近一个叫“杀牛巷”的地方，按门牌号码上三楼，找到了湮没无闻的老右派冯中慈先生。费了一番唇舌，终于促成这次采访。

冯先生骨瘦如材，但神清气朗，他时年65岁，其妻文馨与之同龄；老俩口育有一儿一

女，均已自立门户。

因斗室如蒸笼，采访中，我们均汗如雨下；冯先生两次脱下背心，拧出至少两茶碗汗水。我不禁劝其赤膊上阵，遭婉言谢绝。可见读书人的斯文本色不改。

值得一提的是，曾为大学团委书记的冯先生，现在与曾是国民党老军人的廖恩泽先生为邻，双方过从甚密，似乎历史中的一切都没发生过。

冯中慈：我听老友廖恩泽介绍过你的情况，可还是不明了你的来意。右派中名人不少，且经历也都非常曲折动人，你为啥不去采访呢？你是诗人，对《星星》诗刊的历史肯定清楚，白航、流沙河、石天河、白峡，这当初的四个右派编辑都健在，我建议你去采访他们。

老戚：我花了一番功夫才找到你，当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都被当作运动对象集中在牛棚或干校改造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图为秩序井然的学习会场，这也是贯穿整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特色。

然不可能空手而归。这样吧，我们随便聊聊，您愿意说到哪儿算哪儿，这不算正式采访，我也没资格对这段历史做啥评说。

冯中慈：我没啥好说的。

老威：就从《星星》诗刊说起吧，80年代初，《星星》曾开辟了一个引起争议的栏目：“星星与我”。作者都是57年受《星星》株连而当上右派的诗歌爱好者……

冯中慈：我不懂诗。

老威：但对当时的政治气候陡变还是有感触吧？我查阅了有关资料，了解到57年上半年大鸣大放的宽松环境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反思有关。苏联赫鲁晓夫上台，提倡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由此而引发的文化“解冻”也逐渐波及到我国，而一份普通诗刊的兴衰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冯中慈：你好像在背书。

老威：反右斗争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当然除了你们的回顾，我只有背书。哦，我刚才说到“星星与我”，我就是在这个栏目中，而不是在《牧马人》那样可笑的电影中，看到不少无辜右派的真实遭际。有的人仅仅因为写信给编辑部，表达了自己对某首

诗的赞许，或对某种左倾诗评的反批评，就莫名其妙地成了右派。可以说，这本不会说话的小诗刊的命运改变了许多活生生的人的命运。我们这代人，根本想象不出，还会有人为保存一套诗刊，一辈子饱经蹂躏，并且在临终时叮嘱后人：要与这套刊物同进火葬场！



1965年5月12日，黑龙江省阿城县在“四清”中召开大会，宣布将“富农分子”袁凤祥（左）和“坏分子”邓国兴（右）依法判处管制。

冯中慈：你觉得很离奇吧？但在那个时代，就太平常了。

老臧：您是有感而发吧？

冯中慈：不，我当右派与这些无关。当时我思想积极，与党组织靠得很紧，加上我是苦孩子出身，如果政治需要，我可以立

即站出来，回击右派分子的进攻。

老臧：您不是开玩笑吧？

冯中慈：我是学校团委书记，大学二年级就入了党，反右开始时，我们正准备毕业分配，我率先倡议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组织上找我谈话，甚至透露由于反

右斗争的需要，准备让我留任校刊编辑，从反动派手里夺回这个言论阵地。

老威：我明白了，您可能是左得过火，激起了众怒，于是在一致声讨下从极左滑到极右。

冯中慈：再次说明，我当右派与运动无关。现在想起来，不管在哪场运动中，我都是注定要倒霉的，只要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

老威：直说吧，您为什么当右派？

冯中慈：为了私生活。

老威：您有……作风问题？

冯中慈：你别用那种眼神看我。关于“作风”，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解释。现在的作风问题，过去就够枪毙的资格了。

老威：谁被枪毙了？

冯中慈：打个比方罢了。你这么憨厚的人，还当记者，缺了点悟性。

老威：我不是记者。你说私生活不是作风问题，又是什么问题？

冯中慈：听我讲吧，小伙子，我爱人的家庭成份不好。

老威：地主？

冯中慈：不是一般的地主，而是官僚地主。她的一个叔叔当过国民党政府的禁烟局长，在解放初期被镇压了；她的爸爸娶过一位洋学生做姨太太，因此，她的家庭包袱是很重的。在学校，她只能一门心思扑在功课上，而在个人生活中，她郁郁寡欢，没有任何朋友。这一点，恰好非常吸引我，我在集体中如鱼得水，过得太热闹了。

老威：我还是不明白您为什么当右派。您爱人在政治上与您不相配，组织出面干涉等等，我都能想到。因为我姐姐在文革期

间，曾经与一位解放军的连长谈恋爱，终因我家成份地主，社会关系复杂而告吹。这种外调内查的政审制度长期粗暴地践踏个人生活——人们已司空见惯，并且认可，因为组织是不会错的。但是，这就是你的右派依据吗？

冯中慈：对。开始我是为了做政治思想工作接近她，我发觉她与她父亲的姨太太关系很深，就一再警告她要站稳立场。后来，她一声不吭地把我带到一条深巷里，那女人正在巷尾洗衣服，长长的头发，纤细的手指，她站起来对我微笑，毫无血色的脸上有一种哀婉的美。她进了院子，就着这种哀婉的美弹了弹落满灰尘的钢琴，她似乎在有意讨好我，讨好当时的大好形势，所以弹的曲子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支已经被我们合唱得滚瓜烂熟的革命歌曲，经她那纤细的指头一弄，完全变了，发霉了，但是，你觉得那样深情，像落在深渊里的叹息。我愣住了。这一愣，后半生的命运就全改变了。我，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团委书记，怎么能够这样？阶级立场呢？我想。但是，你要我怎么样？我不可能大呼革命口号来阻止这一切发生，况且，发生了什么？人家不是在弹革命歌曲吗？

是的，我是穷孩子，我被洗过脑，可我受过高等教育，57年以前的教育，还不完全是一种干巴巴的教条。我知道什么是美和善。文馨对我说：“她对您没有恶意，否则，不会弹钢琴给您听。”

我转身走出深巷，这是我第一次领教一个没落阶级的诱惑。文馨跟在我身后又说：“她已经疯了。”我猛地站住了，这是隆冬，阴森偏僻的小巷，一抹阳光涂在低垂的屋檐，这可不像新中国的街景。文馨似乎站在一段历史的深处对我讲述她二妈的经历：“直到现在，她还爱着她的音乐教师，父亲改变不了现实，就由着她去。可惜，那位音乐教师得肺病死了。解放后，她与父

亲离了婚，千里迢迢到西安去找情人，不料已是一座荒坟等着她。两个月后，她回到成都，就一个人独居到现在。父亲早就原谅她了。他在前年去世时，立下遗嘱，承认她仍有财产继承权。”

听完这个资产阶级的动人故事，天已晚了，我和文馨跑步赶回学校。临别时我问她为什么对我讲这些？她说：“我这是向党交心嘛。你去汇报吧，没关系。”

我感到自己受了委屈，我眼泪都快出来了。我仰着头，有一种快完蛋的感觉。我已经爱上了这个姑娘，然而，这一切，可能吗？

老威：组织出面挽救您来了。

冯中慈：组织是明察秋毫的，从学校到社会，都像一张网。好在我和文馨没有过多接触。直到临近毕业，社会上政治环境较宽松，许多大知识分子都响应组织的号召，向党提意见。开头，在毛主席以身作则的表率下，各级组织还很宽容，虚心，后来，意见越提越尖锐，过激，甚至有了结束一党天下，引进西方议会民主的呼声。我至今记得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全国 100 名大右派之一的葛佩琦的“意见”——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是可疑。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这种“意见”已远远超出政府所能忍耐的“度”，但党内整风依然按部就班进行。文馨平时不吭声，也不关心政治，在我的一再动员下，就鼓起勇气提了一条意见，大概是共产党提倡民主、平等、自由，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家庭出身，都应该享有

平等的权利，但是她在校近四年，却受尽了歧视，替家庭背黑锅。入党入团没有份，刻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大家又将她视为“白专典型”。毛主席一再教导，对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只要划清界限，就要给出路嘛……

文馨发言完毕，我带头为她鼓掌，可响应的掌声稀稀拉拉，班委委员们都把脸拉得很长。我是一个机械执行党的政策的团委书记，一切都以《人民日报》社论为准，正因为这样，颇得上级领导的器重和赏识。但在这一次，在对待文馨的问题上，我平生第一次没和组织保持一致。我动员她把心里话说出来，是为了让人伙理解她，同情她，没想到结果却适得其反。在政治风浪中，我是认不清形势的瞎子，还鼓励别人去闯祸。终于在一个月后，风向陡转，毛主席公开向全国人民挑明，所谓让党外人士帮助党内整风是引蛇出洞，是为了让隐蔽很深的阶级敌人跳出来。大右派一个接一个落马，上面的风刮到下面，学校和班级就开会动员反右，组织上暗中把右派教师和学生的名额安排到各系，由大家评选。文馨的得票率在全系名列第三。党委副书记亲自到场，领导批判右派学生的现场会。我根正苗红，属重点培养对象，副书记同志为堵大家的口，反击有关我的流言蜚语，竟当众信口雌黄说：“冯中慈同志是接受了党组织的任务，去与右派学生文馨接触，引蛇出洞的。他做得很好，没有辜负毛主席‘引蛇出洞’的教导，终于将一条一声不吭，却把对新中国的仇恨埋在心底的美女蛇引了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斗争策略非常出色！所以，经校党委和团委研究，并准备报请共青团省委授予他‘杰出共青团干部’的荣誉称号。”

我气得晕头转向，文馨比我晕得更快。她呼地起立，目光转向我，脸色死灰，接着就软了下去。我不顾众目睽睽，冲过去抱起她就朝校医室跑。副书记一愣，又接着歪吹：“哪怕是对阶级

敌人，也应该讲革命的人道主义，冯中慈同志做得对！”

我还是人吗？如果我昧了良心，顺着组织为我竖起的杆子朝上爬，这辈子也许青云直上，可是，我不愿意做畜牲！不，那个龌龊的年代，做畜牲也比做人强！我不敢等文馨醒来，就神色恍惚地离开了。团委的人找到我，要开会全面复审右派，然后上报。我不假思索地拒绝在迫害文馨的意见书上签字盖章。先是那位副书记，然后是党委书记和校长都来做我的工作，要我交出校团委公章。我回答不。我明知这种抗拒如同儿戏，可还是一味蛮干。党委书记警告我：“冯中慈同志，团委不是你个人的，党培养了你这么多年，你应该明白组织原则。”我反问：“我什么时候接受了‘引蛇出洞’的任务？共产党是光明磊落的，不搞阴谋诡计。”党委书记说：“对人民是不搞阴谋诡计。”我说：“文馨是人民中的一员，她已背叛了她的家庭。”党委书记说：“你陪她去探望过她父亲的姨太太，我们早就掌握这一情况了。”我不禁一愣，说：“姨太太？那是疯子。”党委书记哈哈笑道：

“你才有些疯狂，为了一个女人，连组织原则都不要了。”我不顾一切地大叫：“组织原则不是你们用来整人的！我就是不同意把文馨打成右派，我用一个共产党员的人格担保她不是右派。”党委书记一拍桌子：“冷静点，想清楚了再说话，我最后一次叫你：‘冯中慈同志！’你的共产党员的人格就用来保护反动派吗？”我仍然犟着：“她不是反动派。”党委书记又一拍桌子：

“年轻人，被感情蒙住了眼睛，是能够理解的，但是感情也有阶级性，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懂吗？”我一时糊涂，竟吐露真言：“假如我真的爱她，又怎样？”党委书记不拍桌子了，他换了一种轻柔的语调说：“那你就选择吧，爱党，还是爱女人。”

“爱女人。”我说。于是我被开除党籍，补充成了右派兼坏分子。

老戚：当时您和文馨谈恋爱了吗。

冯中慈：没有，不过是彼此有好感而已。如果按自然发展，我不可能与文馨结合，因为我和她完全是两极世界的人。我感激共产党救了穷人，挖了穷根，送我上大学，所以，如果不是物极必反，我会听从组织的劝告，断绝哪怕是一闪的儿女私情。而文馨对我的好感没有超出同学的范围，除了我，她几乎没有一个愿意帮助她的可以称作“同学”的人。

老戚：可您还是承认了压抑已久的感情。

冯中慈：我是穷孩子，有反抗压迫的天性。解放前，我到地主院门口讨饭，他们不但不给，还放狗咬我。你猜怎么着，狗咬我，我也张口咬狗，结果还是我厉害，把狗耳朵咬缺了。那一刹那，我没想到受了剥削阶级的欺侮，只觉得这个大户太混蛋。是共产党教我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看待问题，分析问题。穷人为什么造反？阶级为什么产生？就是因为人与人不平等，不仅社会财产分配不公，而且人格也不公平。文馨是个弱女子，有那么多党员的组织，是不该欺负一个弱女子的，否则，又回到解放前了。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一部名为《在河流那边》的书中，曾引用了反右时期一位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的话说：“你难以想象这些自我批评和各种分组会议有多么痛苦。我办公室里的任何一个人，无论是送文件的小伙子，还是打扫大楼的妇女，都可以批判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傲慢劲，指责我打发闲暇时间的业余爱好，甚至在我沉默不语时，指责我默不作声。我自己只能坐在那儿，接受他们的指责。有些受批判的人宁愿自杀，也不愿意忍受这一切，我可是过了好些年才习惯了这些。……”

我记得书中的这些话，是因为这正是我和文馨在那些年的写照。许多人都为我一时冲动惋惜，我下意识地在组织、集体与个人之间，选择了个人，我应该有我的私人生活，对吗，小伙子？

而在邓小平时期以前，中国人是没有私生活的，至少是私生活见不得人的。感谢邓小平，让我们从不人不鬼的阴影里走出来。

老戚：您后悔过吗？

冯中慈：没有。开始不习惯任何人都可以批判我，因为我从前是批判别人的。后来习惯了。有了孩子，就更加习惯。穷人干革命是为了有饭吃、有衣穿、有老婆孩子，我不革命也有老婆孩子。我又不可能同组织和人民结婚，电影里常说“某某是人民养育的儿子”，人民姓什么呢，人民的奶头是什么模样呢，我没见过。道理越大越没道理。

如果我昧良心把文馨朝火坑推，那才后悔一辈子。哪怕当部长也不安稳。

老戚：你是怎样让文馨回心转意的？

冯中慈：我成了右派，反而踏实了，就写信向她表达爱慕。当时对右派看管得很严，这样也好，否则文馨会自杀的。没人捎信，我就半夜抽空子偷跑到她二妈家，把信塞进门缝，又返回。就这样捎去了五六封长信，也不知道她收到没有。后来她被发配到新疆阿克苏，我却就地安置。这不行，我千方百计打听，过了一年，才找去了。坐了火车，又坐汽车，颠沛流离，我已经成为分文不名的叫化子了。幸好到的那天，太阳暖洋洋的，她在棉花地里，皮肤晒得黑红黑红的，看来，这劳动改造有利身体健康。我当时被当作流窜犯抓了起来，因为在她们农场的西北边，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只有一条汽车路通向沙漠核心的监狱。曾经有犯人爬运南瓜的汽车逃跑，靠生吃南瓜坚持了五天五夜。我说出了文馨的名字，她被唤回住地，认了我半天，才从乱蓬蓬的毛发中弄清“她的中慈”。

下面的故事就有点平庸了。我们都是右派，很平等。我这么远去找她，既使不太满意，也只好嫁我。这一次，组织很爽快，

给她开了证明，准了假，我们一起回四川办了结婚证。又办了户口迁移证，一对黑夫妻就这样响应党的号召，欢天喜地支援边疆去了。

邓小平上台，右派平反，我们领着两个在边疆出生的孩子回了四川，虽不算衣锦还乡，也算一家人苦乐与共。这辈子就这样了，我很满足。

老威：冯老伯，谢谢你的故事，谢谢你对我们这代人的情感教育。

老地主周树德

采访缘起

我爷爷就是四川盐亭县黑坪区的老地主，逝于1988年，享年84岁。他倒田地的霉，一辈子从没走出过县境。

我对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吝啬，腊肉、花生放上七、八年，都舍不得吃。可据说借他钱的不少，均是几角、几元，人家不提还，他也不敢去讨。我一直想问他这是什么心理？现在想问也问不到了。

我的写作同行周鸣乐弥

补了我的遗憾，他爷爷周树德也是乡村地主，现年89岁，牙齿和头脑都还清楚。1998年2月3日，我与女朋友宋玉起个大早，搭长途客车，奔波几百里，终于当日下午抵达川北某县。翌日天晴，又乘车去一乡场，再步行数里，方叩访了周树德老先生。

整理录音之际，我还忍不住叹道：“全国的地主成千上万，可像周老爷子这么有趣的土老财，实属稀罕。”

老戚：老人家，您晚年有啥愿望？

周树德：愿望：我都成孤老头子了。

虽然养了三个儿子，三个姑娘，可现在一个也不在身边。他们都出息了，在外面工作。我的孙儿中数鸣乐最孝，他去年回来看过我两次。你是他的同事？

老戚：朋友。也算同行，我们都写东西。



土改工作
队长的土改笔
记。从这儿开
始，全国成千上
万的“周树德”
产生了。

冉云飞提供



生产队开会斗争“四类分子”。(李振盛 摄)

周树德：哦，文人。

老威：您这房子也太破了，鸣乐他爸也没花钱翻修？

周树德：他要我到潘家沟，跟着二姑娘，赡养费由他出。可哪个来守这祖宗地基？我一搬，就不是周家坪的人了，户口没了，地还划给别人种。您不要看这房子破，以前可是四合院。左厢房、右厢房、堂屋、耳朵房，下首的横房。我爷爷创下的基业，传给我爸，民国34年，我爸因操劳过度，撒手去了。他留下遗嘱，把田地、房产分作两份，我与我哥均分。那年鸣乐他爸



老地主周树德的“旧照”，摄于1979年，那时中国正着手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上百万地、富、反、坏、右摘帽平反彻底推翻“血统论”。周树德没想到人近暮年还扬眉吐气了一回。那天他特地刮干净胡须，穿戴了儿子的中山装和军用棉帽，面带微笑地照了这张像。

这是老地主周树德吗？分明是个土改干部。
（曾循 摄）

已大学毕业，到江西跑滩去了，三兄弟中数他最野。

我哥周树贵，是个败家子，我到了阴间，也要拉他到阎王爷跟前评理。他到了几趟县城，吃喝嫖赌不说，还染上鸦片烟。你们年轻一辈的可能不晓得，那年头若是染上鸦片烟，就完蛋了，万贯家产也经不起抽。不过一两年，他先卖地后卖房，最后典婆娘。她婆娘跳了几次堰塘，都没唤醒他的追悔之心，只好找到族长，要求分开，宁愿守活寡。族长唤了一伙保丁，把周树贵捆在树下，日晒雨淋一星期，想把他的毒瘾戒掉。可一松绳子，他就一阵烟跑到我屋里来借钱，磕头、打滚，自己抽耳光，最后撞墙，还威胁要点火把祖宗的神龛烧了。我太寒心了，就写下字据，与他断绝手足之情。他划了押，夺过我手上的十个银元就不见了。你想想，这样的人哪配活在世上！连族长那样的善人，最后也逼得召集全村乡亲，宣告周树贵

已不是本乡人，如果他的狗腿胆敢踏进本上一步，立即打断。

为了挣回面子，我起早贪黑，外出贩盐，我婆娘身怀六甲，还同长工一道下田。我发誓要把周树贵败掉的产业重新买回来，创业难，守业也不易。好在他的婆娘儿女都很争气，所以，我在民国 37 年把他的欠账还清后，仍然把她们娘儿三个从娘家接回，住右厢房。眼见一大家子，各有其所，六畜兴旺，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忙早晚上香，托祖宗的荫福。

不料好景不长，解放了。50 年县里的土改工作组进村，我被划成地主。村里有五、六个地主，而族长和保长都是恶霸地主，被押到乡里开完忆苦思甜的斗争会，就镇压了。我，鸣乐他奶奶，还有地主、富农一大串，都陪了杀场，那是我半生第一次被五花大绑。唉，我也是读过私塾的，懂得孔孟之道，积德行善。我从不坑人害人，可过去你敬我让的乡里乡亲，这时都变了脸，指指戳戳地斗争我。我家的两个长工，都当了贫协的委员。领着工作组上我家登记田地、房产、牲畜，地契、房契全被搜走了，这两个家贼，我一向待他们不薄。

当然，天下大形势就是富人遭殃，穷人翻身作主，想通了，也没啥，因为被瓜分掉财产的又不是我一家，改朝换代嘛，只要保住命，还来日方长。所以我劝住老婆，莫寻短见；至于儿子，都大了，要与亲娘老子划清界限也好，远走高飞参加工作也罢，都随便，土改到了后期，组长还找我谈过话，表扬我态度积极，能配合政府。我心里肉疼，但只有点头哈腰的份。最让我想不通的，是我哥周树贵，那个败家子，居然成了贫农！当然，不管他怎样变成穷光蛋的，解放初期他的确沿街乞讨，唱莲花落了。若不是共产党，他早被饿死了。现在，天地翻了个，他在上我在下，他竟上台斗我，扇我耳光，骂我猪狗不如，不仅夺了他的地，还霸占了他的婆娘和儿女。真是活天冤枉啊，全村人

都晓得是我周树德念手脚之情，积德行善，替他白白地供养妻儿老小，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明公道话！我被气昏了，醒来的时候，四合院已搬进了四家人，我们一大家子，都被赶进耳朵房，还好，堂屋没拆，还可以偷着烧香。可周树贵占了右厢房三大间屋，一下子又有房有地有家室，成阔人了。哪个想得到，一个鸦片烟鬼竟时来运转！

我一见他在院子里转悠，心里就堵得慌，但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天长日久，也就认命了。私底下碰见，周树贵常问：“德娃子，你当了一辈子的牛，守住祖宗基业了？”我回答：“我是地主，你是贫农，要划清阶级界限哟。”他说：“屁，我的江山可是一杆烟枪打来的，若不是鸦片，你我都没有好下场。”

老威：你哥对你“忆苦思甜”呢。看来，要在农村找三代贫农不太容易。

周树德：败家是转眼的事，而兴家则要看某一辈里出没出能人，田产都是几分、半亩慢慢积攒来的，要攒几十上百亩田地，弄不好会花几十年的光阴，甚至几辈人的心血。可家败如山倒，说没就没了。所以，在乡下找三代穷人容易，要找三代大户才不容易。

老威：以后的日子您怎么过的？

周树德：全国有那么多地富反坏右，他们怎么过，我就怎么过。土改工作组一撤，我就一直住现在这房子。祸从口出，只要少说话，本乡人也不会太为难你。过去，这院里安有一个喇叭，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招集我们开会训话，20多名坏蛋，周围有十多名基干民兵监视。你看我坐的这只小板凳，土改那年钉的，多结实，屁股在上头磨了47年，面子蹭得比石板还滑。你看，还能照出人影子，我坐着，两只膝盖能夹住下巴。小的运动，在村里开两三次会就行了，运动搞大了，基干民兵就要押着我们，

走十几里山路，到公社开会，好几万人的场面，台上坐两排领导，台下站着一窝地富反坏右，上百名，一站就是好几个钟点。每个领导讲话都很长，国际国内大好形势，中央精神的贯彻，再到省里县里，最后到公社，到具体的生产、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会，有时得开三天，天不见亮就起床做饭，烧包谷粑，尽量吃饱点，然后揣几个包谷粑坐在门坎上等广播通知，这样出门，天擦黑才回来，只要不点汽灯开“火把会议”，就算烧了高香了。五几年，我40多岁，长期肩挑背磨，身板结实，随便罚多久的站，我眼都不眨，随着岁数一天天高，腰就不行啦，一天天埋下去，幸好到了七几年，运动搞水了，押我们到公社的次数就少了，即使去，也允许幕间休息和解手，有时也允许坐着开，大伙对地主的态度，也好了许多，也敢来串门了，乡里乡亲嘛，山不转水转，风水几十年，也有转回来的时候。

老威：小时候，学校里常请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代表对孩子们“忆苦思甜”，还吃忆苦饭，特别是参观大邑恶霸地主刘文彩的收租院后，受到了震动，我们都恨地主，恨剥削，不愿回到旧社会去吃二遍苦，受二道罪，您觉得我们这种阶级立场咋样？您是否想复辟，回到解放前？

周树德：你是明白人，何必用阶级斗争来蒙我？早过时了。我79年被摘去地主帽子，我感激邓小平，感激共产党的改革开放，给了我第二次做人的机会。有错必纠嘛。当然，我没那么大口气，不敢说共产党有错必纠，我是说我有错必纠。现在，我们的生活那点不比解放前的地主强？有电灯、电视，肉随便吃，人上了点岁数，就只呆在家做点手工活，这在旧社会不可能，电灯、电视不提了，肉是一星期吃一回，鸣乐告诉我，监狱的犯人一星期也吃两回肉。我爷我爸，全是泥腿子，六、七十岁，还与长工一道下田，有时牛累吐血了，人就接着拉，就这样挣来的家

产，还不如现在出去的打工仔、打工妹，两手空空出乡几年，就衣锦还乡，变戏法一般，要起新房了。若按土改时的标准，村里一半人都是地主富农。鸣乐他爸在省城教书，鸣乐这娃儿上了大学，听说还是博士，过去整个县城都没听说有博士。私塾先生说，胡适是博士，连皇上都接见过他，向他请教问题，你想博士的学问有多大。真是祖先修来的福。我小孙儿是博士，住在北京，说不定，中央领导也经常向他请教问题，康有为说，海内一家嘛。

至于“忆苦思甜”，吃忆苦饭，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都想通了。古人云：“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一个老糊涂，别无能耐，就帮儿孙把罪受了。开始，我的两个长工上台控诉我剥削他们，寒冬腊月逼他们下地，工钱也克扣了。我心里不服，因为我也与他们一道下地，新社会也没说冬天就不上班。渐渐，我想通了，这是命，这天下就是由好人和坏人组成，既使做不了好人，就只好朝坏蛋堆里靠。既使我这个小小地主不想坏了，早就没有变天账了，但是，上面还有，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时刻存在。比如高岗，比如彭德怀，比如刘少奇，比如林彪、四人帮，我都做过他们的孝子贤孙。你不要笑，文化大革命中，就有“打倒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周树德”的口号。我都不认得这些伟人，却攀上了亲戚，我还与邓小平攀过亲戚，他为我们摘了帽，别说孝子贤孙，就是做牛做马，我也情愿。

老戚：龙门阵摆到这会儿，我晓得您老人家心胸开阔，知命知足，难怪能享高寿。

周树德：我今年 89 岁，早活腻了，可咋办，越想死越死不了。堂房里那口柏木棺材，放了 20 多年，我还死不了。这已经是第三口棺材啦，前面两口，被白蚂蚁蛀了，棺材都死了我还不死。风水先生来看过好几遍，连夸我这边的地势好，耳朵房正处

在东南角，把西北的风水全盖了，所以我周树德一脉，虽然被划成地主，劫数几十年，但终有时来运转，这鸿运不应在我这老不死身上，也当应在儿孙辈身上。鸣乐那孩子，因为成份不好，参军招工都不准，还偷偷哭过好几回，可79年我一摘帽，他就考上大学，双喜临门，不比当兵当工人强十倍。其它孙儿孙女也不错，都吃皇粮，告诉你，我的重孙子都读小学了。

老戚：您就更应该多活几年，享享清福。

周树德：你都看见了，这座四合院只剩下我一人了，其它人死的死，搬的搬。好像我在东南角把阳寿占尽了，另外四家的男丁全没迈过50岁，你不信？20多年前，那半边院子就是满门寡妇啦，为首的就是我嫂子。我哥周树贵，我婆娘周王氏都死在自然灾害，不能说是报应，因为死者为大，哪怕周树贵是冤家对头。

老戚：您还是应该跟儿孙住一起，有个照应。

周树德：鸣乐他爸接我到省城住过两个月，我憋出病来了。他是中学老师，挺受尊敬，我一个乡下老头，在高楼下住不惯，鸽子笼一般，还不能随便下楼透气，因为一大帮中学生会嘻嘻哈哈围上来参观。有一回，我坐在篮球架下面晒太阳，刚拉开裤裆捉虱子，就听见周围惊叫呐喊，若在农村，哪个管这个？可在学校，周老师的爸咋能当众捉虱子？还有我抽的叶子烟，儿媳她们也闻不惯，弄得我抽烟还得下楼。唉，大城市的规矩太多，上街入茅坑也得花钱，哪象乡下方便自由，拉泡屎在院子里，第二天早晨一看，没有了，野狗舔得干干净净。

我一直与鸣乐他们赌气，几个小辈一直缠着他们爸妈，要拆这四合院，对，这已经不叫四合院了，三面都塌了，我住的这面，柱子里全是白蚂蚁，晚上能听见扎扎的声音。开始听的时候，我的皮都麻了，慢慢就习惯了。这房子正在变轻，说不定哪

天就全塌了，可地基是石头夯的，柱不坏，堂屋前这对石狮子，脑壳都被我摸光了，这是百年老宅，小辈们不晓得，一搬家就要我的命，再好的房子有啥用？

老威：没想到您还这么固执。这大概是做了几十年地主，被管制，逆来顺受够了，现在要自由。

周树德：对，我最烦人管我，儿孙们回老家，都不敢住这院子；害怕跳蚤。我养着猫，先是一对，后来就好几窝，这畜牲喜欢上床，挨人睡。人老了，一夜到亮，身子总是凉的，全靠它们给我取暖，赶耗子。我经常同它们说说话，说我们这辈人的话。前年，周树中死了，他比我大两岁，经常到院子里来，摆摆旧，现在没有人摆旧了，只有养猫，它们说不定是死去的人变的。冬天，它们钻被窝，呼噜打成一片，使我想起年轻时贩盐住店，一张通铺摆十几个人。

老威：猫会传染病菌的。

周树德：我的病菌比猫还多。

老威：嘿嘿，是这话。不过，这房顶太漏，好些地面积着水呢。

周树德：只要床这块不漏雨就行了。

老威：您对生活的要求这样简单？难怪您长寿。

周树德：像我这样，死活也没啥区别。

老威：您不像个地主，倒象个守破庙的和尚。

周树德：您觉得地主应该咋样？

老威：应该有变天账呀，小学课本里就这么写的。

周树德：您在开玩笑。不过，破庙也守不了几年了，村里人常常借故到我这儿来要东西，我编的背架子，蝈蝈笼，蓑衣，斗笠等等，我的碗筷也有人偷。按迷信的说法，长寿的人死了，参加丧礼的会将他的生活用品带回家给孩子用，以添福添寿，可我

还没死，人们就等不及了。

老威：您是个风趣的老人，我和鸣乐还是希望你搬进城，当然，到潘家沟他姨家也不错，社会进步了，生活改善了，到处都有长寿老人嘛，打打太极拳、钓鱼，猫狗也哪里都能养，您试一试与别人交往，不一定就合不来，说不定，您的故事有许多人喜欢听。

周树德：我的棺材放哪儿呢？

老威：城里时兴火葬，您老不用带棺材。

周树德：烧成灰？那不行，魂就没法还了。实话告诉你，我的坟地都选好了，就在鸣乐他奶旁边，我留有空穴，好去处，风水先生看过，它正处在来凤山的尾巴上，所谓“龙头凤尾”，地脉旺着呢。我没功夫与城里人扯谈，我活得踏实，或许等大家都到了阴间，就该我向他们“忆苦思甜”了——现在一想到死，我就乐哈哈的，就觉得这地主没白当。为儿孙造福嘛，听说现在又可以买房买地了，地主又多起来了。

老威：您认为会再一次划阶级成份吗？

周树德：你们这一辈人的事，大晓得。

老红卫兵刘卫东

采访缘起

算起来，老刘也属于中国最早的一批红卫兵，造过反，串过连，下过乡，哪个时代的时髦都赶过。可惜地处边缘，这辈子注定进入不了主流社会。

而今，老刘面临下岗，“这又是一趟时髦！”他冲我苦笑。

老刘的愤世嫉俗源于历

史的刻痕，他对毛主席有深厚的感情，由此我担心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民间仍有群众基础。虽然知识分子们为否定十年浩劫至今不遗余力。

这次采访是2000年6月30日下午在我家进行的，当时老刘通过熟人介绍，找我打听自己适合干什么“第二职业”？

老戚：关于文革的历史，现在出了很多种书，您怎么看？

刘卫东：我根本没看。书价太贵，买不起。即使买得起，也没时间、没心情去看。这几年，我们厂大半职工都陆陆续续地下岗，每人每月拿两百来块钱。我在劳资科，没下岗，但也一天不如一天。听说某个私人老板正在与厂里谈判，要廉价收购，铲平那片几十年的老厂区，盖商品房，说不定明天早上醒来，我也接到通知：永远下岗。根据土政策，像我这

种78年进厂的老资格，能一次性地拿到3万5到4万。这点钱，我与老婆一点都不敢挥霍，得存进来给刚上高中的儿子，他一年读书的费用就要1万多。万一考上大学……算了，不敢往下想，这辈子就这样洗白了。49岁的人，在修理厂的岗位又是车工，要重新开始？太难了。

老戚：是很难，但付出代价的又不是你一个人。

刘卫东：是啊，经历过文革的这批人，现在大多数都上有老、下有小，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哪来读书的闲情？80年代初，伤痕文学盛行，还要买杂志看，以后，再也没买过啥书，偶尔路过街边的书报亭，就停下来顺手翻翻，由于心里没想到头，也就不敢翻久了，怕遭人家白眼。我老婆倒慷慨，可都是买儿子瞎要的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成电视剧，实在没啥看头，连保尔都假得厉害，可儿子一吵，老婆就背着我给他买小说看。她说我们是夹缝里长大的，吃时代的亏，不能让下一代也在缝里扁着长。唉，一本老小说换个包装，就几十块钱，老婆卖小百货，这几十块就是她两、三天的利润。

老戚：您能给我谈谈文革中的经历么？

刘卫东：经历太复杂了，不晓得从何说起。

老戚：您是什么时候参加红卫兵组织的？

刘卫东：1966年夏天吧，具体的日期记不清了。

当时四川有名的红卫兵组织有川大八·二六，红卫兵成都部队；还有重庆反到底，重大八·一五，您属于哪一派？

刘卫东：我参加的是二·四革命造反军。您可能不晓得，因为这是个县级造反组织，它的观点与川大八·二六一致。

老戚：好像书里没有记载。

刘卫东：书上记载的都是大地方，像北京、上海、广州，一有响动，具有全国性的影响。成都也有影响，但属于野史外

传。再往下，造反组织多如牛毛，就有点闹农民起义的味道。不过二·四造反军在当时名声还算响的，我敢说，除了中江县的保守组织继光兵团（兵团司令为抗美援朝壮烈牺牲的英雄黄继光的母亲），就数盐亭县的二·四军了。

老威：二·四军有对立面么？

刘卫东：东方红兵团，这是个先保皇后造反的投机派别，后来被红卫兵成都部队收编。

老威：什么叫“先保皇后造反”？

刘卫东：文革初期，学校里刚有不安分的苗头，刘邓路线的工作组就进来了。

工作组驻校，依靠的

是党团组织，对蠢蠢欲动、串连造反的老师和学生实行审查，其中也包括反右、四清等历次运动中的专政对象。当时我16岁，也被审查，现在看起来都是鸡毛蒜皮

“造反有理”。



的事：不守纪律、顶撞师长、与家庭成分不好的女生划不清界线等等。本来派工作组蹲点整风是我们党从延安时期延续下来一贯方式，非常灵验，几乎都能收到立竿

见影的效果，但在中学生中也搞人人过关，就过分了。还有什么“老子英雄儿子好汉，老子反动儿子混蛋；谁要革命就跟着毛主席，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就更过分，血统论，骂娘，大约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山高路险何足惧，笑别京城众亲人。

老戚：据史料记载，中央派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其本意还是平息乱子，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因为从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来看，社会动乱最初的导火索往往是学校。

刘卫东：在当时人们的意识里，工作组就象征着政治运动，一搞运动，专政的对象，牛鬼蛇神都纷纷出笼。今天

咱俩是同志，说不定明天就“你死我活”，人民内部矛盾随时可转化为敌我矛盾。工作组是钦差大臣，想宰谁就宰，而根正苗红的学生干部也大大发挥作用，成天帮助这个帮助那个，其实就是没事找事，换个套让你钻。只要你向党交心，吐露真言，刀把子就握在别人手里。在五七年反右中，这叫阴谋，“引蛇出洞”，后来的大小运动，“引蛇出洞”就成模式了——反党定时炸弹就这样培养出来的。对此，大伙都心有余悸。像我们这一代人，营养不良，身体发育晚，可政治上却成熟得早，父母经常用亲身经历的血的教训来敲警钟：这辈子只能一颗红心，向党靠拢，否则死路一条。

老戚：工作组就是党？

刘卫东：绝对是，几十年一惯制，天大的委屈也只能咽下去，所以蹲点审查(叫党领导下的文化大革命)没多久，学生中的坏头头一揪出来，学校就恢复上课了。学校间的“煽风点火”也中断了，贴出的大字报也都是保皇观点。这咋行？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

老戚：你赞成文革？

刘卫东：赞成就是开历史倒车，这点常识我懂。但有人把文革的根源归罪于个人崇拜，我觉得片面。我们为啥崇拜毛主席？因为他老人家这次站在工作组的对立面，他在《炮打司令部》中数落的“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等快语，完全说到受排挤、压制、甚至专政的学生们的心里去了。既然有毛主席撑腰，就反他娘的。工作组、党、团领导整人整成了官僚，就是这批基层官僚，一贯瞒上欺下，动不动就上纲上线，61、62年，明明成片饿死人，还向上虚报成绩，称形势一片大好。唉，你太小，不晓得那时人们对工作组，对官僚主义都憋着一肚子火，毛主席在发动文革

前，到各地考察，可能也意识到党的改造迫在眉睫。

文革一夕之间就满山红遍，工作组被撵跑，斗争的矛头直指党委，二·四革命造反军领风气之先，与之对立，过去围着党委转的学生干部也弄了个“东方红兵团”，装模作样地造反。嘿，各单位都在成立组织，审查机关早瘫痪了，所以用不着登记、批准，只要聚几个人，开个会，刻个章，把红袖章一戴，扯一面红旗上街，就登场了。盐亭小小的一个县，可能几天就成立了上百组织。太热闹了，过节一样。

老戚：这么多组织谁来管理？

刘卫东：没人管理，县委已经被攻占了，书记县长被捉拿。万人斗争大会那天，盐中的操场山呼海啸，每个组织的红旗都在招展。县委一班人，文教局一班人，盐中的白校长，还有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军警宪特、牛鬼蛇神都戴高帽、挂黑牌，被押上审判台，批斗了一上午，下午又接着游街。围观群众呼口号，吐口水，扔石块，打得走资派满脸淌血，还有些娃娃用竹竿追着抽，大伙都疯狂，把对毛主席的爱与对敌人的恨结合在一块了。你想，县长县委书记，平常谁能见上一面？高高在上的父母官啊，但现在，有毛主席为群众打气，就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了。

老戚：整人就这么令你们兴奋？

刘卫东：不仅兴奋，而且高烧。这是历次政治运动栽培出来的。不同的是，过去大家是在组织的监督下背靠背地揭发，当运动员，可现在却倒过来，群起整过去运动大家的当权派，打死打伤不负责。就像在街上捉住小偷，不管丢没丢东西，你都想去施展拳脚。法不治众，越狠越能逞英雄。我当时站在台上，负责揪斗白校长，大家一呼口号，我就与另一个红卫兵一起把那颗白发苍苍的头朝下按。白校长戴的高帽中，还加了铁丝与铅块，帽

檐都陷进头皮了，我们还感觉不解恨。没几天，白校长就感觉受不了，整夜呻吟不止。有个半夜，他去解手，我守在厕所外，20多分钟仍不见动静，就进去查看，没人。我慌了手脚，忙报告总部。大批人马把茅坑搅了个底朝天，刚刚排除了自杀的可能，准备出通辑令时，有人报告，水井里有情况。我们用带钩的扯水竿子鼓捣了个把钟头，没结果。司令就派我下去“将功补过”。

我沿井壁下溜十多米，用手电一照，死人脸朝下泡在水中，我的毛根子汪地炸了，满耳朵都是狗叫，我急忙把铁钩搭上那衣领，自己吼着先上。不料刚把死人吊到一半，衣领豁了。那东西轰地栽回去，像深水炸弹。我只好再次下井，拿绳胡乱绕了好多道，弄扎实了。白校长终于露面，浑身青一块紫一块，脖子勒着根裤带。人家是几代书香门弟，就他背叛了家庭，在上大学时参加了地下党。毕业后被指派回乡，利用教书先生的职业作掩护为革命工作，解放后，他一直勤勤恳恳地当中学校长，埋头教学，错过了许多升迁机会。

这是一桩轰动一时的谜案，谁也说不清他是咋瞒过监管人员溜出厕所。况且上吊与投井，人只能选择其一种自杀方式。有人谋害？可当时的白校长已成过街老鼠，谁会去悄悄谋害他？

老戚：白校长是在你的眼皮下失踪的，公安局没调查你？

刘卫东：我的确说不清。不过文革的大形势这样，我写个材料，上面就定性为“畏罪自杀”。文革嘛，就是学生打老师，群众打领导的运动。连小学生都动员起来，剃女老师的阴阳头，所以某个单位的走资派一旦死了，就白死。某个区的中学校长原是农业专家，一年四季领导学生们半农半读，把校园变成了花果山。被县文教局评为典型，年年都有参观团上那儿去，不愧为世外桃源。不料文革一起，学生们摔了粪桶造反，把勤劳勇敢的走资派校长从果园揪出来，天天斗，每个学生都上台控诉。然后，

红卫兵头头就天天押着校长沿田埂跑步，不管刮风下雨出太阳，都喊着“一二三四”的军训口令，一直持续了将近半年。终于有一天，校长一头栽进稻田，就再也没爬起来。走资派这么快就见阎王，学生们感到遗憾，就把尸体支起来，开了个全校批判大会，再向上汇报。那时公安局从半瘫痪到全瘫痪，都是泥菩萨，谁为走资派立案调查，就是阶级立场问题。那年月，大伙一有机会就发泄积怨，就连小娃娃也经常扛着红缨枪，在街上拦着行人背《毛主席语录》，一旦有谁背错个把字，娃娃们就用枪头戳着你，勒令再背十条，若再错，就是对伟大领袖的感情立场问题，我在红卫兵总部，经常处理被娃娃们押送来的罪人，记下单位，勒令写检查，如果抵赖，说不定还要吃耳光，挨皮带，自己写检讨张贴出去，最后才通知你单位的造反组织来领人。

老威：这种红卫兵运动有点类似纳粹排犹或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

刘卫东：你有点危言耸听，其实斗走资派到后来也没劲了，人家啥罪都认，啥事都交待，很快就成了靠边站的死老虎。倒是东方红的势力不小，保皇卖乖，两头都占，还与二·四争夺胜利果实。两大派从文斗到武斗，最后升级到真枪真炮。不过东方红在人民群众中的名声臭，最终还是“失道寡助”，被二·四从盐亭县境彻底清洗出去。

活人斗垮了，红卫兵就响应领袖号召，“破四旧，立四新”，把红旗插向散布封建迷信的庙宇，盐亭虽是小县，但大大小小的庙太多，刻在石头上的菩萨更数不过来。庙好办，几钢钎把泥胎捣了，或直接把佛头敲下来，再乱砸一气，这比抄家工作量大，但比抄家简单，用不着登记反动书籍、信件、日记，作为被抄者的罪证。

刻在悬崖上的菩萨不好破，就从上面吊绳子拴人下去打，或

用凿子，或绑炸药，弄完后，再刷上超级大标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最新鲜的是一所大庙里的和尚也造反，揪斗方丈和主持。红卫兵派了几十个战士到场助阵。小和尚们扯下封建主义的袈裟，也弄了身军装穿上，可惜没军帽，光着脑壳，呲牙裂嘴，像山上的棒老二。他们拽下老和尚的念珠，挂上黑牌，挨个声讨老和尚不准他们革命，只准念经学佛的罪行。一个小沙弥下山请了张毛主席像，要挂在大殿中，方丈更是不准，还说毛主席是俗人的神。小沙弥说到激愤处，竟挽起袖子扇了他师父一耳光，振臂高呼：“打倒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张和尚！刘尼姑是刘邓路线的小老婆！消灭封建迷信释迦牟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老威：这叫造反？公报私仇嘛，乱七八糟。

刘卫东：我们还必须绷着脸，想笑，用咳嗽掩护过去就完了。

老威：革命已经发展得如此荒唐，您就没怀疑过？

刘卫东：像我这种平民子弟，能在风口浪尖上这么威风，连感激都来不及，林副统帅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老威：毛主席也没说让小和尚造老和尚的反。

刘卫东：造反是时代最强音，“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老威：不愧是红卫兵，“最高指示”张口就来。

刘卫东：我的青春、梦想、狂热与浪漫，都与文革有关。不管您怎么看，至少在文革初期的一到两年里，人民是享有充分的自由，甚至绝对的自由。不自由的，受压的是走资派，是高干子弟，是特权阶层，他们平时高高在上，漠视民间的疾苦，今天，与以往任何政治运动都相反，世界翻过来，让他们也尝尝专政的

滋味。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八次接见上百万的红卫兵，这在世界共运史上都史无前例。我也在红海洋里，跟着大伙一起欢呼、流泪，我们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挥着帽子，喊：“人民万岁！”真是人民与领袖心灵相通的时代，我们整整欢呼了几个小时，不停地跳，不停地挥红宝书，要是在平常，早晕倒了，然而此时此刻，连身体最弱的女同学都一直兴奋着，嗓子都喊哑了，冒烟了。过后，许多人好几天说不出话来，真的，嗓子出不了一点声。可多幸福，大家早晨起床，互相点头，微笑，心有默契地继续串连，像一群口含蜜糖的哑巴。也许，我们一生，就是为了那一天，那一刻而活着。

老戚：现在还有圣徒的感觉么？

刘卫东：我为啥要否定自己的过去？否定那段历史？

老戚：请别误会。

刘卫东：我这辈子没剩下什么，除了文革，值得回忆的还有啥子？

老戚：我理解，您继续回忆，我在听。

刘卫东：我参加大串连就两个目的，一个是搜集毛主席像章，一个是亲眼见毛主席。我们组成一个红卫兵长征队，先到成都，住接待站，凭介绍信，免费吃住，还按人头分发毛主席像章。为了多要像章，我们就虚报人数，多跑接待站，然后到成都剧场门外。那儿成天人山人海，既是观点不同的造反派别的辩论阵地，又是交换毛主席像章的集贸市场，什么样式都有，我们在里面泡了个把星期，开了眼界，结识了不少新战友。因为串连的长征队铺天盖地，各接待站招架不住，连电影院剧院的舞台都腾出来了。那年头，人民币几乎都作废了，凭介绍信，完全能跑遍全国。

我们等了若干天上京列车，太挤，根本上不去。最后，只好

约了大群新老战友，一顿冲锋，终于从车窗进去了。这哪是装人的，纯粹就是装鱼的罐头，人人背贴背，连出气都困难。但熬也要熬到北京！已经9月了，老是听说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再晚就彻底没希望。

火车跑跑停停，也没个到站时间，像开着玩。每停一站，都要经受一次考验，人肉是软的，挤一挤，靠一靠，能多装就尽量多装。他妈我要是石头就好了，占了地盘就纹丝不动，没弹性，挤不坏。尽量少喝水，因为厕所绝对上不了。女同志怎么方便我不清楚，总之男同胞憋急了就掏家伙对窗外扫射，还得事先招呼领座关窗，以免“飞尿伤人”。有个娃娃脸的红卫兵憋不住大便，钻了半个钟头也到不了厕所，只好向靠窗的战友一个接一个行军礼，于是很多人道主义手臂托住他，让他站上茶桌，把不争气的屁股塞出窗外，拉了一泡极丢脸的屎。大伙轰笑着，女战士们忙把脸转开。非常时期，都是革命战友，谁也不会取笑谁。

也许您不相信，现在两天的上京路，那时要走五六天。我一天一顿饭，憋屎憋尿，拢北京时，膀胱都出毛病了，胀得要命，可站在便槽老半天，就不出尿。经过一番挣扎，那儿像藏了根烧红的针，出尿时滋滋地响，浑身都湿透了。

接见那天，我们半夜3点就起床，出发去天安门，但就这样也晚了，四点多钟，长安街两头就封住，根本进不去，我们绕道前门，听从指挥，随大流从纪念碑右侧进入广场，月儿高挂，与华灯辉映，一望无垠的绿军装与红旗……我相信，在场的每个人都为能生在毛泽东时代而骄傲。

后来的情景我刚才讲了。人是应该有种信仰的，信仰使人变得纯洁，勇于献身。

老威：所以有了规模空前的武斗，两派热血战士都为了信仰而拼得你死我活，有的父子、夫妻也因派性而反目，兵戎相见。

刘卫东：总比现在为了一点钱而拼得你死我活强。少女为了钱，可以去当三陪；贪官为了钱，不惜以身试法，用老百姓的社保基金去作私人交易；儿子为了钱，甚至可以勒死老母亲。有信仰的乱跟没信仰的乱是两回事。两派武斗，部队支左，全国开锅了，谁平息得了？毛主席一声号令，哪个敢不交枪？盐亭是全川第一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县，成立大会那天，县城有83万人马，你想象得到一个总人口不足十万的小城，能装下这么多人？可咋样？就装下了，生活照常运转，因为有五湖四海的支援。我记得毛主席发表“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那阵，我们正在挖断通往富驿的公路，埋地雷，以防东方红借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兵力卷土重来。但最高指示一下，我们马上填平深坑，撤掉路障，放下了武器。

老威：据我所知，许多当年的造反派头目都在利用各方面的老关系，做大生意，像川大八·二六政委江某某，工人造反兵团司令邓某某，重庆反到底的邹某某，重庆八一五的黄某某，当年都是省革委常委，受过江青的接见，即使坐牢也效忠四人帮。可出狱没几年，就彻底改头换面，融入经济大潮了。他们中生意做得最火的，要数红成司令蔡某某，盖了整幢大楼，据说是本市最高的建筑物，还开了一所民办大学。

刘卫东：他们发财跟我有啥相干？

老威：向您提供一点信息，仅此而已。老刘，您晓得作家张承志么？

刘向东：不晓得。

老威：联动呢？

刘向东：晓得，北京的贵族红卫兵嘛。

老威：红卫兵这个称呼据说是张承志发明的。

刘向东：你晓得的还不少，可惜有些势利，眼皮朝上不朝

下。说好红卫兵最终的目标是传播毛泽东思想，解放全人类，可这些风云人物，发达了，连广大落难的老红卫兵兄弟也不来解救，我三、四万元了结一生，说惨也不惨。老红卫兵都当知青去了，据说现在还有许多没返城的，陷在农村，被社会遗忘了。前段时间的电视里，还播了某个茶场的知青扎根至今的现状，破屋烂衣狗食，比叫化子不如。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回到故乡，拿城市户口，吃商品粮。

采访缘起

1994年9月2日，我随女朋友宋玉回了一趟江油，在去风景名胜窦团山游玩途中，经人介绍，认识了年近古稀的李长庚先生。

李长庚

祖籍河南，虽离乡背井多年，但仍依稀残留着中原的尾音，他身板硬朗，比一般的四川人要高半个头，他说吹唢呐是一种力气活。

李长庚的黄金时期早过了，但他还凭着一股拗劲要跟上时代。这种传统精神令人心酸。

吹鼓手兼 嚎丧者李长庚



小城镇的送葬队伍，吹鼓手作为一种逐渐消亡的职业，暂时还能派上用场。
(黄峰 摄)

老戚：老人家，您做这行多久了？

李长庚：47年了，我18岁就已经是方圆几十里出名的吹鼓手了。以后断断续续干了这些年，为乡里乡亲操办红白喜事。改革开放以后，我又时来运转，红火过一阵，可现在，人们讲究新事新办，请我吹唢呐的人家越来越稀少。

老戚：咋会呢？您这行当是永远不

会失业的。

李长庚：原先我也这么想，可时代不同了，城里刮什么时髦风，乡下很快就会下什么时髦雨，年轻人看多了香港的录像，就跟里面学。当然，农村没举行西式婚礼的条件，但至少可以免去花轿坐花车，一个电话打到江油，披红戴绿的轿车队就租来了，那排场，比吹吹打打迎娶的旧俗要风光多了。



清末民初的北京城外。战火连年，哀鸿遍野。那是吹鼓手的黄金时期。

老威：拜堂呢？拜堂还是要唢呐闹一闹吧。

李长庚：移风易俗嘛，许多地方不拜堂了。搞婚宴时，就顺便推举一个节目

主持人，笑一笑，闹一闹，父母、亲戚、朋友都可以上台讲，学学做领导。

老威：也不完全是这样，结婚请吹鼓手的人家肯定有，只是不太时兴而已。可办丧事呢？灵堂辞亲、孝子开路、夜半招魂都离不了唢呐，因为这种乐器悲调比喜

调更动听。小时候我在农村呆过，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李长庚：先生您是内行，可不太懂市场经济。我们这个乡，离江油才 20 多公里，交通又方便，哪家死了人，只需打个电话，搭灵棚的班子一会儿就赶来了，包括租花圈，请乐队请歌星、送葬开路……一条龙服务。死人也是热闹的事，过去要请和尚念经做道场，吹鼓手陪伴孝子；现在兴开音乐晚会，大唱通俗歌，亲戚朋友也争着为死者点歌。通俗歌曲内容五花八门，只要歌星出口时随便改改词，就赢得满堂彩了。至于送葬，也用不着孝子扶棺，有车队呢，有西洋管乐队呢，大喇叭一放，十里开外都晓得死人了。

老威：既然形势这样严峻，您的生计咋办呢？

李长庚：只有远离城市，到山里面乱撞找活儿。这很难，因为谁家的红白喜事，也不会先打招呼。唉，人老了，出趟门也不容易。

老威：您没收徒弟么？

李长庚：过去收过好些徒弟，都改行了，现在风气变了，没人学唢呐。

老威：可惜离得太远，要不我就跟您学。老人家，您能不能讲讲您的故事？您春风得意的时候？

李长庚：我从来不编故事。不过春风得意的时候不少，虽然已很遥远了。年轻人，吹鼓手在以前可不是下贱的行当，纨绔子弟瞧不起我们，是因为肤浅无知。其实这一行的祖师是孔夫子孔圣人，他早年为了供养母亲，不仅为人吹唢呐，还给死者披麻戴孝、扶棺嚎丧。所以吹鼓手的家里都供奉着孔圣先师的牌位。

老威：这样说来，吹鼓手不光是吹吹唢呐，也要嚎丧？

李长庚：当然。

老威：这咋可能？您自己的亲人又没去世，怎么嚎得起来？

李长庚：这是一种职业，就像演电影，演着演着就入戏了。电影有台词，嚎丧也有曲调。我刚学吹鼓手才12岁，唢呐调和嚎丧调，师傅都逼着反复练习，有了基本功，临场发挥才会惊天动地，样子做得比孝子还真。那些年，国共两军打内战，难民如潮水一般涌，可我们与难民不一样，那里死人多就往那里去。我是河南人，你从我的口音能否听出来？唉，变了，什么都变了。我16岁就到四川了。四川比中原好，没打什么仗，红白喜事办得漂亮，没多久就出名了。

与九十年代一样，那时候也兴搭班子，我爹是班主。他原是唱河南梆子的，而我师傅是吹唢呐的。中原连年烽火，民不聊生；劫道土匪、散兵游勇太多，谁也没心思听戏，所以我师傅就在我爹走投无路之际，建议两个班子合并，因为活人可以不听戏，但死人不可能不出丧。我爹同意了，两人原是结义兄弟，啥不好说？再说合并了的大班有十几人，结伴谋生，胆子也大一些。我爹不吹唢呐，但嗓门刚猛，平地吼一腔，数里外也能听见，再说唱戏的，要记那十几种嚎丧调，简直小菜一碟，比戏文容易多了。

老威：哪些嚎丧调？

李长庚：《送魂调》、《追魂调》、《安魂调》、《唤魂调》、《辞亲调》、《大悲》、《小悲》、《封棺》、《渡亡》、《陪葬》、《下葬》、《回头》、《撕心裂肺调》、《呜呼哀哉调》。这些调式都是前人经过千锤百炼，一代代传下来的，哪高、哪低、哪哑、哪扬、哪该干嚎、哪该湿嚎，哪该全身哆嗦出不来声，都很讲究。一般的死者亲属，一见尸体就控制不住，大放悲声，没几下就坚持不了，痛极攻心，还会昏迷、休克。而我们一人情绪，就收放自如，想嚎多久就嚎多久。如果场面大，收入可观，还能临场发挥。

老威：您最长嚎过多久？

李长庚：两天两夜吧。唢呐把开场调一吹，我们全班十几人，就全都扔下家伙，披麻戴孝，齐刷刷地向死者牌位三拜九叩，分作两、三轮，哭、泣、嚎。乱作一团。其实表面乱，只要有心，细细地旁观个把钟头，就能看出不乱的门道。比如你泣我嚎，相当于你休息我劳动，而哭只是过渡，准备劳动或者准备休息，嗓门是我们这行的本钱，哪怕猛一声撕心裂肺，也绝不会蚀本的。

老威：你们这不是喧宾夺主了吗？哪有假孝子压倒真孝子的？

李长庚：唢呐也罢，丧调也罢，都是调动情绪，造气氛的。人与人之间的喜怒哀乐就象传染病一样，很快就蔓延开了。当然，孝男孝女是主角，但他们经常是一动真情就软下去了，往往到后来主角都退场了，配角好像才刚刚入戏，说白了，坚持到最后的都是假孝子。过去不像现在，灵棚一搭，几桌十几桌麻将就摆开了，守灵的人一心想着赌钱，连表面的哀悼文章都忘了做。

老威：过去也不可能一嚎到底吧？那不把人弄昏过去？再说现在人的居住密度大，你的响动搞得超过了别人的承受能力，四邻就会提意见，噪音污染嘛。

李长庚：可见人心不古，过去就没这一说。连 80 年代，也兴通宵打围鼓，唱的都是鬼戏。

老威：不错，观众也不少，那时一次丧仪就是一次群众集会。

李长庚：我们这个班子也得学唱川戏，总之，要把丧事从头办到尾，才有竞争力。刚才说到嚎丧……为啥我反复对你讲到嚎丧，一是因为它的难度比吹唢呐、唱戏更大，是表演又不露表演的痕迹，二是它牵涉到这班人能否生存，挣钱多少都得看它的效果。从收殓、最后告别、封棺到下葬，每次众亲属与死者相见都

是高潮。我置身事中又是旁观者，我瞟一眼就晓得有的人是真想扑过去抱住死者，有的人是做做扑的样子。这时，我们不仅要卖力气地哭嚎，而且要充当保镖，一次次地拖住别人。待他们都告别完了，我们就上前延长这悲恸的气氛，按规矩，封棺之前，我们当中至少有五、六个人扑棺三遍，被其他人死死拖住，待盖子一扣，大铁钉崩崩下去，才暗自松口大气。

老戚：你们中也分主唱与伴唱吧？

李长庚：主嚎与伴嚎，对，有些选拔赛的意思，一次丧事就是一次选拔。事后，大家会聚一块，认真地评比，嗓门大还不行，还得会处理，吟诗都讲究起承转合。收、放、脸、手、肩膀都重要，全身都重要，节骨眼上的转弯更重要，从“你的一生勤劳俭朴哟”到“苦日子熬到头你却去了哟”，大伙几乎每一句都要提意见，以便改进。

老戚：你说你们的班子解放前就入川了，不知怎样站稳脚跟的？按理说，四川人办红白喜事是很讲排场的，传统的民俗也不少，一个外乡的吹鼓班子……

李长庚：我晓得你的意思，开始是这样，人们习惯请本地的丧事班子。大户人家，还一边请人打川剧围鼓，一边请和尚念经超度亡灵。成都呆不住，我们就一路撤下来，途经绵阳，也不行，连江油也呆不住，只好离城 20 里地，在这个破乡场上扎营。为了活命，我们先分头找活儿，不挣钱，只图一日三餐。48 年，这地方发生过一场瘟疫，路边都能见着死人，这瘟疫救了我们。生病是不分贫富的，再加上本地的吹鼓手都是子承父业，一脉单传，有人请，他就夹上唢呐去了，这就难以抵挡人多势众的我们。况且，北方人个头大，气血足，唢呐也吹得比本地那些痨病鬼精神。长期下来，我们几乎包揽了江油周围的红白喜事。

老戚：你们的势头这般猛，为何不重振旗鼓，再进城发展

呢？

李长庚：当地有袍哥组织，惹翻了就三刀六洞，哪个敢与他们挤生意？光地皮税你就交不起。

老威：乡下没有袍哥么？

李长庚：当然有。被我们抢了饭碗的本地吹鼓手曾联合找到袍哥的红旗老五，他在青莲镇上开茶馆。红旗老五叫手下人传话，要么滚出江油地界，要么被打断腿扔出去。幸好我们在这一带已有了一定名声，有一个信佛的地主，雅号张圆外，出面为我们求情，并垫付了20块大洋。于是龙头老大才发话，让双方一对一公平较量。我爹问：“没死人怎么较量？”老大回答：“这好办。”第二天早晨，一个叫化子就横尸在我们门口。于是只好把乞丐当王爷，隆重收殓。寿衣寿材置办好，抬到乡场上，双方才按事先协商好的搭台。本地吹鼓手、职业嚎丧户和他们的亲戚朋友，都不惜血本，凑足银元到外地请来名头响亮的高手，准备决一死战。不过半天，台搭好了，两台高耸并立，足有十丈高，而敞开的棺材就搁在两台之间。这阵势惊动了方圆百里，自从盘古王开天地，吹鼓手打擂台在当地还是头一回。

先是比赛唢呐，曲子一样，都是《大悲调》，咫尺之外的看台上，分几排坐着袍哥大小管事，乡长保长，各方乡绅名流。我年轻好胜，要先登台比试，不料被师傅拉下。那阵，他老人家已50多岁，长得虎背熊腰，但见他一身漆黑孝服，孝帕在阳光下白得耀眼。他口咬唢呐，噌噌几下就上了云梯，站在台顶，与此同时，对手也上了台顶。

看台上白旗一招，唢呐就双响了，简直像大刀在人们脑袋顶乱砍。他们都是久经沙场的高手，斗了半个时辰仍不见胜负，激烈之处，眼尖的人甚至能瞅见喇叭口喷出的口水和血丝。但是我爹还很镇定，因为他晓得我师傅不仅底气足，而且脾气拗，老人

家的小名叫“二蛮子”，有股宁死不认输的劲。

斗了一个时辰，对手就只有喘着吹的份了，眼看胜利在望，不料师傅的唢呐嘎地断了。看台上白旗又一挥，这下完蛋了。只见我师傅满嘴鲜血，原来有人用弹弓暗算他。

我人小反应快，来不及多想，就已攀上高台；我爹也向上爬，台子撑不起这么多人，摇晃起来，我急忙喊：“师傅快下！”全班的人都守在台边，爹上不来，就急得跳脚。喊：“小狗日的，找死嘛！”话音未落，对手又上台了。这次是比嚎丧。

对手猛一捶胸，嗓门粗得如牛叫，台下喊好声不断。可我想的是，这回完蛋了，师傅受了伤，失去了帮手，爹也支撑不住。离乡背井跑这么远，为多少活人笑，为多少死人哭，但自己却落得如此下场！受欺负的日子何时才有个头？况且，这只是为了个叫化子，就搞得班子要散了。散了咋办？哪里去谋生？当不了吹鼓手，就只有要饭，说不定哪天和台下的叫化子一样下场……就这样越想越丧气，越想越不想活，就哭起来。向天，鼓着两只牛眼睛，满眼太阳晃也不眨一下。我啥也不晓得，啥也听不见，嚎得不成人形，还一拳一脚地乱打，像要和老天爷拼命。弹弓又瞄准我了，啪啪几下，挨一下脑袋轰一下，我尽量把脸朝上，只要脸不出血……。就这样，台下我胜的白旗已招摇几回，可我就是看不见。后来我才晓得，对手早哑了，我独自一人多嚎了十几分钟，搞得满场黑压压的哭成一片，连袍哥们都抹泪了，连连叹息说：“我们也把外乡人欺负得太惨了，上头娃儿太惨了！”

老戚：真是惊心动魄！老人家，您也算是从少年英雄过来的。

李长庚：英雄谈不上，既然做了这一行，就只有背水一战。唉，好不容易挣来的地盘，总不想随便让，全国解放那年，爹亡故，埋骨异乡，不久，我相了亲，入了当地的户，就走不了了。

老威：这么多年也没回家探亲？

李长庚：回去过好多次，老家有一大堆亲戚呢。不过我已经变成土生土长的四川人了，这方山水养人，虽然时代变了，现在我们这行走下坡路了，但是这几十年苦中作乐也算有滋有味。

老威：解放后你改过行没有？比如破四旧、文化大革命之类的运动中，你还能干吹鼓手？

李长庚：没有改过行。只是改过调。迎解放，扭秧歌，我们的丧事班子就摇身一变，唢呐齐奏《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跟着来的政治运动也一样，发动群众，少不了文艺演出。领导定什么调就吹什么调，艺人嘛，日求三餐，夜求一宿，哪有那么多不满情绪。告诉你，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一片接一片，我也照吹天下太平调，孝子当多了，人就没啥心肝，这世道，千万来不得热血奔腾，今天大鸣大放，政治宽松，该你“奔腾”，好了，

“奔腾”够了？劳改去吧，尾巴一夹就是几十年。所以，为人就是要没心肝。

老威：你们的班子也散伙了？

李长庚：51年就各奔东西了。以后日子就像本地吹鼓手一样，平时在家务农，方圆几十里有红白喜事，人家自会找上门来请。因为我有名气，一年四季总不会断了财路。曾经有人建议我重新拖个班子，到处找活儿，我仔细琢磨，认为不妥，因为这也算个民间组织，它归哪儿管呢？没部门管的组织，在中国就是非法的，非法的下一步就是反动，我可不沾这个边。

老威：老人家，您是人精。我自愧不如。另外，我还想向您打听一件事。

李长庚：请讲。

老威：小时候在农村，我曾听爷爷讲过吆尸人的传说，是否真有其事？

李长庚：你爷爷咋讲的？

老威：他说吆尸人在过去是一种职业。这种职业就是受人重金托付，把客死异乡的尸首从百里或千里之外搬运回家。

李长庚：对，过去是有专门的吆尸人。他们一般是晚上赶路。两人结伴，一前一后，像抬轿子一般牵引着尸体，行走如风，一路还发出嗬嗬的吆喝。

老威：死人也走路么？

李长庚：看上去，死人与活人步调完全一致，这样才能保持一种惯性节奏。如果你走夜路，与吆尸人不巧碰上，就只能闪开，要不，他们就嗬嗬嗬地迎面撞过来。这种三位一体的走法不仅别扭，而且不能转急弯。

老威：您亲眼见过吆尸人吗？

李长庚：白天见过，晚上没见过。49年，本地的一位客商，在江西做生意时被乱兵打死。那时，水陆的交通都极不方便，他的朋友又不忍心就地处置，只好重托吆尸人。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尸体果然被吆回家乡，并且面容如生。

老威：没有腐朽？简直是神话。

李长庚：这位客商姓陆，经我的手出的殡，因此绝无半句虚言。吆尸人都是白天睡觉，我们年轻好奇，舔破窗户纸去看，黑咕隆咚，只闻鼾声如雷。而到了晚上，他们就已经没影了。我们班中的小伍，想把吆尸的棍子偷出来看看，因为大伙都猜测棍上有魔法。不料刚一动门栓，里面呼地一个黑影扑过来，定睛一认，原来是只黑猫！吆尸人随行都带着猫，上路时，他们像取门板一样，把靠墙而立的尸体搬出房外，前后夹定，放猫在尸体上溜几遍，叫“过电”。过完电，三个人还要如练操一般，原地踏步一会儿，方嗬嗬出发。

老威：您这段经历，算虚实掺半吧？老人家，您可谓见多识

广。晚辈佩服。

李长庚：你到了我这把年纪，比我见多识广。你的嗓音不错，很适合做这一行呢。

招魂术亲历者何老东

采访缘起

何老东乃四川万县人，现年64岁，50年代参加过抗美援朝，任过团部文书。后负伤转业到贵阳，因喜欢写写画画，就被组织分配到某省级文化单位，几十年来，发表过小说、诗歌、散文、评论300余万字，并历任编辑、记者、创作员、处长和正局级领导。

由于发表作品，我与老何在80年代神交已久，1998年元

旦，我与杨远宏、李亚东、蒋浩等朋友应邀抵贵阳，在阴霾弥漫中，爬黔灵山，听何老东一再鼓吹招魂术，本欲亲自去见识，无奈神婆的生意过于兴隆，即使马上凭熟人关系预约，也得十天以后。

幸而老何口才极佳，令这篇采访有“身临其境”之感，众友均称“不虚此行”。某日夜，我与老朋友唐亚平不期重逢，惊喜交集，君以玉屏箫笛一对赠之。

老戚：你亲眼见过巫术吗？

何老东：我昨天刚看过神婆张某，她三十来岁，在贵阳乃至贵州都有相当大的名气，如果你感兴趣，我就安排人去预约。找她的人特别多，你只能排在一个星期以后。

老戚：这张某是什么人？

何老东：贵阳郊区的一个普通农妇，



招魂者的群众基础。

(袁东平 摄)

据说七岁的时候，突然抽风，医生想尽了所有办法也止不住，于是就请端公到家里招魂，折腾了三天三夜。烧符、化水，并在水缸内看见一男一女两个赤身裸体的小孩在搏斗，端公一剑刺去，又满山遍野地张贴拿鬼招魂的帖子。大约到了第五天的头上，已浑身冰凉、气息全无的张某突然睁眼，说见到王母娘娘了。

亲戚：胡言乱语吧？

何老东：开始人们都认为是胡言乱语，可突然发现，这孩子的嘴没动，所谓“声音”是从腋窝发出的，左边为男声，右边为女声，还能一问一答。这“声音”叙述了张某抽风死去，又死灰复燃的过程，她的七窍被堵塞了，灵魂出不了气，这就好像一个人被关在窗户钉死的屋子里，憋坏了，就拼命蹦跶。灵魂蹦跶得越厉害，身体也就抽得越厉害。后来，有人用剑在双腋戳开了两窟窿，灵魂嗖地钻出去，她的身体就不抽了，落在床板上死了。她的灵魂上天入地玩了几天，看见端公到处张帖唤它回家，正高兴得笑，却望见自家房前停放着一副小棺材，父母正张罗着要把

自己的躯壳放进去。这才慌了手脚，赶回来入壳还魂，据张某讲，再晚半个时辰就装棺入土了。

老威：这太玄了，前一晌的报纸还在揭露入用肚皮、腋窝或其他部位说话是假的，专家也出面证明这是神汉、巫婆骗钱的伎俩。

何老东：你信记者的话？

老威：不信。实用主义者特别可怕，为了某种新闻的需要，他们可以绞尽脑汁去论证、去判断什么东西是真，什么东西是假，而除了这种快餐式的主观，他们一无所知。我从小在农村生活，对你讲的并不感到陌生，我愿意在传统的背景下考察这些现象。

何老东：我也在农村生活过，但张某的情况同寻常的乡村迷信不同，她的双腋都有明显的疤痕，发音时，疤痕就像嘴唇一般翕张，我们这个文化机构二十多人，几乎都去看过，我还请她请到家里来当众演示，不过出场费要 200 元。

老威：张某到底有何神奇之处？

何老东：她最大的手段就是招魂。你只要把名字告诉她，她就开始念念有词，不一会，她噗地倒下抽风、吐白沫，然后直挺挺地站起来，此时，亡灵就附身了。四十年前，我和九岁的弟弟偷着下河洗澡，我生性胆小，不谙水性，只能挨着岸边扑腾几下子，弟弟与我性格相反，他游到河心时，一个浪打来，他摇了几下手就没了，当时我不敢去救他，也忘了叫人，只呆在岸上发抖。这事使我内疚。我做梦都想见见弟弟，向他解释我当时吓傻了。我通过张神婆招的第一个魂就是我弟弟，我一听就知道他在左腋里说话：“哥哥，你喊我来干啥子？”还是他小时候的尖嗓门！我像挨了雷劈一般懵了，下身一麻，裤裆就湿了，接着弟弟又说：“东娃子，明明是你尿的床，你偏要赖我，惹得妈打我的

屁股，哎哟！”我说：“西娃子，这几十年我一直在想你哟。”弟说：“我晓得。”我说：“因为你，我这辈子再也没下过河，后来，长江里漂过一对水大棒，男的趴着，女的仰着……”弟说：“我晓得，前两年妈到阴间来就告诉我了。”于是我说：

“西娃子，你不怪我么？”弟说：“我命中注定只能长这么大。”我说：“听你的话，算成熟了，怎么声音还是几十年前的？”弟说：“本来死了就不会长了，但我周围都是大人，渐渐我就学成大人思维了。”我说：“你现在和父母住在一起么？”弟说：“我是淹死的，只能住在水里，我的双腿害风湿关节炎，被锯掉了，我长了一个鱼尾巴。好在我的家叫通天河，有一次我不知不觉就游到天上去，我在月亮上屙了泡屎，并且把屎递给那些升天堂的人，他们吃得津津有味。”我说：“西娃子，你还那么淘气。”弟说：“阎王爷见我乖，就逗我去捉下一个淹死的小孩，并让他的魂来代替我。前几年我不忍心，这几年没机会了，上游有造纸厂排污，河水变臭，连鱼虾都绝迹，别提游泳了。”我说：“爸妈在干啥？你让老人家来同我说话。”弟刚要回答，声音就被突然插断了，张某跌在地上喘息道：“这坏蛋，扫我一脚！”我揪住她质问：“你为啥不让我父母来？”张某道：“我不能同时让三个鬼附体。”我说：“我多给钱还不行？”张某说：“我从千里之外的万县把魂招到贵阳来容易么？”于是不再理我。

老威：这个时候你怎么能够提钱呢？这不是亵渎亡灵么！

何老东：这都是市场经济闹的，后来我一再赔罪，张某才答应下次招引我的母亲。

老威：真叫人难以相信！如果你不是文化机构的领导，我会认为你在编故事呢。

何老东：那你就在贵阳多往些日子，我明天一早就去给你排

队预约。你先想好，先招谁的魂，最好是直系亲属，到时你的感受会比我更强烈。

老威：很遗憾，我明天要回四川。

何老东：你认识四川的诗人某某吧？

老威：我们很熟悉。

何老东：那是个通灵的家伙。去年他到贵阳，也就是在这间屋子里，我给他讲张某的招魂术，刚讲到鬼附体时，他浑身一阵哆嗦。突然电灯熄了，我摸着火柴，点了蜡烛，我听见某某喃喃地说：“我真想找找这位大仙，这么多年，我一直想听听姐姐的声音，她88年遭车祸死了，我连她的遗体也没见着，那么活生生的一个人就这么没了，但这些年我一直感觉她在。”于是我答应去安排他们姐弟通话。可他又摇头说：“见着姐姐说什么呢，我没给她烧过纸，今年清明，我和老婆一定给她烧纸。唉，巫术真是无处不在呀，阴阳相隔，阴阳界的人彼此思念对方，你感应到了，却摸不着，这是最大的巫术。”

老威：某某描述的是他个体生命中的某种仪式，在现实里，我们要预约某个人，到什么地方见面，就打电话、发传真，也可以用电子邮件，而在超现实里，这一切也演化成类似的程序，在四川巫山一带的传统巫术里，驱鬼、招魂的仪式有较强的代表性，端公的法术往往能调动大家的情绪，于是都沉醉其中。

何老东：不错，我们招魂的都是个体生命中虚幻的部分，某某的《死城》里有一句“赶尸人的吆喝不绝于耳”，赶尸人在哪儿？谁见过？

老威：让我们回到最初的话题，张某把你母亲招来了吗？

何老东：对，张某一抽风倒地，我就听见妈在埋怨：“东娃子，你少熬夜哟。”我忙说：“妈，文化人的工作就是熬夜嘛。”妈一听就气了：“工作个屁，你熬夜打麻将，把工资都输

光了，还落下个胃病。”我大吃一惊：“妈，你连儿子的底细都晓得？”妈说：“以前在的时候，你在外省工作，干啥妈都不晓得，因为路途太远了，你写个信，打个电话回家，都是你说啥我和你爸信啥。你是文化官儿，也给家里人长脸。现在无所谓了，在阴间也没个省界国界，你干啥妈也瞧得清清楚楚。还骗说熬夜写文章呢，你已经大半年没摸过笔了。妈就在你的隔壁呢。去年腊月初四，你趁你媳妇不在家，干啥啦？”我心虚地应道：“我干啥啦？”我妈见我不老实，就扇来一巴掌，我屁股上一阵凉嗖嗖的：“你偷了个女人回家睡觉，还哄人家说过几天就离婚。”

老戚：你妈这样明察秋毫，大概你和她只隔着一堵玻璃墙。

何老东：玻璃墙？我当时真有浑身被剥得精光的感觉，张某还在地上抽筋、腿都蹬直了，我却总觉得她站着，或者我妈就站在她的身上。我上前两步，却什么也摸不着，我妈在一片雾中，那“玻璃墙”时退时进的。唉，我忘了在母亲的眼里，孩子总是赤裸裸的。我旁边的两位朋友也目瞪口呆，幸好我没做其它丑事，要不我妈也给抖了出来。

老戚：怎么会呢，母亲最疼孩子的。

何老东：阴阳界的观念不一样，阳界是文明社会，人有许多伪装的东西，因为没有大体符合社交准则的面具，就无法与其它人交朋友，君子成人之美嘛，哪个“君子”又去揭人之短呢？而阴间是人类在地上绕了一圈之后的归宿，命都没了，还有啥放不开的？

老戚：你母亲在阴间情况怎么样？

何老东：不愁吃不愁喝，因为人死了就不吃不喝。我问：“妈，那我每年给您老人家烧的纸钱怎么花？这两年改革开放，祭品市场也活了，还有‘幽冥银行’发行的货币，面值都是几百万、几千万、上亿，甚至还有兆亿元的，我见大家都抢着买来

烧，也随大流焚了几大捆。”妈一听又叫骂开了：“你这浑小子烧假钱给我？”

老戚：你妈脾气够大的。

何老东：可不，我刚要解释，张某醒了，又不满道：“你是文化人，不能与亡魂抬杠，你得顺着它们，话才能说得长。要不鬼在我身上动手动脚，弄得疼。”

老戚：不瞒你说，我出生在川北农村，那里的山川地貌同贵州很类似。而且出殡仪式非常隆重，从择墓、人棺、埋葬，都要请巫师跳神。可这无法替代生离死别的感受。阴阳的鸿沟真能跨越吗？还是仅仅为一种催眠产生的幻觉？印弟安人擅长药术，据说向你的鼻孔喷一股烟，你就飘起来，看得见乳白门楣的天堂，因此印弟安巫师在世界上名气最大。

何老东：这不是幻术，张某招了二十多年，一千个鬼有了吧？我没听谁告发她作骗。亡魂的感召力虽然不如宗教，但它有抑恶扬善之功。

老戚：据我所知，揭露巫婆神汉的专家和记者们也曾四处寻找张某，企图当面测试，而张某却东躲西藏，这是为什么？

何老东：所谓专门揭露某种巫术的说法，本身就是一种偏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了两千多年，至今也没结果，这是因为两种东西都是人们需要的，唯物强调看得见的秩序，所谓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但生命短促，你一辈子又能见多少？听多少？张某凭一种心灵感应，就知道记者和专家们是怀着搞垮的目的来的，他们不想招魂，也无魂可招；有了科学作盾牌，就不怕撞鬼。招魂为业的张某也怕鬼，这些现实的“鬼”会使她下地狱。

老戚：你作为文化机构的领导和著名作家，你觉得这样说合适吗？

何老东：你错了，当我与你谈论巫术的时候，我既不是作

家，也不是领导，而是一个无依无靠的人站在天地之间，让源于远古又贯穿始终的声音层层围绕。我死去的亲人们正是这个声音链条的某一环，这一环虽然不起眼，却是不可缺少的。你仔细想想看，《易经》难道不是一部招魂术么？乾坤两卦不断繁衍，成为六十四卦以至无穷，而无穷归一又是乾坤两卦，在这个循环当中，你是否是某个祖先的化身？你说的是谁的话？你淌的是谁的血？几千年以前的人害过与你同样的感冒么？你拥抱的是否是古代的某个女人？当然这种联想张某是不会的，张是文盲，但她的确能在某一特定环境为信者打开血缘的暗道。你可能不知道，她的腋窝还能讲许多种方言。

老威：什么意思？

何老东：也就是亡灵都操着家乡土语。如果某个亡灵的家在大西北，你招它还得等好几分钟，你能感觉它急促的喘息和拍打灰尘的声音。

老威：我还会来贵阳，下次一定亲自找张某。其实在中外典籍里，由招魂而进入生死对话的描述很多，德国电影《古堡幽灵》中，鬼魂还在大街上跳舞呢，虽然这不过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套用，但也折射出人类普遍的欲求。我现在不敢断言巫术的虚实，因为我们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的东西太多了。只要在房子、股票、工资、发表、开会之余，一个人偶尔抬头望一望夜空，想想那些星星是怎么回事，就会感觉到什么是巨大的孤独。科学家们在努力，试图论证与人类对应的高等智能生物的存在，他们把运载着大量人类信息的飞船推向太空，推出太阳系，还沿途播放贝多芬的《欢乐颂》。这种大海捞针式的寻求对话是多么迷人啊。

何老东：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招魂的方式，整个地球都在宇宙中飘荡，我们的根在哪儿？家又在哪儿？科学家是在为人类招魂，

而张某作为一个文盲，只能为凡夫俗子招魂。人死了，就完了么，生命如此简单？我现在真切地感受到亡魂，我的父母和弟弟，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如同宇宙。对，宇宙也是活的，有感情的，不过这种“感情”大得令渺小的人怅然若失。我还会从张某的腋下听到已故亲人们的声音，我也希望张某让你享受到同样的狂喜。因为亡魂比我们率真、善良。

老威：那么暴死之人就无魂可招？

何老东：不一定。哦，忘了给你讲，张某还破过几个案子，最著名的是—一起抢劫杀人案。在公安局侦破的过程中，死者亲属在别人的引荐下找到张某，于是作法招魂。不一会，死者就说话了：“好黑心罗，捅了我七个眼，现在我还在淌血。”亲属问：

“谁杀的你？说出来，政府去抓他。”死者说：“当时我的眼睛被黑布蒙了，啥也弄不清，但我感觉是熟人，说不定还是街坊。你这几天去挨家挨户地摸一遍，谁最近外出不归？”

老威：案子就这样破了？

何老东：当然，鬼话不能作为证据，有人试图把这些鬼话录下来，但磁带一片空白。但巧的是，凶手的确是死者的邻居，谋财害命后逃往广州，终被抓获归案。张某因此还名声大震呢。

老威：“名声大震”也是传出来的，“招魂破案”之说与我们今天的谈话正题还不一样。有点类似包公故事或狄公案类的传奇。

何老东：那今天到此为止吧。

采访缘起

孔庆天先生是孔夫子第74代玄孙，现年88岁，文化大革命中由山东曲阜老家迁居来蓉，是成都最有名的算命大师之一。

1998年5月31日下午，我和妹妹小飞因友人引荐，入九眼桥附近一陋巷，拜访了孔老先生。

大师瘦削无须，在满室古董的环绕下，犹如枯骨，唯双目炯炯有神，令人望而生畏。

据身旁命客介绍，大师解放前曾执教于南京金陵女子学院，与蒋介石的高级幕僚陈布雷有数面之交。

算命先生孔庆天

孔庆天：客官，请报您的生辰八字。

老威：我只能说出生年和月，日和时无法确定。我的身份证上写着6月19日，但这是阴历还是阳历？我多次追问父母，他们只恍惚记得我是天快亮降生的。

孔庆天：算命又叫“推八字”，您的四柱不清，命就没法算了。不过，相面、摸骨、量掌纹也很准。您坐近一点，我好下手……哎呀，先生是罗汉下凡！这天庭……

老威：我晓得，我的脑壳很圆，自从几年前秃顶后，就更圆了，如此寸草不生的好天庭当然暗合“天圆地方”的数。

孔庆天：“数？那您的幸运数字是‘1’？”

老威：不错。

孔庆天：“1”之前您是做什么的？

老威：请大师指教。

孔庆天：“1”是无限大和无限小的数。这就是所谓“天圆地方”。“天庭饱满”“地廓方圆”这类相术词汇，



蒋介石幕僚陈布雷的好友，90多岁的命相大师孔庆天先生。“三尺之外，必有圣贤”。中国民间还有多少这种人物？

（曾循 摄）



成都文殊院围墙外的瞎子算命一条街。庙内是天堂佛地，庙外是世俗人间，连结阴阳两界使者，就是一大群瞎子了。（曾循 摄）

说得小是指具体某人的头部，说得大应该是江山社稷，甚至宇宙。从古至今，社会上流传的算命看相书籍多如牛毛，随便读几本，演绎几回其中的算命程序和方法，再加上察颜观色的本能，就可放心摆摊营业了……因此，命相术本身算不上什么学问，然而，我们的祖先捉摸出“天人交合”的大学问，这种学问能从人的出生，人的面孔，甚至人的种种习惯中凸现出来，既玄，又具体，老子说：



与成都文殊院外相似的另一处“瞎子算命一条街”。令人晕头转向的世道，瞎子们正好大展鸿图。

(曾循 摄)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嘛。人是一个小的宇宙，而眼睛、鼻子、耳朵、下巴、眉毛、太阳穴、颧骨都是自然之门，它们看似关闭，实际上都是开启的；它们就是日月星辰、江山社稷呀。当然，“天人交合”是犯禁的，因为在古代，皇帝才是“天子”，平头百姓妄论天道会遭杀身之祸，所以，命相术里的所谓“上算天道轮回，中算国运兴衰”成了绝学，只有“下算苍生百姓”在民间代代相传。当然，本朝的事不能说，前朝的事还是可以说的。

老戚：请大师为我相面。

孔庆天：先生的嗓音如一口刚刚出土的钟，还有半截陷在地里，但尽管这样，已构成声势……

老戚：您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孔庆天：我的账房在那边，您得按规矩交纳命金。如果是一般的命，随便收点也罢，您的命非凡响。

老威：我先后花在算命上的钱有几千块。当今中国，从京城到地方都遍布算命者，我什么没见过？文殊院门外，瞎子算命一条街您晓得吧？从街头至街尾，有数百名瞎子，我常到那儿，挤在水泄不通的香客里，感受一种气氛。

孔庆天：我算命从来不讨价。别说几千块，花上万块找我算命的人也不少。先生如果觉得自己的命不太值钱，就请回吧。

老威：您？！简直是敲诈！好吧，这兜里的三百元，全拿去！

孔庆天：哈哈，快哉！我活了 88 岁，第一次听明眼人骂瞎子敲诈！先生是个豪杰！今天是 98 年 5 月 23 日下午，我得记住这个痛快的日子。

老威：废话少说，摸吧，按您刚才说的，摸骨、量掌纹、相面、您得来全



在鬼城丰都，满山遍野都是算命的去处。什么东西都是多了就滥了，就连如此光冕堂皇的场所，也门可罗雀。
（宋玉 摄）

套。

孔庆天：算命就是花钱买废话听，因为命既然由先天决定，算不算都一样。就像一个性格倔犟的人决定干一件危险的事，您是劝不住的。您就有类似的经历，



旧时的算命先生，有些有身份的，在店堂中开业，门前还悬挂这“一条明路指君去；半点疑难问我来”之类的对联，有的还有名号或外号，如“羊仙”、“芝果叟”、“吴瞎子”等等。拉一张桌子在街头设摊的这一种，显见得是等而次之的，但较之今天打地摊的算命人，架子还是大些。这行业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您这天庭看似饱满，但仔细感觉，还是有劫后余生的暗纹。我敢断言，您的相貌改变极大，在“1”成为您的幸运数字前，你一头浓发，看不到天庭，这是您人生中的黑暗时期，不，不，现在我触及到了！耳朵，两条眉尾，犯煞。童年您几乎死于天灾，后来从浮肿里复活了，您被架在一口大锅上熏蒸，

您捏紧小拳头拼命哭喊，这像地狱，您是该下地狱的。25年后，您的姐姐替您下了，您的命硬，克死了她，您还会克死谁呢？人生的三大不幸您必居其一！但是，如果您姐在您的生活中一直充当母亲的角色，

色，那这一劫就已经过去了。不错，您的山根崩裂过，您坐过牢，因为做了件危险的事，您避不开，现在好了，您姐姐在天之灵保佑着您，这段时间，您不要离开她生前活动的范围，哪怕再大的名利诱惑，也不要去。今后，您也要远离名利，记住您的幸运数字。1，可大可小，大如宇宙，包容天下万物，时代苍生，人们都熟视无睹；小如微尘，自由自在地在人间进退，人们也熟视无睹。您呢，也要可大可小，远离名利，最终您将获得最大的名利。

老戚：您的意思是我该出家当和尚？

孔庆天：您的灵魂早出家了，可您的躯壳还在凡尘里。您的筋骨结实，气血充盈，想法天真，像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身上有许多欲望，时间随着种种欲望在您心里倒流。然而，您的灵魂已看透了您的欲望。就像我，早就不想活了，可还活着；我爱钱，爱这些古董，明明晓得自己没几天活头了。

老戚：这话我不太懂。

孔庆天：每个人都有时来运转时候，不过早晚而已。古人所谓“大难之后必有后福”，意思是“大难”和“后福”是对等的。老天爷也是公平的。比如周文王被暴君商纣王囚禁在河南羑里的地窖里好几年，不但自己的儿子伯邑考惨遭杀害，被剁成肉酱，就连自己也险些掉脑袋。这种大难，一般人是挺不过去的，而文王不但挺过去了，还通过巴掌大的泥窗，夜观天象，日演伏羲，废寝忘食地苦心钻研，终于做成了一部千古奇书《周易》。自此，天下学问之大，莫有超过《周易》者也？道生乾坤，乾坤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如此卦卦相扣，循环往复，正是永恒的天道规律。大至天道，小至古人、今人、未来的人，都在循环，至于某个人的命运，不过是天道轮回的某一点，《周易》的随机起卦，正是根据心血来潮时的个人感应，去窥测天道的。现

在，我也心血来潮地对您说：“您肯定名扬天下！因为您的难与天下有关。可惜您从了文，要不，36岁就做将军了。您把刀光剑影带进了文章里面，这是文人折寿的主要原因。您得改变方向。我晓得您现在很自信，但到时候（我算是62岁）肯定改变方向！如果经商，您将具有陶朱之富，如果从政，您将立国封爵，而且，您不怕失去什么，假如流浪到国外，您将有宫殿式的大房子住，所谓‘失者有其居’”。古有《天官书》云：“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九五，上下各千岁，然后知天人之际续备。”唉，老夫扯远了。请先生注意其中的变数。

老戚：大师开始让我远离名利，而后又让我注意“天运变数”，弃文以谋取名利，这是否自相矛盾？

孔庆天：远离名利正好清静无为，注意“天运变数”，以取得大功利。古今中外，以隐而显的名人不少，所谓“隐”，不过是一种直达中心的捷径。中国古代很少有真正的隐士，介子推在跟随晋文公落难时割大腿肉给主人熬汤喝，功成名就想隐退，结果被大火烧死在山中；诗人李白也曾隐居，跟道士学武艺，后来长安一热闹，他就出山了；诸葛亮是个最好的例子，他隐在隆中，纵论天下大势，写了《隆中对》，就等着刘备三顾茅庐才好出山。而在此之前，要耐得住寂寞，姿态要拿够。“动则王，静则圣”嘛。

老戚：大师讲的是一种精妙的运作游戏，可惜我不擅此道，说穿了，我还是个性情中人。

孔庆天：性情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没有谁从娘胎里就有性情。如果您现在是省长，可能想不起上这儿来算命；可如果您从省长的官位上跌下来，就会自然而然想算命了。然而，您如果以出世的心情来看待这一切，命就可算可不算。

老戚：佛还是要拜的吧？

孔庆天：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老戚：大师的说法有些机会主义倾向，我总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劲，但抓不住。您刚才讲我“大难之后必有后福”，可能是揣度着我的心理说的吧？我已40岁了，您指的“后福”应验在何时？45岁？50岁？60岁？恐怕那时老了，什么福也享不了。现在社会越来越乱，谁晓得我70岁时会不会发生战争？环境污染会不会毁灭人类？科学因素能不能预测呢？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里讲，战国时期，秦国武安君白起带兵攻打赵国，大破敌军于长平，坑杀赵军40余万。难道这40余万人都注定要在同一天被杀死？类似的惨案有现代的南京大屠杀，几天之内，30余万军民横死，难道这30余万人的命命中都有夭折的迹象？还有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

孔庆天：您别说了，我知道这样的人类遭遇灭顶之灾的例子多如牛毛，我只能用“天遣”来解释。刚才我说过，人的命相是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的，当一个人对他们的命运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庇护他的星座也将从他的面孔中消逝。我敢说，被坑杀的四十万赵军中，无一人有好相，因为他们都在无法摆脱的国家命运的笼罩下，像羊群一般被驱赶到前线当炮灰。所谓天无好天，地无好地，作为“三才”中的人哪来好相？发国难财的都是大奸大恶，谁让这些大奸大恶者能够得逞？再说南京大屠杀的前几日就已有城破迹象，危城之中的百姓如同放在砧板上待宰的鱼，哪来什么好相？

老戚：我看过去一些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图片，其中不乏好相。五官端正，天圆地方者也同尖嘴猴腮，其貌不扬者一块被枪射刀劈，被丢进万人坑。一把火焚烧之后，累累白骨莫辨彼此，把什么星相、命相全消解了。当然，也有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若干年后还惊恐万状。我觉得这样的“大难后福”者也未必有好相。

孔庆天：所谓命相，不仅指五官摆放的位置，它还包括血、气、骨、肉、形、体诸多方面，一个上乘的算命者，如同一个上乘的中医，甚至国医，通过望诊、把脉就能深知一人、一家、一国的宿疾。因此，在国难当头之际，个人的命相就在其次，或者谈不上个人命相。我相信，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满城的人都被一股恶浊之气，一股冲天血光所笼罩，这难道不是一种命的劫数吗？东洋人，据说是秦始皇为寻不死之药，派到海外去的五百对童男童女的后裔，一千多年后，却从海外回来戮杀与自己同宗同源的中国人，这难道不是一种天道轮回的报应吗？覆巢之下，所有的相是同一个相，工农商学兵司命，如果您是专家、教授、学问奇才，您只能叹息自己生错了时代。连孔子、庄子、老子、荀子那样的大仁大圣大贤，都生错了时代，一生坎坷，不被当政者重用，何况尔小小的读书人乎？乱世之中，好命相者首先应具有好的心相，远离时代凶气，超凡入圣以独善其身。

老戚：大师您也算独善其身吧？为什么谈吐间有忧愤之气？

孔庆天：我有忧愤之气吗？这可是算命这一行的大忌。这么多年，我这是首次谈古论今，把胸中块垒一吐为快。天道、国运，这些无形之相，本来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秦始皇坑的儒，大半是方士。方士者，异端邪说的传播者也。当社会上异端邪说盛行的时候，天下就要出改朝换代的大事了；反之，社会上如果寂静得除了当权者自言自语、发号施令就什么也听不见，说不定就会发生比改朝换代更糟的事。现在我知道您是什么人了，但我不会说出来。您不是个信命者，如果信命，您早该死了。您犯刑犯煞，能活到今天，算是奇迹。

老戚：我至今不明白信命好还是不信命好。

孔庆天：当然信命好。命象一把无形的巨剑悬在空中，让人们害怕。有人说算命这一行是封建迷信，却没有想过，人是应该迷信的，这是一种强迫你自我约束的力量。要不，国家就只有靠严刑峻法才能制止人们去为非作歹。我们这行的宗旨是让人“上畏天命，下守法律”，积德行善走正道，这同官方宣传的大前提一致，区别只是报刊文章教条多些，不像我们天天面对私人，人家不口服心服就赚不了钱。

老威：说来说去还是钱。

孔庆天：您这样讲就没意思了。算命不是慈善事业，除非您的命糟得无可救药，我怕招惹晦气不敢收您的钱。您想想，在西方，还有心理治疗诊所，收费特别昂贵，而我这也算大半个诊所吧？不瞒您说，自改革开放以来，命相业一天天兴旺，特别是现在，有点档次的老板、文人有点什么疑难或不顺，都兴打个卦、算个命。前两年兴起《易经》热，有关《易经》的书出了几百种，印数都上好几万。在青羊宫，还有一个挂牌营业的《周易》研究会，我去试过一回，原来会里的“专家”都是泥腿子跑摊匠，平均文化程度连初中也不够。这从反面说明了，中国老百姓从精神上开始“病急乱投医”了。毛主席有首宿命诗，里面有“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句子。意思是：雄关漫道如钢铁屏障，我这辈子还要过多少生死关口？惨败了，又从头开始；而前途渺渺，如海的苍山，如血的夕阳，就是已经注定又不可捉摸的天命么？多么深不可测的古意啊！这不仅是毛主席个人命运的写照，而且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暗示。再过两年，就是下个世纪，我们都处在翻越一个大的时间门槛的心境中。我已经 88 岁，说不定今晚睡去，明早就醒不来了，下个世纪会怎样？谁说得清楚？您说现在不稳定么？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事，您说今不如昔？生活水平却大大提高了。款

爷多如牛毛，花起钱来哗哗水淌，从前别提一般百姓，就连中央首长也没这样大手大脚过。像我这样的瞎子，算了几年命，居然能买房子，这在解放前连想都不敢想。可是您发觉过么，这当中有点不对劲。钱越多越不对劲，人们连老祖宗也忘了，活得不踏实。我是孔夫子的后代，我对外却从来不提家谱、血缘。孔孟之道我都一知半解，愧对列祖列宗呀。虽然《论语》里一再提到命，夫子却认为命是不可违，也不可算的。

老戚：人得吃饭穿衣呀，孔夫子的学生中也有做生意的。

孔庆天：人们感到慌，无头苍蝇一样为生计奔忙，为生计你争我斗，缺乏安分过日子的心态。我敢说除了烧香拜佛的，就数算命的多。我一个礼拜工作四天累得够呛。形形色色的人，算的都是不需要算的俗事，大家都丢了魂了。那些高官、富豪、自命不凡的老板，甚至黑社会的杀手，天不怕地不怕，却到这里来，心甘情愿把命交到我这个瞎子手上。人们在遭遇不幸时，常绝望地骂“老天瞎了眼”，难道这世界真是由瞎子指路么？

老戚：过去好还是现在好？穷而踏实好还是富而空虚好？

孔庆天：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没有什么好不好。

老戚：大师，两天前，我的一个朋友做生意亏了本，债主堵到家里，他只好躲在外面。他老婆急得跳墙，只好到明清茶楼去找术士某某，某某掐指算出近日有血光之灾，因债主已花钱雇了杀手。不过，某某说没关系，只要将他画的符在门前化掉，在卧室外挂面镜子，买五条活鲫鱼向府南河放生，并且用红纸包一把米，四毛钱，在日落时丢在十字路口上，如果有人叫你，千万别回头看——做完这一切，厄运就过去了。大师您说这真的灵验吗？

孔庆天：您说的某某我认识，他把乡间巫术用到城里来了。这是一种仪式，如果您一心一意做完它，就不知不觉进入与现实生活

格格不入的冥想世界，产生一种通灵。您在祈祷一种看不见的力量阻止灾祸。或许，您的朋友会因此而借到钱，还债然后转向做别的；或许债主会让步——心诚则灵嘛。但是，对于命运，可不能采取这种实用主义态度，逼急了才想着找术士化解，否则，从长远来看，这种人是没救的。

老威：大师令我茅塞顿开，小子感激不尽，刚才我掏钱肉疼，令您见笑了。

孔庆天：您的七窍通着呢，应该是您令我茅塞顿开。将来君若春风得意，请不忘随地烧香告诉我一声。

采访缘起

1998年9月5日，我与友人老谢、老田乘游船溯乌江而上，至彭水县，换乘小火轮抵龚滩嘴，离贵州苗族的地界不远了。

几年前，我作为地区的民间文化工作人员，经常在这一带从事资料搜集，如今故地重游，感慨之余，谢绝了同伴相携旅游酉阳、秀山、张家界的美意，在此逗留了三天，寻当年山中老路，竟与90岁的风水先生黄天元重逢。这是值得一记的奇遇。

风水先生黄天元



风水先生隐居（活葬）之地。《南极神数》里有歌诀云“千里游龙落笔架，三代运势起春雷。”

（曾衡 摄）

老威：老先生，我能与您摆摆龙门阵么？

黄天元：有啥好摆的？

老威：这个，这个。

黄天元：我不是风水先生，您不要听人家乱说。

老威：误会了，我不看风水。我是外乡人，即使相中了此地的风水宝地，将来骨头也葬不过来。

黄天元：你不要老跟着我，天擦黑了，这儿两条路明摆着，上坡、下河，



日时香火
鼎盛的庙宇现
已败草凄凄，可
见风水也是蛇
流转的。

(曾循 摄)

你走哪一条？

老咸：走 12 年前的那一条。

黄天元：路早变了。

老咸：山里小路，能变到哪儿去？当年我在文化馆，与彭馆长一起沿着酉水搜集民间文学，一扎就是几个月。原来在这岔口边，有座农家院子，半片茅草半片瓦，当家人是位 81 岁的瞎婆婆，叫冉红玉，唱起山歌嗓子一下就变脆了，比 18 岁的大姑娘还脆。我曾经提着个录音机，守着她录了一个晚上。你肯定听说过她吧？

黄天元：她过世 6 年了。坟地还是我选的，就在这上面。

老咸：院子呢？她家里的人呢？

黄天元：早迁走了，冉红玉命硬，阴宅当头，死人就压了活人。

老咸：我能去看看她的坟么？

黄天元：天晚了。



风水先生
破败的山中旧居。

(曾循 摄)

老威：先生您还担心啥呢？12年前，彭馆长就请您看过水，那时您留个平头，胡子还没白，看上去超不过60岁。“您在一碗清水里能看见啥？”回忆起来没有？我曾经站在一边这样问您。您只回答了一个“魂”字，让彭馆长为他的父亲入土安魂。彭馆长说已经安了，您就拿冒烟的香头在碗边连敲三下说：“魂生气了。”把彭馆长吓得脸煞白，因为他父亲的骨灰盒的确还放在家里。据说您还培养了一个看水神童？

黄天元：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罗。

老威：这么说，您准备收我多少钱？

黄天元：你印堂发亮，没灾可消。好吧，既然是旧人，就给50元咨询费吧。你们文化馆已换了好几批，每次下来，都要千方百计找我徒弟“看水”算命。嘿，还是些大学生呢，被一个9岁孩子唬得一愣一愣的。我早洗手隐居了。你看，冉红玉的坟在这儿，这命有啥好算的？我比她小3岁，年轻时还追过她，隔着山沟对歌。她是方圆几十里的一枝山茶花，追她的人太多，没人能唱得过她，我只坚持了半宿就败阵了。现在咋样？还不是归了

土。这茅草长得多深啊，她一辈子要强，都没跳过龙（农）门，把这一脉旺起来，所以我为她选了个好归宿，比冉土司的地脉还旺，你信不信？

老威：你和她有啥关系？

黄天元：她这辈子嫁错了人，我要通过阴宅的风水，把这错改过来。

老威：人死不能复生，咋个改？

黄天元：我要与她结为阴世夫妇。

老威：梁山伯与祝英台？！生不同房死同穴？！

黄天元：乾坤日月有亏盈，母亲先死人幽冥，堂上父亲还现在，正是人尽亥时生。

老威：您念的什么？

黄天元：《南极神数》。待我寿尽归土之时，就是子孙发达之始。歌诀云：“千里游龙落笔架，三代运势起春雷。”

老威：我一句也听不懂。

黄天元：此为笔架山，你抬头望出去，仔细瞧，不止一个笔架，而是连续三个笔架。三起之落，三三得九，九九归一，穷尽了天地、阴阳间所有的变数。这块阴宅，我用罗盘测过好多次，正好朝西歇在第一个和第二个笔架之间，从右手下退30里，就扎入乌江的龚滩嘴，俗话说：“笔走游龙”。咋样，认清楚了？

老威：笔走游龙？您在谈论书法？

黄天元：啥子书法？这正应了“千里游龙落笔架”啊。可惜这么大的气象，世世代代都没人发现、利用，所以本该出天子的地方，只出了一门冉土司。

老威：在旧社会，土司也算个天不管地不管的土皇帝。据传末代冉土司临终时，学蜀相诸葛亮，于崇山峻岭中遍布了72座疑冢。抬过棺材的人全被杀了陪葬，所以土司墓就成了永恒之

谜，吸引了无数盗墓贼，不少人把一生就押在这个无底的赌注上。说不定啊，这脚下就是真墓，您认为的好风水早被盗墓贼给悄悄破了。

黄天元：风水不可能让冉土司占尽，要不他的后人中总有发了，不会这么无响无臭。况且，地脉运行，风水也是流转。

老威：您的后人中会出天子？

黄天元：天机不可泄露。

老威：您把“阴世夫妇”的事给家里谈了么？因为死后怎样，您可做不了主。况且冉家婆婆的后代也不会同意你们合葬吧？

黄天元：这是关系到千秋万代的事情，我肯定会给两家儿女讲清楚。这些年，大家越来越信风水，起阴宅和阳宅都要请人看，不选好日子，绝不破土动工。我这一辈子，都在为人民服务，现在 90 岁了，也得为自己服务一次。唉，其实我早有准备，让冉红玉先把地方占着，如果儿女不尊重我的意思……

老威：那又咋样？

黄天元：我就自己到这儿来。

老威：您不可能自己埋自己吧？

黄天元：我的阴宅早修好了。

老威：在哪儿？

黄天元：在向西的那些岩石里，你看不出来，除了我，谁也看不出。

老威：这么隐蔽？我还以为您会扒开冉婆婆的墓，连着垒座双头坟呢。

黄天元：我为啥要做给别人看？暗地相通就行了。

老威：这个，还是有点别扭，总不能一点标记也没有吧。

黄天元：我看风水的名气在外，如果为自己选地的消息一传

开，这儿就不得安宁了。这几年，风水、算命越来越吃香，城里和农村差不多，稍微多挣了点银子，就急爪爪地考虑后事。去年，我少说为 50 多家测过风水，今年无论如何不干了。可是许多人都在传，黄老仙勘过哪匹山，哪条沟，于是就一窝蜂去，把地皮子越炒越热，墓修得一座比一座大。我们乡长才 50 多岁，墓起得比他现在住的院子还大。我前年随便为他选了块地，他就跟着把七座祖坟从十里外迁过来，雇了石匠、泥工、砖工、基脚工一大群，热火朝天地干了三个月，把墓弄成私家园陵了。完工时，乡长请了二十桌客，我屁股一拍就躲了。人太贪，身上就带煞，我怕客气转眼就变成晦气。

老威：这风水宝地是您选的嘛。

黄天元：啥地葬啥人，该如何葬，都有规矩，您改了这规矩，乡长赶到县长，甚至省长的头里，就要折阳寿。上乘风水为阴阳五行汇集点，当不盈不冲，墓起得超出了规格，就叫满。你不晓得，乡长在墓里把行头都布置齐了：桑塔纳轿车、龙床、夜总会、卡拉OK 包间、跨国公司董事会的椅子，本来还想打些小姐，可石匠的手艺不行，凿子把石头人的五官啃得稀烂，认不出男女——唉，区区风水小事就硬生生地闹成大事，电视台和报纸争着曝光。上面来调查组，乡长倒霉了，又牵出一串书记、村长、镇长和村民组长，原来没有一个清官，都是铲国家和农民的地皮，并把贪来的钱投资修墓。有领导带头，看不起风水的乡下人也晓得靠着大户边儿圈阳地，通往县城的盘山公路，向阳的一面就有几十座空墓，远远望去，还以为是别墅区呢。

老威：您没事儿吧？

黄天元：咋没事儿？祖坟被毁了，乡长一肚子火，转头就咬我一口，我又成了大搞封建迷信的坏人。我藏进了阴宅，没人晓得下落，他们就拿我的看水徒弟出气——电视台拍了一集神童如

何算命骗人，大家都看了，背地里对我黄家指指戳戳。当然，这跟乡长到处散布谣言有关，他说就因为信了我才倒霉，吃了官司，还连累后人。

老戚：胡说。中国法律不兴株连。

黄天元：一人当官，鸡犬升天，官垮了，哪个屎你这一壶？

老戚：这倒是实话。

黄天元：所以乡长认为我断了他家财路。乡里乡亲也不认黄，纷纷检举我。公安局找不到人，就把我家里请进去审问。这样拔萝卜带泥，又扯出 20 多个风水先生，一溜押到群众大会上，与人贩子站在一块批斗。劳改、劳教的都齐了。又把祖庙旁边的瞎子算命市场也取缔。当然，90 岁的人，在这儿也算国宝，所以抓住我又能咋的？即使劳改了，也干不了活儿，也避不开对风水和长寿感兴趣的人，我有群众基础。文革时，打击封建迷信比现在厉害，我照样做业务。

老戚：我在县城住了两天，市面很清静，看来整治之后，风水算命都萧条了。

黄天元：跑到贵州和湖南去了，几十里就过省界，现在交通又方便。四川搞运动，其它省不一定搞。如果嫌抢人家的饭碗不吉利，还可以跑更远些。福建、浙江都信四川，这边的风水先生有根基，随便露两手就把当地的歪货给盖了，这一行竞争激烈，谁的本事硬，发财就快，靠真才实学稳当。

老戚：据我所知，全国都在取缔封建迷信。

黄天元：封建迷信指的是跳大神吧？前一晌，风水、算命一歇下去，陈巫婆的业务马上红火，门槛都被踩平了。陈巫婆只会一种本事：纸符化水，让人喝下去，然后就披道袍叽哩哇啦地兜圈子乱跳，说啥王母娘娘下凡附身。天晓得啥子鬼附了身。箩筐大的字不识两个，跳一盘神还收人家 50 元，太黑了。

老威：陈巫婆一跳就个把小时，70多岁的人，还把灰盆子（有时是篾筛）顶在脑壳上，人不人，鬼不鬼，也够辛苦的。

黃天元：你晓得个屁。农村人长那么厚的膘，丢不丢脸？她瞎跳当减肥了，哪能消灾去病，预测未来？哼，打击风水，跳神就火；老子倒霉，陈巫婆就吃香，这世道的风水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真他妈被盖里面逮耗子，这边按下去，那边又冒起来。

老威：您算个德高望众的老江湖。

黃天元：所以，我不把陈巫婆放在眼里，纸符化水，治不了病也医不好人。这阵风一过，大伙又会想起黃老仙。我自幼个读孔孟书，以后又多年研究《易经》、八卦、《梅花易数》、五行、阴阳宅基学。我连《推背图》、《天宫书》、《黃帝内经》都反复揣摸过，如果放在过去，说不定渭滨姜子牙早就逢上文王了。

老威：高寿之翁，志向还如此远大，佩服佩服。

黃天元：志向远大不顶用，我这辈子怀抱子牙之才而混迹于世，皆因祖上风水平平，还略有败象。我花了好几年功夫踩勘地理，终于寻到这块“笔走游龙”的宝地。根据命星推断：待我享尽阳寿，与冉红玉行阴间合礼始，黃氏一门，三代之内，必出王侯！封地万里，光宗耀祖。五代，游龙出海，以笔力而文治东夷，以分庭抗礼而震惊天下；至六代，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老威：如此了得的风水，老先生何必与外姓人分享呢？

黃天元：我阳妻病逝得早，况且自然灾害期间，遍地饿殍，哪有风水一说？我一家几口，刨土葬亲，坑还不及三尺，人都饿趴下了。由此可见，堂客她命薄，骨头轻贱，一旦迁入贵地，风水就破了。而我一人独葬，阴阳不调和，风水也不圆满。冉红玉与我的阴世缘分是天定的，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这种百年奇缘我讲不清楚，即使给你讲了，你也不清楚。但生死循

环，天作之合不能违啊。

老戚：老先生的学问的确高深，不仅我不清楚，天下也没几个清楚的。

黄天元：所以世道险恶，能够抽身尽早抽身。

老戚：朝哪儿抽身？今天不是古代，连个隐居的地方都没有。这山，这水，早晚得开辟成旅游景点，如果生意好，在山下修个山门，再打广告，说是最新发现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这样历史与自然的遗产都上档次了，人们就会乘乌江火轮，潮水般涌来，说不定您百年之后也会成为一个招徕游客的绝招。

黄天元：你的心境太乱了，我们下山吧。

老戚：您不是住在这儿么？

黄天元：我住在村上，我的儿女跟孙子辈住在县城。

老戚：您刚才说“曾经藏进阴宅”。看，月亮爬上第二个笔架了，这风好像来自天堂，有一股幽香，如果这时冉婆婆从墓里出来，肯定脱胎换骨了。鬼都是好鬼，美鬼，在草上飘来飘去，令人摔跟斗的鬼。老先生，我们回吧。

黄天元：回吧。我不会当着人下阴宅，我花了很多年的功夫，一个老年人，容易么。其实我已经搬家了，看风水赚的钱，我起了两座院子，儿女分了，后来又转手卖了，因为我要跟孙子、重孙子辈去城里凑热闹，一大家子挤楼房。老人好清静，但我的儿女都跟他们的儿女享福去了。我不去，要分钱尽管分，反正我不去。人太老，一脸的皱皮疙瘩，年轻人看久了，就不习惯。你孝顺我，为我倒屎倒尿，我还觉得是个负担。算了吧，冉红玉一过世，我的尘念就绝了，虽然还勉强给人看风水，但魂已不在这上面了。你看，那块岩石大半悬空，岩石周围还有岩石，像钢筋水泥浇的，没一条缝。只有我晓得咋进去。60年代，这山上有只虎，饿晕了，就下村里扑人。后来全村人都打着火把、

敲着锣赶上山，老虎走投无路，就从那块岩石上跳下去，摔死了。人们连夜剥虎皮，露天架锅煮肉，百多口，每人分到一小砣。据说这是川黔五县的最后一只老虎。我刨出的或许是虎洞，20多米深啊。我每个月都要下阴宅住几天，有冉红玉陪着我，阳世就一天比一天淡。你嗅到的香气是陈艾、苦蒿、黄莲、白芍、薄荷、马桑、断肠草，有野生的，也有我种的。我在这一带撒了二十多味草药种子，土太肥了，春天撒种，夏天就蹭蹭朝上冒，到处窜，岩上的浮土窜满了。这比庄稼管用，心情好，折些草药压在舌根下，就感到饱，感到身体从内到外透着香。这些草药防虫、除虚、明目、解毒，能治多种病。随便扯几把配成方子，搓挤成浆，搽一搽自己的口、鼻、耳、腋下、屁眼，都能驱除邪气、浊气、烟火气，百虫不侵。现在我经常几天不吃饭，睡在阴宅里，即使吃，也不要熟食。我还剩五颗牙齿，一天能慢慢将两把米磨成浆，一点点吞下去，就很满意了。阴宅里太黑，如果有虫子钻进嘴里，我也一口含住。蚯蚓味道还好，蛇和蝎子不敢惹我。

人太毒了，比蛇和蝎子毒得多。特别是现在的人，以前是吃阶级斗争的奶，如今又吃升官发横财的奶，都练得五毒俱全、六亲不认。不相信？你捉条蛇来，隔着一层衣裳咬它一口，不出一分钟，再毒的蛇都死。过去的人没这么大毒性，因为吃简单，想法简单，粮食不上化肥。《三字经》里说：“融三岁，能让梨。”连娃儿都让水果给人家吃，难怪孔夫子要讲“礼仪之邦”。

人生先做加法，后做减法。许多人一辈子做加法，结果越活越累，累死不到头。开国帝王打了江山坐江山，坐了江山又想传给子孙万代，这就是没完没了地做加法。其实帝王与商人有啥不同呢？江山也是一笔生意，哪能永远只赚不赔。所以加法做到一

定时候，就得一点点减。我90岁了，生命快减到零了。零就是自然，就是没有脾气的风水，就是金、木、水、火、土。我的后人在这上头增加一点点，都是一。

老戚：丢开名利，谁也不会关心您的下落，老先生好自为之，不要急于求成，草草活埋了自己。

黃天元：这是我的家。我会享尽天年，为了黃家后人“笔走游龙”。

采访缘起

61岁的黄志远是我父亲的同事，80年代拉家带口，擅离职守，回到故乡成都，为蔑视户口管理的所有打工仔之先驱。

黄老师黑人黑户，又要养家糊口，又要担惊受怕，其多年的酸甜苦辣，一言难尽，好在他已基本安居乐业，小杂货店的生意也算不错。

不过，大学是白念了。1998年10月9日下午，我爸特地嘱我在白果林家中多布置酒菜，招待若干年不见的黄同事。“只有在你们家，我才感觉自己是个知识分子。”他苦笑着，客套着，我却觉得亲切，遥远的亲切。

乡村老教师黄志远



五十年代的乡村中学教师一家。

老威：您好，黄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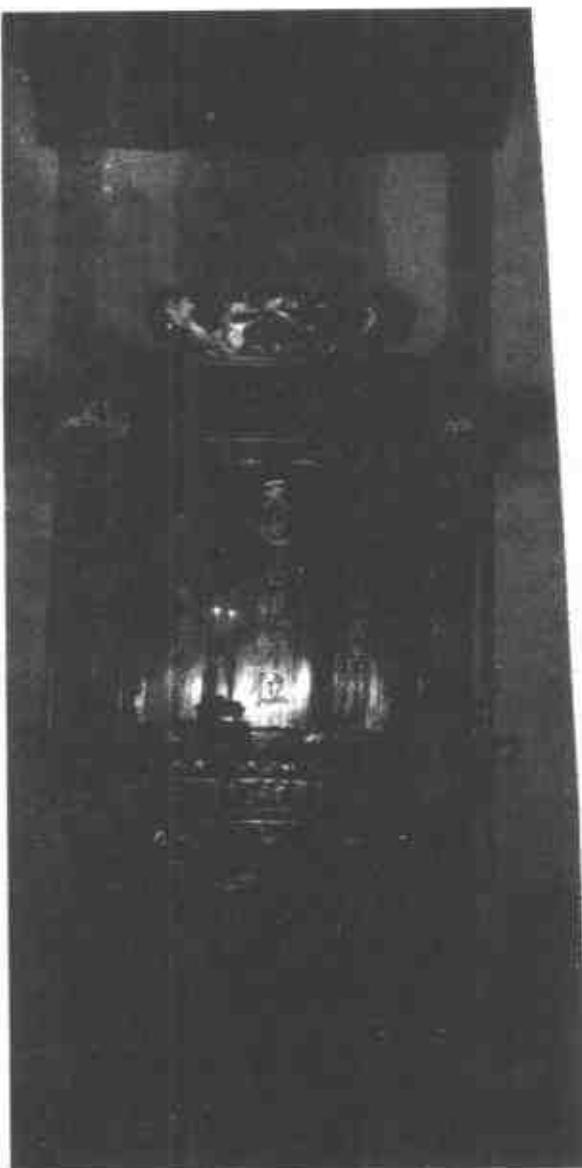
黄志远：这不是二毛么？多年不见，差点认不出了。

老威：您啥时回成都的？

黄志远：84年。

老威：这么早就退休了？

黄志远：我自己跑回来的，公



“天地君亲”，中国旧式的传统教育。

职、户口都没要。你看，一黑就黑了这么多年，凭几根穷骨头硬撑着谋生活，我起码干了五年搬运工。嘿，我学的物理，当搬运工倒挺合适。

老威：这不是与农村打工仔抢饭碗么？您是大学毕业的中学老师，至少代课不成问题。

黄志远：没户口，代不了课，连高考补习班也干不成，运气好的话，偷着干点上门家教。我人老皮厚，豁得出去，娃儿婆娘就惨了。娃儿上不了学，婆娘打零工受歧视，更气人的是经常查户口。妈的，这是我自己的家乡！我倒成了外来人口！当然，现在宽松多了，老黄历也不提了。

老威：您当时 45 岁，再干 10 年，体面退休多好。

黄志远：那鬼地方，多呆一天都烦。

老威：磨了这么多年，还这么冲动？

黄志远：我们这批人，到底为谁在活？一晃就 60 岁

了，黄土埋齐下巴了，可仔细想一想，脑子里除了运动和饥饿，啥都没有。50年代没赶上中苏友好，60年代没赶上文革，70年代没赶上平反，80年代更没沾改革开放的光。90年代嘛，终于攒钱开了个杂货铺，可他娘的税费又多。唯一的安慰就是娃儿跟我自学成才，读完了大学，可现在找对口的工作又困难。

老威：您这辈子的确艰难。

黄志远：我刚好是61年上的大学。如果早生一点，还可以跟苏联专家唱歌、跳舞浪漫一回，相隔多年，我会唱的苏联歌还是比中国歌多；如果晚生一点，读书时撞上文革，也能响应毛主席号召，造反有理，风光一回，说不定还发配不到山区去。偏偏我刚够臭老九的格，就充军到盐亭。

老威：您一直都有“充军”的感觉？

黄志远：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脑子容易热，特别是家庭出身不太好的，党团组织稍微表示一点居高临下的亲近，脑子就热得稀里糊涂，让堵枪眼也上。我家成份是“小资本”，当然应该感恩戴德地服从分配。我是表了决心的，直到风尘仆仆地下放盐亭，又由盐亭再下放到山垭公社，《决心书》还贴在衬衣口袋。老实说，初次下乡的经历虽说不上美好，但至少是新鲜的，也有几分激动。

老威：您讲一讲。

黄志远：你没听你爸讲过？

老威：他是更老的一代人，跟您有差别。

黄志远：我从没见过那么破的公路，有点像《地雷战》里日本鬼子进村时，经常挨炸的那条道。我们在这条道上颠簸了几个小时，天擦黑时，客车还熄火抛锚了。一时修不好，就由一个同车的山民马拉松长跑着去通知公社。我们站在路边等。而挤成一锅粥的山民乘客们纷纷下车，各自赶路。一会儿，接我们的手扶

式拖拉机出现了，我们心急火燎地坐上去，突突突地向前。头上悬崖突兀，月儿高挂，阵阵寒风刮得人直打哆嗦。突然有一艘甲板样的巨岩挡了一半道，拖拉机减速，小心翼翼地绕过去，公社到了。

白天一车人，夜里就剩我们三个大学生，像逃荒的。山垭不通电，百多米长的一条土街，只有场口修理农具的铁匠铺还亮着汽灯，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从铺板里传出，使四周显得更寂寞了。真有点像在月球上走路，连野物也是静悄悄的从我们身旁滑过去。

老戚：有些像梦境。

黄志远：多年以后回过头去想，也差不多。那真是个奇怪的铁匠铺。据说原来是座庙，庙旁的岩壁，凿着个八层楼高的观音菩萨，几百年香火不断，山垭就是围绕着这庙，逐渐发展成乡场的。后来破除迷信，庙改铁匠铺了。冷落了菩萨，生意还特兴隆，农忙时，叮当声要响过后半夜，因为坏损农具总是堆积如山。

老戚：得罪了菩萨，也没见报应？

黄志远：文革时，菩萨被炸了，当地老乡都传要降灾，结果不但没灾，铁匠铺还扩大为修理厂，厂里的十几个农村铁匠都升格为工人阶级，死保当权派山皇。那时山垭中学是造反派的天下，戴红箍的学生们上街造反、游行、开辩论会，总要路过修理厂。于是学生们有针对性地呼口号，唱歌，有时还挺抒情。你想想，几十个喉咙在群山夕照中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还真能把自己感动得掉泪。而此时，铁匠们都丢开铁砧，亮出半身黑亮腱子的肉，一人握一把长柄二锤，齐刷刷地列队门前，敌视学生娃。我从来没进去过，怕被放上砧子当农具给修理了。铁匠在学生的谣传中比吃人生番还凶。有一回，学

生组织头头张红梅失踪了，大伙们怀疑重点就是修理厂。于是调集了几百人，甚至把武装部的枪硬借出来，围剿。攻了半天，铁匠们真红眼了，拉开铁栅子冲出来拼命，把二锤舞得呼呼山响，一会儿就扫荡平了一大片。许多学生中锤当场就哇哇吐血。幸好二锤没往人的脑瓜子上砸。造反派急了，仗着人多势众，终于掀翻铁匠铺。那次还开了枪，把一个铁匠的耳朵崩飞了。嘿，你看我越扯越远。

老威：没关系，我正听得上瘾。

黄志远：刚才讲到铁匠铺。再朝前几十米，就是门口蹲着石狮子的公社及武装部。我们拾阶而上，书记领着这个简陋衙门的所有差役迎出来，为了“贵客”临门，炊事员兼值班员一手马灯一手汽灯，正准备鸟枪换炮，把会议室照个雪亮。

与公社书客套了几句，我就饿哑了，同伴张大春忙接过话头。炊事员笑嘻嘻地端来晚餐。此时已近夜里9点，书记说：“我再陪你们吃一碗。”就不客气地坐定会议桌上首。见我们发愣，他又解释：“农村人开夜饭，也是这时辰。我直到现在还不习惯五点半吃机关饭。”

水瓢大的土海碗，酸菜包谷面粥堆出了尖儿，筷子朝里一搭，婴儿拳头一般的红苕露出来，嗖嗖冒热气。我超水平发挥，没用咸菜就吞掉一碗，撑得腹大如鼓。这是踏入工作岗位的第一天，绝对不能剩碗底。张大春把胃病胀翻了。哎哟了一夜。

可书记连吃两海碗，方停箸摸烟。张大春见抽的是“春城”，忙掏出兜里的“大前门”递上，并撒了一圈。你不知道，这粥包括盐亭人民赖以为生的三大特产：红苕、包谷、酸菜。贮人地窖的红苕是农民大半年的主粮，因糖份重，常吃造成胃酸过剩，所以非与酸菜搭配着吃。酸菜的制作是将大青菜洗净，晾透水气，塞进大瓮密封。几十天后，青菜沤得发霉，呈酱色，指头

蘸尝一点，又臭又酸，能倒掉人的大牙。沤得好的上等酸菜，瓮面起一层鼻涕状的“悬水”，伸手抓一把朝上提，能吊三尺多长。酸克糖，红苕吃出的毛病就解决了，但据专家考证，盐亭之所以成为全国食管癌胃癌的传统高发区，跟红苕酸菜有直接关系。

老戚：您对吃还很有研究。

黄志远：那年头的伙食太次，似乎每个人都研究吃，不是味道，而是啥能吃，啥不能吃。我放在吃上的心思肯定比教书的心思多。所以，我们觉得公社书记不错，人实在，待客用大海碗。人家是三代铁匠，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钻进农具修理厂重操旧业。闹文革，铁匠们都成保皇派，跟书记打铁有直接关系。批斗走资派时，铁匠们劫了法场，从此书记在修理厂躲了一年。后来厂被攻破，造反派就将书记揪回中学，与校长关在一块，天天喊着口令，让一长串大小走资派光着脚，跑操，刮风、下雨、晒太阳都跑。学生们换着喊口令玩，时快时慢，把走资派摔得鼻青脸肿。终于有一天，书记的铁匠性子发了，就与学生们打起来，结果被揍得大小便失禁。学生们不解气，把他架在毛主席像前认罪，他死不开口，原来他把舌头尖咬断了。

唉，悲惨事说不完，书记死了好几年，我都还记得刚到山垭公社那夜，书记的分分头，像土改电影《槐树庄》里的富农。可深秋天气，他只穿单衣，一脱下来，就显出黑亮肌肉的铁匠身份，我总觉得他的脸与他的身子不协调。他曾留我们到修理厂过夜，说铁打完了还可以蹭包谷酒喝。可惜我们奔波一天，太累了。刚在招待所躺下，公社机房又接到学校电话，告之邓校长已亲自带人上公社来接新老师。

那时是个热情过盛的时代，虽然书记在电话中一再说“睡了”，可校方回答“邓校长已在路上。”我们激动得倦意全无。

我不是诗人，要不真要写诗了——书记陪我们站在垭口，极目远眺脚下朦胧一片的山路，一长串火把蜿蜒蜿蜒地上来——那十里开外的乡间中学就是等着我们奉献青春的地方。

我们夹在一群大孩子中间一直下坡，曲曲折折地下到底，就是山垭中学。行李由孩子们扛着，一左一右是邓校长与杨主任。有时，路变窄了，人就排成单行，路旁是深沟，当脚偶尔踩虚时，总会有手或前或后地拽住你。接近学校时，要穿过一片坟地，火把照着人影子，一伸一缩的，与墓间的纷飞磷火互相牵引。我想起书记临别时说的话：“坡太陡，机耕道也莫法修。年轻人，做好长期吃苦的准备，改造世界观肯定不像电影演的那么容易。”

老戚：您对那苦地方还是有珍贵记忆嘛，至少铁匠书记不错。黄老师，我觉得您是 90 年代青年志愿者的先驱。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人才，却主动申请到最穷最苦的山区希望小学教书，体验生活，一年或者两年。

黄志远：这有啥意思？中国山区是改造不过来了，不管投多少钱，最后都变成了水里的月亮。光秃秃的山梁子，一座接一座，你在上面走半天，风景是一样的，脚和眼睛都累了。谁都不愿脸朝黄土一辈子，能跑的都跑了。毛主席时代出门要证明，人不敢跑，哪怕种着庄稼饿肚子，也认了。邓小平把一切都搞活，泥腿子比我们跑得更远更欢。

老戚：您读过山西作家李锐的小说么？吕梁山那么苦，农民还是眷恋自己的土地。

黄志远：瞎编嘛。每个朝代的作家都瞎编，因为农民从来不读小说。你编得如何他们也不晓得。文革中，浩然的《艳阳天》普及得宽，还有克非的《春潮急》，里面有卖假牛的场面，挺生动。说实话，没一个中国农民真爱自己的土地，谁愿意世世代代

种地？只要有更来钱的活儿，都丢下地跑了。树砍没了，水不能喝，人也会渐渐走光——在成都和绵阳，我偶尔也碰见我的学生，当官、做生意、打工、下苦力都有，走运和倒霉的都有，他们共同的理想就是跳农门。有一次，我在磨子桥一带拉贼三轮，撞上城管缴车，躯闪不及，三轮就被弄上大卡车拉走了。我绝望得两眼发黑地蹲在街沿边，正考虑下一步该靠啥谋生，后面却有人拍我肩膀。一回头，见一个胖老板冲我叫“黄老师”，我早忘了我是老师了，所以猜不出对方为谁。

胖老板硬拉我去一家夜总会坐，还自我介绍，原来他是山垭铁匠书记的老二，80届的初中生，我当了他三年班主任，后来他去县城上高中，去绵阳上大专，进一步的情况我不晓得。我看了名片，才晓得这小子是这家夜总会的总经理。

铁匠书记的儿子还是念旧的，他请我喝酒，还给城管的熟人打电话，设法把我缴去的三轮弄回来。这小子门路野，酒量也大。他一会儿就灌完一瓶红酒，醉醺醺的，一定要给我叫小姐，把我的魂都吓出窍了。他说：“黄老师，您和我爸一个城市一个农村，但命都一样的苦，这辈子太没意思。做学生的今天一定要让您享受享受。”我说：“师道尊严还是要讲的，你咋可以拉老师下水？”他说：“课堂上是师生，下来就是朋友——这都是您以前教导的。我爸死得早，老师您偏向我，经常留我在您寝室做作业，今天我非要报答您。”我说：“您虽然是好意，社会风气也如此，但你爸的在天之灵……”他哈哈大笑着打断我：“算了吧，人死如灯灭，哪有灵？老师这是迷信嘛。”不容我多话，两个小姐就上来挤着我劝酒，把这张老脸羞惨了。我的学生见我手脚无措，就起身说：“慢慢来，我这会儿去给您找个更漂亮的，把你们那代人的世界观彻底改造一下。”

我好不容易挣脱了两个小姐，冲出包间，却见走廊拐弯处围

得水泄不通。我浑身都汗湿透了，凑近人堆却见我的学生正殴打一个小姐，他揪住她的头发，手、脚、膝盖、倒拐都用上，小姐被揍成一团，满脸血，浑身打抖；旁边好几个人拉架，可这铁匠的后代力气大，无论如何分不开。再打下去肯定出人命，我不得不上阵相劝，还挨了学生一拳。

我学生见我鼻子出血，一愣，酒才醒了些。他说：“这婊子嫌您老！妈的，她那尻有多嫩？起码几百男人搞过，有多嫩？”我实在听不下去，只有赶紧走。三轮也不敢去要，生怕铁匠后代再找到我。可有天读《华西都市报》，竟无意在社会新闻栏里看到关于我学生逼良为娼的追踪报道，当记者采访被拘留的“打人凶手”时，他说：“我的老师太穷了，小时候，他对我那么好，长大了，我为了他被关几天也值得。”

老戚：世上竟有这种“念旧情”的学生！

黄志远：他爸在阴间还不气死！有时我不明白，老毛和老邓谁对谁错？开放好呢，还是关门好？铁匠后代不打铁，到大城市来乱使力气，结果变成害人虫。比他混得差的更是害人虫，宁愿瞎闯，也不回老家。

老戚：瞎闯不动的，总留在家里吧？

黄志远：朝人多的地方搬。混出人样的，到绵阳或成都继续混；次一等的，在县城或郊区定居；再次一等的，迁往大的场镇；最差的，也靠近乡场。地再大山再高，祖宗的骨头埋得再多，但传说的风水说变就变。听说山垭中学也撤消了，房子平了，操场填了，全弄成农田。我估计原因是师资缺乏，离乡场都十多里，生活太不方便，如果不用行政命令，现在谁愿意去？

老戚：山垭中学教学条件咋样？

黄志远：在当时算不错的，30多名老师，大学文化的占一半，甚至还有你爸那样教过多年进修学校的特级教师。那年头，

哪儿都是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谁也不觉得山洼洼屈才。据说山垭中学还是清朝末年一个同乡举人创办的，拱式教学楼与大礼堂还有点西洋建筑风格，农忙时，教学楼前的操场就成了晒谷场，农民们甚至把风车都搬来，干得欢天喜地。学校师生要进行篮球、足球等体育比赛，得事先与生产队好言协商。而体育课根本上不成，因为农村孩子从小到大都干农活，体育课天生就该满分。

教师、学生住的大、小四合院及女生院都有几十年历史，山湾堰塘绿水幽幽，兼作灌溉与天然游泳池。我看过电视剧《围城》，这儿环境有点像方鸿渐去的三闾大学，日本鬼子的飞机根本炸不到。也许，这儿该办成五·七干校或农业大学，因为学校所辖的果园、农田与菜地都由师生耕种。75年演《决裂》，其中有句台词：“这手上的老茧就是资格！”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以为今后大学不用考了。贫农出身的高校长趁着大伙热情高涨，擅自把全日制课程改为半工半读，并率先挑起一对大粪桶，在田地间疾走如飞。师生们争先恐后，每天下午都掀起种地热浪，以至收获季节，水果、蔬菜过剩。学校没有公粮任务，校长找公社好说歹说，才争取到义务送粮到贫困区的光荣，而水果、蔬菜吃不完，也没地方可送，只好烂掉。

老戚：赶乡场卖嘛。

黄志远：学校不兴做生意，况且农村，不占肚子的东西不好卖，总之，20年中，我可能有5年在认真上课，恢复高考，邓小平复出，学校为适应形势，才划分出教学组，整理教案。此前，我这教物理的，也教过数学和语文。文革武斗时，山垭中学分成两派，造反派一占上风，就将以校团委为核心的保皇派撵出校园。附近农民也有组织，叫“农奴戟红色兵团”，与学生们观点不一致，校方就鸣钟集合宣布：学校操场是革命小将的练兵场，不是小农意识的打谷场，而大礼堂是排练和演出忠字舞的红

色舞台，不是堆放资本主义黑庄稼的仓库——这一招太狠了，“农奴戟”抗了几天，就召集上千泥腿子沿山路游行，挺进学校，发出怒吼。几百学生娃都把《毛主席语录》贴在胸前，齐唱“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与农民对峙。

乡下人毕竟老实，胆小，不敢贸然出手伤人，而书生们伶牙利齿，越战越勇，“母校保卫战”持续了几天，县里造反总部来了两名特派员，声称：“再敢围攻革命小将，‘农奴戟’将被县革委定性为保皇狗。”如此狠话出自“县里”，农民们马上作鸟兽散。

清静日子没过多久，中央号召“革命大联合”，接着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贫下中农”进驻学校。嘿，风水马上又倒转，几个学生领袖被驻校代表宣布为坏头头，“刘少奇的走狗”。经过游乡和批判会，压服了学生们的嚣张气焰后，学校变本加厉演化为农场，不仅拾掇庄稼，而且养猪养狗养鸡。深秋重开课程，学生都不能按时报到。校空了，连早已熟悉的迎接“最高指示”的游行也失去了往日敲锣打鼓的热闹，“贫农代表”跺脚乱吼，急忙去校旁的刘家大院动员乡亲，不料乡亲没有熬夜的习惯，连“最高指示”也把他们搞不起床。

老戚：您虽然在乡下，但热闹看了不少。

黄志远：人像面团被搓来揉去，农民管理学校，除了监督劳动，就是忆苦思甜。你不搭理，他就三天两头找你谈心。忆苦饭更是常吃，师生都成瘦猴子了，还让“斗私批修”。农村学生很本份，都走几十上百里山路，从家里背粮食。学生食堂有口大锅，人横着躺下去只能够着锅底。下面煮水，上面架木格子蒸饭，全是学生们自带的五花八门的器皿。锅盖平时吊在房梁上，蒸饭才放下来。学生下饭顿顿是白水菜汤，没有一星油。长此以往，人会得甲亢病，学校也太黑了，师生打了那么多粮食，却一

粒也不抠出来。

守着个世外桃园，我最深的感受自然是饿。一个礼拜赶一次场，炊事员早早就出门，按教师的人头买肉，一人二两。星期天晚餐，大家无一例外地聚集小食堂，把碗摆在案桌上，等待伙食主任唱名、分肉。炊事员分肉手艺已炉火纯青，片数不会多不会少，连油与菜，也尽量平均。因为此时众多鹞子眼都随着“印把子”转动，你有私心，人家总会咳嗽，以示提醒。

肉碗到手，每个人都要本能地簸一下，才伸出另一碗打饭，一碗三两。计划经济时代，27斤的口粮定额，绝不含糊。为了改善生活，教师们成群结队夜捉青蛙，一会儿一大桶，剥皮白水煮吃，特鲜。

老戚：除了乱七八糟的事，您是咋教书的？

黄志远：你问我，我问谁？那年头根本就没固定的课本，只有讲“最高指示”没错。毛主席啥都讲过，就缺物理和化学，所以我也不敢乱讲。您爸是特级教师，讲陶铸的《松树的风格》，出神入化，就凭这一条，文革开始他就成“黑帮”。唉，这辈子太落魄了，连老婆与我的共同点也是吃。她是当地农民，小学文化，管刘家大院的榨面机。我开始去榨挂面，接着就经常接受她一把面的贿赂。结了婚后，她才嫌我吸面的声响太大，“一里外都听得见”。

老戚：您一个大学生，不嫌她土？

黄志远：我是臭老九，30多岁了，没人要的货；而人家当时是生产队一枝花，追求者满山遍野。我们秘密好了一年多，才公开。她爹见生米煮成熟饭，还叹息“鲜花插在牛粪上”呢。还是俗话说得好：“胃口一致就能成夫妻。”

采访缘起

这篇谈论进行了几次，最后一次是1998年11月6日，在成都百花潭公园门口的茶馆。

许长久50多岁，是下到川北某县的老知青，教过村小，在当时的文教系统还比较有名。

虽然他讲的东西年代久远，几乎没人再愿听，但我还是不知不觉被感动了。

小时候，我记得有部苏联电影叫“乡村女教师”，许长久无疑是它的中国版，如今，记忆的胶片已逐渐模糊，并出现多处空白。

村小老师许长久



村小老师和他的学生们。 (曾循 摄)

老威：我们谈了好几次，互相都感觉比较隔，什么原因？

许长久：我们是两个时代的人，历史背景一变，有些东西沟通就难。

老威：难在啥地方？

许长久：一时说不出来……你好像喜欢戳人的痛处……

老威：你可以反击，戳我的痛处，也许我会跳到桌子上与你吵。真的，我没感觉你比我大多少。

许长久：10岁，一个轮回吧。

老威：但你没把这世界看透，不肯豁出去，所以这辈子显得平了些。



农忙时分，
村小只好放长假，
让孩子们回到田
间与大人一道干
农活。图中的孩子
正在累中取乐。

(曾循 摄)

许长久：毛主席说：“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老戚：这也是你的座佑铭？不错，伟大。不过我要的不是这个。我不是新闻记者，不是圣人、领导，我对境界啦、白领啦、好人好事啦、一夜成名啦都不感兴趣，因为所有的成功者或超凡脱俗者全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连说话的语气都差不多。就像你刚才引用的最高指示，老干部、老军人、老知识分子、老工人，经过几十年风雨人生，现在离休，钓鱼或打太极拳的，都有资格这么说。虽然如今世道风雨飘摇，人心险恶，谁能完全“闲庭信步”？

许长久：你我都是小人物呀。

老戚：小人物的痛才是真实的，没人理解，甚至没处诉说的。

许长久：所以尽量别诉苦。鲁迅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写出了《祥林嫂》。这个农村寡妇的儿子被狼吃了，她一遍一遍地找人说，结果谁都不耐烦了。任何社会都一样，只有成功者有权诉

苦，名星、政客、记者和企业家，成天在电视、报纸上诉苦，老百姓反而喜欢听，还感动。例如某女歌星与男友拌嘴，掩面而去；某市长为了办实事，作表率，深夜下不了班；某企业家向山村小学捐钱献爱心，他的孩子还躺在医院里。生活中处处充满成功者的阳光。我看《北京人在纽约》，当王起明穷途末路，准备离开纽约回北京时，他对阿春说他厌倦了，他讨厌这鬼地方。阿春却回答：“只有成功者才有权利这么说，你失败了。”好家伙，穷人连骂街的权利都没有！这资本主义一旦霸道起来，与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差不多，逼得你发狠、吃人。如果你老了，牙齿钝了，已经没有吃人的力气了，只能忍着，趴着。怎么啦？你不可能让我忆苦思甜。

老威：你的脑子还挺活跃，这很出我的意料之外。好吧，松弛一下老许。你不愿讲自己，我绝不勉强，不过今后你再难找到我这么忠实的听众。

许长久：这倒是实话。

老威：你讲讲别人也行。透过时间去看那段历史，许多东西还是有趣。

许长久：你这是绕圈子来掏我的话。

老威：这样说就没意思了，我又不是警察审案。·

许长久：的确没意思。我 50 多岁，其中有 10 多年的黄金岁月被农村耗掉，等到真醒过来，啥都干不动了。

老威：听我爸说，你教过村小？文革中的村小比希望小学咋样？

许长久：差远了。希望小学虽然简陋，毕竟教师和教室还有；我教的村小，就是座破庙。据说原来还有和尚。文革破四旧，撵了和尚，砸了菩萨，改造成生产队的保管室，后来鼠害、盗贼都猖獗，保管室又迁走。大队领导商量来商量去，为了避免

封建迷信卷土重来，决定在庙里办村小。这庙办村小离公社所在地石牛还有几十里，又穷又偏僻，没一个民办老师愿来献爱心。大队支书没办法，只好就地取材，起用一个解放前的私塾先生，叫张红旗，当时已 50 多岁了。

大队按正规手续，逐级申报，上级拖了几个月，下文只承认代课教师资格，由公社发月津贴 26 元 5 角，大队擅自克扣 10 元，但按当地 7 分钱一个劳动日的标准，张红旗算“富农”。

68 年秋天，我下到石牛当知青，鬼使神差地做了张红旗的同事。本来公社的意思是让我取代张红旗，但 60 多个孩子，我一个人咋教？大队也不同意。支书把原扣的 10 元钱还出来，由两位教师均分一个人的月津贴，不足的部分拿工分弥补。

破庙建在大山脚底，早向阳，晚背阴，据说风水很好。正殿为教室，板凳和课桌一字儿地并了七排，每排坐八人，余下的六人就挤坐入殿的高门坎。班级按竖排分，两人一桌，从左至右，一、二、三、四年级。学生的年龄从 4 岁到 18 岁不等，依个头大小排前后坐次。而老师的讲坛就直接置于铲除了佛主的莲座，授课时高人一等，且目空一切。

生产队把右边偏殿隔出两间，算教师寝室兼教研室，空神龛在我这边，我顺着神龛铺床，隔着蚊帐，床后并着一口红漆老棺材。刚到时天已晚，队长领着两个人用长竿扫帚为我搞卫生，大块大块的黑灰直朝下坠，吓得我朝殿外退，却正撞见张红旗一手端油灯，一手扶一位驼背老寿星进隔壁。我上前认同事，他只咧咧嘴，就要关门。我注意到门上贴着大红喜字。心里纳闷：这人脾气怪得出奇，乡下都兴早婚，他偏独反潮流。也许是续弦？我趴在门上窥视，瞅见两人正添柴煮饭。灶前火光熊熊，我想真是个孝子，连蜜月新婚也顾着老娘。

老戚：这情景有点像古代。

许长久：大山沟沟，百年一景，看不出有多少变化，至于某朝某代，一溜烟就过去了。比如我在爬坡时突然听到林彪在温都尔汗爆炸了，感到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接班人咋会反党叛国呢？而农民就不会惊讶，甚至没有“不相信”这一说，上面的文件下来了，队长让会计在灯下念个大概，就过瘾一般大骂林秃子。干部们依次骂，把妈和祖宗都带上骂。队长一直把毛主席叫“毛太阳”，他说：“毛太阳他老人家农民出身，晓得农村人生活单调，就给我们弄些事来耍，今天忠字舞，明天样板戏，后天打倒刘少奇。林秃子更不是好东西——这样年年变花样，农村的文娱生活一下子就丰富了。”

老威：我有点不明白：四个班级都在一个教室，书咋个教呢？

许长久：张红旗教一、二年级，我教三、四年级；那边讲课，这边自习，黑板也一边一半。

老威：你教语文还是数学？

许长久：全教。政治，包括生理卫生都教，比如三年级语文、四年级就算术，张红旗也一样。那年头经常有头等大事，比如学习最新最高指示，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批宋江、忆苦思甜等等，就四个班一块上。每天开课前，全体师生都要对着神龛上的主席像“早请示”，敬祝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材扎实（健康），永远扎实！农闲时，教室外围着许多看热闹的农民，牵着牛，赶着猪，嘻皮笑脸跟着吼。队长也偶尔来学学文化，与一年级娃娃一块朗读“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然后才是a、o、e；日、月、水、火；山、石、田、土。张红旗教过私塾，习惯用当地土话唱读，抑扬顿挫，尾声拖得极长，比如把“万寿无疆”唱成“万咒无肛”，把“万岁，万万岁”唱成“万醉，万万醉”。这种教书方式极具感染力，所以

我一般要等一、二年级闹腾够了，才开口教三、四年级。敲着教鞭提醒高年级莫往低年级倒退。

老戚：咋会呢？你的学生比他的大。

许长久：妇女主任的娃娃四岁就上学了，坐在头排东张西望，把尿撒在裤裆里可以不管，但有一回，他坐着拉屎，老师就降成幼儿园的阿姨，给学生换裤子。张红旗的班长李桂英，16岁，读完二年级就出嫁了。而我的班长李大柱，18岁，看起来比我高，络腮胡子都长出来了。有一回，李大柱批宋江学李逵，就凭着拳头维持课堂纪律，他当着老师的面，把一个小调皮按倒在板凳上打屁股，我上去拉，他反手一挥，把我的鼻血扇得直淌。我气坏了，就当堂宣布撤换班长，并命令众学生一拥而上，逮住那目无师尊的疯子。李大柱抵敌不住，就抓条板凳要拼命。我的学生中大个子不少，有人从课桌下拿出根牵牛绳，挽个套，抛了过去。李大柱的脖子被勒住，束手就擒。张红旗拖根大竹片来帮忙，据说这是他的看家宝，从旧社会打到新社会，“黄荆条子出好人”，他说，“过去私塾出秀才，讲究的就是个打，手心、腿肚子、背和屁股，学生犯啥事，打哪里，打几下，都有规矩，现在娃娃不好教，就欠打。”

我急忙制止，问被捆在板凳上的李大柱：“认不认错？”他犟着牛脖子不认。反而骂我是宋江，害了他这个帮忙维持课堂“江山”的李逵。张红旗挽袖连抽十几竹片，李逵终于喊爹叫娘，我看不过，就解绳放他。不料他跳起来就踢了我肚子一脚，要反“招安”。

他一跑，我气糊涂了，老子是知青，如果被农民娃娃打了，就别想翻身了。我转头拎了根顶门杠，满山遍野撵。学生像一群呱呱乱叫的鸭子，跟着我捉拿凶犯。坡上干活的农民见了，也一齐围歼，李大柱走投无路，急得跳崖。幸好崖下是个水塘，没伤

着人。

老威：你这叫教书育人？

许长久：我事后也惭愧，就写了辞职书。没想到第二天，李大柱的家长把孩子捆了送上门，向老师陪罪。生产队长也赶来，还送来一小块难得一见的腊肉。革命群众一致夸奖我是好老师、负责的老师。后来贫协代表还专门在课堂上训话：“今后哪个龟儿子敢与老师作对，向毛太阳保证：老子一锄头挖死他！”

老威：臭老九在农村威信挺高嘛。

许长久：自古农村就缺文化，尊敬秀才也算一种割不断的传统吧。毛主席清楚这个，所以动不动就下乡搞农会，与群众打成一片。毛主席身上肯定流着乡村秀才的血，在农民中过得自在，在臭老九中就不自在，因为他们吃着五谷杂粮却瞧不起农民。像张红旗这种变态狂，在城里肯定逃不过运动，至少都是地主阶级的走狗，说不定早劳改去了。可在乡下……

老威：张红旗怎么变态？

许长久：他搞学生的屁眼儿。在我来之前，他起码弄了七八个小男生，结果东窗事发，家长们告到大队。还闹着要去公社。支书亲自出面劝阻。然后找张红旗谈话。

老威：这种人还配教书？

许长久：那你说该咋办？开除、劳改当然够格，但张红旗没了，村小也就没了。大队党支部经过研究，一致认为，张红旗之所以乱搞，是因为婆娘死得早，没个伴。于是由妇女主任出面作媒，让五保户李二婆与他喜结连理。李二婆高龄 75，苦大仇深的雇农，自解放前丈夫被上门逼债的恶霸地主打死，就守寡至今。李二婆作为阶级斗争的活教材，经常在村小向娃娃们忆苦思甜。每次，大队支书作总结发言，总要说：“二婆的苦就是大家的苦，每个贫下中农的后代都是二婆的亲生儿女，需要出力，都

随叫随到。”

据说李二婆根正苗红，万万没想到会下嫁私塾先生，开始还拿出烈女风范，誓死不从。支书只好拿起杀手锏，宣称是“组织安排”，让她随时对张红旗进行思想改造。二婆瞎了一只眼，却晓得与其成为大家的负担，不如傍死一个人的道理。犹豫两天，只好在妇女主任搀扶下，哭哭啼啼地被蒙上了盖头。支书代表他们去公社办了结婚证，花公款买了糖。没钱请客，就宣布“新风易俗，新事新办。”

老威：张红旗同意么？

许长久：出路已经摆明：不成家就劳改。

老威：这叫成家？找了个妈来养着罢了。

许长久：你咋晓得他俩不能上床？我房里棺材是李二婆的，也一道摆过来了。大家认为只要有二婆拖累张红旗，他就没空隙犯错误。没想到，这家伙一旦尝出女人的胯比男人的屁眼儿舒服，就动真格了。床被占了，他就把勾引战场扩展到玉米地里，他搞了两个女生，有回被我碰见，汇报给大队。支书气坏了，就找来基干民兵和赤脚医生，把张红旗按在阶沿上，就要动手阉割。二婆一见，要死要活地扑在花心丈夫身上，再三磕头求情。支书骂道：“你以为有红色五保户挡驾，就可以鸡巴乱截？把二婆请开，这回非要给你长点理性。”

民兵把李二婆劝住，保证鸡巴暂保留，以观后效。赤脚医生抽出手术刀，很细心地按支书命令，为屡教不改的流氓秀才做包皮手术。那场面太刺激人了，在几道手电光的照射下，张红旗的包皮被一点点地剥掉，石阶上淌了一滩血。张红旗只鬼哭狼嚎了几声，嘴就被胶布封了，李二婆大骂支书禽兽不如，支书回骂：“老封建，张红旗把你日得敌我不分了！”

老威：这大队支书太霸道。比旧社会的族长还霸道。

许长久：这叫秉公执法，其实这支书挺仗义，我在农村多亏他照顾。你想想，受害女生将来怎么嫁人？幸好肚子没大，否则真会闹出人命。

老戚：中国农村的贞洁观念真是根深蒂固！

许长久：其实是愚昧。女孩十六、七岁就出嫁，此前根本不晓得自己的身体是咋回事。我班上的女生，来月经时几乎不垫卫生纸，而是缝一条狭长布袋，袋中填草灰。这样阴部轻易就感染了。后来，我不得不替买卫生纸，发给每个12岁以上的女生，但她们都含羞拒绝。那年月，男女之事为禁区，谁也不敢公开在课堂上讲，虽然也有生理卫生的课本，但能教的只是五脏六腑及消化系统。我怀疑张红旗就是钻了性神秘的空子。

老戚：赤脚医生也不普及性知识？

许长久：想当流氓么？

老戚：你是咋晓得女生不垫月经纸的？

许长久：有一回，一个女生肚子疼得直打滚，我只好带她上大队医疗室。我与两个男生轮换背，跑了五里山路才到。我把衬衣脱下来拧，汗水当当地滴了半痰盂。我正光着膀子捉摸这女孩有啥怪病，赤脚医生从屏风后出来，手上的止血钳夹了一块气味强烈的破布，他质问我：“你这老师咋当的？”我一下子懵了，医生又吼：“烂了！那地方都化脓了！”

等回过神，我的脸热辣辣的，那时我还是没结婚的毛头小伙。可是感到自己对不起人。老师嘛，在学生的眼里就应该啥都晓得。

老戚：现在还是这种心理？

许长久：时过境迁。现在我的孩子都上中学了。这一代碰上了市场经济，一切朝钱看，与老师的感情还不如花仙子和变形金刚。唉，人生若梦啊，有时早晨醒来，真不敢相信自己活在这这么

个繁荣的混帐世界。

老戚：你怀念教村小的日子？

许长久；其它场合不会说，就给你瞎扯一通而已。村小有啥好，一座破庙，而教过的农民孩子，像烟一般消失了。可偶尔有些场景会冷不防窜上来，如酒劲，令人慢慢回味。比如走夜路，带着一大群孩子翻山越岭去公社看电影。虽然《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已放过几十上百遍，但每次我都吹着哨子集合学生，冲着缓缓下山的夕照列队出发。天黑了，孩子们点燃火把，蜿蜒在崇山峻岭中。从高处看下去，各村各队的农民们牵着火把长蛇，向同一方向汇集，太壮观了。这是乡下人盛大的节日，孩子们一路唱歌壮胆，穿越成片坟地时，就唱时代最强音：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到底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往往开头学生腔，后来又加入了上百泥腿子的喉咙，真有点排山倒海的阵仗。如果当时真有孤魂野鬼，肯定拔腿就逃了。到了公社，场口早已扯起银幕，山风一刮，那巨大的布就前后哗啦像漩涡中的船帆。电影开场的永远是《新闻简报》，一遍又一遍放。接着，公社书记在广播里讲话，或念本次政治运动的红头文件。挨次点各大队的名，直到每个大队每个生产队都雷鸣般地回答：“齐了！！”方正式推出正片。

老戚：手续太复杂了。

许长久：一般放正片的时间是 12 点左右，如遇上“跑片未到”，那就还得等。有时中间还要等。等片时学生都打瞌睡，四周农民却忙着社交。除了赶场，这时我碰上的知青最多，大伙互相递烟、聊天。两部片子放完已下半夜，我又吹哨点名，踏上归途。农民们像暴动一般，却让孩子们先上路。

有个小女孩我特别关怀，我至今记得她叫刘光明，小名“光

明子”。她是富农的孙女，仅仅因为家庭成份，她参加不了“红小兵”。村小 62 名学生，只有 3 名地富子女没戴上红小兵的胸牌。当时她伤心极了。我越安慰，她越哭个没完。为了避免受歧视，我把她从中间调到第一排。这是我班上衣着最整洁的孩子，柳叶眉，扎着小辫，脸蛋红扑扑的。调皮鬼们见我偏袒她，气不过，就趁我写黑板时向她扔粉笔头，在她背上写“地主婆”。

光明子不敢上学了，我就亲自领着学生上门。恰逢看电影，我就背着这个瘦弱的小姑娘走夜路。在阶级斗争的年月，我不能明言禁止贫下中农欺负地富子女，但我可以通过行动，表明老师的态度。我背了她好几里，光明子挣着下地，牵着我手走。遇着陡坎或坟场，就把我的手臂紧紧抱住。从来没人这么依赖我，唉。

老戚：太美好了。

许长久：不晓得她后来到哪儿了，光明子，这么好的名字，该有好的前途。

老戚：她会永远记得你这个老师。

许长久：她当时 12 岁，就读四年级了，在当地非常难得。算了吧，感慨太多了。

老戚：我当时也 12 岁，却失学流浪，始终没碰上你这么个老师。光明子，我几乎爱上她了。谢谢你，许老师。

拆迁户罗月霞

采访缘起

60岁出头的罗月霞从市中区的黄金地段迁到二环路外的外化成小区已好几年了，仍然很难适应拥挤、嘈杂的环境。“人太多，都是过路的，”她说，“过去那种几代人的邻里关系已找不回来了。”

城市要现代、道路要扩张，所以拆迁每年都必要。随

着大量老化而贫穷的居民搬出去，我们这座古城正迅速失去历史，失去怀旧而伤感的歌谣。整齐划一的灰色楼群崛起着，人口膨胀着，我只好安慰罗伯母：“还是搬到郊外好，熟人少些，心要静些。”

从罗家出来，正是1996年3月9日傍晚。街灰濛濛的，夕阳烧得像哮喘病人的肺，违章占道的菜农们叫卖得猖狂。



拆迁前的成都旧街道，具有古朴而温馨的历史感，罗月霞儿时的记忆就从这条老街开始的。每块砖，每片瓦，或许都蕴藏着一段掌故。

(曾循 摄)

老威：罗伯母，您是从哪儿拆迁过来的？

罗月霞：线香街 78 号。

老威：在啥位置？

罗月霞：靠近玉带桥。一出线香街口子，就能望见“陈麻婆豆腐”的招牌。那是上百年的老店，成都人都晓得。在我的印象中，陈麻婆天天生意兴隆，许多人占不着堂里的座位，就在堂外阶沿蹲着、站着吃。还有把



正在拆迁之中的同一街道。有恋旧得顽固的老住户还在硬挺着，搭根长杆晾过冬的大衣。但这种消极的抵抗是徒劳的。正如毛主席所说：“历史规律不可抗拒。”

（曾循 摄）

豆腐碗搁在地上，呷口小酒的。真是三教九流，口味不分等级。

老威：陈麻婆还在原地么？

罗月霞：还在原地，可是麻婆已经不是麻婆了。品种少，口味差，堂子弄得花里胡哨，不晓得里头是卖几毛钱一碗的豆



唐山大地震，发生在 1976 年 7 月 27 日的毁灭性的“自然拆迁工程”，死 24.2 万人，重伤 16.4 万人，给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们造成难以治愈的精神创伤。

(曾循 提供)



这令人想起文革中破四旧的最高指示，“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曾循 摄)

腐呢，还是卖其它啥子稀奇。过去那一带全是平房，公馆不少，都是青石板路，经常有娃娃在街边打弹子，跳橡皮筋。还有拉黄包车的，叫卖丁糖和豆腐脑的，管这一段的巡官(相当于现在的户籍警)一身黑警服，都扎着白绑腿，夹根哨棒走来走去，这家那家打招呼。有时闲得磨皮擦痒，也会当街抄手一站，看娃娃玩，或者加入小孩阵营，在地上蹭来蹭去打弹子玩。唉，算了，眨眼之间，这些都不见了，上次我回去，居然在玉带桥迷了路。骡马市一座天桥，没走几步，就是座大立交桥，周围高楼大

厦，都贴着大广告，桥下是迪厅与商店。那个闹！那个挤！汽车、自行车、人都不让路，密密麻麻的。才没多少年，

人就像从地缝里一茬接一茬朝上冒。我一问线香街，都不晓得，嘿，活见鬼了！多少代的老街，转眼就消失了！幸好“陈麻婆”三个字我还认识，往门口一站，心才踏实了。

老威：天上一日，人间百年嘛。罗伯母，您才60多岁，应该多出门走走，适应新形势、新路段，因为这十几年，不单成都，全国每座城市都在变，拆老街，建新街。

罗月霞：新形势就是富人朝城里搬，穷人朝城外搬，现在我们都搬到茶店子以外了，还有些老街坊，听说去了九里堤，还有东郊跳蹬河。过去那儿全是农田，郊游也跑不了

这么远，抗战时期，日本鬼子108架飞机炸成都，为疏散人口，开了五条火巷子，可人也没跑出环城范围，穿城九里



精雕细刻的窗棂，动不动就几十上百年。罗月霞说：“搬家那天，有几个老外闯进来逛，花几百元买了一车门楣、窗花、老穿衣镜、房梁、翘檐、水缸……他们啥破烂都搬，乐颠了。”

(曾循 摄)

三。

老威：过去的线香街是啥样子？

罗月霞：铺板门一家挨一家，都做单一小生意。成都人天性闲散，懒觉睡到九点多钟才起，趿着拖鞋，打着哈欠开门，或摆摊，不求富裕，只求温饱。烟摊、糖饼、麻饼摊、锅魁、包子、小面、干杂、酱醋，店多客少，要啥有啥。解放后公私合营，不做小生意的懒虫许多进了厂，上下班当职工了。78号里多半是职工，类似的大杂院，街面上还有好几处，都是双扇黑大门，门坎高，两岁娃娃只能横着翻。

老威：夜里还关门么？

罗月霞：解放前夕，市面上太乱，一会儿兵匪……一会儿游行，所以大门夜夜都关。兵匪还撞过门，把门鼻子大铜环也撬了一只。白天平安无事，学生的游行只经过玉带桥，拐不进线香街。许多巡官跑出街口，包括管我们段的，嘟嘟地吹哨子。邻里百姓都堵过去看热闹，有的还挥胳膊，跟着喊反饥饿反镇压反贪污腐败反涨价的口号。巡官吹哨子，撵大家回去。我们也掏出泥哨跟着吹，气得巡官不撵大人了，专对付娃娃。那时我没满10岁，腿短跑不快，经常被逮。巡官一只手捞起我，另一只手高高举起哨棒，然后轻轻落向屁股。我惊风火扯地放开大嗓门，又嚎又抓，巡官没法，就发一颗水果糖，作为没收泥哨的价钱。我凯旋而归，嘴里还吧吧吮着甜头，继续追游行队伍。有时队伍太长，尾巴还在玉带桥，头已到了皇城坝，甚至少城公园。娃娃们要跟小半边城，直到听完几轮演讲，才捡几张传单回家。解放后，游行都由政府组织，除喊口号，敲锣打鼓，还扭秧歌。当然，逮我的巡官倒了霉，听说发生抢米风潮时，他与其他巡官被派去守米铺，挥哨棒打伤了不少人脑壳。都鸣枪了，饥民还一浪接一浪朝里涌，终于掀翻柜台，抢空了米仓。巡官被挤在旯旮里，抱着

头，差点就逃不出来。改朝换代，他因这事成了群众的冤家对头，开过大会，定为反革命军、警、宪、特，后来被镇压了。

老威：怎么判的？

罗月霞：解放军进城不久，阶级斗争形势复杂，只要群众检举，军管会核准就执行了。唉，咋不垮？官匪一家，物价飞涨，号召爱国市民用金銀硬通货去换金元券、法币，最后一贬值，厚厚一沓钞票，换回来几斤米，这和抢有啥区别？好在 78 号院里还和睦，都是几十年的老邻居，知根知底，就互相挪着借着过吧。送走旧社会，精神面貌也就变了。军管会挨家挨户登记户口，成立街委会。在进大门的水井旁边，挂了块牌子，大门也就不用关了，直到文革搞武斗之前，大门 20 多年没关过。那时人人都爱解放军，我们 78 号院里有位租房的女学生，与街委会的上级，一位南下干部谈起恋爱，结果结婚了两、三年，才被清查出来，她是官僚资本家的公馆小姐，读过成都女中。南下干部气坏了，自己老婆成了剥削阶级埋在床头的定时炸弹，官肯定升不上去，婚也不能说离就离，犹为恶劣的是，她还伪装进步，涂改成份骗婚！于是两口子三天两头打，南下干部是东北人，性子暴，一沾了点酒，就解下皮裤带，把老婆从屋里抽到院里，滚得全身泥，也没人敢上去劝。60 年代生活紧张，南下干部带上两孩子，住进单位吃集体伙食，才个把月不回来，他老婆就饿死在床上。不愧公馆小姐，死也讲究。阴丹蓝对襟扣罩衣，脚登老式绣花鞋，头发梳得光光滑滑，后面挽了个髻。脸都饿塌了，还搽胭脂点口红。她的门反扣，帐子罩得严实，个多星期了，屋里没个动静，邻居就报告了。派出所撩开帐子，大伙才敢进屋。人都硬了，还好，冬天的死人不臭。南下干部赶回来，跺了跺脚，就骂：“什么鸟终归是什么鸟！”

老威：人死了还骂？

罗月霞：北方人就这脾气，况且，亲不亲，路线分，时代风气就这样。文革分派，一家人经常搞得势不两立，78号几十户人家，动不动就爆发大辩论，后来发展到动刀动枪，比南下干部饿死老婆还过分。我们家七口人，61年饿死了两口，还剩五口，分四派。我跑公交车，当售票员，随大流加入了正宗的造反派“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丈夫刘永刚在川棉厂当炊事员，也随大流加入了正宗的保皇派——“产业军”，爸死了，妈无职无业，自然是逍遥派，弟弟是老三届高中生，参加了“红卫兵成都部队”。这下热闹了，大家都在捍卫毛主席，都以为家里的其他人图谋不轨。比如刘永刚，一个炊事员，文化又低，若不遇生活紧张，填肚子第一，我一个漂亮大姑娘会嫁他？真是笨人有笨福，他自己也长期唯老娘的眼色是从。这样久了，两口子就真拆不散了。可是文革把啥拆不散？老刘他是铁杆老产，还执迷不悟，我和弟弟要撵他，这老保就真搬出去住了。

线香街离西南局、成都军区、省市委都近，所以整夜都能听见围攻这些单位的高音喇叭，战歌反反复复地唱：“万炮齐轰西南局，烈火猛烧省市委，坚决打倒李井泉，彻底解放大西南！”公交车被借出去了一半，红卫兵站在车顶，舞红旗，举话筒喊话，下面人山人海地鼓掌。老刘一辈子就这一回，与我拧着干，结果倒了血霉。“三军一旗”大游行没多久，就被中央文革小组宣布为保皇组织，勒令解散。川棉厂是产业军的老窝，被造反派围得水泄不通，那时军队还没支左，所以基本凭原始肉搏战。我对老刘又恨又担心，万一把这条保皇狗的腿打断，我还得服侍他。弟弟参加了一线战斗，搭十几米的竹梯攻楼，结果一拨接一拨的红卫兵被石灰水浇下来，还有的进窗口就被逮住，直接抛出来的，有些学生娃在摔下来的过程中还高喊：“毛主席万岁！”这样一来一往好几次，双方都杀红了眼，就朝死里整了。

川棉厂被攻占，弟弟挂着彩回家，一沾床就睡着了。我摇醒他，问见着他姐夫没有？他摇摇头，又睡了。两天两夜没醒。等终于醒来，他又拿起钢钎，跟大部队去攻打文殊院产业军第五军军部。保皇派大势已去，这仗只打了半夜，就胜利凯旋。快天亮时，有人敲门，一打开，是老刘，满脑壳纱布，浑身臭泥。我赶紧给他烧水洗澡，扶他躺下。解开纱布一看，右前额凹进去一条槽！我差点吓晕了，老刘说他守在文殊院后殿，红卫兵攻进来，边喊“缴枪不杀”，边拿钢钎迎面戳来，他头一偏，矛尖就擦地擦了过去。他们都举手投降，红卫兵的前线卫生员才过来替他包扎，然后准备验明身份，集中关押。出殿时，他趁人不注意，拔腿就逃。四面都在喊杀，没办法，他只好钻阴沟了。我说：“活该！”他说：“月霞呀，我们有5个月没见面了，形势发展得这么快，我是工人阶级，咋会反对毛主席呢？一定是他们蒙蔽了中央文革小组。”我说：“还顽固？把你交给红卫兵算了。”他说：“再顽固也是你男人，如果死在外头，你再革命也一样守寡。”我细细一想，是这个道理，就可怜起他来。

不料这头才按平，那头又翘起，产业军一垮，红成与兵团、八·二六又分裂成两派，打起来，解放军参加支左，有人暗中打开军火库，引诱学生娃娃去抢。我们两口子与弟弟为了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反目成仇，他把枪都拖回来了，还是邻居拦住。武斗升级，真枪真炮干了一年多，线香街上经常能拾到大把子弹壳，娃娃们在院里赢子弹壳玩，我儿子把装小人书的木箱也腾出来，装得满满的，甚至还有没打响的整子弹，用钳子夹开，将炸药倒掉，弹头就不会意外炸了。

78号还死过红卫兵的司令，前院张姆姆的儿子，^{大俩}20岁，到中江与继光兵团作战，牺牲在郊外的凤鸣山。继光兵团司令是抗美援朝烈士黄继光的妈妈，扼吭双枪，八面威风。红卫

兵司令在半坡挨了一梭子弹，立即成蜂窝了。他被运回来，平板车，身上覆盖着红卫兵的战旗。护驾的大小车有 20 多辆，堵住两边街口，然后整条街都成了灵堂，花圈、挽联、祭帐、白花、白绸，从头到尾，铺天盖地。78 号的大门前，还搭了两根大柱子，撑起“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超大型挽联。灵柩放在门里，从早到晚，吊唁的人不断线。这么多年过去，这种规格的丧事我再也没见过了。

老威：伯母的记忆力不错，心也挺年轻的。

罗月霞：那年头的稀奇事太多，只能记个大概。

老威：其实不同朝代风尚也不同，不可能一成不变地延续下来。

罗月霞：我有点文化，晓得城市、街道变不变由不得老百姓。比如皇城坝，明朝的蜀王府，清朝改为贡院，68 年城墙内还有明远楼、至公堂，可轰隆一声，成平地，只因为皇城门楼像北京天安门，连御河与御河桥都一样。这还了得，除了北京，就成都有这种皇帝风格的建筑，李井泉把四川搞成反毛主席的独立王国，这就是另立中央的铁证。

老威：太可惜了。

罗月霞：每个老成都都感到可惜，因为穿过三个门洞，里面早没皇帝。解放前，皇城坝成了扯谎坝，住着不少看相、卖唱、拉条皮、贩毒与野鸡，相当于现在的三无人员。毛主席说：“不破不立。”拆了皇城坝，在废墟上又敬建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这是省革委成立时，献给毛主席的礼物。听说坐飞机朝下看，完全是个“忠”字，检阅台正中的主席像，就是“心”字中的一点。主席像基座高 7.1 米，象征党的生日；主席像高 12.26 米，暗喻领袖诞辰。非洲人民送给他老人家的芒果，转赠过来，就拿玻璃匣子供在里面的东方红展厅，让亿万人民瞻仰。我看到

的是个蜡制芒果，金灿灿的，我没去过热带，因此与许多群众一样，第一次见到这么珍奇的神果。

老威：水果咋能瞻仰？放太久就烂了。

罗月霞：这是精神寄托，谁会想到吃它？你晓得人民南路的毛主席招手像原来准备垒多高？

老威：不知道。

罗月霞：比现在的像高十倍，或者二十倍。总之，要让全市人民从各个角落都能望见。所以运“忠字石”的车辆昼夜不停朝城里开，若遇特别好的巨大石头，还要挂红布，敲锣打鼓。也许是忠心表过头了就劳民伤财，也许是垒那么高的塑像技术不过关，反正轰轰烈烈的计划停了下来，修改成目前的“万岁展览馆”。改革开放后，大楼顶上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不知不觉地消失了，换成各色广告，万岁展览馆又变成广告展览馆。绕皇城一圈的东西御河，在中苏珍宝岛边境之战中，响应“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领袖号召，抽干水，建成防修正主义原子弹的防空洞。那年头经常响空袭警报，政府大力宣传空防知识，但洞子一次也没使用过，后来就适应经济形势，改防空洞为地下商城，直到现在，这也是全国最大的地下商城。可惜，已关门好几年了。

老威：这算文革中最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吧？

罗月霞：应该算。

老威：皇城坝消失了，许多与它相关的掌故、习惯、文化也随之褪色。但时代潮流不可抗拒，我想年轻人还是喜欢变化的，改善居住环境正是造福于民啊。

罗月霞：你说的也许有道理，但我在线香街住了大半辈子，不想动。太熟悉了。现在我住在这五楼，三室一厅，九十多平方米，电视、电话、沙发，煮饭烧天然气，应该说比过去方便。可

我住在这儿，想的全是线香街的事儿。这楼房，也没个邻居，儿子媳妇一走，门一关，就老俩口在家，像坟墓一样。还有这防护栏，与其说防盗，不如说把监狱的铁栅栏搬回来了。老刘退休没事，整日在家练书法，耳朵不灵，与人说话不方便，就干脆装聋卖哑。他一天最多下一次楼，20多分钟。上个月我回线香街寻古，不过大半天，老刘就出事了。他下面吃，一不留神，面汤就泼到手背上。我晚上回去，发现他在被窝里，自己用烂棉花蘸酒精裹手，我赶快通知儿媳，送他上医院，医手，顺带查病。除高血压，还有自闭症，医生建议他上老年大学，与人交往，如果性格一时改变不了，练练气功也可以。

现在啥都要花钱，老刘节约，加上厂里不景气，老是拖欠退休工资，更别提报医药费了。他穷担心的事多，连降压药都舍不得吃。我俩口的退休工资加起来，不到500块，得计划才行。米面油盐先买齐，吃菜就简单了。只要不生病，生活不是主要问题，恼火的是楼里没个邻里关系，一关门，独家独户，哪个习惯得了？一单元的陈大爷，住在七楼上，死了一个多月，都没人晓得。等到他孙儿出差回家，打开门，苍蝇嗡地就扑出来，满床都堆着蛆，把人的肉也看麻了。郊区不比城里，贼娃子牵线线，贫民窟没啥钱，就啥子都拿。自行车、电视、肉，甚至猪油，并且一偷就是好多家。你要养狗防盗呢，狂犬病办公室又收狗税来了，真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老戚：你这附近有居委会嘛，把大家组织起来，开展活动，重新建立邻里关系。

罗月霞：人与人除了钱，就没关系了。居委会开麻将馆，还不是图个桌子钱。居委会主任是个贪官，光垃圾费，他一年就贪污6万多。本来环卫局规定每户每月的垃圾清运费为4元，他翻番，收8元。原先大家都没在意，是他自己在发廊搞按摩，黄色

了一盘，在兴头上告诉小姐的。小姐还算有点人味，气不过，就揭发了。

老威：居委会主任也能贪污？太稀罕了。

罗月霞：社会风气如此，再低等的交椅，只要坐上了，不贪污就不正常。有权不谋私，就是瓜娃子。78号好啊，几十家在一个院里，像大家庭，磕磕绊绊的，有许多想头。多少年了，每户就一把挂锁，有粗心的，出差顺手把门带上，三五天不回来，也不会丢东西。夏天晚上，都把篾席扯出来，铺在大院里，边乘凉边吹老龙门阵。星期天，大部分人没事干，或约起逛春熙路，或听收音机。唱川戏，拉二胡，各逞所能。廖家七妹是唱清音的，四十几岁，嗓子还又脆又尖，能唱整段《毛主席去安源》。我家老张啥也不会，就混在娃娃堆里，单腿斗鸡，跳拱，拍纸烟盒。老张有几百张纸烟盒，老刀、中华、蓝牡丹、红炮台，尽是老牌子，一张起码值五十万。娃娃们老想赢他的老烟盒。可老张厉害，趴在地上瞄一瞄，张开手掌，虎口向下一扇，起码翻六、七张。他的烟盒越积越多，几乎集中了全院百分之六十的老烟盒。于是，他每逢心情好，就坐在床上数烟盒，一万两万，十万八万，四十万五十万，超过二十多万了。有一回，李家三娃偷了他的红炮台，他就叉腰站在门口吼：“哪个贼儿偷了我五十万？！”

老威：烟盒这么值钱？

罗月霞：现在叫“收藏”吧，还有存糖纸、火柴票，在娃娃们看来，老烟盒肯定比钱值价。唉，穷开心的岁月，一去不回了。

老威：当时拆迁的情况咋样？

罗月霞：一两年前，我们就晓得要拆迁了，还以为要等很久，直到某天上午，居委会开会，宣读了拆迁通知，大大的拆字

从玉带桥拐弯，一直刷进来，大门也“拆”，围墙也“拆”。大家才手忙脚乱收拾东西，办理搬迁手续。我家原住面积 41.5 平方米，国家照还，多出的面积，就得拿出钱买。拆迁房修得简陋，位置又在二环路以外，所以价格算便宜，500 多一平米。整个算起来，这次拆迁我们家花了 4 万多元，还没装修。

搬家那天，来了几个老外，要买老窗框、门柱和门楣。上面描的金都黑了，但老外喜癫癫的，说就要这种民俗效果。三百元，我全部卖，包括梳妆台、水缸。传了三辈人的东西，一搬，就散架了。老外要了搬家公司的车，东撬西敲，恨不得把整座院子都抬走。

我一步三回头，眼泪都出来了，这是住了多少代的家，搬走了，心还在这儿。邻里互相告别，留地址，约定以后还要串门。穷人永远都是朝城外搬的命，不管哪朝哪代，都一样。

采访缘起

1997年8月26

日清晨，我与李亚东、陈大华、宋明桂等朋友及妹妹小飞，结伴乘中国联航的飞机，从成都飞抵拉萨。

这是梦寐以求的神祇之国，我们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洗礼和震撼。在当日游历大昭寺时，烈日似火中，我同朝圣者旺吉有了以下交谈。

这显然只触及到藏传佛教的皮毛。如果我再有机会去，或许会更深入一些。

佛主保佑。

朝圣者旺吉

虔诚的朝佛者，
一步一步一磕头地朝拜着。



这一步一磕头的朝拜要持续几百上千公里。

老威：可以和您说话吗？

旺吉(音译)：嘿嘿。

老威：您挺高兴的。

旺吉：很高兴。嘿嘿。

老威：我们认识一下，我叫老威。

旺吉：我叫旺吉。



香火鼎盛，但从敬香者的衣着来看，必是有钱人家，穷人是烧不起香的，仅从这一点就能感觉到内地佛教与藏传佛教的区别。 (曾循 摄)

老威：您一开始拜佛，我就站在这儿数，您磕了 81 个长头。不累吗？

旺吉：不累，我们的生命都是佛给的。我佛慈悲。不累。

老威：这太阳，够火爆的，我站在这儿，头都晒晕了。我的一位同伴，在太阳下停了一刻钟，就中暑了。可你们藏族同胞，在明晃晃的阳光里，一大片一大片地磕长头，这么大的运动量，居然就没一个出问题……

旺吉：喂，您的同伴在哪里？我领他找医生，我知道八角街最好的医生。

老威：他吃了人丹，在阴凉地靠了一会儿，就缓解了。您的心肠真好，您自己的额头，还有这手，这膝盖，这胸脯，伤痕累累的，您该找一下医生，至少搽点药，要不会感染。

旺吉：谢谢您。我们藏人不会感染，我们心中有佛，佛能治所有的病，脑子里的病，也能治。这西藏，是佛的国，好大好大，离天近得很。没有污染。

老威：您是哪里人？住在啥地方？

旺吉：我的家在白云那边，他们，这些拜佛的人，家都在白



作者与拉萨
街头的小艺人合
影。他们跟了我四
条街，顽强地弹琴
歌唱达半个多小时
头，终于讨得几颗
奶油糖。

照片背景是
布达拉宫全景。

(陈大华 摄)

云那边，白云比太阳还飘得高，您骑马也赶不上。我们藏人死了都到白云那边，鹰把我们带去见佛。佛很大，很多化身，鸟、风，太阳或者冰雪，或者山，雅鲁藏布江，都是佛，歌声也是佛。

老威：人也是吗？

旺吉：人也是，您想帮助别人的时候，您就是佛。

老威：那人与活佛的区别呢？

旺吉：人很多时候不想帮助别人，还骗人，犯罪；活佛普渡众生，他一代又一代地轮回转世，是最大的善。现在，布达拉宫没有活佛，我们只有到大昭寺朝拜。

老威：我是第一次到西藏，感触很深，这儿是明亮的阳光之国，河流和天空都像镜子一样，人走在路上，不，哪怕坐车，也觉得是在巨大的镜子之间。我的五脏六腑被洗了一遍，肠子都透明，这脑袋有点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西藏的一部分，从风里飘来嵌在我脖子上。然后是刻着藏文的经幡。走在拉萨街头，藏族人都很友好，向陌生的汉族游客点头微笑打招呼，并教大家怎样

转经，怎样祝福吉祥。旺吉，您也是好样的。

旺吉：进了佛国的，都是兄弟。

老威：看您风尘朴朴的样子，不是拉萨人吧？

旺吉：我是磕头来的，好几百里地。我是牧民，我卖了一些羊，一些牛，又用卖的钱换金子，一年换一点，五年能换好多金子。这次我全带来了，献给庙里，把佛像修得大大的。再过五年，我还能换更多的金子，献给佛。五年前，我就献过金子，那次，活佛为我摩了顶，我喜欢得哭了，我妻子，骑马伤了腿，活佛摩了我的顶，她的腿就好了。神佛保佑。

老威：您家里几口人？

旺吉：我家里五口人。老妻，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出了嫁。我把两个儿子都送进庙里，侍奉佛。他们不识字，进大昭寺不够格，就先在我们本地寺庙呆了两年，然后进了小昭寺。太高兴了，他们不在外面惹祸，



拉萨大昭寺前的朝拜者，安详、朴素的藏族老人，她穷得只剩下那只碗了，可只要你需要，她马上给你，这是藏传佛教的观念：“把所有的东西都施舍掉，你就于干净净进天堂了。”

(陈大华 摄)

一心向佛，还学文化，每天学藏文。

老威：您把儿子都送去当和尚了，家里不冷清？

旺吉：能进寺院，是他们的造化，也是全家向佛修来的佛缘。我们藏族人，总是把家里最聪明最能干的孩子送到庙里去。

老威：人都是要老的，将来您和您妻子怎么办？

旺吉：佛自有安排。

老威：您家里富裕吗？

旺吉：除了吃的、用的和住的，财产都应该奉献给神佛。财产多余了，人就要产生贪心的念头，就会作恶。您看那根柱子下的老太太，牙都没有了，还边笑边吃糌粑，她比我还穷吧，可她活得高兴，因为她除了佛之外，就没多余的东西了。你们汉人可能不理解她为什么高兴？又脏，又无依无靠，吃东西都艰难，还高兴个啥。不相信？您过去问问她，您伸手要她的糌粑，她和糌粑的那只碗，她马上就会给您。因为您是在帮她，给她机会积德行善，这样她就接近佛，成佛了。她不会要您的钱，如果您仍在地上，她看都不会看……。她在笑呢，她知道我们在说她。她在这一带很有名，和许多外国游客照过相。

老威：老人家的眼睛非常有神，她穷得象乞丐，却笑得那样慈祥，我简单不敢看她。刚才，我逛了一回大昭寺，我没随其他游客的大流，而去走岔路，这寺里像迷宫一样，我不知不觉就沿着回形土梯上了顶，不是正殿的顶，而是靠西北角，庙后的一边。那儿没有金碧辉煌和照相留影的众多游客，连一个喇嘛也没有。四四方方的土围子内，只有一间小屋。我在那儿足足站了一刻钟，什么响动也没听见。风渐渐大了，我刚缩着脖子要下楼，却瞅见小屋内有双亮亮的眼睛望着我。

我到底从小屋的暗处看清了那个老人，盘膝在卡垫上，面前的矮桌铺着经卷。他的白头发告诉我，他至少 80 多岁了。我猜

想这老人抄了一辈子经卷。令我感动的依然是眼睛，像太阳下的水，一下子就涌到我的心里去了。他合掌对我说：“扎西德勒！”我也回了句：“扎西德勒！”他点点头，笑得跟孩子一样。不，比我们汉人的孩子还纯洁，他是天堂的孩子。那位老太太，也是天堂的孩子。

我回到了自己的家园。我是不是搞错了？我是在世俗里陷得很深的汉人，却感到那抄经老人是我的父亲？真的，这一切像梦，又太熟悉了。

旺吉：您的话我听不太懂，可您的眼睛告诉我，您有佛缘。其实，许多汉族人，还有许多外国人，都信我们的佛，不过，不少人把财产，把尘世看得太重，他们先是自己，然后才是佛，或者只有自己遇见了麻烦事，才想起佛来，这是得不了救的。

我也做得不够，还有不少尘世的俗事。神佛保佑，我和妻子感情很好。如果有一天，她先于我进入天国，我就毁了房屋，放生牛羊，到山洞里去修行。有不少人去洞里面壁，听我儿子讲，在尼泊尔，还有西方人削发进洞的，一修就是一两年，不出洞，甚至连天日也不见。我没有经济条件去尼泊尔，可我到时候，准备选一座天葬台，在天葬石下掘个洞修行。

老威：在天葬台下修行？太过分了吧？

旺吉：那儿离天堂最近，在拉萨郊外，有个女尼就整日在天葬台下诵经，已经好几年了。

老威：你们藏族同胞平时都极其和善，就是在天葬的时候很凶。昨天早晨我们去了，只想远远地感受一下气氛，藏胞们就从四面八方围过来，扔石头赶我们走。

旺吉：你们外人不应该去，天葬是神的仪式，不是供参观的。否则，升向天国的灵魂会被打扰。

老威：是啊，我们跑得非常远，才停下来，可我们还是看见

了一头鹰从铁青色的天幕后飞来，歇在山梁上，接着太阳从一个缺口露面，点燃了半边山和一片开阔地，鹰群飞来了，在空中盘旋，然后俯冲下去。我的毛发都竖起来了。

旺吉：如果我们早认识，我可以替你们向死者家里人请求，让你们靠近，一起为亡灵祈祷。

老威：您是个好人。我把地址留给您，欢迎您今后到成都我家做客。

旺吉：我到过成都，到过内地的其它地方。

老威：去佛庙里烧过香么？

旺吉：烧过香，但我不相信汉人有佛。

老威：您这是大藏族主义吧？都是释迦牟尼佛的信徒嘛。内地的佛教与藏传佛教只是分支、门派不一样，但源头是一样的。其实藏传佛教也有黄教（经过宗喀巴改革）和红教（未经改革的原教）之别。归根结底，佛陀就是普渡众生，也不是只渡藏人，不渡汉人。成都的文殊院，无论普通节假日和佛教节日，都挤得水泄不通，若遇公开讲经说法，收纳居士，佛堂根本容不下。单就信教的热情，汉人并不亚于藏人，只是风俗不同而已。

旺吉：你们汉人信佛只为了自己，升官、发财、健康、儿女……反正世间所有俗事，都要求佛，都要许愿还愿。

老威：内地有佛学院，专门研究经文，培养出家人。在历史上，因看穿红尘出家当和尚的名人也不少。有些明星还常去寺庙捐款，做佛的俗家弟子，他们可不为什么。

旺吉：不为什么？先生，在佛国里是不能撒谎的。你们汉人信佛都是看破红尘，当不了官，发不了财，健康有问题，儿女不孝顺，还有男女不相好了，觉得活着没意思了，于是想解脱，出家躲起来，人在寺庙里，心在外面。女的剪头发，男的剃头，还流眼泪，一幅想不开的样子。你们把佛信得很痛苦。这是对佛大

大不敬。因为西方是极乐世界，痛苦的人是永远进不去的。

我们藏人信佛很快乐，从阿妈肚子里一出世，我们就是佛的人，佛国无边，哪有“红尘”？我们把金银珠宝都献给寺庙，把最聪明最有出息的孩子送去侍奉佛。我们一路磕长头来拉萨朝圣，高兴啦，心里一直唱着歌啦，头磕破了会长疤，只要身体还活着，血也没流完的时候。至于饿了渴了病了，都会过去，神佛保佑，你们汉人看不出我们心里有多快乐。

来去都一丝不挂，可你们汉人想在世上留下的东西太多，佛是帮不了忙的。你们吃的、穿的、住的都比我们好，也比我们讲卫生，可你们痛苦，因为你们的心在地狱里。

采访缘起

王响40岁，长得天圆地方，非一般意义上的流浪汉。

他无职业，无家室之累，向往古代汉人的浪荡生活，因此至今保持着一种走路的心态。

我于1998年12月31日在白果林我父母家采访了他。我似乎一直在等这么个人，作为这本底层访谈的结尾。

诗人马松已经成家立业了，可在一次酩酊大醉时，竟搂着一条垃圾桶里钻出的野狗痛哭——自由的野狗啊，到底谁可怜谁呢？

这事可以做王响的注脚。

流浪汉王响



流浪汉王响读了画家曾循在成都府南河边摄下的老人照片，不禁热泪纵横。时为1998年隆冬，晚景凄凉，这是否触动了流浪汉的内心？

老威：你流浪了这么多年，是为了什么？

王响：为了走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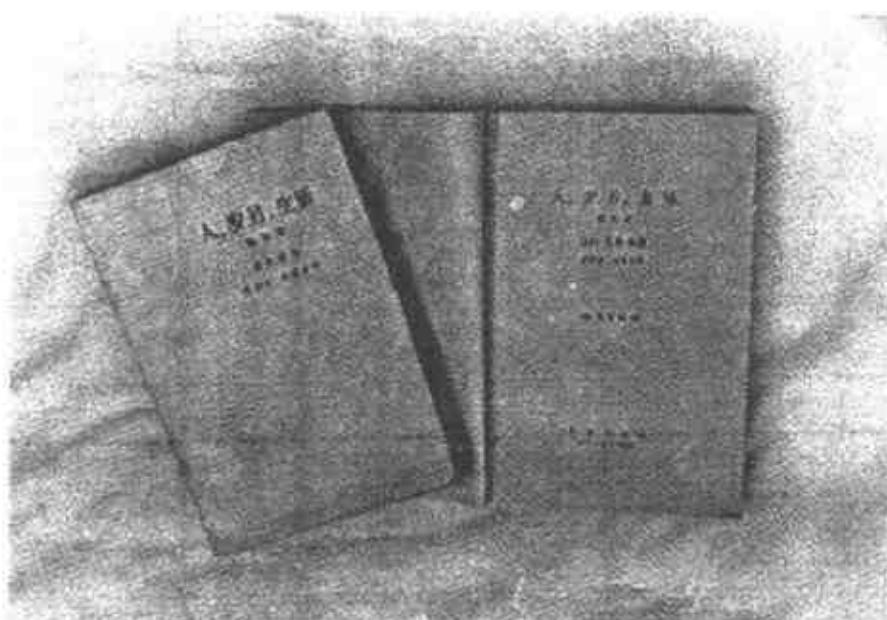
老威：走路？这有啥好说的？流浪汉当然要走路。

王响：人生只有三种姿式，躺、坐、走。其中走路最有意思。

老威：站算不算一种姿式？

王响：站只是过渡，准备走或准备坐。

老威：好吧，我猜你是在保持一种“在路上”的心态，可开始流浪的时



爱伦堡的这部名著曾以“黄皮书”的形式流传在少数高子弟里，它曾对王响这种精神流浪汉产生了方向性的影响。



老人、孩子与海，流浪汉最终的家园。
（王响摄于1997年的南海）

候，你不一定只为了“在路上”。你是为了一种理想，一个现实的目标，例如成名成家之类。单纯的功利目的，或许幼稚、可笑，然而它非常青春、美好。你我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王响：你的确老了，老威。

老威：我操你妈！

王响：怎么？戳中痛处了？时间就是永不愈合的伤口。你还像在《黑道》里一样，没人知道你的真实年龄？

老咸：我40岁，还能对付许多女人，但生理上只需要一个女人。我还没学会宽容、理解。记得十年前，我大吼大叫地朗诵诗歌，两个多小时也不觉得累……

王响：我们都来老一回吧，一起提前怀旧吧。我83岁，你81岁，与我们相好过的女人全都住进坟墓里了，即使没住进坟墓的，也老得不叫话了。你我儿孙满堂，德高望众。可有啥意思？大家巴不得离我们远一点，因为你的口水一天到晚淌个不停，让人忍无可忍。

老咸：你的哮喘也叫人非常绝望。

王响：差不多。那么我们怎样让年轻人忘记你的口水和我的哮喘呢？

老咸：一个人呆着。

王响：不行，人一老，一个人呆着，还不如自杀。

老咸：自杀败坏名声，后代也跟着受连累。

王响：对，你这老头还不糊涂。

老咸：那就锻炼身体，争取长寿。

王响：为保命而拼命折腾？折腾完了还不是死？

老咸：那就朝年轻人堆里挤，让他们以我为核心？

王响：成为年轻人和中年人的核心？那不累死，听说有位将军接见外宾时，一激动，连流尿了也不晓得。

老咸：你太糟蹋老年人了，其实我觉得许多老年人比年轻人可爱。

王响：可爱在啥地方？

老咸：好像，这些老头，特别慈祥，特别善于倾听。

王响：还有呢？

老咸：特别会说话。

王响：应该说特别健康，平和而健康。他们讲故事的语调…

...

老戚：我晓得，你老了，就成了一个卖流浪故事的家伙。

王响：我没多少流浪故事。你刚才猜对了，我的确想保持一种“在路上”的心态，我不想提前到站，因为女人和家庭在给我稳定、和谐的归宿感的同时，也在暗示道路的终结，人生的终结。我有目的吗？对，我开头有现实的功利目的，我最崇拜的作家是高尔基。他的《人间三部曲》至今是我的座佑铭。最早诱惑我流浪的就是做一名高尔基那样的作家，走遍人间的每一个角落，他在伏尔加河上的一条客船上当小工，整日洗盘子，累得死去活来，但却结识了一位相貌凶恶、内心善良的胖厨师，这个厨师为了保护他，竟把两个堂倌的脑袋揪住，发疯地互相撞。就这么一个野蛮人，却喜欢听高尔基读英雄加里波第的传奇小说。当听到加里波第被抓住，打人死牢，等待行刑判决时，厨师的泪珠子一个劲地掉，终于忍不住痛哭失声……在中国，这样的苦难还少吗？为什么中国人天生缺乏这种具有历史厚重感的苦难？于是在很小的时候，就渴望像高尔基那样离家上路。伏尔加河，伏尔加河，这条我从未见过的遥远的异国河流，在我的脑海里，比长江、黄河要深远得多，因为高尔基曾经站在岸边，目睹一船船苦役犯在远行西伯利亚之际，与父母妻儿诀别的情景。天空、河流、岸和人们都是铅灰的，一阵阵告别的深长的歌声与撕心裂肺的嚎哭交织着，与镣链的叮当声交织着……我也在寻找我灵魂里的伏尔加河，这是最初的文学目的。中国绝大多数文人一辈子只有最初的目的，他们为了震惊世界，挖空心思地虚构，挖空心思地博览群书。写呀写呀，他们那些伟大的情感和道德感，或者这种东西的反面，都是编写出来的，挖空心思地设计出来的。在这些书里，只能读到以文字为目的的故事或非故事，而摸不到文字皮肤里的血管。他们总是热衷于讨论“中国作家为什么没得到诺

“贝尔文学奖”的问题，讨论来讨论去，幻觉越大越愤愤不平，于是组成作家代表团到国际讲坛上去毛遂自荐：“中国作家已不止一人有资格获诺贝尔奖……主要是语言的隔阂，翻译的不过关。”

老戚：没想到你的文学情结这么重。

王响：这是我流浪的初衷，就好像我的初恋。高尔基就是我的初恋，他救了一个苦孩子，为这个没有教养的社会底层的苦孩子树立了一个高大的目标。成了作家，我就可以不受欺负，而在成为作家之前，必须流浪。文革开始时，我才8岁，我爸是个普通中学教师，就因为把陶铸的散文《松树的风格》教得特别好，就成为黑帮分子，挂上黑牌遭批斗。我小学只读了两年，当出身地主的爸爸倒霉时，我们在出身城市贫民的妈妈怀里找到了安慰。我小小年纪就晓得努力表现，背《毛主席语录》，背《老三篇》，并在大街上拦住大人背。有两位医院的护士背错了语录就拨拉开我们，逃之夭夭，我们一直追到医院，并且以几个战斗兵团的名义贴了大字报，逼得人家公开哭鼻子检讨。

我觉得自己很争光彩，与爸爸划清了界限。不料有一天，老师率领全体小学生，倾巢出校门，到川剧团开批判坏分子的大会。几千人把剧场挤得爆了，可还有不少人企图进来。我们小学生被提早安排在剧场二楼，高瞻远瞩，把被好多盏射灯照得雪亮的戏台看得清清楚楚。坏分子被押着，鱼贯上场，“打倒！”

“砸烂！”的口号震得天摇地动，我也憋红着脸，举着小拳头投入这怒海狂潮。十只垂头丧气的死老虎排成一溜，把戏台站满了，我以为都齐了，可口号还在呼啸着，突然，第十一名坏分子被几个红袖章拽上台，她反抗着，几次都企图扭身而去，但幕前幕后，台上台下，都站着收拾她的人，群众怒吼着：“老实点！”“狗日的！”“整死！”她终于被制服了，双臂反剪着，专

政者揪住她的头发，使她的脸仰起亮相。

我愣住了，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而周围的同学已经叫开了：“那不是王响他妈妈么？！”“王响的妈是坏分子！”“王响的妈乱搞男女关系！”我蔫了，真想钻到椅子底下去，可台上专政者又领呼口号了：“打倒投机倒把犯廖××！”我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可小拳头还是迟疑地举了起来，嘴角抽动着。

我的小学教师是个年轻姑娘，她不仅没安慰我，还一脸愤怒地质问我：“王响，你妈为啥要投机倒把？”我回答不上来，接着又听见“哼”的一声。这叫什么老师？他妈的，现在提起来我都想强奸了她。后来我才知道我妈的罪状就是把亲戚给的六尺布票卖了钱，正在私下交易时，被盯梢已久的市管会人员当场拿获。那年头，这就叫“投机倒把”。

虽然我明白妈妈是因为要养活我们才这样做，然而我觉得再也没脸上学。就离家出走。

老戚：这是你最早的流浪？

王响：对。兜里揣了一块钱，那是我一分、两分，积了大半年的成果。还有两本连环画，《西游记》和《在人间》，《人间三部曲》之二。我爬汽车，到过四川北部的三台、盐亭、中江。我曾经去河里帮人背沙背卵石，供修筑公路，一天能挣三毛钱。那时候的三毛钱，很管用。我还到烟厂为烟叶上焦油，一口黑糊糊的大锅，围着十几个打零工的孩子，都左手拿烟叶，右手持碗从锅里舀粘稠的浆汤浇下去，晚上就睡烟草堆。我唯一的娱乐就是看随身的两本连环画。别的孩子的梦想都是当解放军，开飞机，开大炮，只有我，迷上了连环画里的高尔基。

稍微长大些后，我又到农村给当知青的哥哥做饭。在哥哥的熏陶下，读了一本文革前出版的《高尔基中短篇小说集》，其中《伊则尔吉老婆子》里，有两篇寓言故事，一是《鹰之歌》，另

外一篇名字忘了，但印象深刻，是一个叫丹柯的英雄青年从胸内抓出自己燃烧的心脏，当火炬高举着，率领在森林里迷路的人们走了出来。这两篇浪漫主义作品令我激动了一年多，觉得献身文学是非常崇高的事。这期间，我又从哥哥那里出逃了两次，到处爬车。

老威：你一再提到高尔基，难道除了这个无产阶级作家，其它作品就没有给你影响？

王响：知青里流传着许多手抄本小说，我哥一窜队，我就偷着看。《第二次握手》、《在社会档案里》、《塔里的女人》我都看得废寝忘食。我看《少女之心》是 72 年回成都的时候。由于我哥的犯禁小说我基本上都看了，所以语文功底比一般上完小学的孩子扎实，我小学只读了一年，停学五年，就直接上了初中。刚入课堂，我省略号不知道打几点，我总是打整整一排省略号，因为我总是觉得文章写不完，有很多意思没包括进去。好了，扯远了。嗯，我是上初中读到《少女之心》的，它是隔壁一个失学少年借给我的，它的另一个名字叫《曼娜回忆录》。我躺在床上，放下帐子，看得上气不接下气，即舒服又意犹未尽。现在看来，这不过是一本性爱教科书，可那诗情画意中的幽会与交合令人一阵阵地颤栗！接下来的几天，我都莫名其妙地亢奋，下意识地乜视班上的漂亮女生，她们也和曼娜一样成熟了。从这本禁书中，我第一次知道了性爱除了其它书中描写的拥抱、接吻与正面交合外，还有那么美妙、繁复的前戏和事后的满足，还有男在下、女在上的游戏。

老威：这时你还记得高尔基和其他作家给予你的道德教育吗？

王响：全被扫得干干净净。要知道，我还是个 14 岁的孩子啊。

老威：这很危险。

王响：对。它诱使我在同女生的交往中，有了强烈的性联想。不过，没有几天就开始“扫黄”了，那时的“扫黄”就是收缴手抄本。小说，文革前的诗歌和爱情歌曲，俄罗斯爱情民歌，港台歌曲，都在收缴之例。借给我《曼娜回忆录》的那个矢学少年被抓了。游了街，脖子上挂着黑牌，上写“传播《少女之心》犯”，他被送去劳教了。我担惊受怕了几天，就外出流窜了，我怕他把我咬出来。

老威：我看你是属兔子的，撞见危险的信号就逃，你的流浪习性就是这样养成的？

王响：差不多。似乎每次逃跑都在改变我的人生。

老威：有没有不逃的时候？

王响：有逃不掉的时候。比如文革后期，我传抄、张贴《总理遗嘱》，被莫名其妙关了两年。这事我给你说起过。别人传抄、张贴东西都有社会目的，就我这傻瓜，天生养成了这么个传播“谣言”的习惯。那年我18岁，刚刚够格就进去了。我还到过劳改监狱，那儿关了许多反革命，还有一个是国民党《扫荡报》的记者，已劳改了几十年，反动弯子还没转过来。我就是在里面跟一个老和尚学会吹箫的，他说他教了十几个徒弟，只有我敢在吹法上欺师灭祖，因此能成大器。虽然至今我不晓得自己成大器没有，可我的确靠这管箫在流浪途中混了不少饭钱。我到大使馆去吹过，也出过黑磁带，也险些成为一个著名酒吧的职业吹手，只因我有一次带了十几个朋友去白玩白喝，老板发牢骚，我才罢吹的。你看，我又扯远了。我这是典型的流浪汉，走到哪儿黑在哪儿歇，说话也一样。我在牢里除了劳动，就是吹箫；除了吹箫，就是在操场内兜圈子，越走越快，一天要走好几十圈；自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东西，你尽管走，一直走下去，就感觉不到

是在监狱里。而吹箫是练丹田之气的，我坐牢两年，筋骨和内气都练了，并且随心所欲地想象比在外面还要深远，这是一种最为愉快的流浪方式。比如我的和尚师傅说：“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我问：“为啥不如肉？”师傅答：“肉就是整个身体。你只有把整个身体当成一管箫，才能练好这根竹箫。”我又问：

“肉箫和竹箫的区别呢？”师傅答：“竹箫是一气到底，肉箫则分吟、唱、啸。我再问：“何为吟？”师傅答：“古有《吟之十二法》，深吟、浅吟、显吟、暗吟……以此类推，有《唱之十二法》与《啸之十二法》。”

这种对话你们门外汉或许不明白，但它已使我的脚迹上溯到历史之外。你记得“响遏行云”这个成语吧？它讲的就是一个名扬天下的大歌星慕名去深山拜隐者为师的故事。这个隐者在大歌星跪了三天三夜之后，点头收其为徒，可又只教他爬山、砍柴，把他当作苦力使唤。他忍气吞声了三年，总以为师傅能突发慈悲，教他一些出奇制胜的技法。然而，这徒有虚名的隐者像哑巴一样，三年不吭一声。大歌星悲怨交集，再也不愿忍受这种野人般的学艺生涯，终于不辞而别。他飞奔下山，连翻几道坡，也不觉得气紧，就加快步子，他太想念过去被万众崇拜的世俗活法了。

正当他已翻过十几道山梁，脚力稍缓时，倏然，当顶炸响了一个巨雷，他下意识地抬头，见晴空灿烂，而雷声还在滚滚而来，四山回应，连天边的白云也被遏制不动了。他恍然大悟，转身就朝回跑，当重归师门时，他的师傅已经杳无踪迹。

“师傅，我错了！”他大喊道，泪如雨下。而回答他的是一个比雷声更空洞的声音：“去吧，为师已教过你了。”

老威：你的经历的确不凡，你坐现代的牢，却通过你的和尚师傅流浪到了古代，甚至古代之外。在这一生中，你的吹箫师傅

对你影响最大吧?

王响：我再也没见过他，一恍 20 多年了！有时，我真有点怀疑自己的经历，这老和尚存在过吗？是否是我的一种幻觉？但我的箫声还在。现在我给你讲一个比我师傅实在的人。这人是 57 年反右时判的刑，反革命罪，无期徒刑。由于坐牢坐成老资格，再加上懂点医，就成了队里的卫生员。你可能不清楚，牢里的油荤很缺乏，更别说大鱼大肉了。按规定，一个星期吃两回肉，有时是辣椒回锅肉，一人一瓢，当然辣椒占大半；有时是莲花白炒肉，肉就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小砣。我讲的这人姓杨，当时 65 岁。每次吃肉时，他都厚着老脸，让犯人组长给他多分肥一点的，而后，他端起肉钵回到卫生室，关上门，点燃酒精灯，把挑选出的肥肉片或肥肉砣放在灯火上炼油。他只能炼出很少的一点油，他把这辛辛苦苦得来的猪油一滴滴刮进一个瓶子，才端起碗，把剩下的油渣和菜吃掉，还舔碗。

老戚：这人也够深谋远虑的，万一断了肉，他还有油解痨。

王响：你错了，他把这三个月才能攒满的一小瓶化猪油（大约三两多吧）捎给他母亲，几十年都这样。当时他妈快满 90 岁了，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

老戚：这是圣人啊！

王响：不错，“三尺之外，必有圣贤”，这是孔夫子说的吧？

老戚：没印象。唉，你在牢里收获可真大，出来之后能适应吗？

王响：相当于从传统回到现代。以后，我又当过汽车司机，去的地方越多，文学的情结越淡。

老戚：这就怪了，经历是搞文学的本钱啊。不过，我听了这么久，也没听到一个完整的流浪汉故事。

王响：走之前和走之后有故事。在路上的故事肯定有，但比走路精彩的不多。我这个人，也许开始流浪的时候，有很明确的功利目的，可当我豪情满怀地走在正道上，路旁突然窜出一条疯狗，咬我屁股一口就跑；我的天性受不得气，就去撵这条狗，欲除掉而后快。然而，过了一会儿，狗不见了，我却找不到回去的道，只有照一种惯性走下去。不料路旁又窜出一条疯狗……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狗咬人，人追狗的戏，我离自己最初的正道越来越远。

老威：这就是你的流浪故事？

王响：对，那狗就是命运吧。